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局透视



美国国家安全局透视

第一章翻云覆雨

第一节绝密中的机密

1952 年 10 月 24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一份长达 7 页的致国务卿艾奇逊和国防部长洛维特的总统备忘录。这件被列为绝密、甚至上面盖的代号也被列为机密的文件指示说，成立一个美国最新、最机密的机构。根据这一指示国家安全局在 1952 年 11 月 4 日诞生了。它不同于其他联邦机构，是默默地成立的。没有记者报道，没有经过国会辩论，没有发表新闻公报，甚至连小道消息也没有。不管是《政府机构手册》、《联邦年鉴》，还是《国会纪录》，对这个机构都只字不提。

数十年后的今天，这份备忘录仍然是华盛顿封锁得最严密的一个机密，依旧是“美国政府过去及当前一切通讯情报活动的依据”，如今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名字虽已不再保密，但有关该局的一切具体情况仍然讳莫如深。美国新闻记者丹尼尔·肖尔在他所著《澄清真相》一书中，称安全局为“绝密中的机密”。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维克托·马凯蒂则称之为“情报共同体中最隐密的成员”。

这样保密的结果是，除了美国情报特工共同体的核心集团外，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情报特工大权已逐渐由中央情报局转移到国家安全局手中。因此，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有个报告说：“如果拿预算做为尺度，安全局局长在情报共同体中就成了最有权势的人。他还兼任中央安全局主任，掌握着国家情报预算中最大的一个项目。”

维克托·马凯蒂和约翰·D·马克斯在他们合著的《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一书中报道说，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因对他在情报共同体中不掌握实权而感到很灰心。有一次他对手下人表示，他作为情报主任，在理论上应对全国情报工作负有百分之百的责任，可是事实上他只掌握情报共同体百分之十五的人力和物力，而百分之八十五的绝大部分则属于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据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说，“兼任中央情报主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所能掌握的全国性及战术性的情报经费，已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十”。

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被卡特总统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后，很快就发现中央情报主任的职务已经变得十分虚弱无力了。不久，他就建议设立一个形同“情报太上皇”的职位，使自己对日益庞大的情报共同体拥有绝对的权威。这一建议引起了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一场激烈争吵。布朗认为有些机构主要是面向国防的，他坚决反对由任何人接管。

直到 1978 年 1 月 24 日发布了 12036 总统命令,这场争吵才算得以解决。这项命令改组了情报体系，较大地限制了收集情报的各种手段。命令否定了特纳的意见，但在整个情报共同体的人事任免和财务预算方面，也给了中央情报主任较大的权力。

尽管特纳在整个情报共同体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可是由于技术情报日趋增多，特工情报日益相应减少，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主要情报收集机构的作用在继续下降。早在 1973 年詹姆斯·R·施莱辛格接替赫尔姆斯时，在他的中央情报局总部短短 5 个月的任期中，已精简了 2000 多名雇员。1977 年 3 月特纳海军上将上任又继续减裁了 800 多名雇员。到 1978 年时，情报局行动处的人员已由越南战争时期的 8000 人的高峰减到不足 4000 多人。

虽然国家安全局也裁员，但到 1978 年，它仍然拥有 6.8 万多人，比情报

共同体中所有其他机构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安全局具有这样大的规模和权力，却从来设立过任何法规限制它的活动；相反，只有严禁透露该局一切情况的法律。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在一份报告里说：“安全局的建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它的职权范围也没有任何界线。”对比之下，中央情报局则是依据 1947 年《国家安全法案》成立的，法案明确规定了情报局的合法权限和对它活动的限制。

安全局除了享有不受法律限制的自由以外，还拥有人们难以想象的窃听技术能力。这种能力会随时转向美国人民，使任何个人生活中的私事都隐藏不住，因为这种技术不论是电话谈话还是电报，任何内容都能监听。美国已秘密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窃听设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用。

这是一条艰难而危险的道路，谁也没有料到它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印第安纳州的小城沃辛顿的景色宜人、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就开始了。至此，从该局内部选拔的专业人才担任副局长已经形成传统。下一任副局长的任命只从一个方面改变了传统——任命了一名妇女。她就是 59 岁的安·Z·卡拉克里斯蒂。她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信号情报高级管理人的岗位上度过的。1942 年，她从大学毕业后，几乎立即就在陆军安全局找到了工作。她在战争期间一直研究日本密码，战后当过短期记者，然后又回到陆军安全局做密码工作。她在陆军安全局和后来的国家安全局内逐步晋升。1959 年，她被任命为信号情报研究办公室主任，从 1972 年至 1975 年担任 A 组（主要的信号情报分析组）副组长，以后又担任组长，直到 1980 年被英曼局长任命为副局长为止。像国家安全局其他许多有成就的管理人员一样，卡拉克里斯蒂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她的事业。她是单身女人，孤独地居住在华盛顿市优美的乔治敦区中心的住宅内。她每天早上驾驶道奇公司制造的青绿色“奥姆尼”牌小汽车，向北行驶去米德堡上班。卡拉克里斯蒂是国防机构内升到高位的极少几名妇女之一。1975 年，她是国家安全局历史上第一位升到行政十八级高位的妇女，也是整个国防机构内升到这个最高级别的第二位妇女。在副局长以下，国家安全局的组织体制一向是该局最高的秘密之一。与从不隐瞒上层组织体制的中央情报局不同,国家安全局于 1959 年悄悄地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用一道保密帷幕永远遮住了它的组织体制。第八六一三六号公法第六款规定：“不得援用本法或其他任何法律的条文来要求透露国家安全局的编制或任何职能，透露该局的任何活动情况，或者该局所雇人员的姓名、职称、薪俸或数量。”因此，根据这项很少为人所知的法律，国家安全局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权力，简直可以否认自身的存在。

第二节亚德利的野心：统治美国

赫怕特·奥斯本·亚德利于 1889 年 4 月 13 日出生在美国沃辛顿。在那里，伊尔河静静地流入了颇为浩荡的白河。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天地从未越出过印第安纳州西南部的那些小城。这些小城取名都非常闻名知义，例如煤炭城、粘上城、自由城等等。他是铁路报务员之子，过往列车雷鸣般的隆隆声不仅使他想起父亲是铁路员工，而且还引起他的遐想，神游迷人的远方城市和陌生的土地。

在中学里，他是十足的幸运儿，也可以说是神童。他性格开朗，聪明过人，谈吐诙谐，深得众望。因此，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担任了班长、校刊编辑和橄榄球队队长。不过，他成为全城最大的扑克迷之一，那倒有点儿出人意外。

1912 年 23 岁的亚德利乘火车到首都华盛顿，走进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一次华盛顿之行使他成了美国第一个破译密码组织之父的创始人之一，并以最早的密码专家载入世界史册。

亚德利到达华盛顿时，正值美国上升为世界大国的年代。而这种大国地位给通讯领域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利害关系。1912 年 10 月 16 日，他在国务院当上密码员兼报务员，年薪 900 美元。

他的梦想开始实现了。

源源不断地送到他桌上的国务院电报至少都是机密电报。不过，在成为历史素材之前，它们仍是机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于是，亚德利担起心来了。因为，他知道，其他国家雇用了一些破译员去解开外国密码电报之谜。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这样干呢？他后来写道：“ 当我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我知道我已经有了答案………并把它作为终生追求的目的。我将为编密术贡献我的一生。 ”

于是，他前往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少得可怜的几份材料，从此开始自学这门神秘的艺术。他练习译解国务院的电报，同时开始搜集华盛顿某些外国大领事馆外交密电的副本。他是从什么地方以及用什么手段搞到这些机密电文的？这大概将永远是一个谜。在他后来的记述中，他只是间接地提到了“ 通过过去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 ”，这大概是指他在电报公司里的伙伴。

1916 年 5 月间一个安静的夜晚，在纽约电报局和白宫之间的电报线路开始工作了。通常，国务院的译电员们对此不甚留意，因为电报是直接发往白宫的，而且是用他们不熟悉的密码，亚德利却把这五百字的密码电文抄了下来。电报是总统助理兼个人代表豪斯上校给威尔逊总统的。上校刚和德意志皇帝进行完会谈。要是有什么密电值得让亚德利一试身手的话，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

亚德利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把密码破译了，结果他自己也大吃一惊。他对美国密码所怀有的敬意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他知道豪斯上校的电报都要通过英格兰的电缆，而英国皇家海军的密码局对所有的电报都一律截取，所以这只能有一个结论：豪斯上校的报告成了向盟国提供的免费情报。

接着，这位年轻人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暗中撰写一篇论文，论述美国编密术可悲的现状，并提出这些密码极易破译。当战争阴影出现在天边时候，亚德利把这篇题为《译解美国外交密码》的分析文章呈给上司戴维·萨蒙。萨蒙在看这篇文章时一言不发，他首先想到的是英国有一个破译外交电报的

庞大机构。于是，他问亚德利是否相信英国密码专家能够破译美国的密码。亚德利答道：“我一向认为，某个人能办到的事情，别人也能办到。”后来，这句话成了密码学上的箴言。

一个月之后，萨蒙十分自信地递给亚德利一些用全新的密码系统编写的电文。几个星期之后，亚德利把译解出的原文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至此，萨蒙不得不承认，没有破译不了的东西。

此时，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亚德利认为，在国务院里充其量只能像蜗牛爬行似地晋升，没有前途，如果转到陆军部去，“很快就会统治美国”。1917 年 6 月 29 日，他戴上了少尉的金色红杠，掌管了军事情报处第八科（简称 MI—8）。该科在处内负责制订所有的密本和密表。

1918 年 11 月 11 日签订了停战协定。那时，亚德利正在巴黎，试图加强同法国情报机构“黑屋子”的合作。于是，华盛顿指示他掌管配属给出席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的密码组。这一小批密码学家在旅馆的两间屋子里将代表团的电报译成密码，并且译解其他同盟国的电报。截获的许多电报都与会议期间十分活跃的特务和间谍活动有关。在会议期间，各国都尽力互相摸底。

和会结束之后，亚德利乘船国国，他觉得前途难以预卜。1919 年 4 月 18 日他到达美国时，关于是否保留窃听外国通讯机构与设施的问题，已经在国内引起了一场争论。他接受了一个起草保留情报八科并把它改为和平时期的机构的报告的任务。5 月 16 日军事情报处处长将这份报告呈递陆军参谋长。报告主张成立一个处，雇用年薪 3000 美元的密电暗码专家 10 名，年薪 2000 美元的密电暗码专家 15 名，年薪 1200 美元的办事员 25 人。处长本人则拥有每年收入高达 6000 美元的可观薪水。全部预算，包括房租、取暖、电力及参考书等，定为 10 万美元，其中 4 万美元由国务院支付，6 万美元由陆军部支付。陆军部这笔开支则用“机密备忘录”提出，不受审核——可能就是这个办法开创了美国情报开支列为机密的先例。

报告送上去第二天，就得到了代理国务卿弗兰克 ·L ·波尔克的批准。1919 年 5 月 20 日，陆军参谋长马奇将军签名的墨迹未干，美国的“黑屋子”就诞生了。

为了保密，同时也由于国务院认为依照法律这笔预算不能在哥伦比亚特区内使用，亚德利把他的机构设在纽约市。他起初曾考虑使用东三十六街十七号的一栋房子，但是最后选定了东三十八街三号一座富丽堂皇的四层楼房：这栋楼房是他的一个老朋友的。

从始至终最重要的是保密第一。每个新雇员都得到了一份 · 保密须知，其中规定了防范措施，写明了为“黑屋子”打掩护的一套说法：你在哪里工作、你做什么，都不能说。但为避免显得过度诡秘，你可以说你是陆军部雇用的，在翻译室工作。除了这些打掩护的说法之外，“黑屋子”还有一个掩护地址是：纽约市中央车站邮政信箱三五四号。一切邮电都使用这个地址为了进一步掩盖真实工作性质（同时也是为了捞点外快），亚德利在大楼的第一层开办了一家企业，叫做“电码编制公司”。如果有人闯进了大门，他就会看到这显然是一家合法公司。这家公司确实编制了一种商用电码——“通用商业电码”，并以出售这种电码获利。

亚德利的小小事业像火箭一样起飞了，到 191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的午夜，这火箭到达了它的最高点——亚德利终于破译了日本密码。在五个月以前，亚德利曾立下军令状：他要在一年之内攻破日本的密码；不成功，

他就辞职。破译成功的好处也很快显露了出来。

1920 年夏，各国准备召开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签订美、英、法、意、日五国公约，规定主要舰只总吨位的限额。这项公约将根据各国现有的海军实力，为舰只的总吨位规定一些比例，并且要求维持这些比例。

会议定于 1921 年 11 月 14 日在华盛顿开幕。会议前三天，美国代表、国务卿查尔斯・休斯曾经透露出美国关于吨位的立场：和英国并驾齐驱，与日本是 10∶6。在这个比例数中，“一”就等于主力舰 10 万吨，也就是说，差不多等于 3 艘战列舰，因此，休斯国务卿所追求的协议是美国 100 万吨，日本 60 万吨；而日本是当时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最富侵略性的国家。

在亚德利看来，这次限制军备的会议是向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证明其“黑屋子”巨大价值的天赐良机。从那时起，“黑屋子”破译和翻译出每一份电报，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因此，美国很早就获悉，日本已把同美国之间的最低比例定为 10∶7（日本 7）。

日本代表加藤友三郎将军宣布这一立场后，会议似乎陷入了僵局。然而，译解出来的那些电报却开始表明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后来，在 11 月 28 日，“黑屋子”破解一份电报，亚德利认为这是“黑屋子”经手处理的电报中最重要、最影响深远的一份电报。这·9·份由日本外务省发给它在华盛顿的代表团的电报，首次流露了日本 10∶7 的立场有所松动的迹象：

“关于战备限制问题，必须避免和英，尤其是美国发生冲突。你应尽力保持中间态度，并为实现我国政策加倍努力。如实不得已，可争取实现你第二个，即 16∶6.55 的方案。如虽已尽最大努力，但迫于形势和为了总政策之故，不得不退到你第三项方案，则请努力争取得到保证，削减或至少维持太平洋之防务现状，以限制太平洋上之聚结与调度力量，并就此提出适当保留条款，说明我方同意 10∶6 之比例的意图。”

亚德利是一个瘾头很大的扑克迷，他把美国现在应当采取的立场比作知道对方底牌的扑克老手所应采取的立场：“只要拖延时间就行了。”最后，日本在 12 月 10 日放弃原先的立场，同意了 10∶6 的比例。

到 1922 年 2 月 6 日会议结束时，亚德利因积劳成疾，离开“黑屋子”，到阳光充足的亚利桑那州休养了几个月，6 月间重新返回时，形势发生了变化。

陆军部和国务院的会议厅和办公室里，已没有人再焦急等待最新破译的情报。那万分重要的会议开过了，而美国则在享受着企盼已久的太平岁月。

其实早在此之前，“黑屋子”已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没有电报，就不可能有破译。在战争期间，获取电报不成问题，因为要对电报实行强制性检查。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无线电通讯法案》重新生效。这个法案规定必须保证电信的秘密。除非具有足够权限的法院或者其他主管当局提出合法要求，否则除将电报内容告诉收报人、他们委托的代理人或转发电报的电台外，任何从事电台工作或了解其工作情况的人均不得泄露或公布电台拍发或收到的任何电报的内容。

这一法案是 1912 年 7 月 8 日的《国际无线电电报公约》发布之后通过的。这对“黑屋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如果必要，即使使用违法手段逾越也在所不惜。

1919 年 4 月，国务院决定同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建立秘密联系，希望该公

司在提供所需电报的副本方面能同“黑屋子”合作。几个月来，国务院的此项努力毫无进展，因为无线电通信法令规”定要严惩电报公司任何泄露电报内容的雇员。于是，亚德利建议情报处长亲自去拜访西部联合公司总经理纽科姆·卡尔顿。这次会晤安排在 9 月份，情报处长在亚德利的陪同下向卡尔顿总经理提出了对“黑屋子”提供所需的一切电报副本这个微妙的问题。亚德利后来写道：“我们把牌都摊到桌上之后，卡尔顿总经理似乎很愿意尽力为我们效劳”。

1920 年春，“黑屋子”开始与另一家大电报公司一邮政电报公司联系，提出了索取电报的要求。然而，该公司职员们远比西部联合公司首脑们的顾虑大，他们担心会引起刑事诉讼。为此，同“黑屋子”的谈判是通过中间人——纽约的律师贝茨进行的。所有的信件都写得很谨慎，以免局外人搞懂其真实含意。

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于是，就只剩下全美电报公司这家较小的公司了。该公司经营北美洲南美洲之间的电报业务。当年晚些时候，亚德利通过战时曾在军事情报处当过军官的戈莱特开始同这家公司谈判。

1921 年初，亚德利与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精心织成的合作网险些被拆散。3 月 5 日下午，距离迈阿密澳 4 英里的海面上，美国一五四号猎潜舰的前炮瞄准了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海底电缆架设船“罗伯特·C·克洛里”号，然后随着一声震耳的轰鸣，射出一发炮弹飞过“克洛里”号的船首。“克洛里”号船长 H·M·史密斯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停了船并在猎潜舰尾随下驶回港口，使西方联合电报公司和联邦政府之间原有的一场剧烈争论发展到了戏剧性的高潮。

几个月来，这家庞大的电报公司一直试图从费罗坦克达州铺设一条海底电缆，与英国通往巴西的海底电缆相接。但是，这种电缆衔接将会加强英国对美国与那个南美国家之间通信联络的垄断地位。国务院担心，这种垄断将会极大地损害美国的商业利益。当时，英国人几乎完全控制了一切国际商业谈判的主要渠道——世界海底电缆网。不管海底电报发自何处或发往何处——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乃至美国，多半都要在某个地方通过英国的海底电缆网传输。国务院获悉英国人正在秘密地窃听一切海底电报（不仅窃听政府的电报，而且窃听商业电报）后，更加惊恐不已。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就开始这样干了，并且一直干到现在。

在此以前，已经有另外一家美国电报公司铺设了通往桑托斯和里约热内卢的美国电缆，因此，在美国和巴西之间就能直接通讯。问题在于，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对发自美国的电报掌握着安排发送路线之权，因此，它只要把一切往来于巴西的电报都经由迈阿密一英国一线收发，就可以把另外那家公司挤垮，前面提到的那条猎潜舰的舰长威廉·H·克拉普罗思少尉的任务就是阻止这次连结，使之不能实现。经过这警告性的一炮，“克洛里”号便驶回了迈阿密，结果只差 4 海里就要到达目的的电缆也沉到海底去了。

4 月 2 日，当这场争执仍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亚德利与其西部联合公司的联系人 J·C·威利维尔副总经理进行接触，要求他提供“黑屋子”很感兴趣的某国代理人交发的某些电报。但是，这项一直转到总经理纽科姆·卡尔顿手中的请求，提得实在不是时候。卡尔顿对于国务院和海军的行为仍然怀恨在心，拒绝再给“黑屋子”帮忙。亚德利不甘心认输，于是去见担任军事情报处处长的 D·E·诺兰准将。战争期间，诺兰担任军事情报处驻法工作组

的组长时，亚德利就和他相识了。亚德利建议诺兰与卡尔顿会商，设法谈妥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办法。这项协议是否达成了？这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不能见诸文字，即使有文件也可能被销毁了。

至于说同各公司的合作持续了多长时间，谁也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自 20 年代中期到后期之间，流向“ 黑屋子 ”的电报，急剧减少。这种情况可能起因于 1927 年制走的《无线电法案》，这法案比 1912 年的《无线电通讯法案》又进了一步。1912 年的法案只规定，电报公司有关人员如果把电文内容泄露给未被授权的人，就构成犯罪；1927 年的法案则堵了一个漏洞，规定未经授权而接受电报的人，也要受到刑事处分。虽然后一法案也规定了例外，即经“ 合法当局之要求 ”可以提供电报内容，但亚德利和他的绝密的“ 黑屋子 ”很难援用这项规定。

电报公司提供的电报减少了，于是转而注意建立窃听无线电通信的侦收站。在战争期间，这项工作曾由通信兵负责，其主要用途在前线——用无线电情报部队监听德军的作战通信。在美国本上，曾沿南部边界派驻“ 流动牵引车 ”部队，侦收墨西哥的某些电信。不过，当时无线电还是一种问世不久的手段，人们认为用它进行两个固定电台之间的长途通信并不可靠。

现在战争结束了，各电报公司供给的材料越来越少，亚德利开始再次探索建议截收电台的可能性。

1925 年，军事情报处曾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侦听站来监听日本的无线通讯。通讯兵部队对这个想法也很热心，并且建议派 4 名精干的电报员到中国去执行特别任务，在那里研究日语和学习判读日本无线电电码。但这个想法受到官僚主义的强烈干扰。1932 年，国务院把这个计划一笔勾销了。

20 年代中期至末期，事实证明，缺乏截收到的海底电报和无线电报是“ 黑屋子 ”面临的一大难题，而且无法彻底解决。亚德利的一度声云直上的“ 火箭 ”开始向地面回降了，它的“ 燃料 ”——电报正迅速耗尽。

第三节英国国务卿宣布“ 黑屋子 ”完全非法

“ 黑屋子 ”与国务院及陆军部之间的消息用“ 简报 ”的形式传递，每份简报部以这么一句含糊的词句开始：“ 我们从认为是可靠的方面获悉…… ”，接下去便是破译后经过改写的电文。

到 1924 年秋，截收到的电报接近于零，简报也就越来越少了。日本组的密码分析人员只得去整理战时和召开和会时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 黑屋子 ”与各电报公司初次建立秘密联系时获得的）。

1926 年全年，“ 黑屋子 ”只得到了 11 件日本电报，而且都是由无线电截获的。因为是用不同的密码编写的，数量不够，不能据以破译。1927 年情况有所好转，一共得到了 428 件日本电报，其中被解破的有 150 件。

缺乏截收的电报，加上各部门紧缩开支，使“ 黑屋子 ”遭到了沉重打击。亚德利被迫大减预算，解雇了半数以上的工作人员。辞退的共有 9 个人，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 · 利夫这样的宝贵人才，使美国的整个破译队伍减得只剩下 7 个人。

为了节约租金，也因为不久前有人潜入过，“ 黑屋子 ”由原来位置迁到了范德比尔特马路五十二号办公大楼后面几间房子里，使用的公开掩护招牌仍然是“ 电码编制公司 ”。

1929 年 3 月，赫伯特 · 克拉克 · 胡佛在就职典礼上声称：“ 我决不担心我国的前途。前途光明，充满希望。 ”接着，他就前往白宫，担任美国的第三十一届总统。胡佛任命保守派亨利 · L · 史汀生担任他的新国务卿。

对亚德利来说，华盛顿的任何变化对“ 黑屋子 ”都会有潜在威胁。于是，他向在国务院的联系人建议，暂时不要向新国务卿透露有他那样一个机构。他希望万一史汀生在就任以前怀有什么不切实际的道德观念的话，过上几个月的时间也许会变得现实一些。

后来，在 5 月份，亚德利译解了又一批日本电报。他认为现在是向那位给“ 黑屋子 ”提供经费的人透露这项极其秘密的工作的时候了。于是，他挑选了几份电报的译文送到国务卿的办公桌上。

史汀生立刻作出了强烈反映。他宣布“ 黑屋子 ”完全非法，并立即指示，砍掉国务院对它的一切拨款，因为“ 黑屋子 ”此时全部经费几乎都来自国务院，这就等于宣布了立即执行的死刑。

亚德利听到这个消息后显然很着急。“ 黑屋子 ”已经译解了 1 万多份电报（大部分是外交电报），仅在限制军备会议期间就译解了 1600 份。此外，自从 1917 年以来，亚德利及其工作人员一直吃力不讨好地埋头苦干，设法译解了发启阿根廷、巴西、中国、哥斯达黎加、古巴、德国、日本、利比利亚、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苏联、萨尔瓦多、圣多明哥（多米尼加共和国）、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密码电报，甚至还研究了梵蒂冈教会的密码。然而，尽管如此，现在却要亚德利去向他手下仅剩下的几个人传达新国务卿的指示：“ 君子不看他人的信件。 ”

1929 年夏季，史汀生给剩下的 6 个人预发了 3 个月的工资，将他们全部打发掉。在当年 10 月 31 日午夜，“ 黑屋子 ”正式关闭了，和它初开时一样不声不响。

亚德利失去了薪金收入，失去了工作，只剩下一些神秘而没有实际用处的新技术。

回到沃辛顿后，由于大萧条还不知何日终了，亚德利开始不很认真地考虑写一本书，表一表他担任“黑屋子”负责人期间的功绩。这种想法既诱人，却不好办——他毕竟曾在 6 年前写信对友人说：“大战以来，我一直为反对泄露与密码及密表有关的任何情况而奋斗不懈。理由很明显：这种泄露会使别国政府知道我们的本事，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更难进行。”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他就写过，如果日本知道了美国人可以看懂他们的电报，“他们就可能将新密码改得叫我们永远也译解不了。”

亚德利权衡得失，认为出书的道德理由超不出现实理由，于是，就着手物色一个代理人帮助他完善他的想法，他选定了纽约一很有名的出版代理商乔治·T·拜伊公司。拜伊公司立刻看出这样一本书的潜在价值，但建议第一步先在杂志上发表。《星期六晚邮报》杂志很感兴趣，同意分三期连载那篇文稿。最后，亚德利得到消息，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鲍勃斯一梅里尔公司同意了他的大纲，决定出他的书。

军事情报处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亚德利的出书计划。1930 年 5 月，“一家著名的出版商”告诉陆军部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斯但利·H·福特上校，亚德利已经找过他，表示要写一部书，详细介绍他受雇于军事情报处时的活动情况。亚德利完全信任这家出版商，详谈了自己于停战前后在陆军部领导下进行的活动。出版商与福特会商后同意了福特的看法，认为出版此书“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于是拒绝接受亚德利的出书建议。

出版商走后，福特找到了负责关闭“黑屋子”的军官之一奥尔布赖特中校，让他与亚德利联系。

第四节美国出版史上最有争议的书籍——《美国的“黑屋子”》

1931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晚邮报》突然预告该刊将亚德利的文章分期连载。华盛顿匆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上考虑提出诉讼，但是被否决了，因为审理案件就会牵连政府，使之更难堪。也考虑过禁止出书，但因既无先例文无法律根据，也被否决。

《星期六晚邮报》把文章分别以“密写药”、“密电”和“暗码”为题，在 4 月 4 日至 5 月 9 日间刊出了。文章轰动一时，极为成功，这几篇文章大吊读者的胃口，越发使人们翘首以盼全书出版。于是，6 月 1 日问世的《美国的“黑屋子”》，便成了美国出版史上最有争议的书籍之一。

该书立即大获成功。它以惊险夸张的文体记述了“黑屋子”隐藏很深的秘密。评论家们对它大加推崇，华盛顿官方则惊恐万状。一位评论家称赞它是“迄今由美国人所写的战争秘史和战后初期秘史中贡献最大的一部书”。另一方面，国务院不仅否认自己曾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偷阅日本的电报，而且甚至宣称国务卿史汀生从未听说过有什么“黑屋子”。几天之后，史汀改变了矢口否认的态度，满脸窘态地表示“无可奉告”。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表示他时“黑屋子”一无所知，军事情报处的高级官员们也作了同样的表示。

那年秋天亚德利周游全国，向各地听众讲演，讲到美国密码工作过去取得的成就，也说到如果没有这些成就前途将会如何黯淡。但是，他的志趣却是再写一本书。《美国的“黑屋子”》只是一本通俗性的揭露作品，在美国销售 1.8 万册。亚德利还想作为一个严肃的史学者得到读者的公认。他的新题目是要写 1921—1922 年军备限制会议期间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亚德利自己收藏了一批当时截获而由“黑屋子”破译了的日本电报。他聘用了一年轻的自由撰稿女记者玛丽·斯图尔特·克卢兹。后者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 970 页的原稿，为这本书定名为《1921—1922 年日本外交机密》。

1932 年夏季来临时，有关亚德利的新书的传闻已开始在华盛顿流传，亚德利怕这一次政府将对他采取行动，决定只署玛丽·斯图尔特·克卢兹一个人的名字。

一位在军备会议期间还是斯威特·布赖尔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年轻女士能够译解一大捍日本外交电报，并且写出一部与此有关的学术著作吗？显而易见，美国最棒的密码学家搞出来的这套骗人的花招实在是最笨不过的了。

写成的手稿装在 7 个棕色马尼拉纸袋内，悄悄地送给了鲍勃斯一梅里尔公司。但是，亚德利现在成了烫手的栗子，叫人不敢沾边，因此公司总经理 D·L·钱伯斯拒绝收槁。他担心司法部会禁止《美国的“黑屋子”》继续发行，于是为了讨好该部而将亚德利写了新书的消息暗中告诉了助理司法部长纽金特，多兹，指出书中大量使用了截获的日本电报。

多兹立即将此事转告国务院远东事务处的斯但利·K·霍恩贝克。霍恩贝克在 1932 年 9 月 12 日写的一个报告中告诫说：“鉴于日本舆论界显然存在着一种恐美、仇美情绪，我竭力主张应尽一切努力制止此书问世。”

多兹自己也认为《美国的墨室》的任何续集都可恶之极，并且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在霍恩贝克发出备忘录的第二天，多兹就要求鲍勃斯一梅里尔公司电告亚德利目前的住址。几小时后，通过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发来的一份电报告诉他：亚德利正在印第安纳州沃辛顿家中。他仰此事通知了陆军

部的，后者立即通过下令派一名军官和两名证人马上前往亚德利家中，没收日本电报和亚德利可能已从“ 黑屋子 ”拿走的其他任何秘密材料。为了不留下这次行动的任何文字记录，这位军官奉命向亚德利口头传达陆军部的要求。命令写道：“ 此项要求必须当着两名证人一最好是军人的面提出，不要让亚德利获得此项要求的副本。 ”命令的原件要交回陆军部。

三天后，亦即 9 月 16 日晚间，印第安纳大学军事学教授、步兵上校奥利弗，在上尉巴伯和艾德金斯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亚德利。亚德利开门后，奥利弗上校开始章读事先拟就的命令。

“ 陆军部长获悉并相信，在你因与陆军部军事情报活动有关而任美国政府雇员期间，有各种原始文件落入你手，现仍在你掌握之中，其中有若干文件的复制件已发表于你所写的名为《美国的“ 黑屋子 ”》一书的 48、49、168、169 等页上。

陆军部长还得悉，在你因前述身份与美国政府有关系的期间，尚有其他各种属于美国政府的原始文件系由你制作或由你获得，现亦在你手中或在你掌握之中。

鉴于前述诸文件或其抄件与国防有关，因此向你提出要求，由你将上述文件及抄件，交付被指派接收此等文件之官员，即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陆军部美国陆军副官，并要求你对此等文件不得制做，或让人制做任何仲类或性质的抄件。 ”

晚间的不速之客显然使亚德利大吃一惊。他先是告诉这三个说，他已经拒绝了《世界主义者》杂志请他写一组与间谍活动有关的约稿，试图让他们相信他已经不搞揭露内幕的勾当了。接着，他又说：“ 我对写非小说类文学作品不感兴趣。 ”最后，他声称：“ 我没有可以损害美国政府的文件。 ”亚德利开始由吃惊变为愤怒。他对那位上校说：“ 我不能理解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找我的麻烦。 ”他要求同副官谈谈这个问题。

多兹本来并没指望亚德利会主动交出那些材料，从法律上说，他也无能为力，因为还没有任何明确法令可以用来约束亚德利的这种行动。只是他仍不甘心让亚德利在他冷不防时，又在他眼皮底下搞出一本书来，因此他下决心要控制住新书的稿子。

机会终于来了。陆军部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艾尔弗雷德 ·T · 史密斯上校来访多兹，并且告诉他：手稿目前在亚德利新找的出版代理商维奥拉 · 艾琳 · 珀（住在纽约市东五十九街九号）手中。多兹立刻打电话给纽约市联邦司法厅第一助理托马斯 · 埃蒙 · 杜威，要他为阻止出版这本书一事和麦克米伦公司取得联系。

杜威打电话给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继承人、公司总经理小乔治 ·普拉 ·布雷特。布雷特之父仍以董事长的身份执掌着大权。布雷特本人则在战争期间穿过军装，在军事情报处当过军官。他完全同意杜威的意见，保证尽力阻止亚德利新著的出版。他同杜威通话时尚未读过亚德利的《美国的“ 黑屋子 ”》一书。放下电话不久，他就找来一本看了起来。他对书中泄露的情况大为恼火，于是在给杜咸的信中写道：“ 我很理解政府反对出版那本书的原因。这本书读起来不仅味同嚼蜡，而且泄露了绝对不该公诸于众的情况。 ”

然而，布雷特同政府的合作远远不只限于这部书。他不仅极其小心谨慎地避免出版任何可能违反间谍活动法的著作，而且甚至走得更远，拒绝出版可能仅仅使政府“ 受窘 ”的图书。大约就在杜威给他打电话的前后，麦克米

伦公司收到了《隐蔽的入侵者》这部书稿，作者是曾在美国活动过的一名德国间谍。布雷特主动把稿子送给杜威，请他让人审查一下该书有无违反间谍活动法的地方和“政府希望不要写到书里的内容”。他还说：“我们当然很愿意尽可能进行合作。”

几天之后，杜威把稿子送给纽金特。多兹，要求司法部同意出版商的尽快退稿的要求。杜威在信中写道：“我想司法部是会尽力同他合作的。他好心好意地把这部书送给政府检查，不仅一点也不想违反间谍活动法，而且讨厌一切得罪政府的著作——不管这种著作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鉴于他的这种好意和态度，司法部定会尽力同他合作。”

多兹把稿子转给了陆军部。陆军部有点为难，因为它从未要求把稿子送给它，而且确实也不想搞到这部手稿。书刊检查工作已经停止 12 年多了，陆军部没有审查任何私人出版物的法定权限。它简单地浏览了一下，发现该书可能使少数几位活着的人难堪，但对国家安全没有威胁，于是把手稿退还多兹，并且申明陆军部不负审查之责。这位助理司法部长就把手稿还给杜威，而且连封信都没有附。杜威莫名其妙，只好给多兹写信，指出退稿时没有附信，并且询问：“您此刻能否告诉我《隐蔽的入侵者》有无冒犯陆军部？”

多兹在答复中建议杜威用电话——显然是为了避免落下字据——同布雷特联系，告诉他陆军部“感谢他让它审稿的好意，但很遗憾，关于出版该书是否合宜或合法，它不能表示意见”。多兹还说，出版此书是否合宜，“必须由出版商考虑”。

四个月之后，1933 年 2 月 16 日，布雷特打电话告诉杜威说：亚德利的出版代理人乔治·拜伊即将交出《日本外交机密》一书的书稿。杜威立刻和司法部刑事司代司长弗兰克·帕里什联系，对他说如果司法部或陆军部想秘密地看一下那部稿件，他可以安排此事，但要快看。杜威写道：“重要的一点是，麦克米伦公司保留那部书稿不便超过十天左右。”

帕里什打电话给陆军部助理参谋长艾尔弗雷德·T·史密斯上校和国务院的某个卡斯尔先生。他俩都很想看一看手稿，于是帕里什告诉了杜威。此时已是 2 月 17 日（星期五），时间成了大问题。杜威通知帕里什，麦克米伦公司将于第二天从阅稿人那里收回手稿，立即转送华盛顿、杜威提醒帕里什注意：“时间紧迫，作者已经电告出版商 2 月 21 日（星期二）到纽约讨论手稿。”杜威还告诉帕里什，麦克米伦公司已经同意电告亚德利：手稿要到 21 日才能从阅稿人那里退回来。杜威还说：“不过，他们只能将合作者的纽约之行推迟一、二天。”

到麦克米伦公司星期六收到稿件时，已经太晚了，杜威已不可能把稿子弄到华盛顿由国务院及陆军部两个部门审阅，现在只有查封稿件这条路。向来都没有任何书稿因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被查封的先例。这样办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杜威告诉检察长乔治·z·梅达利，如果要没收，必须在星期一，亦即在亚德利到达之前下手。没收行动获得了批准。星期一亦即 1933 年 2 月 20 日，杜威派了联邦法院的一名执行官到麦克米伦公司通知布雷特，请他带上《日本的外交机密》书稿到联邦大厦去一趟。与此同时，杜威派另一名执行官去传呼亚德利的代理人乔治·拜伊，陪他前往联邦大厦。

布雷特先到了，胳膊下面紧夹着装着稿子的 7 个牛皮纸信封，走进了邮政大楼。拜伊过了一会儿也到了联邦检察厅。他看见布雷待坐在那里，腿上

放着稿件，立刻就猜出发生什么事了。几分钟后，布雷特走进了大陪审团办公室后，等他再出来的时候，书槁已不在他手上了，根据杜威的建议，已被大陪审团扣押了。这样，《日本外交机密》成了美国出版史上因国家安全因素而被美国政府查扣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46 年之后，到了 1979 年，该稿件仍被政府扣押，其中有些内容仍被列为机密。

杜威认为这次没收行动应当十分保密，于是亲自打电话给所有的新闻机构，要求它们不要发表与此事有关的任何消息。它们都答应合作。《纽约时报》已经写好了一篇报道没收行动的文章，但是答应不予付印。由于偶尔的疏忽，这篇文章被插进了一个版次内，不过很快就从其他各个版次中抽了出来。

第二天，亚德利来到了杜威的办公室，并被告知：他的手稿已根据美国法典第五十章和三十二节的间谍活动法——予以没收。杜威让他选择：是继续争取出版，从而有可能面临公诉呢，还是答应不再坚持出书，从而停止一切进一步的法律行动？亚德利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杜威的要求。

这一仗勉强得胜，但国务院知道，亚德利迟早还要再写书，只有通过迅速而强硬的立法，才能压住亚德利写书的想法。

于是，立即着手起草一项内容广泛的法案，规定编写或发表与政府机密有关的消息都是犯罪行为，可判处长达十年的监禁。这项法案最终由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权势显赫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哈顿·w·萨姆纳斯于 1933 年 3 月 27 日提了出来。等到提出来的时候，这项题为“保护政府档案”的 H·R·四二二 0 号法案的内容已经变更加广泛了，它规定：政府的任何雇员“出卖、向他人提供、出版或试图销售”任何政府文件，不管该项文件有无密级，只要泄露这一情况可被证明为“有损于美国的安全或利益”，则均属犯罪行为。所谓“只要……被证明”云云，只不过是耍了一个花招，因为该法案第三节还规走“上述任何行为一经证实，就无须争辩地证明怀有有损于美国安全或利益的目的。”

这是美国最接近于英国的《政府保密法》的一项议案。根据英国那个法案，未经事先批准连报道英国首相喝了几杯茶之类的事，按条文规定也可以被禁止。

4 月 3 日，司法委员会表示同意。接着，众议院就悄悄地通过了 H·R·四二二〇号法案而未提反对意见。然而，报界听到该法案通过的消息后，无声无息就变成了暴风骤雨。他们抱怨此项立法带有新闻检查的味道，等于取消了新闻自由，并且同宪法第一修正案相抵触，因此要求予以否决。有鉴于此，该法案送到参议院后，由一个小组委员会删去了大多数遭到反对的条文，并由参议院在 5 月 8 日（星期一）通过。

在参议院投票表决时，权势很大的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前州长、副总统候选人约翰逊因故缺席。这位参议员回来之后力主重新审议此项法案。1933 年 5 月 10 日，参议院就该法案激烈辩论了好几个小时，民主党人一般表示赞成，共和党人则一致反对。最激烈地反对这项新法案的人士之一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阿瑟·R·鲁宾逊。他暴跳如雷他说：“我们直到此刻都无法从国务院那里弄清真相！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求通过这项法案——连那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也不知道，我们问他们是怎么搞到亚德利的手稿的。‘是你们偷来的吗？从哪儿搞到？’毫无回音。他们期期艾艾他说：‘非要我说出来不可吗？’”

最后，尽管参议员鲁宾逊指责这项法案是一项十足的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令，十分酷似人们所熟悉的限制异端和煽动活动的法令，H·R·四二二〇号法案还是变成了第三十七号法令。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1933年6月10日签署的最后文本如下：

关于保护政府档案材料的法案

美利坚合众国及众议院在国会举行会议，特制定法令如下：不论何人由于受属于美国之关系，而能向别人索取，或自己持有，或有机会接触任何官方外交密码或用此等密码所准备之材料，如将此种密码或材料，或将外国政府及其驻美外交使团间发射电文所获取之材料，未经授权或得到主管批准而故意予以发表或向别人提供，将处以1万元以下之罚金或10年以下之徒刑，或二者合并执行。

今天，这条法律除了有稍许修改之外，仍然是美国的刑事法《美国法典》的第十八章第九百五十二节的主要内容。

第五节通信情报处诞生了

1929 年，继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一篇夸大其词的道德说教之后，“ 黑屋子 ” 关门了。但是，关门之举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幻想。他停止向亚德利的机构提供经费，并没有宣告情报事业的完蛋，只是促使这项事业转到了另一个部门手中。君子照旧要看他人的信件，只不过君子们现在穿上了陆军的绿色制服，戴上了两旗相交的通信兵符号。

在把那些倒霉的截获电报送到国务卿史汀生办公室桌上的几个月之前，已经打算把密码破译工作由军事情报处转交给通信兵负责。1929 年 5 月 10 日颁发的陆军条例正式列出了导致作出这一决定的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陆军希望在未来战争一旦爆发时能够更加集中统一和更加预有准备。

集中的必要是不言而喻的，在过去，通信兵负责编制密码， 而印刷、保密、发布密电暗码本的责任，则属于副官长。译解密电、识破密写药水的责任，则归亚德利，而他的 “ 黑屋子 ” 又远在数百英里的北面。这一改组计划是为了把这个松散的结构统一于一个领导之下，这领导就是通信兵主任乔治 · S · 吉布斯少将。

1929 年 7 月 19 日——华盛顿的一个炎热的星期五，吉布斯将军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有通信兵的 3 名高级军官和掌管通信兵密本与密表的文职人员威廉 · F · 弗里德曼。他们在那里讨论了设立一个新机构的问题。这个机构将统管密码的编制与破译，集侦收、破译和翻译于一身，并且兼管密写药水的制造与侦破。他们一致同意这个机构下设四个科：密本与密表编制科，密本与密表破译科，侦收与测向科，以及密写药水科，他们还议定，新机构定名为通信情报处，由威廉 · F · 弗里德曼担任处长。直到十年之后，人们才认识到任命弗里德曼为处长是何等的英明。

弗里德曼是犹太人，1891 年 9 月 24 日出生于俄罗斯南方的城市基什尼奥夫，幼年随父母渡淘迁居美国的匹兹堡市，1914 年 2 月获得康奈尔大学理学士学位。后来作为优秀学生参加了河岸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一个慈善性质的研究机构，坐落在芝加哥城外伊利诺斯州的杰尼瓦，是一位乔治 ·费比恩 “ 上校 ” 自费经营的。研究所设有各种实验室，从事音响学、化学、优生学的实验，甚至还有一个隐语密码实验室。

没有多久，弗里德曼就作了优生学及隐语密码两个部的主任。到 1916 年 6 月，他的密码部开始接受美国政府的任务。

费比恩曾故意向华盛顿少数要员透露河岸研究所有能力和条件免费破译密码电报。在当时，华盛顿毫无能力处理用密码或用暗语编写的电文，于是政府部门都陆续接受了费比恩的帮助。

弗里德曼和他那一小组密码专家开始破译从国务院和司法部等部门送来的电文的时候比亚德利成立军事情报处八科还早一年，他们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密码组织。

流向河岸研究所的电报有很多是发自墨西哥的，那时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不怎么友好。据弗里德曼说：这些电文 “ 完全是偷偷摸摸地用各种手段从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电报局 ” 获得的。电报经过钻研、解译，一般部在几天之内退回。

1917 年头几个月中，出现了战争临近的不详预兆。费比恩决定向陆军部

提供密码业务服务。陆军部毫不迟疑地就接受了，派莫博中尉去对这个研究所的能力进行考查，研究所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4 月 11 日莫博给陆军部打电报建议派军官到河岸接受训练，一切截获的电文也必须立即送到那里去译解，此时美国已向德国宣战了。

两个月之后，亚德利在华盛顿成立了军事情报八科。从那以后，大多数截获的材料部送列八科去破译，但河岸研究所还继续培训准备派往法国的军官，在弗里德曼的教导之下，一个小组 4 名军官在 10 月、11 月问用了 6 个星期，接受一次紧张集中的密码分析训练。这一期办得非常成功。从而使参加 1918 年 1、2 月举办的第二期的军官，人数猛增了 14 倍，即达到 60 人。

1918 年 6 月弗里德曼正式获得军衔，被派到法国。在那里，在大战快结束的几个月中，他的工作是破解德国的密码体系。次年 4 月，他又回到了河岸研究所。呆了 18 个月，到 1921 年 1 月 2 日，他担任了通信兵密电暗码科的科长。他在新岗位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改编陆军参谋本部的密码，在整个 20 年代，他和他唯一的助手、一个打字办事员组成了陆军部的整个密码部门。

1930 年 4 月 24 日早晨 10 点 17 分，通信情报处诞生了。就是在这个时刻，通信兵部门正式按到陆军部长的命令，命令规定了新组织的任务与职责。作为通信情报处的第一任处长弗里德曼的新职责包括“编制和修改陆军密电及暗码，在战时截收敌人无线电及有线通讯，测定敌人电台的方位，破译截获的敌方密码或暗语电文，研究密写药水的使用及化验工作。”

为了完成他的使命，弗里德曼有权雇用 4 名低级密码分析员和 1 名助理密电员。

弗里德曼着手物色在数学方而有扎实的根基，在法、西、德语，尤其是日语这几种语言中至少懂一种的人来担任这 4 个低级密码分析员的职务。

文职人员委员会先后给弗里德曼派去 8 个应征者，他只从中挑选了 3 个人。第一个是弗兰克·B·罗利待，22 岁。他以优异的成绩于前一年 6 月在弗吉尼亚州埃默里市的埃默里及亨利学院的理科毕业，罗利特从 4 月 1 日起给弗里德曼工作，任他的秘书。这样，幼年时期的通信情报处的全部人员一共有 3 个人了。

九天之后，亚伯拉罕·辛考夫被选中担任法语方面的职位（德语则已有罗利特负责）。再后，所罗门·库尔贝克参加了工作，担任了西班牙语的工作。

选定库尔贝克之后，弗里德曼遂把全副精力转向最困难的任务——特色一个能完全胜任翻译日语而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弗吉尼亚州众议员乔·谢弗的外甥约翰·B·赫特经过考试很快就被录用了。几个星期之后，弗时德曼又选定了哈里·劳伦斯·克拉克作为助理密电员。

从此，通信情报处的全部人员达到了 7 个。该处的前七年几乎一直保持这个人数。从 1930 年至 1937 年,这个处的全年预算从来没有超过 1.74 万元。

弗里德曼训练了他的几位新助手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一套培训制度，培养一支充足的后备军官力量，使他们通晓密码术的各个方面，以备将来发生敌对情况时使用。结果是建立了通信情报学校。1931 年 9 月 8 日，学校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学生通信兵中尉马克·罗兹到校上课来了。一年之后罗兹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于是决定将培训期的课程延长两年。

教学顺利开始之后，弗里德曼立即把力量转向他那组织比较薄弱的一面：截收和解译。这方面的难题比建立学校还要多。除了有一个对截取通讯

严厉处罚的法律（1934 年的《通讯法案》）以外，还有前国务卿史汀生对这种活动的严峻的禁令。弗里德曼问道：“ 如果连截取和分析电文都不允许，又怎么能对人员进行训练呢？是遵守法律还是发展专业，这成了密码工作方面老大难的矛盾。 ”

这次又是专业占了上风。1931 年，开始在首都华盛顿地区建设一个实验性的截收台。陆军部选定的地点是弗吉尼亚州巴特里湾军需大厦，在里面装备了遥控的收报机。截收站建立后，就开始为弗里德曼和他的“ 黑屋子 ”源源不断地供给截获的通讯资料。除此而外，设在德克萨斯州、巴拿马运河、菲律宾等地的无线电情报小支队，也开始送来截获的电文。

在这期间，前面说过的莫博中尉现己升为负责美国西部通信兵部队的上校。他弄到批自动记录设备，在他家地下室建立了一个自用的截收台。他把录音带寄给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对这些颇有用处的截获材料表示欢迎，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

1933 年，弗里德曼的门徒马克 · 罗兹在新泽西州蒙默斯堡建立了“ 临时无线电情报支队 ”。这个支队的大部时间从事通讯情报领域的研究，但也搞截收工作。

由于世界形势日趋紧张，美国担心再次被卷入战争，通信情报处在 1937 年 11 月提出申请，打算在巴特里湾再建一座截收台。这个台将把收报设备设在陆军部的通信中心，主要作用是监听使馆区和纽约商用中继电台之间的无线电频路，因为绝大部分外交电报部走这条线路。它还申请再雇用两个无线电报务员，把他们派驻于华盛顿，监听每天最“ 有意思的 ”12 至 15 小时之内的电讯来往。

这次计划没有通过，第二年却在蒙默斯堡建立了一个新截收站。这时除了蒙默斯堡之外，通信情报处在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巴拿马、菲律宾和夏威夷等地都是设有截收基地。截获的通讯资料每周一次用挂号的机密邮件寄给弗里德曼。

设在巴拿马的监听站，因它的战略位置，而显得非常重要。1938 年 1 月 26 日该站接到指示，要每天 24 小时搜索太空。首先要注意罗马及东京之间的电讯往还，第二个重点是注意柏林及东京之间的通讯。此外，还要监听日本与中、南美洲间往来的外交通讯。随着截收活动的开展，弗里德曼越来越担心这种非法一旦泄露出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保护工作人员，必须得到官方批准并记录在案。负责陆军情报（G—2）的助理参谋长在 1938 年 3 月 26 日向参谋长呈递了一个报告，申请“ 授权在和平时期进行无线电截收及密码分析业务 ”，美国陆军部长哈里 · H · 伍德林批准了这个报告。

有了官方批准的护身符，通信情报处的业务就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到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进攻波兰时，这个处的人员已由 7 人增至 19 人。及至 1941 年 12 月日本袭击珍珠港那天，其人员增加到了 330 多人，到大战结束之时，已超过了 1 万人。

人员的增长使通信情报处更加注意来自东方的威胁。弗里德曼也卸掉了情报处处长的职务，以便集中全力于密码技术研究。他开始花更多的精力去解破先进的日本密码系统。

另外，到 1939 年，陆军和海军在密码领域中延续了几乎几十年的工作重叠、互不通气、互相干扰的局面终于结束了。

海军和陆军一样，也有多年搞密码的历史。早在 1899 年就有一艘军舰第

一次做了无线电发射的尝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通讯处的密码通讯科负责处理密码业务。1922 年 7 月间，它得到一个新的组织编号是 Op—20—G，即海军作战部（OP）二十处（海军通讯处）G 科（通讯安全科）。

1924 年 1 月，海军上尉劳沦斯·r·萨福德奉命在 G 科里建立一个无线电情报组织，即海军部第一个截收组织。一个前任军官回忆说，“这个组织只有我们几个人，都是献身于密码技术的年轻人，具有专心致志的苦修精神，有如初入修道院的年轻修士。”

说这话的年轻军官是埃利斯·扎卡赖亚斯上尉。1926 年他在萨福德上尉的指导下做了七个月的弟子后，调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设在四楼的一个截收站的站长。凭借着地利，他可以看到许多日本海军电报。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朔，美国海军的密码组织已经发展到拥有七百名官兵。在华盛顿、缅甸、马尼拉、夏威夷和菲律宾都设有窃听站。此外，在关岛、加利福尼亚、长岛、佛罗里达还有规模较小的电台。

第六节英国通信系统是个大杂烩

从各地监听站截获的材料表明，日本至少使用 9 种不同的密码体系，而最重要的似乎是一种被称为 A 型密码机的机译系统，专门用于高级外交电讯。这个体系是 1932 年以前启用的。美国通信情报处于 1935 年开始钻研它，并于次年攻破。美国的密码破译人员因此可以读懂日本外务省收发的每一件电文。

取得这次突破之后不久，弗里德曼有些担心，因为在内部通信和官方报告中，提到日本密码时都称之为“A”机，这也是日本所知道的名称，于是他决定借用色谱上的颜色给各种系统以不同的代号。为 A 密码帆选定的颜色代号是“红色”。

在 1938 年末 1939 年初，日本外务省把一种新的外交密码机分发各地，以备取代“A”机。日本人称之为 B 型密码机，而通信情报处给它起的代号是“紫色”，这个机器比以前用的红色系统复杂得多。1939 年 3 月 20 日，当第一个紫色电讯在华沙和东京之间发射时，为美国提供情报的渠道一下子就断了。

这个新体系深奥莫测。因此，破译这套密码成了最首要的任务。通信情报处一个密码破译小组在 1940 年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终于在军需大厦内把一些五颜六色的电线、接触点和开关装配在一起，弄成面条伴的一堆东西，用这个奇特的装置在 9 月 25 日，发出了第一件完全清楚、准确的“紫色”电报的电文——

他们为一个从未见过的机器造出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再生体。

到这个时候，通信情报处已拥有：通信情报学校；负责截收业务的通信连；负责文书工作、统计图表的 A 科（行政）；规模最大的 B 科（密码分析），也就是生产最终情报产品的单位；C 科（密码编制），负责设计军用密码本并管理通讯安全的业务；D 科（密写药），是一个也称为实验科的小单位。

就离同一条街不远的海军大楼中，海军作战部二十处通讯安全科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领导这个科的是劳伦斯·萨福德，下面有三个股是它的业务核心：GX 股负责截收及测向；GY 股负责密码分析 GZ 股负责翻译及分送情报。

弗里德曼的通信情报处和萨福德的海军作战部二十处 G 科加在一起，力量颇为可观，但它们之间却很不和谐。双方都不顾集体利益而竟先追求自己的“工作表现”——抢着解译电文或寻找破译的方法。因为两个组织常常具有相同的截获材料，也拥有同样的破译手段，往往当一个重要的电文被解译之后，双方都立刻把一份译本急送白宫去，向总统请功。

最后经过长期的交涉和几次试行，陆军和海军之间达成了妥协：它们同意交换从它们的 10 至 12 个截收台收到的一切外交电讯材料。为了避免工作的重复，决议由海军翻译单日发出的一切日本外交电报，由通信情报处负责双日。海军将结果送交总统，陆军则向国务院提供情报。

后来，由于太平洋方面的战势愈加紧张，海军决定把它整个破译力量集中于日本海军密码。因此，它仓促地和通信情报处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把密码分析部门的所有职责及力量都转给了陆军通信情报组织，自己只保留海军方面的及与海军有关的密码业务，等战争结束之后，再将这些交还海军。

在 1942 年 12 月间，美国的通信情报系统很像一个中世纪的封建领地。

通信情报处和海军作战部二十处 G 科共同负责外交报务，按单双日划分职责范围。海岸警卫队和联邦调查局部宣称它们对“间谍”和秘密电台有侦破之权，而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无线电情报处又认为它自己负责无线电监听和定向侦察。

至于破译出来的成品，外交电报是全文分送陆、海军两部，部分送交国务院及联邦调查局。海军电报全部由海军部掌握，但有摘要简报送陆军部，只限高级人员过目。

传送成品的方式也既缓慢又复杂，要由一个信使把文件交给传达的官员，等看过之后就立即带回。介绍情况全用口头，目的是绝不留下通讯情报的文字材料。这种制度是为了保证绝对安全，但其代价是效率低，影响对情报掌握程度。

整个通讯系统是个大杂烩。没有人负责对所有材料进行综合研究，把所有的零散材料组成一个有联系的整体，与其他情报互相联系印证。通讯情报在技术方面取得了极其出色的成功，尤以破译“紫色”密码最为突出，但在分析方面则因组织紊乱而无所建树。

第七节珍珠港事件引出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1941 年 12 月第一个星期六，美国海军在华盛顿州普吉特海峡班布里奇岛上的监听站截收列日本外务省发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一份电报。这电报看来共有 14 部分，截状了其中的 13 部分。内容是对十一天前一件美国外交照会的答复。美国照会的内容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一切军事力量，而美国以保证解冻资金、恢复贸易为交换条件。

星期日清早，班布里奇的监听站又截获了几份电报，随即将这些电报转发到华盛顿海军作战部二十处密码分析股值班军官弗朗西斯·M·布拉泽胡德海军中尉处，他通过“紫色”密码机将其中一件密电译成英文，知道日本已决定中断和美国的谈判。

布拉泽胡德又把另外一件短一点的截获电文用打字机输入“紫色”机，内容是“请大使于 7 日下午 1 时，把我方答复递交美国政府（如有可能，而交国务卿）。”这个电文意味着日本已命令它的大使在星期日下午 1 时整中断和美国的谈判。这是走向战争的前一步。当军事情报处远东科科长鲁弗斯·布拉顿看到这段电文时大约是上午 9 时。

华盛顿上午 9 时是夏威夷的凌晨 3 点半。在代蒙德赫德以北仅仅 250 英里的地方，一只山 6 艘航空母舰组成、由战列舰及巡洋舰支援的舰队偷偷地抛了锚正在海面上轻轻漂动，这就是日本南云海军中将率领的突袭舰队。

布拉顿急如星火，立即打电话找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不想马歇尔骑马外出，直到 10 点到 10 点半之间，马歇尔才得知布拉顿有重要消息需要他亲自过目，便自己开车来到办公室。

大约在同一时刻，克雷默海军少校也看到第二个电报的译文，他立刻明白了它的意义。特别是当他看到命令大使馆销毁一切尚存的密码设备和机控密码的那份九一〇号电报时，他越发感到情势严重。

克雷默差不多是跑着出了屋门，他断定日本人预定的进攻时刻是华盛顿时间下午 1 时，在远东是半夜，在夏威夷刚刚拂晓。他首先沿走廊跑向哈罗德·斯塔克将军的办公室。这位海军作战部长已经在开会研究刚收到的日本电报末一段的细节。克雷默向一个副官指出电文里最后时限的特别意义，然后又跑向国务院大楼。当时陆军部也在同一楼内。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也在开会，克雷默匆忙地向他们指出最后几件电文的重要意义，接着又跑向对面的白宫。

马歇尔最后终于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等他看完了最后一段电文后，大为震动。他本来可以通过加密电话和夏威夷的沃尔特·肖特少将取得联系。可是，马歇尔觉得通话内容涉及截获的“紫色”电报，而加密并不是绝对保险的手段，使用加密电话太冒险了。因而把告警电报交到陆军部的通讯中心，由于畦电干扰严重，通往夏威夷的线路叫不通，只好经由商业渠道辗转拍发，最后到上午 7 时 33 分,美国无线电公司檀香山电报局的一架收报打字机才收到这份电报。这份电报，被装进了一个信封，上面只注明“夏威夷谢夫特堡指挥官收”，被随后放进了以后再送的电报的分类格架上。

上午 7 时 55 分，第一颗炸弹轰炸了珍珠港福待岛的水上飞机停机坪。美国人死伤惨重。马歇尔的报警电报直到下午 3 点钟才转到肖特将军手中，这是早已是明日黄花，使他啼笑皆非。

组织混乱，分工不明，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变混乱为秩序，化不

和为合作，成了陆军部长当务之急。

情报史上最有讽刺意味的绝妙事例之一是，这时认为对截获的日本外交密电重视不够的人正是 12 年前为了“ 君子不偷看别人的信 ”，毅然关掉亚德利的“ 黑屋子 ”的史汀生。但是情况变了。现在，史汀生当了陆军部长，已由彬彬君子变成赳赳武夫了。

珍珠港灾难发生后几个星期，史汀生认为对整个通讯情报领域需要重新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价。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纽约著名律师阿尔弗雷德·麦科马克。麦科马克在 1942 年 1 月 19 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特别助理，任务是仔细审查通讯情报的全过程，从材料的最初截获直到被送到最后使用者之手，以便确定怎样从情报中榨取出每一滴油水。

麦科马克很快就发现最紧迫的问题是：

截收设备太有限；

将材料从截收点转发至密码分析中心的办法不甚牢靠；

语言翻译人员至感缺乏；

无足够的人员也无适当的程序，不能对译好的产品进行研究和审核，借以获取最大程度的情报效益；

把情报递交华盛顿有关当局的办法效益甚低；

没有任何措施能使此等情报立刻以安全的方式拍发给现场的指挥官。

结果是在陆军部军事情报处内组建了一个单独的部门，负责收集截获的原始材料。与从其他来源的情况综合整理，并把一切情况汇集成清楚、简明、及时的报告，其主要作用可概括为“ 估价 ”及“ 分析 ”两件事。

这个绝密部门定名为特别科，由卡特·W·克拉克上校担任科长。他是通信兵部队的一个军官，曾协助过麦科马克研究通讯情报的问题。麦科马克本人也直接获得了上校军衔，并作为现役军官，担任克拉克的副科长。

新科长上任后，用了几个月的功夫敦促通信兵扩建通信情报处，并增加截收站以扩大覆盖范围。这一努力获得了成功，通信情报处很快就搬出了军需大厦，搬进波托马克河对岸弗吉尼亚州阿林顿的一所前女子学校的校址。这片安静地一直被称为“ 阿林顿庄园 ”，有数十座砖木结构建筑。为了安置一个迅速扩充而要避免外国特工窥探的单位，这个地方是十分理想的。

几个月之后，通信情报处专管监听的第二通信业务营向南迁移，迁到了弗吉尼亚州沃沦顿的文持山农场。1942 年 10 月间，通信情报学校的后身——密码学学校也迁到了文特山农场站，在整个大战期间在那里培训陆军的男女成员，学习密码学的各个方面。

在这期间，由于进行改组，通信情报处的名称也很乱：它几乎每星期换一个名字。从 1930 年至 1942 年，它一直叫通信情报处。但在 1942 年 7、8 月间，改称为通信情报业务处，后又改称为通信安全处和通信科，最后称为通信安全处，到 1944 年 7 月，又改为通信安全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改名为陆军安全局。

通信情报处的改组工作开始不久，克拉克就致力于组织他的特别科。这个科的业务是把通信情报处所截获、解译和初步分析的产品变成最后的情报成品。

克拉克的特别科有几个大致按地区划分职责的股。这些股收集、研究、分析截获的电报及其他情况，把结果编入动态报告及长期研究项目。另外还有一个报告股，其任务为认真分析收到的一切材料，分别交付给有关的地区

股，并协助编写报告。

特别科最突出、最有意义的一个贡献，就是它精心编印了一份名叫《魔术摘要》的日刊，刊载从每天截获的电文中提炼出的重要动态情报。

1943 年，美国终于对日本陆军的密码通讯取得了初步突破。到了 6 月间就有了经过破解翻译的一些电文可供研究了。

由于电报流量日益增加，克拉克把他的特别科精简改组为三个精干的股。A 股接过了外交电报和隐蔽材料以及出版《魔术摘要》的职责。在刊出的项目中，有关于和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个人会晤的报告，其中谈到这两个轴心国的领袖讨论了战争的未来，以及他们是否要对这个或那个盟国伸出橄榄枝等等。

从日本陆军电讯中汲取情报的工作属于 B 股。原来代号为“邦克希尔”的 C 股则研究由英国人那里得来的德国军事电报。

克拉克的特别科虽然在多方面做出了成绩，但它对通信安全局在业务上不能进行真正的控制。如应该监听哪些电路，截获的电报应按什么程序对其密码加以分析，哪些密码系统要先攻破，以及待翻译材料的轻重缓急等等，它部无权过问。美国通讯情报体系是个庞然大物，他的首脑指挥不动它的躯体。

这种行政机制不灵造成很多不良后果。通信安全局是属于通信兵部队的，因为它的作用主要是截取、破解和翻译材料，所以永远看不见“全局”。另一方面，特别科是属于陆军情报处（G—2）的，主要是个分析机关，又无权控制具体业务。因此，通信安全局常常把它的截收设施力求用于已有别的单位盯住的线路，譬如盯东南亚、马来西亚、中国南部等地的台站，而不用于大有潜力可挖的地区，如日本本土各岛、朝鲜、中国东北和北部。特别科认为有一些中、低级密码系统与日本航运有重要关系，建议通信安全局优先破译这些体系，不要一味把重点放在高级体系

上，安全局对此也往往置之不理。

1944 年 6 月，特别科经过改组，成了陆军情报处编制内的一个组织。到 12 月间，经过一次大的争权斗争，陆军情报处从通信兵部队手中夺走了被视为珍宝的对通信安全局的业务的控制权。

战争逐步走向尾声：通讯情报在和平时期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开始引起了重视。1945 年 8 月初,已升为准将并担任了 18 个月的通信安全局长的 W·普雷斯特·科德曼设立了一个战后计划委员会来规划安全局的未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讯情报的开支估计每年约五亿美元。但即使支出比这高出 3 倍的费用，通讯情报仍被列为美国最有利的投资。

在太平洋方面，通讯情报工作在 1942 年曾多次探明日本舰队的动向，一次探明舰队向珊瑚海开动，另一次发现向中途岛开动，美国海军曾据此集中它的航空母舰，在对日战争中打了两场决定战局的海战。1942 年通讯情报部门还获悉了日本会同德国对苏作战的关键决定。在 1944 年的逐岛推进中，又侦察出日本方面的防御部署，从而使美方可以选定敌方弱点。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通讯情报能随时说出日本有多少舰只，这些舰只都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被击沉的。大战中，德国人的潜艇损失很大，他们以为盟国有测向装置。事实是当潜艇每晚向德国海军部详细报告它们的位置时，通讯情报部门从太空中就断定了它们的方位。

在陆战方面，通讯情报对隆美尔在非洲的意图了如指掌，使这个“沙漠

之狐”屡次受挫。

第八节英国国家安全局的特殊“ 出生证 ”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从日本方面得到的通讯情报就已表明德国已决定进攻苏联，使盟国在欧洲方面预先做好了准备。

通讯情报还可以判断出日本人的动向，如日本人曾指示其驻莫斯科大使佐藤直武通过苏联人向华盛顿进行和平试探，并且具体交待在谈判中可以在哪些方面做进一步的让步。这一切都被通讯情报及时而详尽地搞到了。在 1945 年全年中，通讯情报截获了日本对它的使节的全部指示，甚至在佐藤大使看到电文之前，美国方面就已破译出来。

战后美国备通讯情报部门的编制和经费虽然很快缩小了，但伸手要控制这些部门的臃肿的上层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早在 1942 年，罗斯福总统曾发出一个通告，规定只限陆军、海军及联邦调查局可以从事密码分析活动。在通告发出之后，设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以协调和明确陆军和海军的职责范围。1944 年 5 月间应战时需要，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 陆海军通讯情报协调委员会 ”。到 1945 年 3 月间，正式改名“ 陆海军通讯情报委员会 ”，在密码分析方面取得更进一步的合作。同年 12 月，国务院也参加该委员会，因而委员会改名为“ 国务院及陆海军通讯情报委员会 ”。1946 年 6 月间，联邦调查局和新成立的中央情报组也相继加入委员会，又再次改名为“ 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 ”。次年，空军也成了它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成员。

1948 年 7 月 1 日，委员会颁布了通讯情报共同体的第一个“ 宪章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号情报命令，这是国家安全委

员会制定的情报系统的绝密法则。命令正式规定成立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 对政府的通讯情报活动进行权威性的协调 ”，并“ 对中央情报主任在通讯情报领域内的职责提出建议 ”。但命令规定：委员会做出任何决定都要 12 个委员（每一部门出两个委员）的一致同意：又说委员会不得干涉委员会成员内部的业务工作。因此，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从一诞生就是虚弱无力的。

这个情报命令为通讯情报在政府内部取得了一个特殊地位，命令规定：

通讯情报活动的特殊性质，决定此种活动应在各方面都不得与其他或一般的情报活动相提并论。一切有关行政部门收集……情报之命令、指示、政策或建议，除非明确说明并由在（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上有代表其主管部门或当局发出，均不适用于通讯情报活动。

所以，假如司法部长或甚至总统发出公开禁令，禁止联邦政府从事任何形式的电子监听活动，通讯情报部门也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此外，这个命令对情报下的定义是“ 由研究外国通讯而产生之情报 ”，但“ 外国通讯 ”这个词的定义范围却极其广泛。按照命令的规定，通讯情报机构有可以随意窃取整个美国国际电信系统的权力。这种授权显然违反了 1934 年《通讯法案》的第六〇五节，因为这一切规定享有通讯保密的权利。

虽然经过改组，发了命令，建立了高级委员会，但通讯情报共同体到 1948 年仍然和过去一样支离破碎。陆军拥有大量文职人员，在通讯情报的非军事方面具有丰富经验，一般赞成某种形式的联合；另一方面，海军则一如既往，不愿交出任何主权；至于空军，则一心只想不受干扰地去建立自己的辽阔的监听站网 1948 年 8 月。国防部长詹姆斯 ·V · 福雷斯物尔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当时任海军通讯主任的厄尔 · 埃弗雷特 · 斯通海军少将为主席，去研究国防部门内通讯情报的现状，并提出解决办法。这个委员会，山各军方部门的

代表组成，经多方协商，历时数月，最后提出了一个不同意见的报告——海、空军部反对合并，福雷斯特尔对这个结果很不高兴，索性把报告锁进了保险柜。

1949 年 3 月，福雷斯特尔辞职，路易斯·A·约翰逊接任国防部长。他指派的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三家合并，但允许三军有权保留其独立的通讯情报组织。

因此，在 1949 年 5 月 20 日，约翰逊部长发出了一道绝密指令，成立一个武装部队安全局，置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导及控制之下”。它的使命是“把……国家军事体制内的通讯情报安全活动，除由陆、海、空军各部单独管理外，全部置于一个主管部门之下。”

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到部氏指令 4 天之后，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拟定步骤，组建这个新机构，并选定斯通海军少将为局长。因为武装部队安全局是一个高度保密机关，连名称也要绝对保密。因此，对斯通的任命不能公开宣布。可是必须有人接替他的海军通讯主任的职务，人们会纳闷原来的负责人怎么一下不见了。

各军种之间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磋商。最后决定，如真有人探询斯通下落，可山新闻处长含糊宣布：“斯通少将已调参谋长联席会议任职”。就这样，武装部队安全局成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组建的政府机构。斯通于 7 月 15 日悄悄地上了任，没有引起丝毫的注意。

在创建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同时又创建了一个“武装部队安全局委员会”。由各军种在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的两个成员、再加各军种另外一个成员组成。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局长，是委员会的常任主席，所以委员会的成员一共是 10 个人。

委员会原定任务是就通讯情报问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建议并协调对军事密码工作的共同需求，原来的目的是要使通讯情报工作统一于一个领导之下，但由于各军种之间的竞争，委员会成立后，通讯情报在实质上仍然照样属于三军的多头控制之下。

美国通讯情报系统的杂乱无章，在选择目标的方法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最初，一切目标都由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下面的一个情报小组选定。小组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及海、陆、空三军的情报单位的代表所组成。代表们每月都收到一份名叫“情报要求”的表格，以国家分类，在每一国名下又列出一些目标项目（如先进武器系统、部队调动等）。各成员对每一个目际按轻重缓急进行评分，分别给予一至五分，以五分最高。然后再把评选结果直接送交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由该局长把这些目标列为表格，分别交付各截收站。

可是，这个办法只能泛泛提出目标，而没有一定的制度把这些目标项目分配给特定的通讯渠道。这个办法也无法使情报需要转化为明确的通讯情报目标。这些弱点非常误事。

这种方法的失败引起普遍不满，因此，武装部队安全局委员会在 10 月 2 日同意建立一个“情报需求委员会”，由下列军事情报部门的代表组成，即，海军情报处，陆军情报处，空军情报处。还有武装部队安全局本身。情报需求委员会的责任主要是针对军事报务提出目标、确定缓急次序，而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下面的情报小组，则主要限于非军事报冬的目标。这两个组织都应向武装部队安全局提出各自的建议。然后再把这些建议转给一个“截收优

先评委会”。评委会由武装部队安全局的业务部门（二处）的负责人组成，固定由二处处长主持开会。

“截收优先评委会”下大约有 10 个“特定截收优先小组”，设立在安全局二处各分处之内”在评委会每月例会之前，这些小组根据各加工单位的关注与需要，向评委会提出它们自己的建议。

在收到两个情报委员会及各小组的意见之后，评委会即制定出下个月的截收计划，把情报要求交给武装部队安全局收听部的截收处，由该处根据各种要求，具体指定电路和中继点，由监听站截收和监听。

电讯截获之后，一般的规则是：凡能在 24 小时之内进行加工出结果的，就在区内的截收点进一步加工；凡进一步加工可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完成的，就在军区级加工；所有其他加工一般都交到华盛顿由武装部队安全局处理。但不管在哪里，或由哪个单位加工，每一件截获原电文部有一份抄件送交武装部队安全局。

在安全局内，成卷成筒的非暗码明文以及经过密码分析的暗语电文，先由低级人员仔细审查电文，寻找各种单词与词型，然后把电文归入适当的分类箱内。

然后，由 11 个判读小组的语言专家们进行第二次处理。再剔除大约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电文，把剩下的部分交叉归档，分为约 90 个大类，再从中选出个别的电文，从字面上加以翻译，散发给使用部门。筛选出的这一部分精华不到原来总量的百分之一。但是经第二次筛选剩下的材料并不销毁，都保存起来，以备进一步研究或日后翻译之用。

最后经手的人是那些被称为“滩头堡”的小组，也就是各情报使用单位常驻安全局的情报联络员。他们对尚未刊发的截获材料进行研究，然后将成品送发陆、海、空三军的情报处以及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每月要收到 7000 件情报，约占武装部队安全局总产量的一半，每份情报成品都要有一个抄件送交调查局总部。其他使用部门当然还有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

“滩头堡”设在安全局的大院之内，其成员可充分接触到安全局各级的业务，但他们并不归武装部队安全局领导。

1950 年 7 月 14 日，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举行第五十三次会议，对于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通讯情报质量都表示失望。于是，杜鲁门总统在 1951 年 12 月 13 日指示国防部长罗伯特·A·洛维特和国务卿迪安·C·艾奇逊设立一个委员会，调查美国通讯情报的资源问题，要他们采取措施进行必要的纠正。15 天后，刚卸任的空军部长特别助理乔治·艾伯特·布劳内尔主持了一个由名流组成的专门小组，为这个疾病缠身的通讯情报系统寻一医病良方。

经过 6 个月的工作，布劳内尔委员会将通讯情报界的杂乱无章及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工作不力，直接归咎于三军及参谋联席会议。

为加强通讯情报系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叫做“特殊消息统一散发”计划的方案。该方案主张把通讯情报一切收集及加工的责任都交给武装部队安全局，另外再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来分析、评价、散发情报产品。这个机构称为“特殊消息统一散发办公室。”

后来，委员会虽然否决了这种双头安排，但它对于组建一千单一的、包括通讯情报各个方面——收集、加工、评价、散发的集中组织，还是颇感兴趣的。委员会注意到，英国人自 1920 年起就采用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具有易于管理、缩小情报分送范围等等优点。

委员会建议把美国的通讯情报收集和加工业务管辖权全部交给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虽然他可以转托一部分给各军种，以换取他们提供部队的密切支援，但控制权一定要在安全局局长手中，从上至下层层下达指令。至于安全局局长的人选，委员会表示由文职官员承担更适宜。

从一开始，委员会就认识到，影响通讯情报系统的主要问题不在安全局内部，而是来自上面，因此，他们要从上面进行彻底的大改组。

委员会认为通讯情报的领导权应尽可能由一个较高级官员来执掌，因此它建议由总统任命国防部长为通讯情报的行政代理人，让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而不是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

委员会还建议解散武装部队安全局委员会，由两个机构来取代，一个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另一个是恢复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的作用。

根据这个复杂的改组计划，国防部长作为管理通讯情报的行政代理人，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通讯情报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个特别委员会由国防部长本人和国务卿组成，必要时总统也亲自参加。

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如要采取新的重大政策或方案，必须事先提请通讯情报委员会加以考虑；另外，他还要向委员会提供委员会可能要求审阅的任何报告。

通讯情报委员会有权就通讯情报和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工作向国防部长提供咨询。

这是一相当复杂的结构模式，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实现委员会的基本目标，使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手中握有更大的权力，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强大、更加有效的机构，解散武装部队安全局委员会和重建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就可以打掉军方独霸情报的铁掌，并在通讯情报的收集方面给予备非军事部门一定的发言权。至于向特别委员会申诉的程序，则可以使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卸掉在投票时要求全体一致的包袱。

1952 年 10 月 24 日，即布劳内尔委员会提出了它的最后报告 4 个月之后，杜鲁门总统发给国防部长洛维特和国务卿艾奇逊一份绝密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几乎逐字重述了布劳内尔委员会所提的建议。它以总统命令的形式发出，规定于 11 月 4 日秘密生效。

总统命名这个超级保密组织为“ 国家安全局 ”，因此，杜鲁门的这份备忘录成了国家安全局的出生证。

第二章暗潮

第一节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间谍工厂

美国密码帝国总部的所在地正从背街斗室发展成了一座新兴城市。到1980年，国家安全局已经成为有史以来从未见识过，而且也从未想到过的间谍工厂。在那里，数以千计的现代探矿家们使用电子计算机化的淘金盘，从侦收的无尽头的电信材料溪流中，搜寻难以捉摸的金块——词汇、格式和反常现象，以期发现金灿灿的矿脉，揭开高深莫测的奥秘。

当初，信号情报处小得连旧军诫大楼的一间屋子都填不满。如今，它的直系后裔简直要有一座城市那么大的地方，才能处理从全球电子侦收活动中源源不断地搞来的堆积如山的材料。

可以毫不夸张地把国家安全局庞大的建筑群称为信号情报城。它位于华盛顿市和巴尔的摩市之间，占用了1000英亩的土地。它有居民3500人左右，比马里兰州另外的130多个小城镇还大。然而，像多数较大的城市一样，每天清晨，它的人口将猛增至15倍。因为这时有大群白班（上午9时至下午5时）工作人员从巴尔的摩——华盛顿大道上涌向信号情报城的近20栋大搂。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座城镇都很像别的任何城镇——人们可以去理发店，可以上银行，可以找旅行社，可以到图书馆借书，可以买化妆品，甚至可以找医生看痔疮。城内有自己的公共汽车、警察（配有橙红色的巡逻车）、大学（拥有学生1.8万人）和电视台，甚至还有电影制片厂（已经摄制了《横行无阻的陌生人》这些紧张刺激的影片）。那里的邮局每天处理1.8万多件邮件，电话交换站每月接通3万次电话。信号情报城的电力来自本城的发电站。该电站可以供应近10万千瓦的电力，足够一座5万人口的城市之需。

然而，信号情报城同普通城镇之间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例如，你在坐到理发椅上请理发师给你刮脸之前（指取得在此工作的资格），首先必须通过长达好几个月的严格审查，被绑在测谎器上接受测验，要领取一份接触某一范围内的绝密信号情报的许可证，并且要在许多表格上签字画押，保证只字不提这座城市、城内居民及其职业。信号情报城与众不同之处还有：那里没有为表示欢迎而向来宾赠送礼品的小车，没有商会，也没有观光项目。那里根本与旅游不沾边。

把国家安全局的这座豪华城镇建在马里兰州的这个地方绝非偶然，而且选定地址前的一幕戏还差点儿激起该局文职人员的哗变。

武装部队安全局成立后，美国所有的信号情报和通信保密活动都在有限的程度上统一由一个机构负责，以便提高效能和厉行节约。为了进一步提高效能和厉行节约，决定将所有的信号情报活动部集中在阿林顿大院进行，所有的通信保密活动都集中在内布拉斯加大街海军安全站进行，并将研究和发展工作分给这两个设施进行。

这种体制很管用，而且可使该局呆在华盛顿官场的近旁。但是，有一点总是叫人惴惴不安：敌人对华盛顿的袭击乃至破坏活动，有可能使美国的整个密码事业毁于一旦。这种灾难将使美国的密码技术水平倒退十几年，亦即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水平。这两个设施相隔仅9000码，不足以确保两者的安全，这就更使人担心了。

尽管如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集体讨论后断定：“集中之后可以捉高效能，因此值得冒一点风险”。不过，他们还是开始寻找一个远一点的地方，以便仔放较为紧要的档案复制件和备用件设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美国的情报活动很分散，此外，同英国信号情报机构的密切合作又增加了应付危险的保险系数。但是，万一发生这种不幸事件，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绝密备忘录作了说明：“在太平洋，那怕只在十分紧要的十天里得不到通信情报，其后果就可能是莫尔斯比港被占领，而不是进行珊瑚海大海战。通信情报中断七天，就会使我们得不到打胜中途岛之战的情报。”然而，最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担心的是下述结论：“在战争爆发前夕，或者战争初期……”，失去通信情报，或者通信情报长时间中断，“就可能置我国于死地”。

因此，1950 年 3 月 14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国防部长约翰逊授权制订将武装部队安全局迁出华盛顿地区的计划：

首先搬迁阿林顿大院的信号情报设施，因为那里有电子计算机，失去之后极难补充。此项要求在十天之后获准。于是，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斯通任命了一个特别选址委员会去寻找合适的地点，最好选在得克萨斯州、田纳西河谷或丹佛地区的国有土地上。

该委员会在漫长的 7 个月中作了 30 多次现场调查，最后宣布决定：选在位于肯塔基州卢格拉斯地区的诺克斯堡。海军高级

情报专家之一、选址委员会主席托马斯·H·戴尔海军上校和他的 4 名同事对这个选择感到满意。因为，诺克斯堡毕竟位于内地，远离其他可能的目标，肯定能保障安全，而且有足够的土地供施工之用。然而，不幸得很，委贝会的成员内阁（都是军人）从未考虑武装部队安全局 5000 名文职雇员可能作出的反应。

武装部队安全局不是一般的军事机构。它的雇员们也不是华盛顿的普通官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至少是科学家和数学家的精华，许多人原先在工业界或学术界身居高位。为了搞到他们，不得不进行劝诱乃至拐骗。另一些人虽然原来并不十分能干，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将自己的特殊手艺发展成了高超的艺术。连文书和秘书也不是普通人，他们都通过了政府十分严格的安全审查。即使失去百分之十的人，那也是一场大灾难。而迁往肯塔基州的边远地区，则有可能失去远远不止百分之十的人。军人生来就是漂泊者；文职人员则生来就喜欢定居一地，他们定居的地方是华盛顿。

尽管他们呼吁重新选址并且提出了抗议，决定依然不变。19S1 年 4 月 10 日，美国国防部长批准了搬迁计划。于是，阿林顿大院里的许多人就开始翻阅招聘广告了。该局曾一直设法保持住的百分之二点零五的减员率，大有猛增之势。

此时，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易人，由拉尔夫·卡奈因少将接替了斯通海军少将。卡奈因几乎立即就看出了局势的严重性。然而，他深知木已成舟，也只好准备吞下这颗苦果。12 月 10 日上午，参谋联席会议秘书Ｗ·Ｇ·莱勒海军少将打电话给卡奈因，征求他个人对此事的看法。这使他很感意外。

“作为这里的局长”，卡奈因告诉莱勒说，“如果允许我自作主张，我不同意那样做。事实上，我的意见完全相反。依我看，那是个很糟糕的决定。……如果给我说话的机会，我就会说……我不同意呈送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个决定。如果他们让我陈述自己的意见，我将十分高兴。”

两天后，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1952 年 1 月 4 日，国防部长洛维特撤回了命令，并且指示在距华盛顿 25 英里以内的地方选一个新址。于是，卡奈因成了英雄人物。

不到 1 个月，候选地址压缩到了 8 个，其中之一是弗吉尼亚州公共大道实验局，该地后来成了另一班密探的驻地（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候选地址中，颇中人意而又唾手可得的是乔治·G·米德堡。它距华盛顿仅 22 英里，土地和后勤支援设施绰绰有余，而且比较安全。唯一的美中不足是仍有大批文职雇员要搬家，不过至多是从华盛顿的这一头搬到那一头。显而易见，利大于弊。该地位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正中间，便于利用这两个城市的人力和公用设施。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在按到卡奈因将军的建议后几个小时，就向洛维持部长提交了一份表示同意的备忘录。洛维特很快开了绿灯，同意着手制订这个绝密机构的大搬迁计划——代号为 K 计划。

1954 年 7 月，同华盛顿查尔斯·H·汤姆金斯公司签订了执行 K 计划施工任务的合同，合同额达 1900 万美元。合同要求修建一座带玻璃窗的钢筋混凝土三层建筑，其形状像一个大 A 字。外墙用预制绝缘水泥板修建，墙上用暗绿色石片贴面。这座主楼的建筑面积达 140 万平方英尺，并有一个大地下室，用于安装庞大的电子计算机。除此之外，K 计划还要求修建一座 6 万平方英尺的供应楼、人行道、沥青铺面的停车场、公路支线、警卫室和一个电力分站。

到这项秘密工程在 1957 年秋季竣工时，造价已经增加了几乎一倍，从近 2000 万美元增加到了 3500 万美元。但是不到 6 年，该楼就人满为患了。1963 年 6 月 24 日，J·w·贝特森公司的蒸汽车铲开始为新的总部大楼挖地基。这座造价 1200 多方美元新的九层塔楼位于 A 字形业务楼叉开的两翼之间,并有一条中央走廊与业务楼相通，塔楼主要容纳国家安全局系统的分析和破译人员。它使美国国家安全局又增添了五 51.2 万平方英尺的建筑面积，其中 14 万平方英尺是地下室，用于安装错综复杂的电子计算机和数据处理设备。这座地下室将填满原业务楼两翼之间的空隙。从业务楼前院挖出第一铲土的三年之后，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歇尔·卡特为启用新楼剪了彩。

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和业务搂的总面积几乎有中央情报局大楼和美国国会大厦加在一起那么大。楼内有总长 756 万英尺的电话线，7 万平方英尺永远密封着的窗户，1.6 万个灯光装置，一座每天可处理 1100 万加伦水的冷却塔，以及一条全国最长的走廊——980 多英尺长，把国会大厦七百五十英尺长的中央走廊远远地挤到了第二位。

来访者沿载重汽车绝迹的寂静的巴尔的摩——华盛顿大道驱车向北，路过马里兰州地势起伏、绿树成荫的乡村，向右拐入萨维奇路，一眼即可瞥见那座棕色的九层大楼及其身旁的三层 A 字楼。乍一看来，这座建筑物可能属于社会安全管理局或者另外某个庞大的官方机构。但是，逐渐走近之后，上述的初步印象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整座院落围着 10 英尺高的赛克隆栅栏，上面拉了好几条有刺铁丝。栅栏上每隔几十英尺就悬挂着一块告示牌：“禁止照相和写生，否则按国内治安予以惩处。”这道栅栏之内有一道电网，就连大楼周围的沥青卵石地基上也栽了一圈木桩，木桩上拉起了五条高压电线。最后还有一道高高的赛克隆栅栏，以求更加保险。在栅栏之内，偶尔有牵着恶犬的武装警卫进行巡逻。在楼顶上，闭路电视摄像机（带有望远镜头）缓缓地转动着，向下扫描大楼周围的整个地区。

楼顶上还布满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天线。在长方形总部塔楼楼顶的两端各

有两个巨大的圆顶天线罩一一个像巨大的高尔夫球，上面布满了带棱角的麻点；另一个像乒乓球，表面很光滑。楼顶上的其他地方则架设着长线天线、抛物面微波反射器、对数周期天线和一个藏在大绿罩内的白色巨型抛物面反射器（供接收卫星信号之用）。

登上十二级台阶，穿过一道玻璃门，就进入了大楼。这是一号门。整个楼群有四座大门，但是唯有经过一号门才能直接进入塔楼。一直往前走，有联邦保卫处的两名身穿蓝色制服的武装警卫检验证件。每个工作人员的脖子下面都挂着带有电子计算机穿孔和彩色标记的层压塑料出入证，两名警卫要核对出入证上的照片与持证人的面貌是否相符。

来访者在通过检查站之前必须向右拐，穿过另一玻璃门，进入窗明几净的接待室。在那里，国家安全局的接待单位的接待员接待来客。接待单位的代表必须为没有安全通行证的来客签字作保，并且始终陪伴着客人。签字之后，来客获准入内，并且领取一个红白相间的证件。证件长 4 英寸半，宽 2 英寸半，正面醒目地写着“有效期一天”，背面写有注意事项，告诫持证人不得滥用证件。但是，这种层压塑料证件上没有标明国家安全局的大名。

来客系好证件后，就在接待人的陪同下通过门卫沿走廊步入总部大搂门厅。中途要经过占满一面墙的、长 33 英尺的告示牌，提醒局内从事各种活动的工作人员不要用耳机收听卫星信号。告示牌搞得很长，是为了便于人们边走边看。

过道尽头正面的墙壁上镶嵌着色彩斑驳的巨大局徽。它直径四英尺，用两万多块拜占庭式刻花蓝玻璃拼成，中间是一神态刚毅的雄鹰，鹰爪紧握着一把古老的大万能钥匙———把既打开别人的而又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秘密的钥匙，闪闪发光的钻蓝色衬底周围是白底蓝字，写着那头雄鹰凶猛地守护着的主人的名字——美国国家安全局。

在局徽那里向左转，就进入了塔楼的门厅，厅内挂着每位前任局长的油画像。在这里，越过另一名武装警卫，六部自动电梯可将人们载到下一层，进入由极其先进的电子计算机组成的世纪的世界；或者将人们一直送到第九层的行政办公室——别名“红木区”。

“红 21 木区”尽头有一堵淡蓝色的墙壁，壁上饰有局徽，开着一扇同样色调的门，进了门就是第九 A——一九七号房间——局长（缩写 DIRNSA）办公室。外间是行政秘书们的办公室。穿过外间向右拐就到了局长舒适但不豪华的办公室。在擦得一尘不染的办公桌前，摁着两把皮椅子，中间是一张不高的咖啡桌，对面是一张配套的长沙发，透过右侧的窗户可以凭眺马里兰州绿色的原野。在软百叶帘低垂的窗下，摆着一座大型地球仪；壁架上则陈设着一艘帆船的模型。

回到楼下的大厅内，沿通往业务楼的、配有落地玻璃窗的过道向前走不远，就到了国家安全局内相当于“繁华市街”的地方。沿着比三个足球场还长的 C 走廊漫步，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公正信托银行支行、塔楼联邦存款互助会、环球旅行社办事处、“药美”药房、班车站、献血站、订票处、修鞋铺、洗衣店和理发馆。

附近有一个自助食堂，180 名厨师在 15 个炉子旁汗流侠背地干活，每周 7 天、每天 24 时不停地制作鳕鱼饼和鸡肉馅饼。在阳光温暖的日子里，雇员们可在食堂门外院子里的凉棚就餐，附近还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凉亭。

不过，要是奶油浓汤里混进了病菌，那倒要小心点儿。大院内有一座各

科齐全的医务中心，从脚指甲的毛病到精神病都能治，急诊室、X 光室和手术室一应俱全。

国家安全局有一座可容纳 500 人的大礼堂，它以威廉 ·F ·弗里德曼命名，入口处陈设着他的半身塑像。此外还有一座国家安全局图书馆，它大概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图书馆，人们在那里可以借到研究美锡尼文献的著作，也可以边看沙特阿拉伯电视节目的录像边听解说词。

C 走廊的中部也有联邦保卫处的一名佩带手枪的警卫人员，那里的几部电梯可以将工作人员送到二楼或三楼工作区。那里的宽敞过道两侧排列着笨重的钢门，门上有各种颜色的圆徽，表示门内进行的各项工作的机密程度。例如，红色表示那里进行的工作只限于少数人知道，非工作需要不得入内。其他一些过道内则挂着告示牌，不准擅自进入。当有人既没有适当的证件，又没有看告示牌而仍然往前走时，警铃就会响起，红灯开始闪光，扩音器里传出声音，要闯入者向头顶上的一部摄像机出示身份证。

某些机密性极高的办公室（如业务搂内的通信中心）都装有密码锁。要把手伸进装着 10 个按纽的黑盒子，按照正确的顺序漱动几个按纽，才能把门打开。

在办公室内，有些人在政府配发的灰色办公桌旁工作着，另一些人则在绿色书写板上抄抄写写。在业务楼里，几乎每间办公室色彩淡雅的墙壁上都镶嵌着这种书写板。在这座由研究与工程系统使用的业务楼里，还有许多实验室。办公桌上摆着两种电话机：黑色电话机通外线，用于非保密通话；灰色电话机用于进行保密通话。此外还有一个保密传送带系统，可把文件在 14 分钟内从楼的这一头传送到另一头，而不必通过中央控制站。为了更快地传送，按一下转盘，德国制造的气动管道系统可以在不到 90 秒钟内把文件从一个办公室急速传到另一个办公室。

1966 年，马歇尔 · 卡持局长在总部新塔楼落成典礼上献词时，妙趣横生地向到会者讲述了这番话：“ 诸位将会在业务楼门厅里看到记述该楼施工详情的铜铭文和卡奈因将军纪念碑。在门厅对面的墙壁上，我们挂上了布莱克将军（前局长）的肖像。 ”接着，他带着一丝微笑说：“ 现在诸位该明白我为什么大力敦促 · bU · 再建一座楼了吧！ ”

卡特将军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带有幽默感，不如说是富有预见性。两年之内，他自己的名字就刻进了一栋三层楼房的铭文。这栋新楼很漂亮，外表呈青铜色，配有玻璃钢窗，建筑面积达 16 万平方英尺，造价 570 万美元。此楼人称 S 楼，由该局通信保密系统（内部称为 S 系统）使用。1968 年以前，通信保密系统的总部和办公室一直设在华盛顿内布拉斯加大街海军安全站内，它是迁往米德堡的最后一个大单位。

一座接一座的大楼拔地而起，国家安全局不断扩大自己的帝国。初创时的“ 黑屋子 ”正在变成一座“ 黑城市 ”。为了方便分配到该局工作的越来越多的单身军人的住宿，新建和扩建了一些宿舍。到 70 年代，已有 5 座宿舍楼，住着大约 3500 名男女军人。此外还增建了一个可容 1000 人就餐的餐厅、一座造价 84.4 万美元的娱乐大楼和一座造价 200 万美元的部队支援楼(供三军密码机构的行政管理部门使用）。

1972 年，又兴建造价 260 万美元的机密材料中心，以存放该局全球侦听网每年录制的几百万英里长的侦收材料磁带。在此以前，这些磁带一直存放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地区另外六座楼房内。鉴于这些磁带具有脆弱的化学

特性，而且经常需要重新调用某些磁带（含有特别难破译的内容或者含有仍有重要价值的内容），因此需要修建这座新楼，以便在温度和湿度保持恒值的条件下保管这些磁带。此外，鉴于某些磁带要进行消磁处理，然后重新使用,这座 10 万平方英尺的新设施还可以容纳一个统一进行磁带更新工作的中心。

机密材料中心设在叫做 SAB3（号支援设施楼）的楼房内，它的一项职能是充当该局邮政与信使勤务的总部。每周有 5 个上午，国家安全局的信使们从 sAB3 出发，前往华盛顿的 17 个地方传送和收集十分机密的文件。武装部队信使队的军事信使和国务院的外交信使们也常来常往。

一年以后，亦即 1973 年，该局决定再盖一座新楼——造价 350 万美元的后勤楼（SAB4 号楼），以加强贮存工作和后勤工作。这栋 12 万平方英尺的楼房竣工后，该局又花了 5.3 万美元向楼里运送了大约 700 车纸张和办公用品。楼内 50 万立方英尺的空间用于贮存报纸。

然而，贮存堆积如山的纸张只是国家安全局遇到的最好办的一个难题。主要的难题是侦收到的电报稿经过阅读和分析，并被撕碎和扔进废纸袋后怎么处理。几乎谁也无法想象国家安全局每天产生多少秘密材料。据政府审计局 1980 年的一份报告说，国家安全局每年产生 5000 万份秘密文件。“ 这就是说 ”，总审计局的报告得出结论说，“ 它的密件大概比政府其他一切部门和机构的密件总和还多。 ”其密件比陆军部、海军部、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其他所有政府机构的密件总和还多！

按重量计算，国家安全局每天作废的密件几乎有 40 吨，一般每周 200 吨。一位参议员见到如此惊人的统计数字之后，曾经问过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官员：“ 国家安全局是不是正用秘密材料把自己埋起来？ ”国家安全局的那位官员无可奈何地答道：“ 好像是那么回事。 ”

如何处理这些含有机密的废纸？这个难题使国家安全局苦恼了几十年。该局一度试图把废纸都化成纸浆。这就要把废纸封装在塑料袋内，用卡车运到几百英里之外的西弗吉尼亚州霍尔城纸板公司（它显然是唯一参与此事的公司）。运到之后，国家安全局就接管工厂 24 小时。废纸倒进纸浆制造机后，一度是国家核心机密的这些材料顷刻之间就会变成制造盛蛋纸箱的材料。但是此法也有问题，那就是某些纸张化不成纸浆。于是，国家安全局修了一座两万平方英尺的库房，里面堆满了必须焚毁的废纸。

最后，在绝望之余，国家安全局设施与后勤系统（即 L 系统）求助于马萨诸塞州惠特曼市美国热力公司，请它制造一种焚纸机——“ 白象一号 ”。

1972 年底，国家安全局 L 系统派人前往马萨诸塞州查看造价 120 万美元的“ 机密废纸焚化机 ”的模型，并且获得了深刻的印象。据该公司称，这部三层楼高的机器可以以每小时 6 吨的速度吞食该局堆积如山的废纸，然后以华氏 3400 度的高温焚化。

为把成堆的废纸袋从各栋楼房里运进“ 火怪 ”的口中，国家安全局简直变成了佛罗里达州的“ 迪斯尼世界 ”。就像迪斯尼世界这个魔术王国中的“ 幻境 ”和其他场所积存的垃圾由地下传送带自动运到中心垃圾处理站一样，来自信号情报城所有楼房的废纸袋均被塞进造价 200 万美元的气动系统，经过埋在地下 10 英尺深处的一些钢管直接送入焚化炉。

1973 年夏，这座精心制作的焚化炉竣工了。不过，现代烟火制造术创造的这个奇迹还有一问题：不能用。绝密垃圾不是变成可以排出炉外的气体和

液体，而是时而凝结成坚如岩石的硬块，积存在“大象”的肚子里，因此要用气锤去砸碎。至少还有一次，没有焚尽的机密材料、电子计算机印刷输出材料和磁带的碎片逸出了炉膛，急得惊恐万状的保安人员们团团转，到处捡拾这些碎片。此外，还不得不动用了陆军的一些 20 吨卡车，并派武装警卫押车，把焚化不了的机密材料运到巴尔的摩城拉伯德堡陆军情报总部的安全地点存放起来。

这部焚纸机问世后的 17 个月一共只运转了 51 天。1974 年 12 月，国家安全局取消了这项合同。但到那时，120 万美元的制造费只剩下 7 万美元还没有付出去了。国家安全局一位羞得满面通红的官员说道：“我们将继续研究下去。”

后来，信号情报城再也容纳不下新楼房了，设施与计划部门的人不得不另找地方去大兴土木。选中的地点是米德堡以北十几英里处的埃尔克里奇兰丁路，距已尔的摩一华盛顿（友谊）国际航空港的跑道灯只有一箭之遥。国家安全局在那里租用了两栋七层塔楼和两栋二层楼房（其中一栋当时归国家宇航局使用），并且部按该局规格用三层有刺铁丝网和电网牢牢地围了起来。

这几栋楼的正式编号是 FANX（友谊附属建筑物）Ⅰ、Ⅱ、Ⅲ、Ⅳ号。被派到那里工作的密探们给它起了一个不那么神秘的名字：友谊麻风村。一位雇员解释说：“我们活像麻风村里的病人。我们的确隶属于国家安全局，可是社会地位比局本部的人低 L 等。”他还说：“国家安全局局本部的人问你在哪儿工作，你一告诉他，他就用高人一等的腔调说上一句‘噢，你是友谊附属区来的’。他们要是不这么说，你还不至于那么难受。可是，他们确实是这么说的。真叫人受不了！”

关于这个附属区的牢骚远不止这些。那位雇员在解释高达七层的 FANXⅢ号搂为什么没有局本部兄弟单位的那处用管道传送文件的装置时说：“这大概是政府不想把太多的钱花在 FANXⅢ号楼身上，因为这栋楼房总有一天会被友谊机场在恶劣天气中进场的某架喷气式飞机撞毁。这些飞机就在距我的六楼办公室一百码远的地方飞行，有时飞得只有五层楼那么高！”还有个绰号“卡迪亚克山”的停车场也叫人头痛。他说：“卡迪亚克山上水流成河，深达脚踝！你到这个停车场停下车子去上班，不必担心鞋子会太子。你很清楚，鞋子是干不了的。”

即使有 FANX 附属区，信号情报城还是继续力争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他们又兴建了一栋造价 650 万美元的供 600 名军人住宿的楼房、一个造价 500 万美元的设施控制中心、一个造价 250 万美元的后勤支援中心和一栋造价 250 万美元的新部队支援楼。并拨出 200 万美元改建道路，还为其他一些项目（从修建地下通信设施到扩建安全控制站）拨出了 350 万美元。

主要项目是为总部塔楼——业务楼楼群增加几栋总造价 9200 万美元、总面积达 100 万平方英尺的楼房。这项工程将使现有的总部大院增加两栋九层培楼。这样一来，国家安全局将成为华盛顿地区仅次于五角大楼的政府大楼的拥有者。尽管如此，这座用水泥和玻璃建造起来的窃听事业纪念碑在许多年内可能仍将不见于导游图。

指挥国家安全局广泛业务活动的信号情报城首脑们，也像该局本身一样不为外人所知。

身材魁梧、白发苍苍的拉尔夫·朱利安·卡奈因少校是第一任局长，有人称他是国家安全局之父。他实际上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登上局长宝

座的。1951 年 1 月 19 日，亦即在武装部队安全局改成国家安全局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规定了选拔新局长的办法。武装部队安全局理事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每个军种派两名将官组成）定于 2 月 1 日左右开会，从陆军和空军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海军除外，因为斯通海军少将刚担任过局长）选拔一名局长。但在该委员会于 1 月 29 日开会时，陆军只提出一名候选人——卡奈因，空军连一个候选人也没有提出来！于是卡奈因稳操胜算，并在 1951 年 8 月接掌了武装部队安全局。

这位 55 岁少将的军事生涯大部分是在地面部队中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法国指挥过炮兵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又在欧战役中指挥过炮兵部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他担任过各种职务——在珀杜教过军事课，在麦克道尔堡当过伙食军官，在杰克逊堡当过第七军参谋长。然而，在从西点军校毕业后的 34 年中，这位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将军在通信工作方面的经历，只限于 1919 年在堪萨斯州芬斯顿堡当过兼职通信军官和旅代理副官。他在情报工作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因为在调到武装部队安全局之前曾在五角大楼当过负责情报的助理陆军参谋的副手，为时 10 个月。

尽管卡奈因不是出身于科技界，他似乎很快就同局里的军人和文职人员都相处得很好。他说：“局里的工作人员是本局最重要的财富。依靠他们的头脑和双手，我们定会成功。我确信。做好工作的可靠途径是聘用最优秀的人才，给他们创造利于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工作环境。”他决定这种工作环境应当选在马里兰州，而不是选在肯塔基州，这就使他获得了几乎所有雇员的欢心。

卡奈因和新生的国家安全局几乎是天生的一对。由他当局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既设法获得了文职人员的敬重，又没有疏远身着制服的军人。他的最大的资本显然不是什么技术专长，而是有能力把由一个趾高气扬的自我主义者、桀骜不驯的强硬分子和无数特殊利益集团组成的机构团结在一起。他下达的首批指示之一不是什么与当时正在朝鲜进行的战争有关的指示，而是涉及按颜色陈设营具的计划。卡奈因下令调整营具（例如把所有的栎木营具放在楼里的这一翼，把所有的械木营具摆在另一翼等等），直到把原来杂乱无章的营具陈设得和谐一致为止。

“女士，我知道您从 1942 年以来一直使用这把椅子”，他有时会这样说，“不过椅子的颜色不适合这里办公。能不能通融一下，把椅子搬到三号民办楼去。这样，您和您的椅垫就可以留在五号翼楼这里了。”经过调整，营具陈设得井井有条，工作效能也大力提高。不过，卡奈因后来承认，他下这个指示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去让人们熟悉他。

1956 年 11 月，卡奈因当过 5 年多的武装部队安全局和国家安全局局长之后退休了。接替他的是 51 岁的空军中将约翰·亚历山大·桑福德。他那饱经风霜的英俊脸庞似乎告诉人们他早年当过无舱盖飞机的驾驶员。这位西点军校毕业生、陆军早期的飞行员之一，是在 1929 年获得金光灿灿的飞行员徽章的。在美国国内和巴拿马担任过一些职务之后，他在 1939 年到遭受地震灾害的智利圣地亚哥参加执行历史性的救灾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桑福德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在第八航空队担任过许多职务，包括当过参谋长。1944 年，桑福德回到华盛顿，在五角大楼担任负责情报的助理空军参谋长的副手，初次接触到了秘密工作。此后，他又重温了 30 个月的院校生活。起初当过空军指挥参谋学校校长，后来则担

任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马克斯韦尔基地空军国防大学校长，但为时不长。

1951 年 10 月，亦即在朝鲜战争期间，桑德福当上了空军情报部长。这个职务为他担任的下一个职务——国家安全局次长提供了良好的阶梯。1956 年 6 月 1 日就任国家安全局次长后，他在卡奈因将军手下见习，把头六个月的时间花在尽量了解奇异的信号情报世界上。最后，他在 11 月 24 日从行将退休的局长手中接过了管理国家安全局的大权。

桑福德继续进行了卡奈因业已开始的扩充国家安全局全球侦听站的工作。在其四年的国家安全局任期行将结束时，他受到的注意比刚上任时多得多。他计划于 1960 年 11 月退休，但此前几个月，该局发生了它历史中最大的丑闻——两名雇员决定永久迁居莫斯科。

就在这场丑闻闹得热火朝天之际，劳伦斯·休（杰克）·弗罗斯特海军中将接任了局长一职。他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 1926 年的毕业生，在通信和情报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这位身材瘦削、头发灰白的海军军官曾在安纳波利斯海军进修学院学过两年的应用通信，然后又在舰上担任过一系列职务，包括在“达拉斯号”旗舰上当过通信军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罗斯特指挥“沃勒号”驱逐舰通过了日军控制的所罗门群岛，从而荣获一枚铜星奖章和两枚银星奖章。后来，他回到通信工作岗位上，并在海军情报局担任过各种职务。1953 年，他晋升为海军少将，并且担任了国家安全局参谋长，为时达两年之久。1956 年 5 月，这位 53 岁的海军将领被任命为海军情报局长，四年之后又回到了国家安全局。

弗罗斯特在其短短的 20 个月的局长任期内,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应付对两名雇员叛逃事件所作的各种调查上。他所作的改革之一是把该局文职的地位从正常的文官地位改为特殊地位，从而使该局得以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解雇某个雇员，而被解雇者则不享有请求保护权。弗罗斯特自己的密码生涯则在同五角大楼发生一次争执之后过早地结束了。1962 年 6 月 23 日，他离开了国家安全局，去担任波托马克河海军司令，这是行将退休的海军将领们的过渡性职务。

接替弗罗斯特的是 51 岁的空军中将戈登·艾尔斯沃恩·布莱克。他特别爱跳方形舞。像其前任一样，他的相当一部分军事生涯是在通信岗位上度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太平洋指挥过陆军航空通信系统。1953 年，他被任命为空军通信主任。1957 年至 1959 年，这位身材高大的秃顶将军指挥过国家安全局的空军分支机构——空军安全局。短期担任过太平洋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和大陆空军司令部司令官之后，布莱克进入国家安全局，充当该局第四任局长。在那里，他集中精力建立国家安全局和三军密码机构之间比较密切的关系。

他的创造之一是设立了国家安全局秘密工作奖——特拉维斯奖。正如那只双耳银杯的铭文所述，该奖“每年授予在业务活动、行政管理或提供建议等方面作出最重大贡献的美国密码机构”。

特拉维斯奖由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相当于国家安全局的机构）第一任主任爱德华·特拉维斯爵士创设，原意是为了奖励陆、海军信号情报组织之间举行的象棋和垒球等竞赛中的优胜者。后来，美国的信号情报部门夺得了这只奖杯。武装部队安全局成立后，这只奖杯一直被人们所遗忘，摆在阿林顿大院内招灰尘，布莱克发现了这只奖杯，决定重新启用，把它作为三军密码机构在密码学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竞赛奖，1965 年 9 月 10 日，当时的国家

安全局局长马歇尔·S·卡特把闪闪发光的奖杯授予了首次竞赛优胜者——空军安全局第6988安全中队。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派驻国家安全局的代表、留着漂亮八字胡的雷金纳德·H·帕克，代表英方出席了授奖仪式。

布莱克的后任是马歇尔·西尔威斯特（帕特）·卡特中将。他是第三代陆军军官。从经历的广度来说，他是历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最合格的局长之一。卡特毕业于西点军校，获得过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工程硕士学位，早年在陆军高炮部队中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职于陆军后勤部门。1946年，在前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期间，卡特被指定为这位将军在华盛顿的特别代表。次年，马歇尔就任国务卿，设法将卡特提升为准将，把他留在身边当特别助理，从而使这位未来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了亲身感受。后来，马歇尔就任国防部长，又把他的这个门徒带去当行政助理。1962年4月，卡特在防空部队担任过一些职务之后回到了华盛顿，在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A·麦科恩手下当副局长，军衔升到了中将。

在这座“泡菜工厂”里或“麦科恩岛”上（这位有失恭敬的将军有时是这么称呼中央情报局的），他几乎要花百分之二十五的时间在麦科思缺席时充当代理局长主持工作。例如，首先接到U—2飞机拍摄的苏联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导弹照片的是卡特。最早把这些秘密照片呈交肯尼迪总统审阅的也是卡特。

但是，担任这个国家的第二号密探所面临的挑战和职责虽然令人兴奋，他却发现此项职务并非没有风险。卡特曾三次同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发生争执，而且每次都设法取得了胜利，这对于他在军界的前程十分不利。有一次，在白宫同肯尼迪总统一起开会，麦克纳马拉拿出了一份他认为是最新的情报。但是，这实际上是8小时以前的情报。卡特在离开中央情报局总部之前刚从国家安全局获得了使情况完全改观的最新情报。“我掌握了真实情况”，卡待回顾说，因此“我不得不当场纠正麦克纳马拉的说法，他很不高兴，简直要骂人！”

据卡特说，“麦克纳马拉从来不懂得，根据法律规定，我（作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是直接为总统和政府工作的，而绝不是他属下的一个可以任他摆布的中将。”卡特进入中央情报局所接替的是陆军上将查尔斯·P·卡贝尔的职务，任职三年后，麦科恩决定提升他为上将。但是麦克纳马拉反对提升。最后，卡特不但没添一颗星，反而丢了一颗星，同时也丢掉了他的职务。

1965年4月11日，约翰逊总统以退役海军中将威廉·F·雷伯恩取代麦科恩，卡特也就坐了冷板凳。中央情报局是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而成立的，此法规定军方不得同时占据该局的两个最高职位。卡特不在应由中将担任的职位上了，因此降为少将。为了保全面子，仍允许他佩戴中奖肩章。不过，这番好意于事无补。正如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所吐露的那样。

“雷伯恩将军人选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我就注定要立即失业。现在要由陆军——而不是我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了。我橄说，在我完全朽烂之前，他们会在这个令人疲惫而痛苦的世界上的某个地方给我找个好差事。”

卡特在大约一个月或稍多一点的时间里没有获得新的任命，真想交回军装不干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坚持下去，希望有可能摊上一份好工作。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过去的西点同学之一、国家安全局局长戈登·布莱克决定退休，麦克纳马拉的副手赛勒斯·万斯要求卡特接掌。

这项建议对卡特很有吸引力，但有一点降职的味道。“我实际上是降

了……因为我又要回到国防部去了。”

卡特认为，国家安全局已经变成了“前妻”所生的没人疼爱的孩子，把自己侦收到的大批材料漫不经心地交给兰利的分析家们去处理。局长换了一任又一任，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搜集业务和技术知识方面是合格的，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人对分析这些材料十分重视。在美国情报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大政方针时，有的局长显然感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因为他们不了解全面情况。

弗罗斯特将军曾说，这种感受“有时使人十分难堪”。虽然信号情报和通信保密这两个小组委员会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全体会议却经常发生问题。弗罗斯特离职后说道，“在美国情报委员会中，国家安全局局长在材料鉴定领域内的地位，同他在生产领域内的地位有点儿不同”。他还说，这虽然没有使他失去在某些问题上的表决权，但是“很可能导致对那些负责鉴定所有来源提供的情报的人唯唯诺诺。”

在万斯找卡特谈话时，后者对这些问题都很清楚，因此对这项工作不抱幻想。他告诉万斯，只有答应他一个条件，他才会就职。这个条件是：他只对万斯或麦克纳马拉负责。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从而使卡特放了心，因为这就使他免于受负责情报的助理国防部长尤金·G·富比尼博士的支配。卡特提出这项条件是因为他个人不喜欢富比尼，同时显然也是因为他不愿意在过去三年中当过整个情报界的第二号人物之后再去听从一批中层官僚差遣。

1965 年 6 月 1 日，53 岁的帕特·卡特终于接管了他后来经常谑称为“字谜客栈”的国家安全局。卡特是个谢了顶的矮胖子，几乎随时都会流露出引人发笑的幽默感。当他还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时，曾给一位个性古怪、不愿应聘的招募对象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他在信中写道：“我打算请你不时地干一点特殊工作，时间有长有短，有时还要出国。”他接着写道：“不会叫你去派遣间谍、给电话安装窃听器、策动政变，也不会叫你像玛塔·哈里那样裸体扭来扭去。你知道，我们不干那种事！”

卡特还是一位热衷于户外运动的人，周末经常在弗吉尼亚州皮尔里兵营打鹌鹑、猎鹿。这座兵营毫无疑问是美国最戒备森严的禁地。它位于威廉斯堡郊外，占地好几千英亩。那里树木丛生，是中央情报局训练新手和高级间谍的基地，人称“农场”。卡特在中央情报局以及后来在国家安全局任职时，都被“农场”（代号“孤岛”）待若上宾。他在那里乘坐一辆名叫“玩具娃娃”的吉普车兜风，或者打野鸽子，而在不远处，中央情报局未来的官员们则在学习从事破坏和渗透的最新技术。卡特去“孤岛”的次数大多，以致他的助手亨利·诺奇（70 年代后期当过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在信中发表感慨说：“您如果有一天想到‘农场，任职，乃至想当那里的站长，请相信我一定投您一票。”

卡特从一开始就明白，国家安全局在其内部以及在外界的形象不佳。他希望通过在美国情报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情报委员会中更加积极地活动来改变该局形象。但在本局内部，则是另外一回事。

图书、文章或新闻报道中偶尔会提及中央情报局，这使该局工作人员至少在内心里会得到一点满足。而国家安全局则严格奉行避人耳目的方针，这就注定了该局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卡特认为，对于提高士气说来，使该局的工作得到人们的赏识是十分重要之举。因此，他开始邀请政府高级官员访问国家安全局，以鼓舞士气。

在卡特担任局长之前，很少有什么官员知道国家安全局藏身于何处，更不用说登门造访了。关于卡特和他领导的局，看来连莫斯科也了解得比大多数华盛顿官员多。苏联的一家杂志曾给卡特起了一个“电子耳朵”的绰号。并且描写了一番“卡特在从事隐蔽的勾当方面的‘技能，”。这篇文章接下去写道：“人们说，越是优秀的特工，就越不为外人所知。如果此话不假，那么帕恃·卡特就应当感到自豪。因为在避人耳目方面，他比其同事赫尔姆斯更高明。”

卡特希望通过邀请高级决策人到处转一趟并在弗里德曼大礼堂讲讲话，提高该局在情报界的地位，同时使其工作人员受到鼓舞。最成功的一次是1967年9月26日。那一天，副总统休伯特·H·汉弗莱在一片欢腾声中抵达装饰一新的一号大门，准备视察一番，并且发表一次演说。汉弗莱是走访国家安全局的最高级官员之一（副总统布什在1981年2月23日也曾访问过该局）。他对集合起来的密探们说，虽然“你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长期从事富有成效的劳动而不指望得到公众的赞赏……但在政府的最上层，确实有人了解你们的工作，并且十分赞赏你们所作的努力。我是来告诉你们这个情况的，并且代表我们的国家向你们表示感激之情”。

应邀来给国家安全局助兴的人还有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特工处处长詹姆斯·罗利、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布朗利·史密斯、美国情报委员会执行秘书詹姆斯·莱和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执行秘书 J·帕特里克·科因。

卡特的邀请名单上有一点很引人注目，那就是没有邀请任何穿军装的人。虽然从建制上讲国家安全局是“国防部内一个独立的局”，但是卡特宁愿强调“独立”这个词，而不强调“国防”这个词。军方和卡特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竞争，军方要该局完全归它控制，而卡特则要维护和加强该局作为国家级机构的地位。

“你知道，我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一直在进行斗争。我是为阻止军方接管国家安全局而斗争。”卡特中将后来回忆说。“我力求至少坚决不放弃我们已经获得的地位。”说得具体一些，军方就是指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想在该局多安插一些高级军官、少用一些文职人员，多搞一些战术信号情报、少搞一些战略信号情报，并且力图加强军方对该局的控制。

在力求使国家安全局获得国家级机构的地位方面，尽管偶尔也有失败，但是卡特还是设法在同五角大楼之间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其中之一是在局徽问题上取得的胜利。在美国情报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卡特坐在长方形的大会议桌旁边时，偶尔会抬头看看挂在墙上的委员会各成员机构的徽章，中央情报局的徽章上部写着“中央情报局”，底部写着“美利坚合众国”。接着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徽章，上部写着“原子能委员会”，底部也是写的“美利坚合众国”。当他看到自己的局徽时，眉头锁得更紧了。从象征的手示上讲，这个局徽堪称杰作。局徽上画着国防部的象征——站在盾牌上的张开双翅的雄鹰，盾牌上有一道闪电一把万能钥匙相交叉，闪电被三条锁链所切断，另外盾牌每侧还各射出两道闪电。使卡特十分烦恼的不是这些形象，而是所写的字——上部写着“国家安全局”，底部却写着“国防部”。是改变字样的时候了！

有一天，他刚到国家安全局之后，就把美术师理查德·纳奇曼叫进了局长办公室，指示他设计三四种不同的局徽。“局徽上要有‘美利坚合众国’，

要有‘国家安全局’，不要写‘国防部’”，卡特对纳奇曼说道。他还强调：“我需要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而不是一大堆该死的利剑、闪电和画在老鹰屁股下面的那些东西。”

最后选定的设计图案既简洁又雅致，上面画着一头几乎是立体的、神态刚毅有力的雄鹰，它张开双翅，采取一种豪情满怀的保护姿态，利爪中紧握着一把古老的钥匙。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新局徽用“美利坚合众国”取代了“国防部”，从而形象化地宣告国家安全局独立于五角大楼之外。

在卡特看来，这件新艺术品象征着独立。但是他知道，在五角大楼特别情报办公室主任约翰·奥加拉看来，它将象征着造反。虽然法典上没有禁止此项行动的任何条文，卡特还是认为最好逐步给奥加拉造成既成事实。起初是在内部信笺上印上了新局徽。三个月之后，没有听到反应，他就下令在内部业务通讯上印上新局徽。仍然没有反应。“因此，”卡特回忆道，“我说，我们豁出去干它一家伙。我们真的那样做了。我们刚对外使用新局徽，奥加拉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谁批准的？”奥加拉问道。

“我批准的，”卡特回答说。

此后一段时间内，卡特再也没有听到人们提起这件事。一个月之后，奥加拉又打电话说：“我认为你最好提出申请，要求批准使用这个局徽。”

卡特回答说：“太晚了。我们已经使用 6 个月了……旧信纸都用光了，凡是印有旧局徽的纸张都已经用完了。我们已经在所有的纸张上都印上了新局徽。”

奥加拉问道：“花了多少钱？”卡特回答说：“嗯，我想，大概一共花了 12.5 万美元，不过……如果你要改回来，请你下个指示，再拨给我们 12.5 万美元，我一定照办。”卡特哈哈大笑，结束了他对这段情况的描叙。“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准提起这件事。”

卡特同五角大楼之间的某些矛盾来自高级将领们的下述担心：“国家安全局正朝着完全由文官控制的方向发展，而卡特正在协助加速这一进程。”因此，不难理解，当卡特当了四年多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之后宣布准备于 1969 年 8 月 1 日退休时，有人大概并不感到惋惜。

诺埃尔·盖勒海军中将被选中担任国家安全局的第六任局长。他是一位头发斑白的英俊的海军飞行员，1941 年圣诞节出生在伯明翰，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其军事生涯多半是在战斗机驾驶员岗位上度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历史上第一枚海军十字勋章的获得者。1957 年，他被选中担任海军部长小托马斯·S·盖茨的副官。1960 年 8 月，当过一任“突击者号”航空母舰的舰长之后，他前往伦敦担任海军武官。在舰队和五角大楼担任过其他一些职务之后，盖勒成了内布拉斯加州奥佛特空军基地联合战略计划参谋部副主任，其职责包括为战略打击力量选择目标。从那里，他又调到了国家安全局。

盖勒的经历在许多方面恰好与卡特相反，这可能是选中他的原因。卡特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任职期间受到了文官观点的影响，而盖勒除了在伦敦任职那段时间以外，没有受过文官的影响。在那些认为卡特力图把国家安全局变成另一个中央情报局的人看来，盖勒过去缺乏情报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长处。还有一点：卡特明白自己当过这任局长就要退休了，因此很不容易制服他。与卡特不同，盖勒岁数还不大，至少可以再担任一次别的职务，从而

有可能晋升为上将，因此，当军方和文官的决定发生矛盾时，可以指望他会服从军方的命令。

如果以上这些是选中盖勒的原因，那么，至少从初期的情况看来，策划者们必然大夫所望。1971 年 10 月，亦即盖勒在国家安全局任职两年多之后，陆军安全局局长查尔斯 ·J · 德诺姆少将在向陆军副参谋长秘密汇报时诉说了自己的苦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德诺姆说，“ 国家安全局大约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员是军人。现在，在国家安全局的 2000 个高级职务中，也许只有百分之五的职务是由军人担任的。行政十七级以上的文官很多。行政十五级以上的文官约有 650 人。在大约 275 名主持该局工作的高级人士中，来自三个军种的军人只有 16 名左右。因此，国家安全局较高职务上的军人逐渐减少了。 ”德诺姆在这次不能让国家安全局的人听到的汇报中断定：“ 我担心，在大约五年的时间内，国家安全局内大概不再会有军人了。军方正在失去国家安全局所有的关键职位。 ”

军方和文官斗争的核心是对预算的控制权。此项预算被称之为 “ 统一密码预算 ”，它把美国的全部信号情报和通信保密经费（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选择目标的工作所需的经费）都纳入了一项庞大的预算之中。有人估计这项预算高达 100 亿美元，从摩洛哥沙漠中某一个侦听站一副耳筒的费用，到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地下室内的“ 克雷—1 ”型电子计算机的费用，都包括在内。

到 1969 年，国家安全局的密码工作人员已经增加到 9.5 万人之多，几乎是中央情报局人员总数的五倍。“ 统一密码预算 ” 如此庞大，连国家安全局局长卡特也曾把它称之为 “ 庞然大物 ”。为了强调这一点，有一天晚上，他把恰好在附近的劳雷尔赛马场上骑马散步的国家安全局印刷处的一名雇员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此人约有四英尺六英寸高，卡特让这位骑师站在该局的一辆手推车后面，车上堆放着 “ 统一密码预算 ” 和一些说明文件，然后叫国家安全局的摄影师拍下这个场景。据卡特说，这张照片抵得上一千句解释性的话，因为 “ 你说不准（这位骑师）是四英尺六英寸高，还是六英尺四英寸高 ”。

还有一次，卡特决定亲自把‘ 统一密码预算 ’送给国防部副部长赛勒斯 ·万斯，使后者对编制这份预算的工作量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为了能够说明问题，卡特把整份沉甸甸的预算书包在绿色大军毯内，让两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员把它放到车上，跟他去五角大楼。

“ 我让那两位大个子抬着包袱送进了万斯的办公室 ”，卡特笑着回忆说，“ 万斯说，‘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 我说：‘ 我要让你看看国家安全局及其业务控制部门所作的全部努力，看看他们为了满足你的工作班子对我们密码机构的工作所提的要求而不是不做哪些事。 ’ 于是，我让那两个小伙子解开包袱，露出了一大摞工作文书。我真以为他就要惊得从椅子上摔下来了。 ” 这位前局长接着说：“ 这份该死的预算书一个劲儿地增厚！ ”

到 70 年代初期，随着越南战争之趋于结束和国防与情报开支的相应削减，国家安全局开始感到经费拮据。结果，国家安全局内对“ 统一密码预算 ” 的控制变得极为重要了，因为这种控制决定了削减哪些开支以及如伺削减这些开支。虽然军方和文职人员双方都对 “ 统一密码预算 ” 的最后文稿作出了贡献，但在审查过程中的某个时刻要由一个人去代表双方说话。

盖勒局长收到了一份被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前官员称之为 “ 宣战书 ” 的方针政策性文件，力主由文职人员担任那个代表双方说话的人。文件是由该局

当时的第二号有势力的文职人员、业务副局长助理米尔顿·S·扎斯劳和 W组（业务系统的侦收单位小组）组长罗伯特·J·赫尔曼撰写的。它争辩道，文职领导人在国家安全局内体现了连续性，因此更适于决定信号情报界的需要。国家安全局的那位前官员说：“那份方针政策性文件的意思是，‘我们对这一切最清楚。我们要控制预算。你们能分到多少经费，要由我们决定。我们将在你们需要支援时给予支援。’”

但是军方争辩说，由于他们掌管着侦听站、飞机和潜艇，因而他们应对“统一密码预算”享有最后决定权。

后来，盖勒不得不作出选择——把决定权交给军方。一位文职人员认为：“他（盖勒）不是自始至终都办事公道。据我所知，他在国家安全局干得真不差，可是临到末了，我们认为他出卖了自己，站在军方那一边去了。”

1972 年 8 月 24 日，在担任了三年的美国电子间谍首脑之后，盖勒晋升海军上将，并且在军队中获得了一个美差——担任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美军总部司令官。盖勒升为四星将军和就任更高、更好的职位，标志着国家安全局历史上的一个迄今尚未逆转的转折点。在盖勒之前，一般都认为国家安全局局长一职是一个没有发展前途的养老职务。但从盖勒开始，国家安全局变成了晋升上将和担任军内要职的跳板。

盖勒的继任者是塞缪尔·C·菲利普斯中将。在这之前的 12 年中，他从事空军的空间和导弹计划工作，还在全国侦察办公室掌管美国的间谍卫星的单位任过职。他只当了一年的局长。接替他的是他过去在空军空间和导弹计划部门工作的副手艾伦中将。

艾伦高高的个子，头顶上盖着几缕纤细的黑发，戴着一副无边眼镜，颇有专家风度。他在中央情报局只任职 5 个半月就于 1973 年 8 月 15 日调到了国家安全局。他于 1925 年 9 月 30 日出生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毕业于西点军校，后来获得了伊尔诺斯大学物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早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核武器领域内度过的。在核武器领域内，他专长于研究高空核爆炸的军事效应。1961 年 12 月，他到国防部国防研究与空间技术办公室工作。此后，他主要在极其机密的全国侦察办公室工作。在担任过特别计划主任的助手之后，他被任命为空军部长办公厅特别计划主任和卫星计划、空间与导弹系统组织的副指挥官。这两个职务加在一起，大概就构成了第三个职务——全国侦察办公室首脑。

将这位习惯于本尽可能避免引人注目的空间时代间谍派到国家安全局，似乎是在错误的时间向错误的地方派错了人。他接管该局后要处理的棘手问题之一是司法部起诉的一项法律案件。这一案件大有暴露国家安全局一项最秘密的活动之势。除此之外，艾伦将军还把他四年的局长任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用来保卫国家安全局，应付行政当局、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情报调查发起的猛攻。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了国家安全局历史上第一个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作证的局长。

继艾伦之后担任局长的是海军中将博比·雷·英曼。他仅有 46 岁，是该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局长。英曼体型瘦削，长着一张娃娃脸，两颗门牙之间留了一道缝。他出生在得克萨斯州到处是尘土的罗恩斯博罗镇，19 岁就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离开法学院后，他在公立学校教了一年书，然后在征兵局的一再催促下加入了海军后备队。他起初被分配到一艘航空母舰上服役两年。他原先打算在海军中干三年就退伍，没想到被调到了巴黎，后来就留在海军

里。

英曼定下了在海军中干一辈子的决心之后，就在 1957 年申请进修，并按其第三志愿——海军情报——被录取。“他们显然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英曼后来开玩笑他说。完成学业后，他被任命为海军作战部的一名值班军官。“1958 年 7 月初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值班”，他回忆说，“几个小时之后，伊拉克发生政变。努里·赛义德和费萨尔被推翻并遭杀害，尸体被拖到大街上示众。几小时后，我国接受派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的请求。”这是他光辉前程的一个戏剧性的起点。

1961 年，英曼在国家安全局海军的作战情报办公室当上了作战情报分析员。“我当了 33 个月的分析员，主要任务是根据所有来源提供的情报密切注视苏联海军的动向。”英曼在回忆他在国家安全局担任的这个职务时说道。“这就是说，不管哪一类情报，只要涉及苏联海军这个大题目，都要不加限制地送给我研究。我开始监视苏联海军动向的时候，他们很少将舰只派到距其领海 200 英里以外的海域里去。即使派去了，其舰只也常常出毛病，而不得不拖回去。到我三年后离职时，我已目击他们在地中海和西非海岸外常驻了海军力量，并且正为远洋常驻海军力量打基础。”

在斯德哥尔摩任助理海军武官之后，英曼又在夏威夷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担任了动向情报科科长。在这个岗位上，他有机会仔细观察了情报工作上的一些灾难性事件，例如发生在朝鲜海岸外的“普韦布洛号”间谍船被俘和 EC—121 间谍飞机被击落的事件。1974 年 9 月，英曼被任命为海军情报局局长，两年后又当上了国防情报局负责计划、活动和支援的副局长。

英曼是势如暴风骤雨的情报调查过去之后的第一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因此他的态度可谓比较开明。英曼与其许多前任不同，他在同国会打交道时是一位手法高明的外交家。他是在作为海军情报局局长经受各种国会调查的磨难时获得外交才能的。他在任期内似乎忙于处理两件事：一是力图确立国家安全局在密码领域内的垄断地位；二是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一起进行保护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活动的立法工作。

为了消除外界在密码领域内的竞争，英曼采取了空前未有的步骤，在一些新闻采访活动中公开露面。但是，这些活动大多不加宣扬，力求少引人注目，透露出来的实质性内容则更好。他曾对一些人说：“我试图在毫不大肆宣传的情况下进行这些活动，因为我确信情报首脑们不应成为新闻人物。如果他们成了新闻人物，手下的工作人员们天天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在电视上、在周刊的封面上见到其上司的形象，看到自己辛勤工作换得的荣誉都被上司占有了，那么这些情报首脑要维护保密纪律就有点儿难了。”

英曼在国家安全局任期内实行的比较开明的改革之一,涉及 20 年来一直折磨着该局的一种恐惧症——担心工作人员的同性恋活动。

使该局蒙受打击的最糟糕的一次丑闻发生在 1960 年。那一年，两名分析人员——许多人相信他们是同性恋者——叛逃到了莫斯科。在此后进行的麦卡锡式的清洗中，国家安全局几十名被怀疑有同性恋行为的雇员被迫辞职或遭解雇。从那时以后，只要有一点同性恋嫌疑，有关的人员就不会被雇用；如果已被雇用，则在事实被揭露之后被迫辞职。

1980 年 7 月初，一名在弗吉尼亚州罗斯林短期受训的行政十一级语言学家被怀疑为同性恋者。国家安全局的头一个反应是取消他接触机密的资格并且开始进行调查。在接受盘问时，国家安全局这名已有六年工龄的雇员坦率

地承认他实际上是同性恋者。几天之后，一位上司把他叫进办公室，告诉他肯定会被解雇，因此竭力敦促他辞职。

这位雇员不但没有辞职，反而去同华盛顿维护同性恋者权利的卡梅尼联系。于是，卡梅尼打电话给国家安全局里的那位上司，告诉他这位雇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辞职，不管是由行政部门处理还是由司法部门处理，都要把官司打到底。卡梅尼要求立即恢复这位雇员接触机密的资格，以及恢复他的工作。此外，卡梅尼这位口若悬河的高明的街头斗士还告诉那位上司：“如果要打官司，那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而贵局肯定不喜欢这样。”

这番话击中了避世遁迹、怕出头露面的国家安全局的要害。9 月 15 日，该局总法律顾问施瓦茨打电话给卡梅尼，要求他“降温”。施瓦茨过去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律师。他告诉卡梅尼，此事已促使上层人士重新考虑处理同性恋问题的方针，看来最后的决定会对同性恋者有利。

此后，这件事就暂时搁置起来。10 月中旬，施瓦茨与那位雇员的辩护律师卡梅尼联系，请他同当事人一起于 10 月 29 日（星期三）到局里商讨解决办法。卡梅尼和当事人在一号大门受到接待，领取了出入证，并在施瓦茨的陪同下来到九层楼上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助理法律顾问威廉·哈格尔和行政办公室副主任波纳尼已经等在那里了。施瓦茨首先发言说，国家安全局已经决定使这位雇员复职，并且恢复他的接触机密的资格。但有一个惊人的难题要解决，那就是：这位雇员必须签署一份业已拟妥的保证书，保证把自己的同性恋毛病告诉全家人（母亲、两个姐妹和五个兄弟），并且保证不向因搞同性恋而受到的讹诈屈服。

那位雇员和卡梅尼都同意上述条件，但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条件。他们都感到这是一项重要决定，因此要求公布此事——至少在同性恋音的内部报纸上公布。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起初表示反对，后来虽然作了让步，但有一个条件，即不得披露该雇员的姓名。这是可以接受的条件，于是那位雇员签署了保证书，并且定于下星期一复职。

然而，卡梅尼和那位雇员走了之后，施瓦茨（大概还有英曼）开始重新考虑公布于众这个主张。当晚 10 时左右，卡梅尼在其华盛顿家中接到了施瓦茨的电话，要求他推迟 30 至 60 天再公布。施瓦茨说，他要同政府里的其他人“打通关系”。他认为，让他们先从他那里听到这件事，要比先从报纸上看到这件事好些。具体地说，他要同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国防部的某些部门以及中央情报局进行磋商。那时，卡梅尼已在当地同性恋者的报纸——《浮荡者》上保留了版面，但最后也还是同意了施瓦茨的要求。

六个星期之后，大约在 12 月中旬，施瓦茨打电话给卡梅尼，要求根本不公布签署保证书一事，因为在这之前的一个半月里，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已经当选为总统，政治风向突然急剧右转。“他们已经看到了选举结果报告，因此认为，如果公布那件事，会有许多人很不高兴。”卡梅尼重复施瓦茨的意见说。“他们担心维护道德的多数派会作出强烈的反应。他特别强调‘维护道德的多数派’这个词，并且要求我们根本不公布那件事。我说，这可是个难办的决定。”

其间又插进了这佯一件事：当局正在认真考虑让英曼担任中央情报局的二把手。在威廉·J·凯西被提名为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之前，英曼也一直在争取担任那个职务。卡梅尼虽然很想发表那篇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报道，但是

相信英曼进入中央情报局之后整个情报界的同性恋者一定会获得更加公正的待遇，因此他不想干任何可能妨碍这位国家安全局局长获胜的事情。

然而，另一方面，据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官员称，“整个情报界内还是有一些人深感同性恋者不适合获得接触机密的资格。这批人为数不少，他们对上述决定深感不安”。显然是出于上述感情，也许还由于想叫英曼难堪，圣诞节过后就有人开始打匿名电话，把情况透露给了《华盛顿邮报》。此项消息于 12 月 30 日首次见报。但在前一天，国家安全局那位同性恋雇员已向安全处报告履行了保证——把情况告诉全家。安全处表示尚须核实，但是告诉他绝对不会丢掉饭碗。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内，他被提升到了行政十二级。

英曼轻轻松松地度过了难关，这无疑使那些透露情况的人大失所望。经过大约一个月的不择手段的钻营，包括扬言要从海军退役去商界挣钱，英曼接受了凯西的建议，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同时晋升为海军上将——对于不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人说来，这是罕见的现象。在国会为批准他的任职而举行的听证会上，大家都喜欢上了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参议员们竟相对他大加赞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参议员理查德·卢加尔说道：“如果说两党在什么事情上曾表示一致赞同而且都十分热情的话，那就是批准他的任职这件事。”

1981 年 3 月 10 日，英曼的老朋友林肯·D·福勒奉命填补他的遗缺，登上了国家安全局的宝座。这位 53 岁的空军中将是马萨诸塞州梅德福人，毕业于西点军校，获得过伦塞勒工业学院工程管理硕士学位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硕士学位。他的军事生涯大部分是在情报和战略侦察岗位上度过的。50 年代指挥过 RB—47 侦察机，六十年代后期在阿留申群岛中寒冷的谢米亚岛上掌管过一个监视中队。

1964 年 7 月，福勒被调到国防情报局科技情报处工作，后来担任了导弹与空间办公室空间系统处处长，直到 1967 年离开该处为止。七年后，他回到了国防情报局，担任负责情报的副局长。1976 年 7 月，他当上了该局的两名次长之一——负责生产的次长。同年，英曼也调到了国防情报局，担任了另一次长——负责计划、活动与支援的次长。根据分工，福勒负责动向情报、情报判断、科技情报和研究工作，而英曼则掌管国防情报学校、情报搜集活动、武官系统和反情报与安全工作。

1977 年夏，英曼被调往国家安全局，福勒则被派往德国，担任欧洲美军总部情报部长，两年后晋升中将，并且当上了设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与英曼不同，福勒决心不出风头，并且显然已经开始重修国家安全局遮人耳目的神秘高墙。

至此，从该局内部选拔的专业人才担任副局长已经形成传统。下一任副局长的任命只从一个方面改变传统——任命了一名妇女。她就是 59 岁的安·Z·卡拉克里斯蒂。她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信号情报高级管理人的岗位上度过的。1942 年，她从大学毕业后，几乎立即就在陆军安全局找到了工作。她在战争期间一直研究日本密码，战后当过短期记者，然后又回到陆军安全局做密码工作。她在陆军安全局和后来的国家安全局内逐步晋升。1959 年，她被任命为信号情报研究办公室主任，从 1972 年至 1975 年担任 A 组（主要的信号情报分析组）副组长，以后又担任组长，直到 1980 年被英曼局长任命为副局长为止。

像国家安全局其他许多有成就的管理人员一样，卡拉克里斯蒂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她的事业。她是单身女人，孤独地居住在华盛顿市优美的乔治敦区中心的住宅内。她每天早上驾驶道奇公司制造的青绿色“ 奥姆尼 ” 牌小汽车，向北行驶去米德堡上班。卡拉克里斯蒂是国防机构内升到高位的极少几名妇女之一。1975 年，她是国家安全局历史上第一位升到行政十八级高位的妇女，也是整个国防机构内升到这个最高级别的第二位妇女。

在副局长以下，国家安全局的组织体制一向是该局最高的秘密之一。与从不隐瞒上层组织体制的中央情报局不同,国家安全局于 1959 年悄悄地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用一道保密帷幕永远遮住了它的组织体制。第八六一三六号公法第六款规定：“ 不得援用本法或其他任何法律的条文来要求透露国家安全局的编制或任何职能，透露该局的任何活动情况，或者该局所雇人员的姓名、职称、薪俸或数量。 ” 因此，根据这项很少为人所知的法律，国家安全局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权力，简直可以否认自身的存在。

第二节复杂而庞大的间谍机构

国家安全局基本上由十个“关键部分”组成，四个主要从事业务活动的“系统”，五个行政和支援“系统”，以及一个训练单位。

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DDO）：按照国家安全局的等级划分，这个由负责业务活动的副局长领导的办公室一向被视为是“兄弟”中的“老大”。它原名生产办公室（PROD），拥有一大批侦听员、破译员、语言学家、通信量分析员和信号分析员，是国家安全局最大的一个系统。从 1963 年至 1968 年，掌管办公室的是奥利弗·R·柯尔比。他起初担任助理局长帮办，后来担任助理局长。他矮矮胖胖，留着平头，是国家安全局的元老，1963 年荣获过五角大楼授予文职人员的最高奖——文职人员服务优异奖。1968 年春，柯尔比经不住私人企业的诱惑，转到得克萨斯州格“林尔 LTV（林—特姆科—沃特）电气系统公司，担任负责高级计划工作的副总经理。该公司显然是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设备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例如，据说 E 系统公司曾在 60 年代末期和国际商业机械公司一起为国家安全局设在澳大利的来松峡的庞大侦听站制造了电子计算机。

接替柯尔比的是空军少将莫里林。他是该局最风趣的演说家之一。卡特挑选这位将军就任此职，主要是为了缓和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方的压力，因为军方要求让他们的几个人担任某些高级职务。莫里林领导它产办公室到 1973 年 3 月为止，然后就从空军退役了。其时，他已在空军中服役 32 年。

莫里林退役后，负责专业的的助理局长一职也撤销了。他的继任者陆军少将赫伯特·E·沃尔夫当上了第一任负责业务活动的副局长，沃尔夫被人们称为“精力充沛、勇气十足的犟驴”，“对谁都毫无顾忌”。他用一挺镀了铬的机枪装饰自己办公室的墙壁。据一位前官员称，他能“把人生吃了”。他的任职似乎是军方在同文职人员进行上层权力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果实。据说，沃尔夫到任后立即锁上了他的办公室通往其文职副手（米尔顿·扎斯劳）办公室的那道门。

1975 年 7 月，局长艾伦任命罗伯特·德雷克为负责业务活动的副局长，从而使这个职务回到了文职人员手中，使将军们大为扫兴。三年后，德雷竞升为负责全局工作的副局长后，陆军少将麦克法登接任负责业务活动的副局长，从而使这个职务又回到了军人手中。麦克法登在这之前的三年内一直担任负责外站管理与评价工作的副局长（DDF）。作为掌管全球侦听站业务活动的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的首脑，麦克法登就成了基本上有名无实的中央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在军内的名称）副局长。

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的业务包括全部信号情报活动——从侦收到破译，从通信量分析到电报明文分析，从侦破高度机密的外交密码到窃听保密性较差的无线电话，无所不包。它出的简报包括了对各国——敌国和友邦、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超级大国和极小国家——密码的分析。它是“黑屋子”中的“黑屋子”。

卡奈因将军担任局长后就把生产办公室分成了四个业务处和三个支援处。苏联高级处（ADVA）集中精力破译苏联高级单位的密码，主要专长于研究新破译方法。另一方面，苏联一般处（GENS）主要负责破译苏联基层和中层单位的密码，集中精力开拓这方面的工作。第三个业务处是亚洲共产党国

家处（A-COM），负责研究朝鲜、中国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密码。最后是其他地区处（ALLO），负责破译世界其他一切地区的密码，包括美国的盟邦和中立国的密码。例如，ALLO—34 科负责破译中东地区的密码。

对四个破译处的电子计算机支援由机器处理处（MPRO）的程序编制员和电子计算机专家提供。电信处（TCOM）负责转递该局的全球电信。最后一个处是搜集处，负责管理庞大的侦收网。

在该局两名分析人员于 1960 年叛逃到莫斯科以后,生产办公室改编为三个庞大的信号情报分析组和两个支援组。跟过去一样，三个破译组按地区划分，每组负责其目标地区内所有信号情报的分析工作。这些组又分为室、处、科。

在这次改编中，ADVA 和 GENS 合并为 A 组。它是三个组中最大的组，负责分析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所有密码。组长是原先的 ADVA 处长亚瑟·J·利文森。他后来离开了国家安全局（到国际商业机械公司任职去了）。从 1975 年到 1980 年，安·卡拉克里斯蒂是苏联密码首席破译家。1980 年，她当上了副局长。

B 组接过了 ACOM 处破译中国、朝鲜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密码的职责。组长是该局元老、汉语专家米尔顿·扎斯劳。

原 GENS 处处长弗朗西斯是最后一个业务组——G 组的组长。该组由原先的 ALLO 处组成，负责破译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密码。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G 组还开始破译发至和发自美国的国际电信。到 1972 年，G 组已发展到拥有 1200 多名文职雇员和大约 600 名军人，他们分散在五个室、四个处和十四个科内工作。

在支援领域内，MPRO 变成了 C 组，搜集处变成了 W 组（负责协调和管理所有的侦收活动）。TCOM 处起初未予变动，后来在 1976 年左右并入 C 组，改为电信与电子计算机勤务室。

除辖有上述各组外，还有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的一些行政单位。在最重要的行政单位中有 P05 处——该局的情报使用单位联络处，负责与联邦其他所有情报机构进行联络。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情报界其它机构提出的监视名单和其他信号情报要求，源源不断地送进该处。侦收到的材料也通过该处转往情报界各单位。

P04 处是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负责制订活动方针和计划的行政单位。

大批工程师、科学家和数学家在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内从事分析信号的机密工作。这项工作又分为四类：通信信号分析，亦即对任何可以传递信息的发射信号进行研究；电子信号分析，主要是获取电子情报和转达情报、遥测分析、信号转换研究，以期发现用频谱扩展（信号几乎消失在噪声之中）或跳频（信号迅速从一个频率跳到另一个频率）之类的技术隐藏起来的信号。

躲躲闪闪的信号一旦被捕捉住，经过分析和再现，若系加密电报，则送到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密码破译处去。在那里，破译员们过去是俯身在成堆的电报纸上埋头工作，今天则不但拿着纸张和彩色铅笔，而且使用安装在办公桌上的电子计算机终端设备，运用一切新老方式和高等理论数学，竭力搜索昨天和今天电报中的共同规律。

即使破译乏术，通信量分析员们也许仍能捞到不少情报。只凭电报的‘表面现像”——发报地点、可能的收报地点、轻重缓急程度、密码等级的高低以及发报频率与数量，通信量分析员往往可以为解开一个重大的谜提供线

索。例如，发往和发自苏联宇航中心的电报量剧增，可能表明马上要进行空间发射活动；驻在苏联一阿富汗边界上的部队突然改用高等级密码，或者发报的轻重缓急次序上大大优先，这可能意味着爆发敌对行动。但是有的通信活动不那么容易判明含意，要通过研究大量的通信资料和有关的情报，才能搞清其内在联系。

然而，并非所有的信号情报都加了密，它们也不是都隐藏在无线电频谱之中。流向国家安全局的许多通信资料均来自电话、海底电报和用户电报的未加密的话声与电文。据前负责通信保密的副局长雷蒙德·西奥·塔特称，为了把大约 50 种外语译成英语，国家安全局雇用了“美国最大的一批外语专家，他们也是苏联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几批外语专家之一。”

除了按照规范科学地翻译大多数外语和方言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密码语言学家的特殊语言专家，他们负责破译保密通话，并且研究借助计算机进行通话翻译之类的先进方法。多年来，国家安全局一直用机器进行某种翻译工作（叫做“行动查寻”），亦即在电文中查出一些字，找出这些字在原文所用语言中的含义，然后打印出释义。这种装置还可用于标示要找的同（包括监视名单中的那些词），或者统计某些特定的词或字母在电中出现的次数，以有助于破译密码。

助理国防部长杰拉尔德·P·丁尼安曾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上令人惊异地承认：“苏联人今天有能力侦收美国的通信频率并且测定电台位置。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信号情报机构……掌管着数以百计的侦收、处理和分析设施，并且大量利用未加密的话频通信。”

然而，外国通过信号情报活动对美国通信活动加以利用的能力，并不只是苏联老练的窃听人员才有。越南战争向国家安全局证明：即使是电子技术落后的国家，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未加保护的通信活动。前通信保密首脑塔特说过：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北越人和越共之所以有效地逃过了空袭和炮击，是因为事先通过监听美国和盟国未加保密的通信内容而获情报。此外，我们还有证据表明，在许多情况下，敌人在对美国及其盟国的部队作战时利用了我们的通信。从战俘、投诚人员和缴获的材料所提供的情况来看，北越人和越共虽然只花了不大的力量搞成了一些比较落后的监听设备，但却显然获得了对未加保密的话频通信进行通信情报活动的宝贵能力。

在国家安全局内部，国家安全局通信保密办公室通称 S 系统，或者简写为 CLMSEC。它提供保护美国全部保密通信——指挥与控制通信、话频通信、数据通信、电传打字通信和遥测通信——的方法、原则和设备。它还规定使用各种保密装置的方法。这些保密装置五花八门，从总统车内的保密电话到国务院大楼密码室内嗡嗡作响的密码机，应有尽有。

国家的通信保密政策由国家安全委贝会下设的高度机密的美国通信保密委员会制订。通信保密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是国家安全局政策与对外关系处处长。该委员会旨在确定国家通信保

密工作的目标，为联邦政府其他各部、局规定通信保密标准，以及制订与外国政府及北约之类的组织进行通信保密合作的政策。通信保密委员会将政策呈送作为联邦政府通信保密工作执行代理人的国防部长，然后转给国家安全局。

通信保密委员会的成员有国防部长、国务卿、各军种部部长、商务部长、

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主席一般由五角大楼负责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的国防部副部长帮办担任。1982 年，此职由国家安全局原空间与机动微波系统办公室副主任莱瑟姆担任。但是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不超过一次，而且只批准各工作组的决定。这些工作由执行秘书（总是由国家安全局的人担任）控制。因此，通信保密委员会只不过是国家安全局的附庸而已。

若某个问题未能由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则提交由国防部长和国务卿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处理。若他俩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则提交总统裁决。

国家安全局 A 系统研制密码设备的过程既漫长又费钱。第一步是深入研究须用密码保护的新通信系统，特别着重研究该系统是不是易被侦听。一旦找到了弱点，工程师们就着手工作改装一种现有的密码机，或者设计一种全新的装置，以克服弱点。研制出新编密码系统的快慢，取决于基本上由美国通信保密委员会规定的轻重缓急次序。

这个过程尽管拖得很长，可能要持续好几年，而且要花费几十万美元，但是 S 系统有时也出次品。有一次，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贝会发现国家安全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最先进的密码装置被弃置在空军的地堡里，上面积满了尘土而且生了锈。这种设备的型号是 KY—28。它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匆匆忙忙地投入生产的，目的是让战斗机驾驶员在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时能有一种保密通话手段。然而，在飞行员们看来，这些黑匣子至少叫人讨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还会带来危险，因为在通话之前要有一段调整时间。一位空军将领说：“ 战斗机驾驶员在战斗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不喜欢等那么长的时间才通话。……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什么东西部往战斗机里装。但是，如果无法让驾驶员确信它会满足其需要，他就不会使用它。 ”

因此，在花了 1.1 亿美元改装 2200 架战斗机之后，这些黑匣子还是被扔进了地堡，国家安全局的工程师们只得回到绘图板旁重新设计。

负责编密的通信保密办公室和负责破译的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好像都参与制订新密码。通信保密办公室编制的所有密码都要交给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试验其抗破译性能。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卡特说道：“ 我们是按所谓的秘诀行事的。这个秘诀就是，通信保密部门搞出来的任何东西都要由密码破译部门仔细分析，看看能否破译。 ”然而，这种试验是确有其事还是纯属虚构，连卡特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我们应该那样做，而且自称也是那样做的。 ”但他又说：“ 我对技术问题并不十分注意，因此不知道我们是否确实那样做了。 ”

1973 年至 1978 年期间，担任通信保密副局长的是雷·塔特。他是亚拉巴马州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 B—24 和 B—17 轰炸机空勤组成员。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空军试验场司令部电子处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在朝鲜战争期间戴上飞行头盔，参加了海军航空兵。1954 年，塔特进入国家安全局，在 S 系统任电子工程师，后来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在生产系统参加执行过一些特别搜集、处理和信号分析计划之后，他于 1972 年 9 月当上了通信保密办公室的二把手。10 个月之后，他升至行政十八级，并且担任了通信保密办公室的最高职务。1978 年 1 月，他在 53 岁时从该局退休。

把窃听艺术变成一门科学，这是国家安全局最初的三大系统中第三个系统的宗旨。研究与工程办公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实验室和嵌满黑板的办公室里孜孜不倦地绞尽脑汁，力求创造技术奇迹——从小得要用电子扫描显微镜对其进行特征试验的电子部件，到为了更好地侦听苏联信号而设计的有

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抛物面天线。

研究与工程办公室起初分为三个处。REMP 处（研究、工程、数学和物理处）专长于解决带有普遍性的各种各样的密码分析问题，而不是去攻克某个特定国家的密码。

REMP 处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们集中精力研究把理论统计学和数学的最新成果用于破译工作的可能性。该处后来改为数学研究技术处。

另一方面，RADE 处（研究与发展处）则集中力量制造越来越先进的侦收和信号分析设备，其中包括各种新型磁带，每一种都可以容纳几百路微波通信的内容。RADE 处后来改为侦收设备处。豪斯曼一度担任过该处处长。他在国家安全局工作 12 年后于 1960 年离职，把他的磁带知识贡献给庞大的安佩克斯磁带公司，担任该公司负责研究工作的副总经理。1971 年，他就任总经理兼首席代表。

STED 处（标准技术设备发展处）负责协助通信保密办公室研究和发展先进的编密设备。它后来改为编密设备处。处长是霍华德·巴洛曾担任过处长。60 年代末，他担任了国家安全局通信保密系统首脑（1973 年由雷·塔特接任）。

在导致各处改变称呼的那次改编中，还增设了一个处——电子计算机技术处，负责全部电子计算机研究工作。

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担任研究与发展助理局长的是马修斯。他 40 多岁，说话和气，善于用最简明的语言讲清最复杂的理论。卡特将军特别赞赏这种才能。“同他谈话可以确切领会他的意思”，这位前局长回顾道。“在同别的家伙谈话时，他们总是谈得根深奥，叫我理解不了，我有时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存心要糊弄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马修斯统率一支博士大军，但他自己只在 1943 年从伊利诺斯大学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不过，除学士学位之外，他还有 20 年的经验——40 年代在信号情报处研究与发展科工作，接着又在武装部队安全局工作，后来又在国家安全局工作了 10 年。他是接替库尔贝克（弗里德曼 1931 年招募的最初三名工作人员之一）担任研究与发展部门首脑的。1966 年 5 月，马修斯荣获五角大楼文职人员服务优异奖，一年之后又获得了国家安全局自己的最高荣誉——文职人员服务卓越奖。1971 年 1 月 18 日，他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出差时突然去世，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年仅 48 岁。

接任研究与工程副局长职务的是罗森布拉姆。1978 年 1 月，他接替雷·塔特担任了通信保密首脑。同月，布恩接过了罗森布拉姆的遗缺——研究与工程副局长职务。

第三节不出头霹面的政策

大多数政府机构或大公司均以平方英尺为单位计算其电子计算机的占地面积，而国家安全局却以英亩为单位计算其电子计算机的占地面积。“我在那里时拥有五英亩半的电子计算机。”卡特将军说道。“我们不说有多少部电子计算机，只说占地五英亩半。”尽管强调扩大容量、缩小体积，国家安全局的一位雇员在透露统计数时还是说：“现在加倍了。”

今天，在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业务楼庞大的地下室内，大概集中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批电子计算机。在那里，电子计算机科可以互相交谈，它们以其非人的力量，可以在几毫微秒的时间内解答复杂的统计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得出答案。

像其前身一样，国家安全局从一开始就悄悄地参与了美国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工作。但是，由于奉行国家安全局一位电子计算机专家所渭的“不出头露面的政策”，国家安全局在发展电子计算机方面所起的作用几乎完全被隐瞒了。当计算机协会为纪念其诞生 25 周年而举行庆祝会时，国家安全局只是悄悄地庆祝了一番。国家安全局又一次表现了它很怕见人的特点。显而易见，美国在其信号情报和通信保密活动中利用电子计算机这一事实仍属国家机密。

尽管不加宣扬，国家安全局在发展电子计算机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早在 30 年代中期，陆军和海军的信号情报部门就已经使用复杂的机器进行破译和编密工作。这引起使用高速数字电路和穿孔卡片控制程序的机器是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先驱。但是，这些机器的主要问题是过于专用。为了攻克某种特定的密码，要制造许多昂贵的机器。因此，如果那个密码改变了或被弃置不用了，所造的机器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安全大队同科达克公司、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及其他几个公司签订了设计与制造这些机器的合同。另一方面，信号安全局则同贝尔实验所密切合作，战争期间另一家大合同商是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它为其 TBM 制表机制造了一处专门的附件，使标准打卡系统的效率提高了好几倍。

战后，陆军和海军都力求继续发展先进的密码设备，但是由于无仗可打，外界的合同商们不那么愿意从事此项研究工作。严格的保密审查、森严的警卫体制和这种设备的销路有限，促使许多公司对这个领域敬而远之。正因为如此，一批熟悉编密和信号情报工作的前海军军官结合在一起，成立了工程研究公司，承担了海军安全大队交办的一些十分复杂的任务。

大约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穆尔电气工程学的一批工程师和数学家创造了一项电子奇迹——制成“埃尼亚克”（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的略称），从而宣告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埃尼亚克”是一个粗笨的巨人，身子比脑袋大得多。它的总存贮量只有 20 个数字，但其 1.8 万个电子管却占据了大半个长 50 英尺、宽 30 英尺的房间。

“埃尼亚克”的研制成功导致海军研究局和陆军军械部在穆尔学院联合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探讨电子计算机的理论。在 1946 年 7 月 8 日到 8 月 31 日举行的一系列讲学活动中,海军安全大队的彭德格拉斯海军少校是听众之一。他的任务是估计电子计算机在编密和信号情报领域内的潜力。他听完课后十分激动。电子计算机看来可以提供机器所缺少的灵活性。许多机器

只能处理某个特定问题（例如破译外国的一种密码），而电子计算机却可以处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问题。

彭德格拉斯回去后写出了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报告。不久，安全大队与工程研究公司开始谈判“十三号任务”——设计和制造情报界第一部电子计算机“阿特拉斯”。“阿特拉斯”电子计算机是以滑稽连环画《巴纳比》中的智慧巨人命名的，它的确堪与那位同名巨人媲美。到 1950 年 12 月交给安全大队的——“阿特拉斯”具有 1.6184 万个词的惊人容量，成了美国第一部装有磁鼓存储器的并行电子计算机。1953 年 3 月，第二部同样的电子计算机被交给了国家安全局。

大约在工程研究公司对“阿特拉斯”进行最后的装修工作时，陆军安全局正忙于制造自己的破译密码的电子计算机。这部绰号叫做“艾布纳”的机器于 1952 年 4 月完工，成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不仅可用电子计算机的标准键控穿孔卡片存取信息，而且可用穿孔纸带、磁带、并行打印机、打字机中控制台存取信息。

国家安全局实施过的费用最高、影响最深的研究计划之一，不是在研究与工程办公室写满粉笔字的黑板上诞生的,而是 1956 年 7 月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问世的。国家安全局的几位高级设备计划人员一面喝着鸡尾酒，一面与卡奈因局长讨论该局多年未曾解决的问题之一：虽然国家安全局的工程师们努力设计和制造容量更大、计算速度更快的电子计算机，但是破译人员对新的、更好的破译方法的需求水无止境，他们需要更好的方法去处理数量日益增多的资料。不管新设备的能力有多大，工程师都似乎永远赶不上破译人员的需要。

当时，正在设计一种叫做“收获”的新电子计算机来满足上述需要。据估计，这种电子计算机的能力比当时最好的电子计算机提高了 100 倍，但是尚需好几年才能制造出来。卡奈因对此深感恼火，他大发雷霆地说：“他妈的，我要你们抢到那些家伙前头去！给我造一部一千兆周的机器！我会搞到经费的！”没过几天，“闪电”计划就开始实施了，预算 2500 万美元，在五年内研制出“一千兆周的电子装置”。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下,“闪电’研究计划于 1957 月 7 月开始实施。这项计划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由政府支持的电子计算机研究计划，承包单位包括斯佩里兰德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业机械公司、菲尔科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堪萨斯大学和俄亥俄州有关单位。虽然此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使电路性能提高十倍，但其成果实际上更大，使电子计算机科学的水平获得了超过任何期望的提高。

“闪电”计划最有益的副产品之一是促进了国家安全局庞大的“收获”系统的发展。1955 年，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开始设计最能体现其雄心壮志的电子计算机（代号“伸展”）。“伸展”的体积太大，以致国际商业机械公司的设计人员认为只可能有两个买主：国家安全局和原子能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签订购买合同主要是因为该计算机具有高速演算乘法的优点，而国家安全局则不但希望用乘法演算大量数据，而且要求具有更大灵活性，因此让工程师们回到绘图板旁，去设计更加符合其规格的计算机。最后的设计于 1958 年 4 月获得批准。1962 年 2 月，国家安全局接收了期待已久的“伸展”计算机，它比以前有了改进，运算速度也比过去快多了。

“伸展”计算机一旦安装在国家安全局庞大的“收获”系统的心脏（更

确切地说是头脑）部位，也显得渺小了。装上各种各样异常复杂的附件之后，电子计算机的体积增大了一倍以上。其中一个附件的绰号叫做“拖拉机”，它能从由 160 个盒式磁盘组成的磁带库中自动确定所需信息的位置，然后把所需的磁带安装、固定和穿接好，并以每秒种 112.8 万个字母的惊人速度传送信息。大多数磁带每英寸有 100 个存储单元，而国家安全局却设法使每英寸能有 3000 个存储单元,并使磁带以每秒钟 235 英寸的速度飞快通过读出磁头。“收获”系统的效果极佳，因此国家安全局在以后 14 年中一直使用它，最后在 1976 年才改用一种更先进的系统。

在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业务楼里有几个街区大的地下室内，安装着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像人脑一样，国家安全局的脑子也分成右半球和左半球，代号分别为“电子钟琴”和“天然磁石”。一电子钟琴”一度曾由几部 IBM360 型电子计算机组成，后来则由四部庞大的 IBM3033 型电子计算机组成。这几部计算机连在一起，并且配有国际商业机构公司制造的三部每分钟 2.2 万行的页式打印机。

然而，“天然磁石”的功能更强。装有电子计算机、前端界面和海量存储器的大厅铺着金色的地毯，墙壁漆成黄色，中央是排成半圆形的狭长的金色和深色面板（每个面板宽 4 英尺半，高 6 英尺半），周围是铺着黑色塑料座垫的长椅。它好像是中午休息或者上午九十点钟喝咖啡的理想场地。然而，它大概是当时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功能最强、造价最贵的电子计算机。

这部由明尼苏达州门多塔海茨市克雷研究所制造的、价值 1500 万美元的“克雷—1”型电子计算机，也许最能证明“不可貌相”这句老话不假。在这部曾被一位爱插科打浑的人称之为“世界最贵的双人椅”的机器内，装有 20 多万块指甲盖那么大的集成电路板、3400 块印刷电路板和 60 英里长的电线。这部机器重 5 吨，体积为 70 立方英尺，部件排得十分拥挤，以致每立方英寸产生的热量很高。如果没有采用独特的氟利昂冷却系统，那么，产生的热量足可在几秒钟之内把机器熔化。这种冷却系统使用了许多竖嵌在计算机壳壁上的铝质和不锈钢冷却管。

这部超级电子计算机是西摩·克雷的杰作。他是一位电气工程师，50 年代初期一参加工作就在工程研究公司制造密码破译机，当时的公司负责人就是后来国家安全局研究部门的首脑和副局长恩格斯特龙。克雷的梦想是制造一部每秒钟能运算 1.5 亿到 2 亿次的电子计算机。这种能力将是当时普通电子计算机的 20 至 100 倍，亦即等于六部 IBM370/195 型电子计算机的能力。

1976 年春，第一部“克雷—1”型电子计算机从该公司设在明尼苏达州奇普瓦福尔斯的制造厂出厂，并且显然直接运进了国家安全局的地下室。第二部悄悄地交给了国家安全局的的智囊机构——普林斯顿大学防务分析研究所通信研究处。

这种电子计算机装有随机存取半导体存储器，每秒钟可以传送 3.2 亿个词，相当于 2500 本厚达 300 页的书。因此，它是不会使国家安全局失望的。这种存储器与电子计算机专门的输入输出分系统相连后，机器就可多达 48 个磁盘存储器，这些存储器总共可以储存几乎 300 亿个词，每个词的间隔时间不超过百分之八十秒。

除此之外,国家安全局在 1983 年还计划秘密地启用一个庞大的全球电子计算机网络——代号“平台”。这个网络将把在全世界使用的五十二个独立的电子计算机系统连接起来。这个庞大网络的中心（或称“主站”）将是设

在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平台”中还包括英国的信号情报部门——政府通信总部。

然而，尽管拥有了“克雷—1”型电子计算机的巨大能力，国家安全局还在谋求将约瑟夫森遂道结技术、光学逻辑元件、磁泡和激光记录等应用于数字计算机，从而提高速度、扩大功能和增加存储量。国家安全局仍试图深入研究光学模拟计算技术，以及光声相互作用装置和电荼转移器件，以便达到每秒钟 1000 万亿次以上的乘法运算速度。

70 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安全局的电信活动和电子计算机勤务是分开的：通信工作统一由电信办公室实施，电子计算机勤务则较为分散，由几个单位实施。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力量控制在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的 C 组手中，该组掌管“收获”电子计算机系统，以其电子计算机支援破译部门。大约在 1976 年，C 组撤销，该局所有的电子计算机业务都转由新成立的电信与电子计算机勤务办公室（一般称为 T 系统）负责。

改编之后，海军少将英斯于 1976 年 8 月当上了 T 系统的首脑。他是从事密码工作已 18 年的老手，当过海军安全大队欧洲分部主任。有一次，新上任的英斯曾冒险下到地下室，想看看“天然磁石”，但在人口处被警卫挡了驾，因为出入名单上找不到英斯的名字。据说，英斯对警卫说：“没错，我是英斯将军，这个单位归我管。”尽管如此，名单上还是没有他的名字，只好请回。不言而喻，他的名字很快就添到名单上去了，那位女警卫也由于警惕性高而获得了奖状。

1978 年 6 月，英斯当上了海军安全大队的首脑，遗缺由扎斯劳接替。扎斯劳当过负责信号情报的助理局长，当时刚从伦敦美国国家安全局首席联络官任所回国。1977 年 5 月以后，负责 T 系统的助理局长帮办是克斯皮尔曼。他过去是巴勒斯实验所的首席科学家，后来当过国家安全局信息与电子计算机勤务处处长。斯皮尔曼是促成电信勤务部门与电子计算机勤务部门合并的主要人物之一。

进三号大门，上几层楼，在一扇贴着警告标语并用密码锁控制的灰色钢门后面，没有国家安全局全球侦听网的中心。如果把国家安全局比作美国的大顺风耳。那么 T 系统庞大的通信中心就是这只耳朵的鼓膜。在通信中心内，一排接一排的砰砰作响的密码机把全世界的秘密都暴露在多种颜色的六层复写纸上，每一页的上端部印有“秘密”这个词，下端则印有警告，告诺人们不得泄密，否则就会得到间谍法规定的惩罚。

苏联运输机驾驶员的闲聊，科威特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发往国内的最新报告，一位中国商人给吉隆坡供应商打电话订购零件的单调声音——不管侦听网搜集到了什么通信，都通过该局极端机密的特别情报通信网发回国家安全局总部。侦收到的材料通过特别情报通信网发到赤道上空 2.2 万多英里处的同步卫星上，然后回射到藏在国家安全局后面树林内的一对巨大的抛物面天线上。情报从天线沿一条价值 50 万美元的、长达一英里的地下电缆进入通信中心，中途还要经过一座价值 220 万美元的无线控制设施。通信中心收到情报后，再分给分析人员、语言学家和破译人员。

还有一个全球网路通过这对地面终端站进入国家安全局。这个网路是留给拍发最重要、最紧急的情报使用的。这个紧急情报通信网用于向美国总统和其他几名高级官员紧急传送最优先的情报警报——例如中东某个酋长国即将发生政变、某位世界领袖人物遇刺或者一艘苏联潜艇被击沉。国家安全局

的奋斗目标是在事件发生后 10 分钟内就能将这种紧急电报送到总统办公桌上。

由于报告紧急情报要快，因而有时在区分好情报和差情报方面会出现错误。以前就曾发生过一次这样的错误。当时，希腊克里特岛美国空军侦听站的一名分析人员发现一架苏联轰炸机在苏联中部的一个湖上降落。他从侦听中获悉该机没有坠毁，于是立即发出紧急电报：苏联显然已经研制出能在水上降落的新一代轰炸机。然而，他不知道贝加尔湖在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覆有一层厚冰。

发出紧急情报后，关于同一问题的进一步报告往往采取“ 最新消息 ”的形式，其紧急程度比紧急情报差一等。紧急通信系统中的另一等报告是“ 侵入报告 ”。每当苏联的战略飞机在非苏领土上空出现时，就发出“ 侵入报告。”

1973 年，国家安全局的紧急和特别情报通信网改成了国防特别保密通信系统数字通信网，从而使其通信完全纳入了国防部通用的自动数字通信网。1976 年又增加了一个代号为“ 流线型物体 ”的自动化通信系统，旨在通过压缩或取消许多过去很费时间的工作来缩短发报人拟稿至收报人阅报之间的时间。诸如选择通信通道、发稿登记和确定格式等工作过去就需要通信人员用手工进行，因此很费时间。

从彼士顿古老的麦科马克邮局兼市府大搂内的铁路员工退休委员会沿走廊往前走几步，就到了四〇六室门口。然而，与四层楼上其他办公室的门不同，四〇六室的门上没有单位名称。这扇门也不是玻璃的，而是用坚实的加固木料制成的。门总是锁着，门顶上的气窗也用三合板钉死了。门边有一个黑色按钮，揿一下按钮，一名工作人员就从里面把门打开一道窄缝询问来客。如果把门再开大一点，就可以看到对面墙上的圆徽，上面写着“ 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局 ”。

四〇六室没有 1980 年 11 月 7 日正式开张的国家安全局东北部招募办公室。像与国家安全局有关的其他一切一样，这个办公室十分保密。在这座布满学院和大学的城市里物色招募对像的负责人是拉杜佐。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东跑西颠上，从一所大学赶到另一所大学，在人们耳边悄悄地诉说“ 字谜客栈 ”的好处。他物色的对像主要是工程师，最好是有一天可能造出更好的信号捕捉机的电子工程智囊。在拉杜佐的招募清单上，数学家（特别是数学硕士或博士）的位置也很靠前。优先招募的还有少量语言专业的学生，主要是那些善长汉语、斯拉夫语、中东语言和亚洲语言的人，偶尔还需要会说某种特定外国语（例如印度尼西亚的萨那方言）的人。

一旦引起了招募对像的兴趣，招募人员就送他一本长 11 英寸、宽八英寸半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封面光滑而漂亮，但是在整整二十页的内容里一次也没有提到要读者为一个情报机构效劳。小册子甚至像奥韦尔那样企图改写历史，在开头第一段就声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某个时候，一位内阁官员曾经对人们说‘ 君子不看他人的信件 ’，并且关闭了一个编制密码的机构。”国家安全局把“ 黑屋子 ”由密码破译机构改成密码编制机构，这就不仅窜改了历史，而且使小册子开头的一段话变得矛盾百出。

对未来的密探们采取的下一步措施是由教育测验服务公司根据合同进行统一的专业资格测验。这种测验不是只考核应募者的学识，而是要弄清他有没有“ 密码头脑 ”。例如，有一个问题要求应试者设想自己是站在高高的悬崖上的人类学家，脚下有一群小岛。人类学家从这个有利的位置可以看到一

些通信兵划着橡皮舟穿行于小岛之间，于是一个一个的小岛上升起了烟火信号。应试者先阅读大约半页纸的材料，例如“A 舟依次驶往三号岛、七号岛、五号岛……B 舟则依次驶往二号岛、一号岛……在这期间，六号岛向三号岛发了烟火信号……”。接着，应试者必须回答一些问题，例如：“哪个岛是主要的？”“哪个岛控制着通信活动？”“哪个岛最不重要？”

另一道题可能涉及一家公司，公司人员分散在一座大办公楼内，各办公室之间靠一个不可靠的内部通话系统进行通话。应试者还是先看材料：“由于布线不当，A 办公室的某人要想与 E 办公室的某人通话就必须通过 C 办公室，而 C 办公室的人与 E 办公室的人通话则必须首先通过 J 办公室……”这样的叙述大约占了半页纸，然后问应试者：“怎样才能从 J 办公室给 B 办公室打通电话？“如果 A 办公室无人，怎样才能从 Y 办公室给 H 办公室打通电话？”这样的问题大约还有十个。

那些在答题时没有严重“卡壳”的人，大概设想了国家安全局要在南太平洋诸岛安装内部通话系统。然而，这一部分试题却是为了发现少数罕见的人才，他们有可能成为进行通信量分析的大师，善于从浩瀚的电报中找出规律来。

3 月份，最后被选中的人（全国每年约有 2000 人提出申请，通常只录取 150 人左右）又陆续来到该局友谊附属区接受雇用前的审查。国家安全局在那里新盖了一栋四层“机场广场大楼”。应募者进大楼的头一天要进行个别谈话、填定表格和接受体格检查。然后，他们沿一条狭窄过道走到一扇漂亮的门那里去，门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罗伯特·贝茨和他的官衔——测谎器勤务处处长。

门内有许多色彩淡雅的小房间。每个房间的一侧有一扇玻璃窗，另一侧有一面大镜子，测谎人员偶尔通过这面镜子监视测谎现场的情况。测谎器共有 16 部，安装在擦得锃亮的木纹大桌面上，有点儿像新电子游艺机。在这些机器后面的小房间里,该局 20 名合格的测试人员聚精会神地研究四五支红色细笔缓慢地来回移动的情况，问过每道题之后都在笔记本上写点儿什么。在每张桌子的另一侧，应试人坐在垫得厚厚的大转椅上。这张椅子很像经理们坐的办公椅，但是人们不会把应试人错当成公司巨头，因为他或她的手指上绑着电极，胸部摁着厚厚的黑带子，上臂裹着测血压的气垫。

测谎工作早在 1951 年就开始进行了，当时雇用了 6 名测试人员，每人年薪 6400 美元。迄今为止，在国家安全局的雇佣手续中，测谎仍是最叫人害怕的关卡。测谎工作原先是在华盛顿市西北区 U 大街一四三六号警卫森严、外貌可憎的大楼内进行的，后来迁到了该局业务楼里进行，最后又搬到了友谊附属区三号楼。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测谎成了丑闻，因为在测谎中要提许多令人难堪的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涉及个人性生活的隐私，跟个人的忠诚或爱国心毫无关系。在国会进行调查和内部采取了措施之后，涉及私人的问题现在多少婉转一点儿了。例如，今天的典型问题之一是：“你有过同性恋经历吗？”

测谎之后，申请人要接受一系列心理测验，以确定他们是否适于接触该局高度保密的材料。百分之九十的申请人由该局门诊所的一名心理学家进行盘问。心理测验结果和测谎报告转给五角大楼的国防调查处，由该处开始进行紧张的特别背景调查。

例行的背景调查包括向联邦所有的调查机构核查被调查人有无不名誉的

事，核实出生情况和公民资格，调查大学学历和过去 5 年内任职的情况，查阅当地刑事档案，以及进行信用调查。特别背景调查比例行背景调查深入，它要调查 15 年的情况和找邻里进行核查。要取得接触绝密材料的资格，必须通过例行背景调查。但是，要取得国防部最高一级参与机密的资格，则须通过特别背景调查。取得这种最高一级的资格，是被国家安全局录用的先决条件。

特别背景调查（往往要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后，就将结果送回国家安全局进行评定。然后，将通过测谎、心理测验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有关申请人的一切情况都集中起来，交给国家安全局的申请人审查委员会进行审议。该委员会由人事、医务和保卫等部门的代表组成，负责对申请人进行全面审查，然后要么对候选人表示满意，要么把卷宗退还人事处长，并且附上一封“我们遗憾地奉告您”之类的公函。

申请人在友谊附属区一共呆两天。第二天主要是听一些情况介绍，包括一次保密教育和一次非保密的工作情况介绍。少数很有希望被录用的人可能还会参观一个工作区。然而，事先要把工作区清理一番（拿走一切保密材料），很少组织这种参观活动。

应募人在友谊附属区逗留 48 小时后就返校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学业，同时忍受历时约为四五个月的背景调查。通过了特别背景调查并且决定进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人一般定为行政七级，该级工资额在 1981 年初为每年 1.5 多美元。工程师们每年可以拿到奖金。如果招募工作的负责人感到某个工程师值得领取较高的工资，该工程师甚至可能一开始就拿 2.2 万美元的年薪。

一旦通过审查并且列入了花名册，受雇人员还可能接受进一步的测验，以便确定他或她最适于在哪个领域里工作。有的测验显然是为了选拔密码人才。这些测验的名目很深奥，例如“歪曲电报”一这种测验要求回答根据因排印错误而被歪曲了的“电报”提出的一些问题。另一种测验的名目叫做“字模”，这种测验要求辨别或重新排列一组字码或数码，找出漏掉的字母或数字，或者恢复原来的排列格式。“数字识别”测验要求确定一道数字计算题（其中许多数字都有星号代替）中遗漏的某一数字。在“数字序列”测验中，必须首先找到数字排列规律，然后指出序列中的一个数字是什么。

根据测验的结果和其他一些考虑因素，雇员将被分到 14 个不同行当中的 23 个专业岗位上去工作，通常先当实习生。例如，通信量分析实习计划为期 3 年，并且规定了一些正式课程，如通信量分析初级和中级课程、借助电子计算机进行通信量分析课程以及通信量分析高级训练课程，其间还要到 8 个岗位上见习，每个岗位上的见习期为 3 至 6 个月。实习结束后只能升到行政十一级，若想再往上升，就必须先“专业化”，这就是说要达到通信量分析专业小组规定的要求。获得专业通信量分析员的证书后，就有了竞争的资格，以便在适当时机升到更高的级别上去。

没有大学学位或者没有经过实习的人，其发展道路则多少有点不同。这样的雇员可能先在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当助理分析员，然后当密码分析技术员，行政级别为五级至十二级不等。像密码分析实习生一样，若想再升，必须首先成为专业密码分析员。

行政办公室除负责招聘和解雇工作外，还管理该局的保卫力量，发布人事管理函件，以及按该局的大厚本内部管理手册——《国家安全局人事管理手册》——进行管理工作。

第四节控制了国家安全局的采购权就掌握了不少的权力

在盖住国家安全局的那块厚厚的大保密帷幕之下，还隐藏着一些与该局亲如手足的电子、通信和电子计算机供应商。他们堪称密码界一工业界集团。有的供应商（如国际商业机械公司、摩托罗拉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是家喻户晓的公司，而另一些供应商（如超级系统公司、哈里斯公司和桑德斯公司）在信号情报一通信保密界之外则远不是那样出名。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渴望尽可能多地获得国家安全局的密码设备合同。

由于国家安全局几乎完全依靠外部承包商制造信号情报和通信保密设备，以及进行为制造这些设备所需的大量研究与发展工作，因而密码设备制造业已经变成了营业额达 10 亿美元的行业。到 1977 年 1 月，该局手头的合同已增加到 7000 多个，合同费总额约为 9 亿美元。但是，百分之八的合同就占了百分之八十六以上的合同费总额，因此承包商们都激烈争夺复杂的大项目，如代号为“ 求雨者 ”、“ 西尔克沃思 ”和“ 栗色盾牌 ”的合同项目。

70 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安全局所有的合同均由陆军打着“ 马里兰州采购处 ”的招牌与承包商签订。当初成立国家安全局时，五角大楼奉劝卡奈因将军集中精力抓业务，而依靠陆军为其采购。据说，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避免重复。

然而，这套办法的主要问题是：负责签订合同的人百分之九十没有多高的接触机密的资格，因此只能起到旁观者的作用。此外，事情涉及十分先进的密码装置，经办人要有相应的技术专长，可是陆军参与订立合同的军人和文职人员的技术知识大多差得很远。据国家安全局采购政策与支援处前处长弗洛伊德称：“ 替陆军干这项专业工作的人百分之九十八不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是承办文件的老手，高中毕业以后就一直摆弄文件。他们熟谙商业行语，通晓合同法——他们一直就是干这个的。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国家安全局设计机器的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专家，首先，他们甚至无权过问机密，因为没有经过审查——他们也乐于这样！”

后来，采购办法就发展成了下面这种样子：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的工程师们会见研究与工程办公室的工程师，提出某项要求。该局负责对外联系的研究与工程办公室就找到某个承包商，槁出可以满足要求的设计方案。最后，在双方握手成交之后，研究与工程办公室就对陆军采购部门说（据弗洛伊德介绍）：“ 喂！我要买这个，在合同上盖章吧！”弗洛伊德强调指出：“ 我要告诉你们，从这套办法逐步发展的情况来看，在合法地承担合同义务之前，早就达成协议了。”

快到 70 年代中期时，陆军监察长注意到了上述情况，于是开始询问采购官员。他想了解，他们怎么能够签订事先基本上不知底细的采购合同。结果，陆军高高兴兴地把这档子事推出去不管，让国家安全局全盘接管了马里兰州采购处。

1975 年 6 月 30 日，陆军采购处。国家安全局派去了 20 名签订合同的军官、63 名谈判人员和大约 20名行政与办事人员。采购处处长是伊丽莎白 ·R ·黑格，她是国家安全局的老资历者，当过研究与工程总法律顾问。

但是，尽管采购处换了人，凭老熟人订合同的一套办法显然仍很盛行，至少弗洛伊德 1977 年 1 月 19 日向卢 · 艾伦局长秘密汇报时是这么说的。弗洛伊德，多半生是在该局度过的，他毕业于波士顿大学，1951 年被任命为负

责中东通信量分析的 ALLO—34 科的科长。1963 年，他为 B 组制订了远东信号情报政策，两年后当上了监察长。在国会上当过一年的国会研究员后，弗洛伊德又回到 B 组，负责制订搜集方针，争取第三方的合作和支援下属各站，在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和研究与工程办公室担任过好几种职务之后，弗洛伊德被调到了设施与后勤办公室，担任采购政策与支援处处长。

弗洛伊德在汇报时告诉艾伦，该局有不经过竞争就把合同交给单一来源的癖好。他点了国家安全局违反规定的主要人员和承包商的名，并且列举了涉及的金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弗洛伊德要求授权他招聘一批律师和会计师，让他们熟悉业务，在承担合同义务之前就充分参与签订合同的事宜，并且严格审查和大力反对只从单一来源采购所需设备的做法。

虽然这个主张很合理，但在该局许多人（特别是研究与工程办公室的人和采购处里的其他人）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异端邪说。“ 汇报后不到两个星期 ”，弗洛伊德后来说道，“ 就开始了……有计划的阻挠活动。 ” 他指出，“ 如果你控制了采购过程，控制了像国家安全局这么庞大的机构管理采购工作的人员，你就掌握了不小的权力。 ”

首先发难的是采购处处长黑格。她要求让弗洛伊德进行一次体格和精神检查，因为 “ 许多银川事件 ” 正对他的工作效率以及他与同事和上级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弗洛伊德是长着浓密黑发、意志坚强的粗壮大汉。他认为黑格的话是谎言和诽谤，构成了对他的侮辱，因此要求派人听取他的申诉。与此同时，他找本局首席精神病医生詹姆斯博士进行了检查。詹姆斯报告说，弗洛伊德 “ 没有明显的症状，得不出精神错乱的诊断 ”，但他又建议弗洛伊德去找双方都信得过的局外精神病医生朗博士，进行 “ 健康状况适于任职的鉴定 ”。

5 月 14 日，朗报告说，虽然弗洛伊德由于工作过度疲劳（也许还有高血压病）而可能使健康状况恶化了，但是医生 “ 没有发现精神错乱的征兆，也没有发现弗洛伊德先生对此深感忧虑 ”。

不到两个星期之后，受理此项申诉案的官员查理斯 · w · 马修斯发表了一份总的说来对弗洛伊德有利的报告，指出弗洛伊德“ 才能卓越，潜力惊人 ”，并且认为冲突的根源是“ 手下工作人员显然少到了可能维护不下去的地步 ”。马修斯建议把弗洛伊德调到“ 能够对本局最有利地发挥其才能的岗位上去 ”。

可是，新局长英曼海军中将 “ 充分考虑 ” 了整个案情之后，认为弗洛伊德的申诉 “ 站不住脚 ”，立即把他从年薪 3.8 万美元的职位上解雇了。弗洛伊德提出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350 万美元。

弗洛伊德给自己招来麻烦的那次抗议，对于采购处只管盖橡皮图章的陈规陋习，显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弗洛伊德向艾伦局长汇报两个月之后，一项金额达 1800 万美元的代号为 “ 西尔克沃思 ” 的修订合同送审。大约下午 3 时半，两名采购军官对此项合同进行正式审查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找来了第三名军官。接着，他们讨论了大约 45 分钟，于是盖章批准，然后显然就急冲冲地走出大门，挤进了 4 点半下班的人群。

只是由于弗洛伊德提出了正式控告，一位监察长才调查了这次批准合同的情况，并且得出结论：

从这次的情况来看，委员会所花的时间（45 分钟）不足以使其成员们感到有把握建议批准合同。委员会成员们对于在需要有条有理地认真进行工作的审查过程催促他们 “ 快干 ”，也表示恼火。总之，本监察长建议，在制订

管理计划时，应给审查过程提供充分的时间。

虽然采购处大概是设施与后勤办公室（或称 L 系统）内最重要的一个处，但是采购工作不是该系统的唯一职责。其他职责包括制订信号情报城和国家安全局海外设施的发展规划，以及处理各种日常杂务——例如处理国家安全局大量的机密废纸。

L 系统多年来一直由军人掌握。1977 年 4 月，设施与后勤助理局长、空军准将香农突然去世，遗缺由邦南尼接任，L 系统落到了文职人员手中。

计划与政策办公室：与国家安全局其他各办公室的首脑不同，计划与政策副局长一职主要是参谋性质的职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 60 年代中期。当时，卡特将军设立了参谋勤务执行官一职，其作用类似于参谋长。1977 年 3 月，艾伦局长将此职升格为政策与联络助理局长。1980 年 1 月，此职撤销，代之以权力更大的职位——计划与政策副局长，并由克思担任此职。

计划与经费办公室：像计划与政策办公室一样，计划与经费办公室基本上是办理参谋业务的机构。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它的名称是全国密码参谋机构办公室，负责人是海军少将舒尔茨。他曾在炸弹像雨点似地落在珍珠港之前 12 小时，把侦收到的 13 段“紫色”密码电报送给白宫书房内的罗斯福总统，并且听到罗斯福说“这意味着战争”。作为负责全国密码参谋机构助理局长，郤尔茨的职务并不令人羡慕，因为其工作是在国家安全局与各军种密码机构之间进行联络，要有杰出的外交才能和机智，才能调和三个军事机构和基本上由文职人员组成的国家安全局的相互冲突。1986 年，舒尔茨离职，前去领导国家安全局的太平洋分局。

70 年代初，该办公室为计划与经费办公室取代。计划与经费办公室像其前身一样，负责编制信号情报界的预算——“统一密码预算”。在几名海军少将轮流任职之后,空军少将埃斯蒂斯于 1979 年 8 月被任命为计划与经费助理局长。五个月之后，该办公室改组，埃斯蒂斯成了计划与经费副局长。

总法律顾问办公室：该局第一任总法律顾问是一个姓史密斯的文职人员。他在快要退休时向卡奈因将军提出了一项惊人的建议：撤销总法律顾问一职，因为不需要。卡奈因采纳了他的建议，撤销了总法律顾问办公室。这无疑使史密斯的助手、当然的接班人班纳很恼火。他只当上了国家安全局的法律助理，而不是总法律顾问。

然而，这一情况在 1965 年发生了变化。那年，卡特将军使这个职位升了格，任命 55 岁的班纳为他的总法律顾问。班纳的办公室在后来的大改组中显然又降了格，划归法律与立法事务助理局长伯克领导。伯克是 1977 年 3 月被任命为助理局长的，他过去在国家安全局任过职，后来当过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的执行秘书。他于 1976 年 7 月回到国家安全局担任特别法律顾问，8 个月之后被任命为法律与立法事务助理局长。

英曼将军认为，任命一位多年来同情报工作不沾边的外界律师，也许可以更好地使国家安全局免遭人们指责它非法滥用权力。因此，他于 1978 年 2 月任命西尔弗为总法律顾问。英曼撤销了法律与立法事务助理局长一职，把总法律顾问一职变成了真正的要职，通过副局长直接对他负责。

西尔弗 37 岁，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1979 年 10 月离开国家安全局，就任中央情报局新设的总法律顾问一职。接替西尔弗担任国家安全局总法律顾问的是前联邦贸易委员会律师施瓦茨。

“他们的教育水平和智力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卡特在回顾就任局长

后周围工作人员的情况时说道。“ 我到任后……作了一次调查，结果叫人难以置信：业务部门里的博士多如牛毛，而且他们可不是无用的摆设。 ”

为了使智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国家安全局设立了入学条件必然是国内最严格的一所高等学校——全国密码学校。这所学校是由该局训练学校几经演变而成的。五十年代初期，训练学校设在华盛顿市西南区第三与第四大街之间的杰弗逊大道上。那里有一栋分成五翼的杂乱无章的木结构楼房，外号“ R ”大庙 ”，二层楼上就是训练学校。学员们登上三号与四号翼楼之间咯吱作响的楼梯，通过警卫，分散到学校所占的那层楼上去。

后来，全国密码学校占用了国家安全局友谊附属区的一座现代化七层塔楼。该校于 1956 年 11 月 1 日开办，没有许多技术和分析训练班，从为期八周的密码基本介绍班（代号为 CY—001，详细介绍国家安全局在美国情报界的作用）和信号情报技术介绍班（代号力 EA—010），到全国高级密码班（代号为 CY—600，为期七周，脱产培训信号情报界的高级管理人员），一应俱全。1976 年春季的 CY—600 班有学员 45 人，课程表中包括了为期 4 天的“ 国家安全中的密码问题 ”讨论会和“ 卡巴—76 ”军政模拟演练之类的活动。

但是，其他所有的训练班都无法与“ 一般分析深入研究计划 ”训练班相比。这个为期 18 周的讨论会式的训练班是专为培养高级职业分析家而开设的，学员结业后可获得相当于破译博士的学位。该班每年 2 月到 6 月开办一期，只招收遴选出来的 12 名学员，他们要学习 60 多部（份）书籍和文件，听讲课，进行集体讨论，并且要做 400 多次作业，以便既懂得理论，又会应用。

从日后的晋升方面来考虑，参加这个训练班肯定有好处。除此之外，有幸从该班毕业的人还可以顺便捞到一种十分受人尊敬的好处，获准加入该局极为机密的联谊会——敦提社。

这个秘密结社的标志是一只敦提果酱瓶,里面装着世界上最早的破译‘ 机器 ”一四支削得很尖的铅笔。主持该社会议的神秘头领身穿合体的尼赫鲁式米色短上衣和据说是用未支配过的雌美洲骆驼毛织成的裤子，脖子上围着稀奇古怪的装饰品，足登号称由安达曼群岛归化了的食人生番制作的白色皮鞋。

每个学员的课桌上都放着两只敦提果酱瓶和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训练班的头一条规矩：“ 打破瓶子，吃果酱 ”（打破一只瓶之后要吃光另一只瓶子里的果酱，用空瓶替补被打碎的那只瓶子。）开课以后，12 名学员就开始破译神秘王国中难得叫人发疯的密码，力图读懂其首相萨拉西奥的电报。

该社头领亦称“ 头脑灵光的无名氏一号 ”，起初由国家安全局传奇式的人物卡利马霍斯担任。这位先生满头白发，长着一双慈祥的蓝眼睛，领带打成一个漂亮的蝴蝶结。他以罕见的聪明才智在“ 深入研究训练班 ”任教 22 年之久。

他于 1910 年 12 月 16 日出生在开罗，双亲是希腊人。他 4 岁来到美国，后来在朱利亚德音乐学校学吹长笛，24 岁就成了世界闻名的长笛演奏家。

卡利马霍斯在为获得第一流音乐家的声誉而拚搏的同时，还尽力学习密码学。他 8 岁首次阅读《金甲虫》故事后，就迷上密码学。他在欧洲巡回演出期间，总要到各地图书馆搜罗这方面的书籍。他通晓七种语言，一周之中的每一天都换一种文字在黑皮活页本上记笔记，以保持高超的外语水平。

1941 年 2 月 11 日，这位长笛演奏家自愿加入陆军信号情报处。报到时，

他按照演奏家的身份打扮起来：小胡子上打了蜡，头戴一顶他能在巴黎拉丁区找到的最大号黑礼帽，身穿黑色软领长大衣和黑色套服，足登带有黑色鞋罩的黑鞋，挟着黑色皮

包，拿着一把乌木手杖，系着雪白的丝质领带。“我那副样子活像威尼斯小歌剧里的间谍，也许还像桑德曼葡萄酒的活广告，可叫人吃了一惊。”他多年后回忆道。

卡利马霍斯尽管着装古怪，但还是获得了委任，在中、缅、印战区担任战区助理信号情报官。战后，他在阿林顿大院落脚，充当弗里德曼的技术助理，以后又作为文职人员继续在武装部队安全局和国家安全局供职。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写成的秘密技术书和手稿比政府里的其他任何一位密码学家都多。在他的著作中，有同弗里德曼合写的三大本军事密码分析（I II III卷），以及为《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和《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有关密本和密表的词条。

1977 年 10 月 28 日，卡利马霍斯因患癌症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世。去世前三个月，这位头领穿上了最漂亮的尼赫鲁式短上衣，给第三十二届一般分析班学员颁发了敦提社社员证书，同时授予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以荣誉社员称号。

全国密码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罗利特，他当过弗里德曼的秘书，后来又在 1930 年成了弗里德曼创建的通信情报处的第一名雇员。1958 年，在中央情报局任职 5 年之后，他接替即将退休的弗里德曼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特别助理。他担任此职达 8 年之久，其间换了四任局长。罗利特领导过导致创办全国密码学校的那个研究小组，并且留下来当了校长，以便指导学校的工作。两个月后，亦即 1965 年 12 月 30 日，他退休了。1966 年 3 月 2 日，约翰逊总统在白宫的一次仪式上授予罗利特“国家安全奖章”。这样，罗利特就成了国家安全局中三位获得情报界最高奖章的人之一。他领奖时对周围的环境并不陌生，因为就在 9 个月之前，他曾在那里接受总统颁发的“联邦文职人员服务优异奖”——授予联邦政府文职人员的最高奖。总统嘉奖令写道：“从破译敌人的富码，到推动密码技术的发展，他的卓越成就已经成为美国安全史上的里程碑。”

从 1979 年 7 月到 1981 年 4 月，全国密码学校校长兼国家安全局负责训练工作的助理局长是贝克尔。他获得过哈佛大学中东研究硕士学位。继担任全国密码学校校长之后，贝克尔成了国家安全局驻五角大楼的代表，所遗校长一职由普雷斯特尔接任。普雷斯特尔曾当过该校密码系主任。1979 年，先后有将近 1.9 万名学员在该 500 个不同的训练班学习。其中，大约 1.35 人是国家安全局的文职人员，2500 人是国家安全局的军人，2800 人来自政府其他部门或陆、海、空军。

除全国密码学校外，国家安全局还有许多相当秘密的专业协会（叫做“学术组织”）。该局工作人员可随意参加。首批成立的协会之一是密码语言协会，下分许多小组。例如，词典学专业小组为（SIGLEX）的成员力求提高编辑词典的水平，其中竟然包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编词典！另外两个专业小组语音专业小组（sIGVOICE，集中力量研究从重音到首音误置的各种课题）和翻译专业小组（SIGTRAN，致力于研究翻译艺术）。

该协会还没有以其第一任主席、已故的贾菲博士命名的奖学金，授予“在语言领域内的成就对完成密码界的任务有贡献”的人。1973 年井同获得首次

奖学金的两名工作人员一共通晓 17 种语言。

其他的学术组织是密码数学学会、电子计算机信息科学学会和国际分析协会。通信量和信号分析员有自己的通信分析协会，破译员有密码协会，侦听员也有自己的搜集协会（该会每年向最佳侦听员——叫做“通信处理员”——颁发奖金）。

第五节纵深保卫

国家安全局的全面安全保卫制度称为“纵深保卫”。从 1954 年 10 月到 1977 年 12 月以前，一直由海军陆战队守卫。他们于 1954 年 10 月 15 日开始值勤，把守信号情报城的全部门卫室，检查出入证，搜查公文包、钱包和午餐袋。他们每天上岗前五小时就要组成警戒小队，在业务大楼后面的营房里值勤，一有情况就立即奔赴现场。

过了门卫室还有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通行证制度，各种磁性的、以颜色为标志的和穿孔的通行证规定佩证人可以在大楼哪一部分通过。通过了全面安全审查而“知密需要”的人，佩绿色通过证，他们除特别规定的地区外，可以到处通行。非本局雇贝持黄色通行证。知密级别次于通过全面安全审查的人，持红色通行证。

通行证正面有持证人姓名，还有本人正面相片和社会保险号。证的反面，印有不得滥用此证的注意事项。

另外还有一些专用通行证，如携带文件出大楼，必须先向安全官领取的通信员通行证等。

通行证的类别多达十几种，颜色多种多样，花纹图案也各有不同，有立体图形，也有斜线条纹。通行证还在链条上挂了一个“小标签”，作为进一步识别的标志。有的小标签标志某种具体职务（如国家安全局的摄影师），有的标志佩带人可以进入某一工作区。

有时这一套制度十分混乱，例如当安全局从华盛顿往米德堡大街搬迁时，就不得不增发通行证。经过保密审查的国家安全局人员发绿证，搬迁监督员发白证，没有经过保密审查的合同工人发粉红证，没有经过保密审查的军职和非军职卡车司机发蓝证，搬迁承包商代表则佩带有红色照片的黄色通行证，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一套制度中单靠颜色还不够。每张通行证还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穿孔使用卡一样，一塞进阅读机里即可辨明持证人当时的身份。

安全局除了各种令人晕头转向的通行证以外，还有各式各样本身就是机密的密级代字、清规戒律、机密分类等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制度。

情报共同体核心圈内对信号情报资料有一种超级的双重保密制度，即在普通的保密分类以外又加上一种“仅限在信号情报渠道内传递”的密级分类。一份文件一旦打上这个印记，密级就自然升到绝密以上，能过目的人只限少数几个信号情报圈内的成员。从安全局发送出去的电文、函件、报告，大都印有这样一个标记。

一份文件一旦从普通密级分类中提出来，就要标上各式各样的密级代字，以便进一步缩小扩散范围。例如绝密的 UM-BRA 就表明这份情报具有高度的信号情报敏感性。它以前的代号是 TRINE，再往前，在六十年代初是 DINAR。此外，还有更多诸如此类古怪的密级代号如 VIPER，HARUM，FROTH 和 CANOE 等等。再低一等，相当于一般机密级的代字是 SPOKE。

UMBRA 和 SPoKE 代表的是一个总的敏感水平，此外，还有五个字母的代字，代表更具体的意义，例如，GAMMA 用来代表截获的最重要的苏联电信，从 1969 年开始，这个代字同时也成为美国反战领导人如琼·方达和本杰明·斯泼克等人的监听材料的密级代字。

还有一些总是以 G 开头的四个字母的附加代字，这些代字把从苏联截取

的通讯情报范围更进一步缩小。例如，用 GUPY 表明情报材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谈话，其中有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主席波德戈尔内和部长会议主席何西金在高级轿车中通过无线电的谈话。另外在 GAMMA 系列内的另一个由 4 个字母组成的代字表示的是有关苏联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通讯情报，还有另一些代字代表的是邮政检查材料和有关外国密码本的情报。属 GAMMA 系列的大约有 20 个不同的代字，如 GILT，GOUT，GULT，GANT，GABE 和 GYRO 等等，不一而足。

在截取的苏联情报中，敏感性比较低的，均归入 DELATA 代字系列。这一系列代字代表有关苏联军事活动方面的情报，如苏联潜水艇的地点或苏联飞机的活动等。DACE，DICE 和 DENT 都是 DELAT 系列的代号。

除用以代表情报敏感程度和情报来源的代字外，还有一些代表特定活动的代字。例如，用 HOLYsETONE 和 DEsKTOP 表示几项高度敏感的海底活动。

每个代字基本上都代表一个独立的、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可以接触 GAMMAGILT 文件的人不可以接触 GAMMAGOUT，同样，可以接触 HoLYSTONE 的人不等于就可以接触 DESK-TOP。常常一份文件中的材料涉及好几种活动和情报来源，它的全部密级代字往往令人不知所措，如“UMBRAGAMMAGANTHOLYSTONEDESKTOP 绝密。”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人就必须逐项通过知密审查，才能阅读这些文件。

由于某项情报来源的断绝或由于某项具体任务的结束，大部分代字都会“撤销”，但有些代字要适用几十年。由于泄密，不得不更改代字的事也偶有发生。

有许多代字，包括 UMBRA 在内，通用于整个“超级绝密”的国际信号情报界。任何一个代字的暴露就要使成千个橡皮印章报废，改换了代字的新印章，还要派信使送到每一个监听站去。改动一次还得牵涉到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加拿大人，所有的人都要一致行动。因此，改换代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大事。

在国家安全局内，铁丝网、电围墙、闭路电视、通行证和武装警卫应有尽有，但是，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

安全局最怕的是变节者，即由于金钱、外界压力和思想意识等原因，决心改变立场的内部雇员。国家安全局制定的保安审查计划就是为了及早肃清这些人。

国家安全局审查程序的第一步就是测谎。五角大楼曾下令指示：“测谎器只能是其他调查技术的辅助手段，只能在充分利用了其他调查手段后，才能使用。”尽管如此，国家安全局还是把测谎器作为安全甄审的第一手段。

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不一样，他们直截了当地以测谎器为主要工具来搜集拟予录用者的问题。据国家安全局统计，对求职者的不利情况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来自测谎器。

安全局的安全工作看来已近干滴水不漏，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有层层的通电围墙，但它的前厅和接待区却比长途公共汽车站还要容易进出。它设在一个陆军基地里，这个地区却没有警卫，也没有宪兵检查出入证。一旦进入基地，谁都可以进入接待区找个座位径自坐下，聆听各种有意味的谈话。例如有一次，有几个英国绝密的政府通讯总部人员在候取通行证时，对国家安全局的保密工作和“科茨瓦尔德”总部的保安工作进行比较，大加评论。还有一次，一个来自加拿大全国研究委员会通讯分部（相当于加拿大的安全局）

的人员和国家安全局出来接待他的人竟然交流起双方的情况。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承包通讯安全设备的商人通过内部电话大谈业务。

在安全局里面再没有比它那几千名雇员的姓名、面孔和头衔更敏感的东西了。他们所有人都被看成是敌方情报机构可能选中的靶子。国会早在 1959 年就通过了八六一三六号公法，以立法形式禁止将安全局雇员之姓名、头衔、薪金和人数等情况向外披露。如此重视姓名的原因是：很多雇员会以掩护身份派往海外工作，这些人的名字如公开出去，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人身安全”。

国家安全局尽管对此十分关切，近 30 年来却每月都要定期出版一本 20 页内容轻松的《新闻通讯》，把一些工作人员的姓名，连同他们的正面像、职称、内部组织代号，还有其他“敏感”的材料统统登在里面。至今，《新闻通讯》仍然不算机密材料，但要求读者“特别注意保管，阅毕立即销毁”。

安全局上层有二三百名最高级的官员，他们的汽车同外国信号情报机构驻安全局的代表们的汽车在一起并排停在门前的要员专用停车场上。如果莫斯科想要搞一份安全局高级间谍的档案材料，只需开车穿过该车场，将汽车牌照号记下来，然后从当地机动车注册处对照出生姓名和地址就行了。

内部警卫现已换上总务管理署所属联邦保卫局的文职保安人员。他们对一切携带外出的公文包都要负责彻底检查。但是“除非发现蛛丝马迹”，是不许搜身的。雇员想夹带文件出去只需塞在衣服口袋里就能避开检查。

国家安全局自吹自擂的保安工作其实存在许多弱点，而最明显的就是测谎器的使用。对一切军事人员都免用测谎器。他们的理论是；因为这些军人都不是自己找上门来的，而接受测谎审查必须是自愿行动，因此，要求军人接受测谎审查，就会侵犯他们的权利。

通过那些想由军职转成文职人员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双重标准产生的影响。在 1978 年财政年度里有六十八名军方来的人员谋求脱去军装，换上便服。经审查小组最后审定，不合格者约占百分之二十。其中足足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否定材料就是来自测谎器。结果判明：十三名以军人身分一直在安全局工作的人员，如果过去以文职人员身份前来，是绝不可能跨进大门的。

国家安全局的安全处在安全局内部简称 M5，在最初十年中由雷诺兹领导。雷诺兹曾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毕业于圣约翰法学院。他在 1942 年加入联邦调查局，早年大部分时间从事侦探工作，同各种军事情报单位保持联络。他于 1952 年 3 月辞去职务，在政府外面做了一段短期工作后参加了新建立的国家安全局，最初做安全处处长怀曼上校的副手。那时内部保卫工作依靠由秘密情报员组成的一个秘密组织，这些情报员大部分时间用来听人闲扯，或在角落里窥视别人的行动。雷诺兹不久升任处长，他撤销了这个秘密组织，改变办法，经常作安全情况报告，进行保密教育。

虽然雷诺兹清除了安全处原有的一些作法，但偶尔也采用秘密手段。50 年代末期，不经法院许可而进行电子侦察的事总共发生过四次，其中有二次是对一个年轻黑人女雇员进行窃听。他们认为这个女雇员同某个不友好的外国使馆官员来往，就在她同使馆朋友周末幽会时把窃听器安进她在纽约市的饭店房间里。

1960 年发生了安全局两名雇员双双叛逃的事件后，雷诺兹被迫辞职。

接替雷诺兹职位的是伦纳德·比恩沃努，一位司法部律师，曾在斯坦福大学获中文学士学位。在司法部时，曾直接在部长罗纳特·肯尼迪手下工作，

做他的安全官。又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属的国内安全部委贝会的执行秘书。再以前，任职于中央情报局；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在中国北部和东北做情报官。

他在加强安全处的反间谍工作中下了大功夫，差一点又把国家安全局拉回到了十年前雷诺兹所结束的隐密侦察活动的老路上。

比恩沃努于 1963 年 10 月间开始实施一个“外部调查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安全处的特工人员要定期到迷宫附近的酒吧、饭馆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地方去，掌握国家安全局的雇员业余时间在哪些地方聚会，他们谈不谈机密情况，外国问谍是否也经常涉足这些地方。

另外，这项方案还鼓励这些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酒吧招待员、女老板、女招待——将一切涉及国家安全局人员的“可疑事件”报告该局。

这个方案大约在 1966 年至 1967 年间无声无息地夭折了。

使国家安全局感到担心的除了嘴不严的局内人员以外，还有那么几个敢于把国家安全局的情况写出来的局外人。为了掌握这少数几个人的线索，安全处特别建立了一套名为“发表本局情况的局外人员”的档案。

一度成为国家安全局眼中钉的是《新闻日报》记者、业余密码专家戴维·卡恩。1961 年，卡恩同麦克米伦公司签订合同要写一本有关密码的书。

国家安全局得知卡恩要出的这本《破译者》有一章专写国家安全局的情况，就开始拼命阻挠该书问世。局长及上层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对策。他们考虑过各种办法，都一一否定了，最后把卡恩的名字列入国家安全局的监视名单里，随时在天空的电波中截取他的电话和电报。卡恩后来搬到巴黎接任《国际先驱论坛报》驻巴黎新闻组织的工作，监听他的工作就更加好办了。

1964 年年初，国家安全局放弃了单独行动，把问题提到美国情报委员会，交给委员会的通讯情报小组委员会承办。小组委员会建议劝说卡恩和他的出版商“不要发表这本书或至少争取审阅原稿”。麦克米伦公司未经作者许可，最初同意将两章原稿交给五角大楼，之后又同意交出了全稿。

1966 年 3 月 4 日，五角大楼收到全部原稿以后将它交给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又送交美国情报委员会的通讯情报小组委员会和安全小组委员会审阅。然后国防部致函麦克米伦公司

董事长李·C·戴顿，通知他说，“出版这本书不符合国家利益”，倘若出版者执意出版此书，必须删去某些段落。过了一个月后，仍不见戴顿答复，新任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兼美国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赫尔姆斯在 7 月初会见了国家安全局局长卡特，建议他悄悄地去一趟纽约，亲自我戴顿恳谈。

然而就是这条路子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如果新闻界知道全国最隐蔽的间谍机构的头子秘密去拜访全国最大的一个出版商，定会闹得满城风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此心中有数，他不肯给这个出版商写任何东西。卡特最初草拟了一封给出版商的介绍信，要求麦克纳马拉署名，麦克纳马拉只叫卡特自己斟酌处理，什么东西也不肯签署。

1966 年 7 月 22 日上午，卡特登上从巴尔的摩飞往纽约拉爪迪亚机场的飞机，去会见戴顿。当初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删掉包括有关国家安全局整个一章在内的好几百页。后来已减到最低限度，只剩下寥寥数段涉及问题当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即国家安全局与其最保密的英国伙伴政府通讯总部的关系。

戴顿最初不明白这次会见是什么目的，一听说卡特是国家安全局的人，

很吃惊，就将该书外聘的法律顾问找来。逐个听完卡特举出的“国家安全”论点，同意去找作者提删节的问题。在卡特的要求下，他们还同意不把这次会见写出文字记录，也不把谈话内容载入档案。

后来，卡恩在《论坛报》驻巴黎分社一间小房间里接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一个电话，他勉强同意了要求他删节的部分。这使得大洋两岸的两家情报机构大大松了口气。要求删节的材料有以下几段：

与国家安全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另一个美国政府以外的机构就是政府通讯总部——英国破析密码的机构。国家安全局的驻英联络处同政府通讯总部之间交换密码分析材粹，解密技术等。有时密码工作由两家机构分担，一家负责几个国家，成果互相交换，以免重复劳动；但在多数情况下，两家是各于备的。除此以外，他们还短期交换工作人员，以丰富这些人员在密码工作方面的经验。（当然，派驻国家安全局的英国密码分析员不能接近该局破译英国密码的地区）。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有类似、但规模小得多的联系关系。

国家安全局属国防部，而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则是外交部里的一个部门。但政府通讯总部同国家安全局一样，既为军事又为外交机构处理战略性的密码分析工作。……

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前海军信号通讯官克莱夫·洛尼斯爵士在 1960 年 58 岁时，被任命为政府通讯总部的主任。洛尼斯是电工学会的成员，曾在海军部的信号处工作，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了海军情报处，1945 年进入外交部。自 1952 年起他曾在埃里克·琼斯手下当过通讯总部的副主任。琼斯原是纺织商人，从未上过大学，曾在皇家空军志愿后备队服役，可能在战时专门从事密码方面的工作。琼斯大概是从 1946 年开始在政府通讯总部工作的，六年后他 45 岁时当了主任。洛尼斯的副手是 1960 年被任命为副主任的胡珀，他是牛津大学近代史优秀毕业生，任职时 46 岁.他是 1942 年从空军部调到政府通讯总部的。胡珀自 1952 年至 1960 年曾任主任助理。古德博士，皇家统计学会会员，一个很有才华的数学家，也是个多产作家。还有英国象棋冠军之一亚历山大。上述材料虽然已从正文中删去，书后有关注解却被审查人忽略了，任何人只要查阅一下这些参考资料，都可以大致看出删掉了一些什么材料。

第三章浮沉

第一节美国国家安全局第一件间谍大丑闻

1954 年 10 月 9 日近中午时分，满满一汽车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开到弗吉尼亚州阿林顿一座简朴的楼前，来逮捕一个 40 岁的物理学家彼得森。他被指控违犯美国法典第十八项法第七九八款——通讯情报法——而受提审。由此揭开了国家安全局的第一件间谍大丑闻。

彼得森早先就读于罗耀拉大学，后在圣路易大学攻读科学获硕士学位。1941 年学完了陆军密码分析函授课程后加入了弗里德曼的通信情报处。整个大战时期都在阿林顿庄园破解日本的外交密码通讯。

在阿林顿有一个荷兰联络官 A·维凯尔上校，座位紧挨着彼得森，也搞日本密码体系，是一个知名的密码专家。两人很快成为挚友，维凯尔将彼得森介绍给他另外一个同事施托特。此人是荷兰驻华盛顿使馆的通讯官员，在密码方面他们的志趣一致。

战争结束时，美国和荷兰之间的密码合作关系结束，维凯尔返回国内。彼得森投入于新成立的陆军安全局（后为武装部队安全局）的训练计划。他未经授权，开始将他认为可能有助于他的荷兰朋友在荷兰创建密码机构的意见寄给维凯尔。到 1948 年又开始将安全局的绝密记录和高度机要的文件抄件偷带出来，交给战后留在使馆未走的施托特，其中有美国破译荷兰密码的详细记载和一份通信情报处 1939 年的文件，文件标题是“海格林密码 B—21 型的分析”，这是荷兰政府进行外交通讯的设备。彼得森为荷兰人一共干了 6 年之久才在 1954 年偶然引起了国家安全局的注意。一个安全处的特工人员在一次定期的安全审查过程中，向“苏联一般处”的处长弗兰克·雷文提起，他偶然发现一项材料说明彼得森同一个叫维凯尔的荷兰人有通讯联系，雷文说：“维凯尔，维凯尔是战时荷兰驻美国的通讯情报首席代表。你最好查一查看，这事有点不对头。”

调查员潜入彼得森的公寓住房，发现里面藏了一大堆高度机密文件，还发现文件经过施托特拍照复制退回彼得森后，上面的圆形美国书钉一律都换成了方形的荷兰书钉。于是安全局进行了一次大清查，把很多其他被泄露过的文件统统查了出来。

1954 年 10 月 1 日，彼得森被开除了。问题提到了美国情报委员会，卡亲因主张提起公诉，把彼得森拿出来做反面教材，但只能将保密性最小、危害性最少的几件事拿出去做证据。

彼得森被押进亚历山大市监狱，等候联邦大陪审团 12 月 6 日开始对他进行审讯。

紧接着的审讯是公开和秘密开庭交替进行的。联邦地方法庭的法官布赖恩在秘密庭中听取敏感性的证词，再转到公开法庭上听审不敏感的证词。政府虽有大量高度机密的文件可作为起诉依据，但是，遵照美国情报委员会的决定，只选了最不关痛痒的几件提交法庭。彼得森的辩护律师戴维·金尼指出，这些材料定为机密“大大过了头”。

然而，金尼也明白，要想叫他的委托人免受十年徒刑和 1 万元罚款的重判，只能寄希望于折衷的认罪上。于是，12 月 22 日彼得森招认，“他明知故犯，以损害美国安全及利益的方式，使用了有关美国及外国政府通讯情报活动的机密材料。”

但是认罪没有起多少作用，布赖恩法官声称，彼得森窃取的文件“十分

重要”，判处他七年徒刑。

四年以后，到 1958 年彼得森获得假释，国家安全局的官员担心波得森会因对政府心存愤懑，而被苏联招募。雷诺兹为防患于未然，下令再次潜入彼得森家里去安置窃听器，以此证实或排除安全局所耽心的事。安全人员没有向法庭申请合法手续，就安上窃听器，经过两个月的窃听，没有发现他丝毫不老实的地方，最后将窃听器拆除。彼得森案从此终结。

1961 年初的一天，有两个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员坐在莫斯科记者之家的一张长桌边，面对着一排排的电视摄像机、耀眼的弧光灯和十几个麦克风。他们开始就有关国家安全局这最核心的机密问题进行现场答问。

这一出戏是国家安全局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事情起源于大约十年以前，当时米奇尔被派到安全组在日本上濑谷的监听站工作，与刚从阿拉斯加截听站调来的马丁初次相会。

米奇尔 1929 年 3 月 11 日出生干旧金山，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沿海城市尤里卡长大，是尤里卡市一个律师的最小儿子。他少年早慧，中学毕业后，考取加州理工学院。学了几天外语之后，改学统计学。他酷爱读书，他的课余消遗读物，也多是大部头的数学、哲学，间或也读些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方面的书。他喜好辩论，时常宣读他所笃信的未知论。

在二年级上学期结束时，他应征参加了海军，被派到戒备森严的上濑谷监听基地。

马丁于 1931 年 5 月 27 日生于乔治亚州哥伦布市。1937 年他的父亲马丁带着他和全家人，斜穿全国，搬到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市。八年后又迁至 40 里以北、坐落在基蒂诺斯谷地中心、以养牛业为主的艾伦斯堡镇。马丁才思敏捷，曾引起华盛顿州立中心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勒的注意。米勒曾对他做了一系列的专门测验，看他是否能免修全部的中学课程，直接升入芝加哥大学为天才学生设立的一个特别班。他以高分数通过了这些测验。

马丁在华盛顿中心大学学习了一年，以后应征入海军，由于他有数学基础，而被送到海军安全组执行密码方面的任务。

马丁和米奇尔都着迷数学，对数学在密码分析中的应用尤其入迷，甚至在 1954 服役期满后，马丁以陆军安全局文职人员的身份在日本又呆了一年。

米奇尔回到尤里卡，考进斯坦福大学继续攻读数学学位。到四年级的时候，米奇尔开始想前途问题。早在海军服役的时候，他就想过要到国家安全局去工作。国家安全局数学人员做的工作要比一般水平足足先进五年。

对安全局来说，他也是一个理想的人选——聪明，有数学学位，还有密码分析的工作经验。除此之外，他还曾通过海军安全组严格的密码工作的合格审查。

1957 年 2 月 25 日，国家安全局的一个负责招募的人员在校园内对米奇尔进行了面试，对他印象很好。一个半星期后，国家安全局的另外招募人员也对马丁进行了面试。当时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主修数学，正在念最后一年，成绩一向是甲等。显然两人从海军退伍后一直还保持着联系。1957 年 7 月 8 日两人都以国家安全局七级雇员的身份来局报到。

尽管他们以前在海军工作时都通过了最高级绝密合格审查，国家安全局还是要求他们再一次经过全套审查。7 月 23 日米奇尔被叫进测谎机问话的一个小房间。用皮带捆在测谎机上，被询问了一大串问题。他的表现一直很正常，在问题开始转到性反常和敲诈等问题时，他突然不肯合作，拒绝进一步

回答任何问题。

11 天后，他再一次来到这间小房间，问题又转到他的性生活上，这次米奇尔屈服了，把他在 13 岁至 19 岁期间对狗和鸡做过的某些“性实验”的事告诉了提问人。

对米奇尔的测验结果，连同各联邦情报部以及执法机构对米奇尔的有利报告和米奇尔在海军时的情报调查材料，一并送到国家安全局的安全处一个中层评定人贝那里。评定官员认为对米奇尔在农场的动物“实验”问题，结合他当时年龄、以后没有再犯，以及其他方面对他的好评等情况来考虑，没有理由不给他审查合格证。五天之后，米奇尔得到了初步审查合格的资格。

一周以后，马丁顺利地通过了测谎器的测验和国家安全局的调查，也得到了他的初步审查合格证。

两个伙伴于 1957 年 9 月 4 日进行保密宣誓,国家安全局给他们颁发了绿色通行证，准许他们通过绝密的代号去接触密码材料。

米奇尔和马丁先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国家安全局训练学校接受分配工作前的培训。几个月之后，到库尔贝克博士领导的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去报到，开始在密码术方面展示他们的数学才能。

第一年两人对自己的工作、对国家安全局都没有反感。

到这时，国家安全局同苏联之间秘密进行的流血空战已近十年之久，从 1950 年到 1958 年，有担负侦查及收集电子信号任务的美国军用飞机十多架次，在波罗的海，在西伯利亚附近，在黄海、日本海……先后遇到苏联战斗机的截击。美机大部遭到机毁人亡的厄运，侥幸返航者只有少数。

米奇尔和马丁早在 50 年代初期,在上赖谷海军安全组时就对间谍飞行之事有所了解。现在作为国家安全局的人员，他们又了解到了电子侦察机还进行另一种活动，使他们十分苦恼。在执行这种所谓电子情报任务时，飞机不仅擦着苏联边境飞行，而且还侵入境内，目的是迫使平常不工作的苏联雷达设备开动机器，从而截取它们发射的可能透露内情的信号，以供日后由安全局进行分析。

两人在 1959 年初就知道了这一高度机密、只限内部知晓的任务。在头一年 9 月，一架空军 EC—130 飞机在苏联亚美尼亚境内坠毁，6 名机组人员死亡，11 名宣告失踪。5 个月后，经过多方努力想要苏联人提供有关这 11 名失踪空军更多一些的线索，但都不成功。美国国务院便逐字逐句地发表了苏联米格飞行员在击落这架美国飞机过程中的谈话纪录。

在国务院发表这份记录的当天，国家安全局局长约翰·桑福德通过该局的广播装置建议全体同仁不要谈论 EC—130 的问题。这显然是在捂平盖子。有一个高级官员对马丁说，这架特殊飞机里“载有电子专家和在近距离内接收苏联雷达信号的专用设备”，还说这架飞机故意飞越边境，“以便靠近苏联雷达设备”。

美国进行如此危险及挑衅性的活动使马丁和米奇尔大为震惊。他们并不反对收集情报，但认为美国政府派飞机越过外国边境，侵入敌国领土，是在于着可能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战火的蠢事。更糟糕的是，似乎只有少数几个政府官员了解其中实情，连国会也蒙在鼓里。

马丁和米奇尔认为应该有人将这项活动的内情报告国会，但他们明白，通讯情报法规定，对泄露这方面情况的人要判以十年徒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冒险一试。几周后他们约见了国会议员海斯，向他谈出他们对行政

当局不向议员准确反映情况感到忧虑，之后，就开始把 EC—130 事件的真实情况和他们对这种越境行为会危及世界和平的优虑，一五一十地谈了出来。话音未落，电话铃就响了。来电话的人是负责国会关系的助理国务卿梅康伯，他要求海斯不要再公开讨论 EC—130 事件。

海斯在他的支票簿后面信手记下了两人的姓名，告诉他们，国会也许会对此事进行调查，“ 但是得根据国会中的上层人士的反应行事 ”。马丁和米奇尔在离开之前提醒这位代表说，他们是冒着触犯通讯情报法的危险前来的，要求他对这次来访严格保密。

事后海斯向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 · 摩根简要提了一下这次会见的事，就再未过问。

米奇尔和马丁对整个美国社会的信念正处于迅速瓦解的过程中。这位国会议员对待这么重要的事件，竟连一封信都不回，这使他们对美国社会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对政府越不满，就感到这个社会同他们越有距离，越同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格格不入。

为填补他们的空虚，他们开始对苏联产生向往，认为那是一个更能赏识他们的社会，在那里他们的聪明才智会受到尊重而不被忽视；在那儿这种非法的越界飞行绝不会受到宽恕。

到 1959 年仲夏，他们已决意叛逃，计划在一年中先探好路子。就在这时马丁的上司——研究与发展主任库尔贝克为他写了封评价很高的推荐信，对他工作出色倍加赞赏，他因而获得一笔脱产攻读数学硕士学位的奖学金。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在全部申请人中，马丁是唯一被授予奖学金的人选。第二年他又获取了一年的全额奖学金，成为第一个得到奖学金脱产学习两年的雇员。他在安全局中是最有前途的一个人。

1959 年 9 月，马丁离开安全局到厄巴纳的伊里诺斯大学学习，在那里表现十分出色。他还有时间攻读俄文，并取得甲等成绩。这门课他是在华盛顿大学学习时读过。国家安全局发给他奖学金的条件并未要求他读俄文这门课程。

在厄巴纳，他开始结识一些共产党员。12 月间，他和米奇尔向他们的目的地公开地迈出了第一步。他们违反国家安全局的规定飞往古巴，很可能就在那里，同苏联官员接上关系的。

马了在这次旅行之后，回到伊里诺斯。米奇尔则返回国家安全局。

1960 间，马了从伊里诺斯回来，二人开始一起计划他们的假期，他们提出从 6 月 24 日至 7 月 11 日休假两周，去西海岸探望双亲。几天之后休假获准，除两周假期外如有必要，还可以延假一周到 7 月 18 日。

星期三那天，他们收拾好行装。星期四（6 月 25 日）上午驱车往南，到 25 里以外的华盛顿国家机场。米奇尔和马丁登上东方航空公司 307 航班的银色飞机，在正午前数分钟，米奇尔和马丁升入天空，走上第一段行程。这次旅行的终点不是回家去西海岸，而是去苏联，去过另一种方式的生活。他们即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叛逃者。

飞机在新奥尔良稍停后，在墨西哥城着陆。两人登记住进维尔利斯旅馆，他们告诉管理员要住两个星期，但第二天上午突然结了帐，登上一架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哈瓦那。在那里悄悄登上一艘苏联货船，驶向他们新的国家。

一个多月以后，国家安全局才发现二人不见了，既未回来工作，也不在

西部两人的父母家中。当时安全处处长雷诺兹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为国家安全局一个专题座谈会进行安全督察工作。一听到消息，急忙赶回，并立即悄悄地展开调查。经过对各家航空公司的乘客单进行查对，在飞往墨西哥、然后飞往古巴的乘客名单中发现了他们两人的名字。

国家安全局安全处的特工人员连搜查证也没有办，就闯进米奇尔在劳雷尔八号街的住房。在房内发现一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特工人员立刻同马里兰州警察局联系，获得开保险箱的许可证，然后到劳雷尔的州立银行，打开米奇尔租用的保险箱，从里面抽出一个封好的信纣。因信封上端有一段米奇尔和马丁共同署名的留言，说他们希望将这封信的内容公诸于世。信上说，

“我们希望向亲友们以及其他感兴趣的人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当苏联公民。”接着他们以流畅的文笔，有条有理地列举出他们对原来国家的政府的种种不满，特别是对美国政府明知理亏，仍一味发表“虚假、骗人的声明，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越过他国”的作法的不满。他们说美国政府有时使用“金钱和军火秘密颠覆被认为是不友好的政府”，他们对这种作法感到失望。

他们最后又举了一个事例证明，“美国政府指责苏联不择手段，自己才真是这样”。这显然是指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一次“D 处”活动。在这一行动中“美国政府曾用金钱向一个盟国驻华盛顿使馆的密码员收买对解译该国密码信息有帮助的情报”。

尽管有这样一份声明，窘迫不堪的国防部仍决定佯作不知，妄想掩藏住这封信。

8 月 1 日五角大楼发布消息说，国家安全局有两名雇员因超假未归，宣告失踪。事隔五天，他们去古巴的事被发现后，国防部悄悄收回这份声明，加以修改，添上一句话：“只能揣想，他们有可能已到铁幕那里去了。”五角大楼企图掩盖这一损失的惨重性，宣称两人在工作中掌握的材料“决不可能有损于美国的通讯安全，因为他们接触不上有关美国武器和防卫计划的机密文件”。

五角大楼的这份骗人声明激怒了知道内情的情报界的其他人士。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向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科马克揭发了这起叛逃事件的真相。第二天，麦科马克就公开了他听到的新情况，并要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沃尔特着手调查这一事件。

麦科马克宣称：“这两个雇员已经带着很有价值的密码情报叛逃至苏联，其损失之严重，远甚于任何一位官员所公开承认的。这两名雇员很可能早在 12 月份就同苏联特工有了接触，他们在失踪前几个月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有价值的情报传递给在黑西哥的共产党人。”更坏的是，沃尔特还听说，两人当中有一个人在 5 月 1 日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 U—2 飞机被击落之前，曾索要并获得过有关这次飞行的材料,这两人都是搞有关 U—2 飞机和其他侦察机方面的通讯工作的。

一周以后，麦科马克所指控的情况被一一证实了。

在“莫斯科记者之家”，坐满了来自社会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记者，再次对国家安全局所进行的不道义的情报收集活动表示不满。首先列举出的就是电子侦察机的问题。他们以 EC—130 为例，将它在苏联亚美尼亚上空那次飞行，详细描述了一番。

国家安全局另一个使他们丧失信念的活动就是，“截取和破译自己盟友

的秘密电讯”。后来，马丁在回答一个《消息报》记者的提问时，说出了几个国家的名字。

这个历时 90 分钟的记者招待会上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被用来让全世界初步见识一下安全局的内幕。这两个人把许多情况从人力截收站的数目（共有 2000 以上），到生产办公室的下属机构以至国家安全局同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之间最秘密的合作关系，全部谈了出来。在快说完时，他们又想起一点补充说，国家安全局经常阅读十多个国家的秘密通讯。

两人发表完预先准备好的声明之后，又同意进行答问。一个记者问到他们如何抵达莫斯科的具体经过。马丁咧嘴笑而不答。他说：“也许还有别人要利用这条路线。”

在美国国内，对这桩丑闻至少有三方面开始了调查，最起劲的就是沃尔特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他们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对国家安全局用人的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历时 13 个月，耗费了 2000 个工时，召开了 16 次内部会议听取证言。最后，沃尔特发表了一份委员会的报告，好象辩明这起叛国案的主要起因是同性恋。这个委员会从没有耗费精力从政治和思想动机上深入探索这次叛国事件的起因。

从叛国事件发生到非美活动委员会交出结论报告，历时 13 个月，安全局许多人如坐针毡，而人事处处长克莱因，就像等着上断头台一样。

克莱因当时 48 岁，千这一行已近 20 年，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中尉时，被分配到阿林顿庄园工作，后来升为少校，任陆军安全局作业处的助理处长。1949 年在陆军安全局改组为武装部队安全局时，克莱因决定脱掉军服以文职人员身份参加新的机构。但他还得重新交一份申请书，再填一次各式各样的表格，其中最主要的一份就是标准的政府求职表，公文术语叫“57 号表格”。

克莱因在 1942 年 2 月和 5 月都填过他的履历。但从 9 月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的出生日期从 1912 年 2 月 4 日改成 4 月 12 日；他的母亲的出生地从俄国改成美国；他的名字从莫里斯·哈里改成毛雷斯·哈罗德。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学历从新泽西州法学院毕业生变为哈佛法学院的校友。1949 年，这位陆军军官希望在这个新成立的机构谋求一定地位，又填写了一份“57 号表格”，写了一个自传，里面还是后来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克莱因没有等多久，也没有多少困难就得到了任命，同时还得到了密码工作绝密级的甄审合格证。

可是好景不长，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时下了一道命令：凡在敏感部门任职的全体政府文职官员一律要再经过一次调查。1955 年的调查发现，克莱因的历史材料前后不符，此事报到安全处处长雷诺兹处，雷诺兹只问了他一下，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克莱因为了保险不再出事，抽出了他自己的人事档案，撤掉了填有假情况的“57 号表格”，重填了一份情况准确的表格换了进去。

马丁与米奇尔叛逃事件发生以后，国家安全局内一片慌乱。众院、参院、五角大楼也都开展调查，而要调查就都要查阅档案文件。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员唐纳德·阿佩尔来索要一些录用登记，其中也包括“57 号表格”在内，克莱因拒绝交出这些表格。

克莱因对待委员会这一要求的反常态度引起委员会主任调查贝塔弗纳的怀疑。鉴于委员会有权审查安全局用人情况，索要表格本是完全合理的。

现在注意力开始转到克莱因本人的身上，非美活动委员会要他将他的人事档案送给正在五角大楼的委员会调查员。克莱因知道调查员一定会发现他那份调换过的表格是在应该填表的时间（1949）以后印刷的，于是他又搞了一次偷梁换柱的把戏：找到一张 1949 年前印的“ 57 号表格 ”，将上面写过的铅笔字擦掉，填上真实情况，并打上了 1949 年 6 月 15 日的日期。

调查中一眼就可看出旧痕迹。于是，他们将这份材料的复制件转给退役军人局的验证侦察处的侦察人员。他们认定这份材

料是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一英寸十个字母型号的电动打字机打出来的。

委员会接着将调查结果呈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他委派联邦调查局去审查克莱因的材料。结果查明是：这份表格是在国防部索要克莱因的履历材料时才填写的。

克莱因被叫到委员会，在内部会议上他矢口否认曾偷换材料。尽管这样，他还是被开除了。

在克莱因腾出他的办公桌两天以后，47 岁的雷诺兹也被请下台来。表面上是因为他触犯了禁止军人接受金钱礼物的国防部新的“ 行为准则 ”法令，因而引咎辞职。但实际上雷诺兹去职也是受马丁和米奇尔的牵连。

马丁到苏联以后改名为索可罗夫斯基，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抱怨苏联政府答应他们可以自己选择住处，却又说话不算话。后来他们曾申请搬到莫斯科去居住，要求被打了回来。他逐渐意识到了过去的认识和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

米奇尔的理想幻灭得更彻底。1979 年下半年，这位列宁格勒的电子计算机专家开始向美国领事馆探询重回美国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为此又重新审查了他的情况。1982 年 2 月间，他被正式剥夺了美国国籍。

接着米奇尔又向领事馆申请以移民身份回美国，也遭驳回。根据是：移民法中规定，凡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人一律禁止移民入境。

米奇尔仍不泄气，又申请旅游签证，不出所料，又遭拒绝。

米奇尔不时给他父亲打电话。据他父亲说，米奇尔叛逃后很快就追悔莫及了。

在马丁和米奇尔叛离之后的几个月里，安全局处于四面受敌的孤立境地。沃尔特主席和他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不断施加压力，要国家安全局清除掉一切“ 性反常 ”的嫌疑分子。国家安全局遂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悄悄辞退所谓“ 反常分子 ”，平均每两周就有一两个被革除。

此时安全处却没入注意到陆军中士邓拉普。这可是一次不幸的疏忽，他们在张惶失措地搜寻同性恋者时，竟忽略了莫斯科为取代马丁、米奇尔而安排的继任人。

从档案材料看，邓拉普在安全方面是一个信得过的理想人物。他在 1958 年 4 月被派来做局长助理兼参谋长加里克洛弗代尔少将的司机。那时，这个 30 岁的中士就已经有一份很不错的档案材料了。他先在商船上工作了 8 年，后干 1952 年 6 月入伍参加陆军三十六步兵团。在朝鲜服役时表现很英勇，曾因“ 在战火中沉着冷静忠于职守 ”获“ 紫心 ”和“ 铜星 ”勋章。他在私人生活上也没有可使人对他的忠诚不放心之处。他只上了 3 年高中就离开学校去海上谋生，在陆军时曾得到三次“ 品德优良 ”奖章。

到 1960 年 6 月间，他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局的通讯办事员，早在此时，他就从克格勃领取高额报酬了。

在国家安全局，正如在中央情报局或其他高度敏感的政府机构一样，接触机密材料最多的人员并不是该部门的首脑人物或某项计划的领导人。他们限于统一规定的“有必要才能知道”的政策，只知道与其具体任务有关的材料。往往地位越低的人接触的敏感材料反而越多。例如，局长要呈给总统一份“亲自过目”的电文，首先要经过秘书打字，然后秘书又很可能交给某一个人送到电报室去，在那里，电传员再用密码机穿孔。在白宫，这份电文首先要从机器上扯下来，交给又一个通讯员，可能还要转给另一个人，最后才能呈交总统。等这份供总统“亲自过目”的电文送到总统手上时，至少已有另外六个人过了目。至于说其他电文和文件，过目的人还要增加好几倍。

邓拉普是在局内各部门之间任传递高度机密文件的通讯员，他于是成为这些“过目人”中的一员。

邓拉普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倾向，他叛卖的动机纯粹是经济上的。

1960 年 6 月，这个一个月前还买不起一辆旧面包车的人，竟能不动声色地一下掏出整整 3400 美元现款，买下一只 30 英尺长、厨房酒吧俱全的汽艇。几个月前他在银行里连买一张船艇展览票的钱都不够，现在竟能出钱派两个朋友去纽约为他新买的赛艇选购意大利手工制作的上等快艇辊旋桨。这个国家安全局独一无二的机密情报贩子，第一年里拿回家的钱达三四万美元之多，他的上级竟毫无察觉。甚至因为马丁和米奇尔的问题，安全工作抓得最紧的时候，都没有人对他注意。在一次游艇俱乐部的赛艇比赛中，他摔伤了，国家安全局怕镇定药会使他泄露机密，特地用救护车把他送到米德堡陆军医院去，即使这种情况下，都没有人去费心想想他玩船的钱是哪儿来的。

邓拉普在最保密、最机要的国家机构中几乎整整当了三年苏联的坐探。他对美国信号情报和通讯情报活动造成的危害无从推算。他究竟卖了哪些文件，任何人都不知道。后来五角大楼的一位官员说，邓拉普的叛国罪行“比马丁和米奇尔的背叛要严重三四十倍”。

贪婪使他得到高级汽车和高速快艇，贪婪也使他垮了台。他耽心在安全局工作满期后，会调往海外不敏感的地方工作，便下决心退出军队，申请在国家安全局做文职工作人员，以便继续他那收入丰厚的副业。

但是，国家安全局对文职人员的安全甄审远比对军人严格。申请文职工作的人一律都要经过测谎器。1963 年邓拉普两次被绑在测试箱上，承认自己有过“小偷小摸”和“不道德的行为”。几个月后逐步调查出他的生活水平很高。5 月 23 日军队撤销了他的安全甄审合格证，将他调到米德堡勤务兵室。

当调查工作继续进行到 6 月份时，邓拉普意识到自己不能摆脱厄运，留下两封遗书，企国服毒自杀，被他的朋友及时发现，抢救过来。遗书中没有提到间谍活动的事，调查员仍找不到可以正式控告他的依据，可是调查更加紧了。

但事隔不久，邓拉普再次自杀身亡。1963 年 7 月 25 日，国家安全局以正式军人葬礼，将他安葬在阿林顿国家公墓。

此事本可以到此为止。可是邓拉普死后约一个月，他的遗孀黛安在他家里发现一箱极为机密的文件。国家安全局的安全处一听说此事，即刻找来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然而，事到如今，已为时过晚了。这件大间谍丑闻的唯一知情人，已长眠于六尺黄土之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邓拉普刚死，又一名国家安全局雇员突然在莫斯科露面，通过《消息报》的头版向全世界公开了他的情况。

这一次是汉密尔顿。他曾在国家安全局破译密码的生产组织里做密码分析员。汉密尔顿是一个人了美国籍的公民，在 50 年代中期与妻子一起来到美国。他原名欣达利，改名后到乔治亚州定居。他是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毕业生，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教书工作。他将这一切归因于自己的阿拉伯血统，只好屈就饭店杂役工的工作。后来遇到一个美国上校，才把他招募到安全局里来。

他从 1957 年 6 月 13 日开始当了“ 研究分析员 ”，分配在生产组织“ 其他各国处 ”的近东组。据汉密尔顿说，“ 这个组主管阿联酋、叙利立、伊拉克、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伊朗、希腊和埃塞俄比亚 ”。汉密尔顿还对一家苏联报纸说：

> “ 我和‘ 其他各国处 ’的同事们的责任是研究和破译这些国家的军事密码，也破译这些国家给我们驻世界各地的外交代表的全部通讯……国家安全局运用密码分析判读所有的这些国家的密码电报……
>
> 例如，在我的办公桌里就有经过破译的在 1958 年阿联酋政府代表团为购买苏联石油出访苏联时，开罗和阿联酋驻苏使馆之间的全部有关通讯。国家安全局把这些通讯都达到国务院去。
>
> 当然平时也把阿联酋外交部给它驻华盛顿使馆的密码指示不断破译出来，送给国务院。
>
> 特别是要着重指明的是，联合国设在美国领土上。美国当局凭借这一优势，十分专横跋扈，阿联酋、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希腊等国政府给它们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发去的密电指示，国务院总是抢在收报人前面捞到手。 ”

但后来一些根深蒂固的心理上的问题开始露头。1959 年 2 月，国家安全局说他“ 精神有病 ”，四个月后他被迫退职。据汉密尔顿说，解雇他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想同在叙利亚的亲属重新联系。这个阿拉伯破译员因此出走莫斯科，这一走，给已然遍体鳞伤的国家安全局，又是一记沉重打击。

武装部队安全局一国家安全局在它的前 15 年当中受内奸和叛逃者困扰就有 12 年以上，它在美国情报共同体里不仅是保密最严、隐蔽最深的一个成员，同时也是被渗透最彻底的一个成员，在这两方面它都出足了风头。

第二节看不见的机构——全球侦听网

在国家安全局破译一种密码或读懂一份密电之前，首先必须捕捉和记录难以捉摸的信号。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中央安全局——一个几乎不为米德堡以外的人所知的看不见的机构。

中央安全局由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即前陆军安全局）、海军安全大队和空军安全局组成，是美国密码帝国的耳目。其成员都是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士兵。他们坐在成排成串的椅子上，头载耳机，手调刻度盘，操作着录音机，在六层多色复写纸上打出电文。

中央安全局共有 4.5 万人，其局长由掌管着安全局 5 万名雇员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兼任。中央安全局是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悄悄建立的，“以便在国防部内设立一个比较统一的密码机构”。不过，它的建立与其说是出于深思熟虑，不如说是出于偶然。

最初的设想在导致 1971 年情报界改组的那次讨论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那时的想法基本上是组建武装部队的第四个军种。虽然“密码”军的成员将身穿与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相同的制服，但将专门负责信号情报和通信保密工作，并有一套完全独立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最后直通国家安全局局长。

然而，不出所料，军方高级将领们群起而攻之，最后扼杀了上述主张，代之以成立中央安全局。据参与筹划的一位人士说，该局“是仓促搞成的残缺不全的怪物”，旨在抵制最初的建立第四个军种的建议。

“我参与了起草成立这个该死的机构的报告，不知道它究竟是何物”，这位前高级情报官员说道。“我从未弄明白宫是怎么一回事。”

中央安全局最后根据尼克松的行政命令建立起来了。它千方百计地要解决预定由它解决的问题，但是非但没有统一密码界，反而由于设立了一套“重叠班子”而使之更加四分五裂。结果是灾难性的，致使整个中央安全局实际上被取消，只剩下局长（由国家安全局局长兼任）和副局长（由国家安全局负责基层管理的副局长兼任）。

中央安全局几名副局长的一位前助手将该局称为“象牙之塔”，并且指出混乱状况达到了何种地步：“实话对你说，作为他们的助手……我们一直没完没了地谈论这件事，可是谁也搞不清该局到底是怎么回事。”

连上述行政命令的拟稿人施莱辛格（当时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遇到这个问题时，也想回避。他受到佛罗里达州众议员赛克斯的逼问：“既然在国家安全局内取消中央安全局的重叠班子使该局除了局长之外只剩下一个人，那么，还有什么正当理由保留这个虚设的独立机构呢？”施莱辛格（这时已任国防部长）只是犹犹豫豫他说：“我想最好是找艾伦将军来谈。”

不管中央安全局是不是虚设的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极其机密的第六号情报指令（1972 年 2 月 17 日修订）中，规定了这支穿军装的破译员和侦听员队伍由国家安全局局长控制：

> 国家安全局局长有权直接向所有从事信号情报活动的作业单位下达必要的指示和任务。凡该局长根据本款授权下达的指示，均应坚决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只能向国防部长申诉。

国家安全委员会这项情报指令授予了国家安全局局长以惊人的权力和职责，不仅绕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绕过了武装部队各军种部长，至少就信号情报而言，使他拥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部队。

在三军密码机构中，陆军密码机构的历史最悠久，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情报处八科。改变陆军安全局后，其总部仍设在日益陈旧、东倒西歪的前女子学校——阿林顿大院内。70 年代末，陆军安全局与陆军情报部合并，变成了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

像其姐妹机构一样，海军安全大队仍然留在内布拉斯加大街前女子学校富丽堂皇的红砖房子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就占用了这处校址。

最年轻的是美国空军安全局（后来改名为美国空军电子安全司令部）。它成立于 1948 年,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凯利空军基地一片杂乱无章的“ 工 ”字型建筑群内。其主楼——阿迪萨纳大厦——是以已故的阿迪萨纳准将的名字命名的，这位准将去世时是国家安全局业务副局长助理。

三军密码机构合作从卫星到潜艇的各种平台，织成一张包住整个地球的电子网，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无线林立的陆上侦收站——霍尔顿城吉林农场侦收站的后代。

霍尔顿侦收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前两个星期才竣工的，只使用了不到一年。在没有战争和废除新闻检查的情况下，陆军部队认为没有什么必要继续在太空中搜索了。

然而，1930 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一年，信号情报处接管了这项工作，并且在其他职责之外还受权探测、分析和破译“ 敌人的通信 ”——但只有在战时才能这样做。为贯彻上述改编方案而下达的命令，确实授权建立一支无线电侦收队伍和修建几处侦听站，但其平时任务再次被限制为只训练人员和研制设备。

将近 1931 年年底时，开始在华盛顿东南 25 英里的弗吉纽约亚州巴特里湾亨特堡修建一个试验性侦收站。该站重点研制高速接收机，但也搜集侦收材料供破译学员“ 实习 ”。

到 1938 年 2 月，信号情报处共有六个全日工作的侦听站。在美国境内，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普勒西迪奥和得克萨斯州萨姆豪斯顿堡的侦听站负责拾取信号；设在新泽西州蒙默斯堡的侦听站负责监听华盛顿和纽约各大电报公司之间的通信。在菲律宾马尼拉和夏威夷谢夫特堡设立了海外侦听站。设在巴拿马运河区夸里海茨的侦听站则一天 24 小时不停地监控罗马、柏林和东京的电路。

与此同时，海军也由设在马里兰州切尔腾汉、缅因州温特港、华盛顿州普吉特的班市里奇岛（监听东京至华盛顿的通信）和夏威夷瓦胡岛的侦收站，以及设在菲律宾科雷吉多尔一座碉堡内的侦收站拾取信号。在关岛、加利福尼亚州英皮里尔海滩、长岛阿马甘塞特和佛罗里达州还设立了较小的侦听站。

由于远东战云密布和欧洲形势吃紧，1938 年 3 月 26 日秘密取消了平时不许进行侦收活动的禁令，信号搜索员们开始以冲天的干劲转动刻度盘。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侦听站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到大战结束时，头戴耳机的男男女女们操作着从阿留申群岛到澳大利亚、从印度到非洲的众多侦听站。由于认识到掌握空中电波的价值，美国慢慢统一起来的信号情报界，在

战后时期和冷战年代，把无线指向了颇具威胁的苏联人及其东面的邻国。遭到战争洗劫的日本硝烟未散，这个岛国就突然从美国信号情报的主要目标，变为美国信号情报的主要基地。在日本帝国最北部的北海道，美国陆军安全局设立了一个占地 184 英亩的侦听站,开始对北面仅 40 英里远的苏联进行侦听，在北海道南部千岁西南 4 英里的一块 1290 英亩的土地上，陆军安全局竖起了更多的天线，就像一片蒿草。

在本州酒田，第三个侦收站监听着日本海（宽 550 英里）对面引人注意的中国、朝鲜和苏联交界地区。在南部的九州岛上的加贺田还有一个侦听站。同时，海军安全大队集中力量在横滨港口区的上濑谷和冲绳的半座、宗兵卫与二手问设立了侦听站。

朝鲜战争结束后，国家安全局更逼近了其主要目标，陆军安全局在汉城、平泽（占地 50 十英亩）、距离政府 12 英里的红云大院以及土桥的一个小基地建立了侦听站。

为了监视苏联的下腹部，特别是丘拉但的导弹和空间活动，安全局转向地处战略要冲的土耳其。小城卡拉米塞尔被选作主要侦听站的站址。该地距马尔马拉海仅几英里，在清真寺和尖塔鳞次栉比的伊斯但布尔东南 37 英里。这个位于土耳其亚洲部分占地 697 英亩且用铁丝网圈起来的大院，被其主要租用者——美国空军安全局——称之为主基地。实际上，该基地是由美国空军安全局和海军安全大队共同配备人员的。

卡拉米塞尔侦听站投入使用后不久，其他较小的侦听站也开始在黑海沿岸的干泥滩上和罂粟种植园里投人工作。这些野外侦听站起初设在装有天线的绿色通信车和没有窗户的小水泥房里，监听苏联空军与海军的通信活动、商务通信和带有“威夫”、“标记”、“蘑菇”、“海王星”等古怪名称的雷达的信号。

最靠近目标的侦收站在特拉布松——土耳其东卡德尼兹山脉附近的一个沿海小村，距苏边界只有 70 英里。在西面 200 英里通往查尚巴的公路上，一小批空军信号情报专家在萨姆松使用着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侦听站。至少从 1955 年夏天起，美国就一直从这里密切监视苏联位于里海西北的卡普斯金亚尔发射场。1963 年底或 1964 年，在叙利亚北面大约 60 英里的迪亚巴克尔设置了一部探测距离较远的雷达，从而能够监视苏联从黑海以东的丘拉坦新试验中心发射的导弹。另外一个侦收站则设在因杰角锡诺普。因杰角是黑海沿岸的突出部，就像指向苏联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山脉的一根短粗的手指。

国家安全局在土耳其的侦听站继续增多。在首都安卡拉建立了一个；在伊斯但布尔以南 14 英里的小城阿纳多卢卡瓦克也建立了一个。据一位官员说，在阿纳多卢卡瓦克，23 名安全大队的水兵在一座坍塌了的面积为 870 平方英尺的办公楼里截收信号，并且住在“老鼠成灾”的活动房屋里。

1975 年上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美国对其实行武器禁运。于是，土耳其政府关上了国家安全局在土耳其国内的信号情报“窗户”。从当年 7 月份起，所有的侦收活动都中止了。但是，由于抱着也许可以迅速解决的希望，各侦听站仍然配备人员和派设警卫。后来，希望消失了，美国人于 1976 年 9 月开始慢慢地撤走。四个月后，土耳其海军人员接管了卡拉米塞尔这个一度戒备森严和高度机密的工作大院。海军安全大队通知留下来的几名美国人说：“自即日起，‘工作’大院不再是‘限制’区。不再凭安全工作证进入大院和在院内走动，未经审查的人贝也勿须有人陪送。”

1978 年，华盛顿取消了武器禁运，卡拉米塞尔和其他侦听站看来又回到了美国侦听人员的手中。不过，代价是土耳其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截收到的通信机密。1980 年 3 月 29 日签订的公开的国防与经济合作协定，附有一项秘密“ 补充协议 ”，其中第二条的部分内容如下：“ 由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的情报搜集设施搜集到的一切情报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均将根据两国政府技术主管当局共同作出安排，由两国政府井同使用。 ”

和日本一样，德国也从侦收对象变成了侦收“ 窗口 ”——美国监听苏联欧洲地区和东欧集团国家的出色基地。在靠近北海的威悉河港口城市不来梅（曾是德国的一个主要海军基地），海军安全大队开始架设天线和戴上耳机。与此同时，陆军安全局将信号情报设备运到了法兰克福、奥格斯堡和加卜根，空军则在茨魏布吕肯和茵——美国空军基地建立了信号情报站，并在柏林和达姆施塔特从事通信保密活动。

50 年代中期，国家安全局极为机密的“ 侦收站布局计划 ”要求在全世界建立 4120 个昼夜值班的侦收站。该计划是国家安全局“ 平时通信情报无线电侦收要求 ”的一个组成部分。在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计划中的数字不断增大。到 1965 年 9 月，仅陆军安全局就有 26233 人分布在全球 99 个独立单位中。1969 年（越南战争高峰期），侦收站数量达到了顶点。

第三节恶梦中的一座令人胆战心惊的监狱

最简单他说，一个侦收站不过就是一部无线电接收机——一部极其先进和极端灵敏的无线电接收机，但终究还是接收机。侦收站可以是一辆陆军有篷卡车，也可以是由几副伍伦韦伯天线组成的侦收岗，每副天线占据的面积都有三个足球场连起来那么大。

海军安全大队在苏格兰埃德齐尔开设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伍伦韦伯式大型侦收站。该站建于 1960 年 7 月，当时只有一名美国海军军官和 8 名密码技士。后来，该站迅速发展，到 1976 年 8 月已拥有大约 1500 名军人及家属。该站位于苏格兰东部的金卡丁郡，占地 490 英亩，周围是起伏不平的农田、茂密的树林和顶上长满植物的山丘。它以大约 3 英里之外的埃德齐尔村命名。

在绿油油的沃野上，没有几样东西高过西红柿秧，对比之下，庞大的伍伦韦伯天线非常突出。乍一看去，这片无线好像不是卡夫卡式恶梦中的一座令人胆战心惊的监狱，就是美国最新科学幻想惊险小说中描绘的那种天线。

实际上，这些天线更像是 20 世纪的石柱。伍伦韦伯天线占地四十英亩，包括一个箱形的二层水泥工作楼，四周架设着天线杆和金属线，构成四个同心圆，直径几乎为 1000 英尺，高度从 8 英尺到 100 英尺以上。

这种天线系统亦称环形天线阵，旨在探测和截收从低频段（如潜艇通信）到高频段（如无线电话）的各种信号。由于采用了全向设计，这种系统能够从空中拾取任何方向的信号。

最外面的那个同心圆高度最低，为最高频段天线阵。其直径约为 875 英尺，由 120 个等距排列的“ 线单元 ”（每个单元像一根垂直的粗水管，顶上伸出天线杆）组成，方位角每隔三度就有一个天线单元。往里是高一些的第二个同心圆，即高频段反射屏，由从固定在天线杆顶的水平张线上悬挂下来的垂直无线组成。它的作用是屏蔽高频段夭线，防止来自其他方向的信号干扰。

第三个同心圆更高，为低频段接收无线阵，包括 40 根等距排列的“ 折叠式单极天线 ”，类似于第一个同心圆的“ 套管式单极天线 ”。最里面的同心圆是庞大的低频段反射屏，看起来像一个由十层楼高的电线杆组成的大圆圈，在这些电线杆之间还有从顶端垂下的细铜线。

为了探测发射源，每个天线单元都与＝根地下同轴电缆相连，通到天线阵中央的工作楼。由于每根电缆的长度相等，因此，可以使用测向器测定哪个接收单元最先收到了输入信号，从而查明信号来自哪个方向，因为信号触及的第一个接收单元必然距发射台最近。

然而，上述程序只能使侦收员大致了解目标发射台的位置，因为信号的传播路线上极可能有众多的发射台。因此，为了精确测定目标的位置，位于大片区域内的许多伍伦韦伯式侦收站均串连在一起，构成一个高频测向岗（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称之为 HFD 或 HJFFDUFF）。高频测向岗中的侦收站同时测定同一信号的方向，各方向线的交会点就是目标的位置。海军为其高频测向活动起了一个恰如其份的代号——“ 靶心 ”。

华盛顿市以南 30 英里的弗吉尼亚州福基尔县，提供了一个避开首都的钢筋水泥建筑物、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犯罪行为的世外桃源。在迂回曲折的公路上，四个轮子的“ 野马 ”牌汽车必须与四条腿的种马和平共处；购买土地论的是英亩而不是平方英尺。广阔的原野上点缀着一座座小农舍，构成一幅美

妙的图画，湿润的沃土上生长着玉米和大豆，在沃伦顿以东十英里处的一块与世隔绝的 720 英亩的土地上还“长着”无线。

自 1942 年以来，文特山农场一直以“栽培”无线为业。虽然花销很大，但是菱形无线、对数周期天线、宽频带无线和单极无线生产出了美国东部一些最上等的信号情报。每天都有数千名身着绿色咔叽服的男女在收获“庄稼”，用昂贵的机器进行加工，然后送往马里兰州南部的主顾，这位主顾对该农场的产品一概全数照收。

四十年来，文特山农场及其位于西海岸的姐妹站（设在旧金山以北的国科罗克牧场），一直是陆军安全局设在美国本上的主要侦收站。文待山的侦收目标可能包括华盛顿使馆区——驱车向北只需 45 分钟即可到达——和往返不停的大量美国国际电信。文特山一名前雇员在众议院关于政府情报与个人权利的政府工作小组委员会秘密作证时证实，在对使馆的监听中，显然连英国也未被放过。他揭露说：“我们有大量的机器。我是一个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的唯一工作就是阅读和处理截获的英国通信。”

如果说文特山是华盛顿的顺风耳的话，那么鼓膜就是被称为菱形无线阵的夭线系统。这种系统不同于庞大的伍伦韦伯天线，其微妙之处就在于菱形。每副天线都由一根架在呈菱形排列的四根天线杆上的金属线组成，距地面几英尺高，每边的边长约 10 英尺，金属线的一端与一根同轴电缆相连，从地下通往位于中央的工作楼。整个天线阵由分散在几百英亩面积上的三 30 至 40 副菱形天线组成。

像鱼网一样的伍伦韦伯环形天线旨在拾取任何方向的信号，像箭头一样的菱形天线则旨在对方向性很强的特定通信线路进行侦收活动。科德曼准将曾任陆军安全局局长，并且是电信侦收活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回忆说：“我们是针对特定的通信线路架设无线的。若想监控某个特定的通信线路，就首先找出……何种定向天线在理论上效果最佳，然后再架设符合要求的天线。”

由于架高了菱形天线阵，坐在工作楼里的侦听员可以不间断地监听十几条特定的通信线路，诸如一天 24 小时监听长途高频电话波道。此外，天线阵不必位于两个通信台之间的直线上。只要一副菱形夭线对准一个台、另一副菱形天线对准另一个台就行了。科德曼说：“比如，若一方面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另一方是柏林，那么，就朝南架设一副对准里约热内卢的天线，朝东架设一副对准柏林的无线。”

然而，不管是菱形天线还是伍伦韦伯天线，是定向天线还是全向天线，作业中心都设在没有窗户的水泥箱式工作楼内，侦收站就像一个突变种，只有一只耳朵和一个大脑，中间由同轴听神经相连。

以上湬谷海军安全大队侦听站为例，侦听站的业务部门分为四个处：

搜集处：由莫尔斯电码抄报员和话务（如电话）侦听员组成。

整理与上报处：由密码砂译人员和分析人员组成，分为地面、气象、船舶、数据处理和搜集管理等科。

高频测向（即“靶心”）处：实施测向活动，并设有一个网路控制科。

通信保密处：监听美国的军事通信，以保证遵守通信保密条例。

伊斯坦布尔东南的卡拉米塞尔大型空、海军联合侦收站，大概也采用同样的体制。据一名前分析人员称，在这座侦收站里，约有 25 名抄报员和 5 名话务侦听员监视苏联的战术航空兵和远程航空兵。这些情报搜集专业人员坐在各自的接收机前，首先在最新的报务分析技术摘录上查找受领的目标。

报务分析技术摘录是用电子计算机整理出来的从世界上几乎所有通信设施搜集来的最新情报汇编，由国家安全局出版，被称为信号情报界的圣经。它可为侦收员提供一些重要情报，如各发射台的通联方式、通联内容和通联对象。接着，他们仔细查看列有大概地点、频率和呼号的清单。最后，他们伸手握住频率刻度盘，拨向各自的目标。

列在目标清单前面的有苏联海军航空兵通信网（苏联用该系统跟踪自己的军用飞机）和民航通信（即苏联大量民用机场航管中心接收和发出的无线电报）。从上述侦收活动中获取的情报，要与截获的苏联飞机的空对地通信，以及经常被执行“ 挑衅回】汽 R 回性 ”任务的美机触发的防空雷达信号进行印证。

为了协助侦听员，高频测向处人员也忙于跟踪苏联飞机，他们与其他网站合作进行三角定位。

隔几张桌子远，其他信号情报专业人员在密切监视苏联潜艇的活动，希望在潜艇把超缩电丈发回基地时捕捉到极为短暂的猝发信号。庞大的落地式录音机录下淬发信号之后，即慢放磁带，对信号进行还原、分析，也许还破译。

卡拉米塞尔站信号侦收员的另一个优先目标是苏联的空间计划。1967 年 4 月 23 日，几名分析人员照例记录着“ 联盟 1 号 ”载人飞船的情况，这艘苏联宇宙飞船在空间逗 26 小时后，正载着宇航员卡马罗夫返回地面，即将进入大气层时却突然发生了故障。一名侦收员回忆道：

> 他们无法打开重返大气层后减慢飞船速度的降落伞。他们查明故障差不多已有两个小时了……正在竭力排除。当然，讲的全是饿语，但我们录了音，后来又听过几遍。柯西金亲自出马，通过电视电话同宇航员交谈。柯西金哭了。他对宇航员说，他是英雄，取得了苏联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他为他感到骄傲，人们将永远怀念他。宇航员的妻子也通了话。他们谈了一会儿。他告诉她如何处理家务以及孩子们怎么办。情况相当吓人。到最后几分钟，他的神经开始崩溃了。他说：“ 我不想死，你们必须想想办法。 ”尔后，仅仅传来他临几时的一声尖叫。我想，他被烧成灰了。

像任何一个有大量分支机构分散在各地的庞大组织一样，安全局必须处理一些令人烦恼不已的问题：重复劳动、军种间竞争和通信中断。为有助于解决体制上的一些弊病和统一协调位于穷乡僻壤的各侦听站的活动，国家安全局建立了一套地区分局、地区办公室和侦收处理与分析联合中心。

太平洋分局——即国家安全局太平洋总部——设在夏威夷。1965 年 6 月 1 日，正当越南战争越来越富有爆炸性之际，为国家安全局太平洋业务组——该局太平洋指挥所——的开张举行了剪彩仪式。它设在珍珠港以北史密斯兵营太平洋美军总部指挥中心内，负责协调太平洋地区所有的信号情报活动。在越南战争最为激烈的 1968 年 6 月至 1971 年 6 月，太平洋分局局长是前国家安全局负责全国密码参谋部的助理局长舒尔茨海军少将。

国家安全局太平洋总部下辖若干地区办公室，如驻太平洋总部代表办公室，代表一度是罗德雷克，他后来在 70 年代末担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另一个是驻台湾代表办公室。最重要的办公室之一是驻日本代表办公室，设在重兵防守的渊边兵营。渊边兵营在东京以西十几英里处，占地 592 英亩。

国家安全局除地区办公室外，在冲绳还设有一个庞大的、非常秘密的密

码破译与分析中心。出于对三军信号情报机构可能重复劳动的关切，1957 年 1 月，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便研究如何提高国家信号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和节省人力物力。一年后，该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包括在冲绳的宗兵卫建立一个统一的三军处理中心。宗兵卫联合处理中心由国家安全局、陆军安全局、海军安全大队和空军安全局配备人员，1961 年正式投入工作。该设施使得各信号情报机构可以共同使用昂贵的电子计算机进行通信分析，以及进行其他支援太平洋战区司令官的密码活动。

几年后建立了一个同样的设施，以协调美国在整个欧洲的信号情报活动。它设在西德法兰克福 I·G·法尔本大楼内，占据了 2.1 万平方英尺的面积，与国家安全局欧洲分局共用这座大楼。法兰克福联合作战支援中心的建立，使国家安全局得以关闭了茨魏布吕肯侦听站。

国家安全局设在夏威夷库尼亚的一座秘密地下设施，拟改建成第三个三军联合处理中心，改建费达 200 多万美元。冲绳完全交由日本控制后，它可以取代宗兵卫联合处理中心。

建立上述联合中心是出于一个由来已久的信念：密码破译和其他处理工作应当在能够达到所需速度的最靠前的地点进行。侦收后，可在 24 小时内有效处理密电，由侦收站（如上懒谷海军侦收站）负责处理；可在 48 小时内处理的难度较大的密电，交由联合处理中心（如宗兵卫联合处理中心）处理；其余的则交米德堡局本部处理。

在 50 年代迅速发展时期建立的所有侦收站中,抱负最大而又失败得最惨的是设在西弗吉尼亚州偏僻的休格格罗夫地区阿勒尼洼地（当地人口只有 42 人）的侦收站。休格格罗夫深藏在彭德尔顿县南福克山谷的丛山密林之中，位于美国最奇特自然保护区之一的心脏地带。这个自然保护区不是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或者保护遭到破坏的风景区，而是为了保持某种遭到更大危害的东西——安静。

1956 年 8 月 9 日，西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射电天文学分区法，根据这项法律，设立了一个一 100 平方英里的国家无线电静噪区，以避开比较都市化的地区常见的大量电磁干扰。离得最近的稍具规模的城市是哈里森堡，人口约有 1.7 万人，它与休格格罗夫隔着几道山梁，从而避免了任何干扰。这里没有高功率无线电台或电视台，在崎岖不平地面上只有几条纵横交锗的输电线。这里的天空也没有商业班机光顾，从而消除了雷达信号的干扰。甚至重型卡车和公共汽车也被禁止通行；这使得车辆只能在山背面的谢南多亚河谷中行驶。

在国家安全局、海军安全大队和海军研究实验室的一小批官员看来，这个不受天线干扰的禁区似乎完全适于使一个时至今日也会令人挠头的理论变成现实。在休格格罗夫的树林内，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侦听站。

几年来，国家安全局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反复琢磨着这个主意，在办公室里长长的绿色书写板上列下一组组方程和公式。他们设想，假如能够建造一个足够大的电子望远镜，那就可以把月球变成一种信号情报中继站，监听由月球表面反射的苏联通信和雷达信号。

到 1959 年，安全局和海军技术研究局已经向不少因对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1 号”成功耿耿于怀而发狂的国会议员兜售了这一主张，因而获得了一笔 6000 万美元的巨额拨款。然而，一年之后，他们连基础尚未打好就又申请追加拨款近 1800 万美元。

几乎从一开始，超支的费用就与这项工程本身一样令人咋舌。在那里建造的是一种空前庞大的可转动结构。用 3 万吨钢材焊成了一个 66 层楼高、直径达 600 英尺的盘状物——宽得足以容纳两个足球场。这个巨大的“耳朵”安装在巨型转动装置上，能够上下左右转动和沿 1500 英尺长的轨道作 360”旋转，以便对准地平线上方的任何一点。

用一名工程师的话说，这项工程需要进行的数学计算量“几乎不可思议”。由于在同一个地点上必须连接的部件多达 13 个，因此需要同时计算出 92 个不同的公式。要进行这种计算，连当时最大的商用电子计算机也很吃力。

尽管有一台国际商业机构公司制造的 704 型电子计算机为设计规格计算了半年以上，但到 1961 年，工程的进展仍未超过安装旋轨道和枢轴轴承。所以，工程师们再次来到国会伸手要钱。这时，国会开始认识到过分相信了月球侦听站一说，于是为这项工程规定了 1.35 亿美元的限额。仅仅几个月之后，据海军估计，这笔钱还不能满足需要，尚缺大约六 6500 万美元。

从 1962 年夏，休格格罗夫已经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而政府开始进一步审查这项工程。总统科学顾问威斯纳在给肯尼迪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他接触此项工程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他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都认为“从情报角度来看，这是一项油水不大的工程”。这位未来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院长告诉肯尼迪，他预计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很快就会取消这个项目。他表示同意麦克纳马拉即将采取的行动。他说：“鉴于这项工程的糟糕历史，我认为此举是恰当的。”

最后认定，休格格罗夫是取代马里兰州切尔腾汉海军无线电站的理想设施，据认为，这个无线电静噪区将为海军的接收天线提供一个出色的架设地点，这些天线可用地下电缆与留在切尔腾汉的发射站相连。1969 年 5 月 10 日，上述变更获得了批准。

自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兴建以来，休格格罗夫就一直笼罩在密雾之中。在这项工程的整个施工期间一直放风说，这个直径 600 英尺的抛物面天线纯粹是为了进行研究工作和从事射电天文学方面的活动，使科学家能够（用当地报纸的话说）“接收远至 80 亿光年以外的无线电信号”。时机的选择是适当的，因为洛弗尔爵士上一年刚刚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射电望远镜，即设在焦德雷尔班克的庞大的马克—1 型射电望远镜（天线直径 250 英尺）。

即使在那个庞大的钢制“耳朵”接到死亡通知书 20 年后，遮住这项工程的保密帷幕依然捂得严严实实，因为休格格罗夫仍是国家安全局最重要、最秘密的侦听站之一。

在海军作战档案中的一个非保密卷宗内发现一系列表明上述天线最初就准备用于侦听的文件后，国家安全局立即调回了这些材料，盖上“机密”印章。作为理由，该局援引了通信情报法（美国法典第十八章第七九八节）、允许国家安全局不透露其活动和人员情况的法律（第八六一三六号公法）以及保护情报来源和手段的法律（美国法典第五十章第四〇三节［d］［3］）。

海军档案中的文件表明，在最初的“巨耳”被放弃和该地改建为海军接收设施之后，海军研究实验室（即最初协助国家安全局计划和建造巨型天线的机构）继续掌管着这个站——该站当时拥有一对庞大而奇特的伍伦韦伯无线。更重要的是，海军研究实验室还在继续使用一副直径 60 英尺的微波接收天线，这副天线是作为“巨耳”的原型而于 1957 年建造的。

1975 年 7 月 1 日，海军安全大队从海军研究实验室手中正式接管了一幢两层地下工作楼。现已加了密级的那些文件表明，从那时以后，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官员经常出入这个独院。例如，1978 年 3 月 23 日，副局长巴夫汉率一个小组视察了地下工作楼，计划在这里搞一项高度机密的新工程。当年 5 月、9 月和 10 月，其他的小组接踵而至。

在 1979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秘密访问一直不断。9 月 11 日，国家安全局负责计划与经费的助理局长埃斯特斯空军少将率领一个小组视察新工程的施工情况。两个月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总法律顾问迈克尔·J·奥尼尔对该设施进行了一次极不寻常的访问。

在休格格罗夫附近隐蔽的树林中，正悄悄地修建一个蔚为壮观的卫星微波接收天线阵。这些抛物面天线大小各异，直径有的只有 30 英尺，最大的则有 150 英尺（这是当时所建最大的天线之一，修建这个庞然大物时部分地使用了“巨耳”工程留下来的材料）。另外，还增添了一栋名叫“雷蒙”的白色建筑物，以海军安全大队在以色列海军用鱼雷攻击美舰“自由号”（国家安全局的一艘信号情报船）时牺牲的一位军士长命名。

是安全局发现了一种比较经济的从西弗吉尼亚的树林中监听苏联人的新方法呢，还是它的目标比较靠近本土？看一看国家安全局访问休格格罗夫的那些要人之一的官衔，就可能找到答案。他的头衔是 G 组组长，该组负责监听发至和发自美国的一切电信。不过，在这些访问者中从来找不到 A 组组长（苏联问题专家），也找不到其他组的组长。

这还不是说明休格格罗夫真正使命的唯一证据。

在离休格格罗夫不到 60 英里的西弗吉尼亚州埃塔姆,还有三个为森林所环抱的庞大的抛物面天线。然而，与休格格罗夫相比，这些卫星无线毫无秘密可言。它们属于通信卫星公司，美国每天的国际商业卫星通信一半以上由它们处理。

在埃塔姆，三个直径分别为 62 尺、97 英尺和 105 英尺的抛物面天线，以光速接收和发出发自或发往全球 134 个国家的成千上万的电话、电报和用户电报。在埃塔姆的 4943 条半电路中的许多电路上，电子计算机以每分钟 7 万个字的速度与其他电子计划机交换着信息。四个地面站（除埃塔姆外，缅因州安多弗有一个姐妹站，西海岸有两个站）几乎控制了来往美国的除政府通信以外的全部国际卫星通信。

在休格格罗夫以北 5 英里外的秘密地点，国家安全局的抛物面天线应能拾取发往埃塔姆的每一个信息，以及它对外发射的每一个脉冲信号。据埃塔姆站——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面站——站长沃伦称，截收通信卫星信号只需一个同样大小的卫星天线。他说：“当然，窍门是把直径 105 英尺的抛物面天线隐藏起来。”

事实上，国家安全局正是这样做的。1980 年初，建成了一个直径 105 英尺、闪闪发光的白色抛物面天线，补充原先的 150 英尺、60 英尺和 30 英尺抛物面天线。然而，尽管体积庞大，这个大概是国家安全局国内主要监听装置的天线却隐蔽得极其出色。从大约一英里外那亲人迹稀少的公路上望去，连天线的一点影子也看不见。只有驱车沿着有人守卫的通往该站的政府专用公路走下去，才能看见天线的凹部。甚至连飞机也被禁止飞越这一地区。

从技术上讲，这项活动对安全局说来易如反掌。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作出结论说：“截收微波信号相当容易，因为微波站的技术参

数（即微波站的位置、频率、方位角等等）和有关的多路传输设备的情况都是公开材料。”该报告指出，只要有“适当的技术知识和资金”就行。这对美国间谍机构中最富有的国家安全局说来一点也不成问题，它吹嘘说：“本局的使命要求我们的专业人员力争保持比局外领先 5 年的技术水平。”此外，人们很难找到比贝克“技术知识”更渊博的人。贝克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所的主任，同时也是极其秘密的国家安全局科学顾问委贝会的成员——也许是最重要的成员，毕竟主要是贝克领导下的实验所研制和完善了国家安全局希望予以截收的这个系统。该局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前负责人库尔贝克博士说：“实际截收微波通信从来不成问题。”他说，问题在于研制一种能够记录大量信息的系统。

最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进一步说，“除非发现了……接收无线”，否则无法发现对微波通信的窃听活动。这份报告还指出了截收国际微波通信的可能位置。理想的地点为商用地面终端站附近，但是要有一个直径大约为 30 英尺的天线，即休格格罗夫最小的抛物面天线那么大。

既然通信卫星公司的埃塔姆地面站只是进入美国本土的四个卫星通信“门户”之一（最大的一个），那么，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测，国家安全局也会试图监视另外三个地面终端站。

例如海军安全大队设在缅因州温特港的设施（位于阿卡迪亚国家公园深处，距邦格 60 英里）就很可能作为一个出色的平台，截收通信卫星公司安多弗地面站——在西面 121 英里处——的来往信号。

在西海岸，通信卫星公司的北部地面站设在布鲁斯特，位于华盛顿州中北部西雅图与斯波坎之间的哥伦比亚河畔。70 年代初，国家安全局令人奇怪地在南面 100 英里远的亚基马陆军射击中心（占地 26 万多英亩）内开设了一个非常秘密的设施。这个造价为 356.4 万美元的设施如此机密，连国家安全局内部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存在。当地居民也没有注意到这个设施。在亚基马市，商会和当地的《亚基马先驱报》主编吉姆·麦克尼基从未听说过这个设施或其公开名称——亚基马研究站。只有在邮局，这个研究站才为人所知。一名邮局雇员说：“他们那里真是个机密透顶的地方。他们亲自把邮件送来，亲自打包——甚至不让自己的邮件与射击中心的其他邮件一块儿寄送。他们住在射击中心，但是显然自成一体。说真的，除了知道他们在那里之外，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有一个人却对他们了如指掌，他就是国家安全局该站站长兰德。在被问到他的研究站隶属于哪个单位时，他回答说这是“秘密”，该站从事的是“秘密研究工作”。然而，经过一番旁敲侧击之后，兰德终于承认研究站实际上隶属于国家安全局，但补充说：“我不习惯于像这样当众对着麦克风谈话。这件事不是你们可以乱讲的，尤其不能到外边乱讲。”

通信卫星公司的第四个地面站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白詹姆斯堡——加利福尼亚州中部蒙特里地区洛斯备斯国家森林边缘的一个小村庄。国家安全局可能的窃听地点是北面 130 英里的双石牧场陆军安全局侦听站。

但是，如果恰好通过海底电缆发电报，那怎么办呢？乍一看，这似乎使侦收过程复杂化了，因为有六条横穿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而且窃听电缆的技术要求比从空中拾取信号高得多。窃听者必须用潜艇铺设一条与商用电缆平行的长电缆，然后利用感应现象拾取信号。然而，在试图把情报发回国家安全局或莫斯科（这须视谁是窃听者而定）时，真正的难题就来了。

电信专家、国防通信局首席出庭律师麦克弗森在联邦通信委员会作证时曾讲到了这个问题：

> 侦收电缆通信需要直接接触电缆。这比接收卫星通信要困难得多。侦收电缆通信还需要保养侦收装置。这就是说，不管是谁侦收电缆通信，都必须装置，以进行侦收活动的手段。这也是在侦收卫星通信时不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不需要到空中去安袭某种设备进行侦收活动。
>
> 第三，窃听电缆（特别是窃听海底电缆）时，假使达到了头两项要求，还必须把它发回某个侦收站。
>
> 这在侦收卫星通信时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只要有适当的设备，那么就可以在你的后院、一条船上或任何可以接近卫星通信线路的地方非常方便地进行侦听。
>
> 发现电缆设施被窃听也要容易得多，这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而要发现卫星通信被窃听，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
>
> 最后的结论是，与侦收卫星通信相比，侦收电缆通信的风险要大得多，而对人们的吸引力却小得多。

尽管如此，电缆也有致命的弱点。大西洋海底有六条电缆，但是，从加拿大新斯科舍伸出的 TAT（横穿大西洋电话电缆）1 号电缆只有 165 条线路，因此于 1978 年停止使用。从新泽西州塔克顿通往英国和法国的 TAT3 号和 4 号电缆也只有很小的容量（350 个话频通道），它们处理的通信量只占电缆通信总量的百分这六点五多一点。担负横穿大西洋海底通信总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 TAT5 号和 6 号电缆，共有 4845 条线路。来自欧

洲大部分地区乃至中东的通信均在西班牙输入 TAT5 号以及在法国输入 TAT6 号电缆，经过 3400 英里的海底传送，到达罗德岛州格林山的一座建筑物内。这座建筑物位于地下，几乎有三层楼那么深，四周是 5 英尺厚的钢筋水泥，还有一个 10 吨重的密封门，能抗高达每平方英寸 25 磅的压力。

在电缆的这一端，多路通信原为单路通信，而且大部分转换成微波，通过发射塔上的一个严加保护的装置发往 30 英里以外的蒙特维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长途中继站。就在这短短的一毫秒的传输过程中，这些通信与来往于埃塔姆的信号一样易被截收。

格林山未以微波发射出的其他通信,则经地下电缆输往 70 英里以外的切希尔。在那里，大部分通信进入陆上微波网。

由于在通信卫星公司地面站附近建立了四个作战略配置的卫星天线场，以及在各电缆终端站附近的屋顶或不起眼的塔楼旁安装了一些普通的喇叭形微波接收天线，因此，国家安全局应能不间断地监听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收到或打出的几乎每一个国际电话或电报。这样的能力只有奥韦尔才能想得出来，胡佛连做梦也不会想到。

国际通信网的入口有限，所以对其进行监听大概总比监听庞杂的国内通信网容易一些。但是，随着微波的应用在美国全境日益扩大以及陆线的相应减少，上述差距正在逐步消失。另外，国内卫星系统的飞速发展最终可能会使监听国内通信的活动达到几乎无法想象的规模。1981 年，通信卫星公司将第四颗供本国使用的“通信星”式卫星送入轨道，租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样，通信卫星公司七个“通信星”地面站同时受理的国内通话，就可达到

5.4 万个。

应福特政府的要求，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研究与工程公司曾不声不响地出版了一份令人惊奇的实用手册。这份手册生动他说明了截收国内微波通信不费吹灰之力：

（4.2.1）截收微波无线电信号

一种可用于截收无线电线路上通话内容的方法如下：

1.查明有关线路上的各微波接力站的位置。

2.在沿线租借一座小农场，该地位置应与线路上的辐射能保持视线距离。

3.安装无线电侦收设备，包括一个足够大的天线……置于谷仓年，以免被人发现。

4.让同伙利用微波线路呼叫，输入示踪信号。

5.对各微波波道进行扫描，以寻找示踪信号。

6.不论是否找到了示踪信号，均从农场打电话告诉同伙（为此，同伙必须另备一部电话），让他停止原先的呼叫，并且进行带有示踪信号的新呼叫。

7.开始对已经找到示踪信号的那些波道进行监听。

8.继续搜索中继线路，直到大致查明中继线群在微波线路中的位置。

9.停止进行示踪呼叫，继续监听线路，以获取想要的情报。

10.为带有频帝年信号脱密装置的微型电子计算机编制程序,使之自动对有关的中继线群进行扫描。不管列为监听对象的两部电话中的哪一部被拔动，扫描装置都会发出信号提请侦听员监听，或者自动打开录音机，录下通话内容。

11.通话录音既可以就地进行分析，以便搜集所需的通信内容，也可以送往情报整编机构。

第四节你们的罪证就在这儿

在城市的屋顶和山野之中，锥形灰色小微波天线比比皆是，就像春天的藏红花那样让人熟视无睹。然而，正是这些倒陀螺形、茶盘形和羊角形天线组成的通信网，使电信系统从有线通信过渡到了微波通信。

这些夭线间隔 25 至 30 英里，互相保持视线距离。加上新型单边带设备，每副无线都能发射、接收和中转多达 6.18 万个同时电话。绝大多数长途电话通信都是通过这个像电子网一样覆盖着全国的宽频带微波系统进行的。

不过，由于这个通信网过于庞大，变化甚多，国家安全局的国内监听可能仅限于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外国外交通信。隐藏在该局九层总部大搂和友谊附属区七层大楼（友谊附属区三号楼）顶上白色高尔夫球状无线罩内的大型微波接收机，就可以完成此项监听任务，因为这两幢楼的位置很理想，正好处在上述微波线路上。

不过，有些人则认为国家安全局对国内微波通信进行的窃听更广泛，不只是窃听华盛顿与纽约之间的外国外交通信。戴维 · 沃斯特是一名电信工程师，一度在中央情报局通信研究与发展部门工作，他拿出一张大华盛顿地区微波线路图，用食指点了一下一个有几条线画入其内并且注有 RCV（只进行接收的站）三个字母的小圆圈。圆圈紧下方还有三个字母 :NSA（国家安全局）。沃斯特又点了一下说：“ 你们的罪证就在这儿。 ”

事实上，这个圆圈是一个庞大的微波天线塔，上面有九副圆锥形天线，对准五个方向。天线塔坐落在米德堡国家安全局业务楼一面几百码的地方。沃特斯说，该塔的可疑之处在于它与当地电话公司的线路相连，而电话公司的线路又与归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所有的全国微波电话系统相连。他指出，虽然这个事实本身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关键在于 RCV 这几个字母，它们代表 ReceivOnlyStation（只进行接收的站）。

沃特斯带着柔和的佐治亚口音说：“ 你从中只能推论出它拥有对极其宽阔的频带进行窃听的能力。如果他们只是接收西部联合公司的电报、用户电报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的话，是不需要拥有目前这么大的只进行接收的能力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正在不间断地对全国的数千条线路进行扫描。 ”

1978 年 2 月 8 日，这位一度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下司属的西部电气公司工作过的电信专家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气象和新闻有线广播部门只需要单向电路，这是可以令人理解的。可是，国家安全局这样做，而且比世界各新闻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等等）总电路容量多出几千倍，这就令人费解了，除非认为这些单向电路都是遥感窃听线路！ ”

沃特斯告诉参议员们，国家安全局“ 对国内多路电信干线进行宽频带窃听 ”的另一个迹象，是它提出修改窃听法，使其不需批准即可进行“ 以测定设备的能力为唯一目的 ”的窃听，而测试的时间则限制在……90 ”。他接着警告说：

说得明白一点，需要 90 天时间进行调试的只有一种窃听设备或系统，这就是宽频带电子窃听设备，即对微波干线进行全面搜索，进行真空吸尘器式的搜集情报的活动。我是依据我在电子情报界伪实际经伤和 25 年以上的电信经验作出这个判断的。一般的单线窃听只需要五分钟的调试时间。

虽然某些微波调试可能是由国家安全局研究与发展部门的工程师在友谊

附属区顶上有白色高尔夫球状大型天线罩的办公楼内完成的，但大部分调试显然是在切萨皮克湾肯特岛蚊子成群的沼泽地中极其秘密地进行的。

1961 年 1 月，国家安全局利用陆军工程兵作为中间人，与佐治亚州萨凡纳市钻石建筑公司谈判，租借考克斯奈克路路边 210 英亩的地皮，租期五年，年租 4500 美元。四年之后，国家安全局于 1965 年 2 月 24 日行命在租期内买地的所有权，用 48500 美元买下了这块地皮。

国家安全局把该地视为“ 秘密设施 ”，其中有一栋没有窗户的白色单层房子——国家安全局传播研究试验室，里面有价值 25 万至 35 万美元的自动设备。那里还有一座用煤渣砖盖成的白色小控制楼，四周圈着缠有铁丝网的金属栅栏。控制楼附近有许多奇怪的无线。一副是样子笨拙的无线电测向天线———种庞大的、可以转动的矩形无线，坐落在大单层控制室（带有空调设备和窗户）的屋顶上。另一副看来是卫星发射天线，架在二层平台上。其他的天线有：一个白色的圆形天线罩，距地面有十几英尺高；一副可旋转的高频宽频带对数周期无线，位于七层楼高的塔台上，底座上有一个小盘状微波抛物面反射体；一副低频长线天线；许多架在高达 60 英尺的电线杆上的高频无线。最后，栅栏内的地面上似乎有一些喇叭状微波天线，在另外一个七层塔台上还有一副喇叭状天线。

在安全局的研究与工程部门内，该地被称为肯特岛研究设施。国家安全局前副局长托德拉在参议院某小组委员会秘密作证时，解释了这个设施的用途。托德拉说，该局建立这个设施是“ 为了研究和鉴定甚高频和微波通信系统。这些系统是该局为执行任务所特有的。用于进行这种研究与鉴定的地区必须射电噪音干扰少。这些系统采用的天线要求地势开阔，没有障碍物。在肯特岛占用的土地（210 英亩），足以同时进行若干项目的试验与研制工作而互不妨碍 ”。托德拉另一次讲得更为具体：“ 我们在肯特岛探索不规则传播效应，以及其他与侦收工作有关的特殊问题。 ”

虽然这个设施在很大程度上完全自动化，不需要人操作，但是派驻了一名工程师乔治，他是一位魁梧的岛民。在被问到有多少人在那里工作时，乔治说：“ 头头也是我，工作人员也是我，总共只有一个人。 ”然而，关于这个设施归谁所有，他只说它是国防部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无可奉告 ”。

最后，当托德拉被问到国家安全局为什么选中这块与世隔绝的地方时，他的回答使某个恶意批评该局的人可能认为是典型的因漫不经心而说漏了嘴。他说：“ 这里恰巧是适于我们开展工作的理想之地，即地势很低而且多沼泽。 ”

第五节苏美关系史上最严重的事件

“我是 201，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栅栏。”

米格机驾驶员在苏联亚美尼亚山区三万 32000 英尺的高空看见了土耳其边界。几分钟之前，苏联的雷达发现一架国籍不明的入侵飞机从土耳其东部越过“栅栏”朝东南方面飞去。201 号和其他四架歼击机从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附近的基地紧急起飞，去迎接不受欢迎的来客。

201 号看了一眼下方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云量，通过无线电报告基地：“南面有两三个云量。”几秒钟过后，582 号米格机发现了目标。他报告带队长机 201：“发现目标，一个大家伙。像你说的一样，高度 100（1 万米）。”

与此同时，201 号也发现了外形笨重、装有四台发动机的螺旋桨飞机。他毫不迟疑地下达了“攻击”命令，并率先开火。

218 号米格机驾驶员也发现了这个无武装的目标，但是可能因为从未击落过一架真飞机，所以迟迟没有射击。为此，201 号再次用无线电大声下达命令：“攻击，攻击，218，攻击。”

那位非法侵入别国领空的飞机驾驶员知道，他挽救自己及机上乘员生命的唯一途径是越过边界返回土耳其。这里距边界不到几十英里，可是飞机的时速只有 180 英里，后面还有五架米格机攻击，他需要创造奇迹才能逃命。

“目标速度 3009 公里，我正在追击，它转向栅栏。”不会出现奇迹了。

“目标起火。”

“命中目标。”

“目标倾斜。”

“它正向栅栏飞去……”

“开火……”

“218，攻击了吗？”

“攻击了，攻击了，我……”

“目标起火……”

“目标尾翼掉落。”

“582，看见我了吗？我在目标前方……”。

“注意！”

“哦？

“注意目标，它跑不了，它已经在坠落。”

“是的，它在坠落，我来于掉它，弟兄们，我来干掉它。”

“目标失去控制，正在坠落。”

“现在目标要坠落了，”

“582，偏右一点。”

“目标翻滚了……”

“目标正在坠落……”

“编队……”

“582，我在监视目标。”

“啊，你瞧，掉下去了。”

“是的……编队，返航。”

1958 年 9 月 2 日下午 2 时许，目标（一架为国家安全局执行任务的美国

EC—130 电子侦察机）在亚美尼亚埃里温西北 35 英里的山中坠毁。

这是苏美关系史上最严重的事件。在苏联列宁纳坎镇乌云密布的天空中，冷战转眼间变得白热化了。

多年来，国家安全局一直使用塞满最新式电子和通信侦收器材的飞机侦察苏联边界。侦察机沿苏联边界飞行，拾取微弱的防空雷达信号、地面通信信号和微波信号。一旦截收到了信号，就转给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

这是搜集所需情报卓有成效的方法，通过填补空白，与陆基截收平台相辅相存。但是，也有一大不利因素：只能侦收开机的雷达信号，一些很重要的雷达只在飞机越境时才开机。为此，飞行员偶尔玩弄“一只狐狸逗引一群猎狗”的危险把戏：径直向边界飞去，引诱雷达开机，并且在最后一刻脱身。飞行员有时也有意无意地侵入苏联领空。

驾驶这架 EC—130 的是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康普顿的斯威斯特拉空军上尉。这架飞机当天早些时候从土耳其阿达纳郊外的一个美国小型机场——因契乐利克——起飞，计划朝东北方向飞到土耳其黑海海滨的一个满是灰尘的城镇——特拉布松。那里有陆军安全局的一个侦听站昼夜不停地监听苏联的通信联络及其他信号。这架电子侦察机飞越特拉布松后，就转向正东，朝苏联边界飞去。然后沿“栅栏”向南飞到靠近伊朗边界的凡湖地区。飞机飞抵凡湖地区后就掉头沿原航线返回阿达纳。这架飞机在沿边界向北返航时侵入了苏联境内。

按照惯例，特拉布松的信号情报人员正在不间断地监听苏联的空中通信。因此，他们在侦听中发现米格机开始攻击他们的同伴时，心中越来越害怕。飞机击落的消息无疑马上通过国家安全局专门的紧急情报通信网报告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但是为了隐瞒这一行动，空军起初将这架飞机列为失踪和情况不明。尽管如此，还是派出了救援飞机沿边界搜索。编造的消息是，这架飞机担负的任务是空军全球无线电波传播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这种消息通常是用来掩饰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活动的。

9 月 12 日，即飞机被击落的十天之后，苏联透露飞机在苏联的亚美尼亚坠毁，六名机组人员显然遇难。但是，没有提及机上的其他 11 名人员，也没有说明飞机是如何坠毁的。

翌日，美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戴维斯向苏联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提供其他 11 名飞行贝的消息以及飞机坠毁的详情。苏联人在复照中指责 EC—130 蓄意侵犯苏联领空，未进一步提供详情。

这使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艾森豪威尔当然知道出了什么事和出事的原因，他甚至可能看过截收到的米格机飞行员的通话。但是，若承认知道内情，这等于告诉苏联和全世界，美国情报部门正对苏联实行不间断的监听。

空军发表了所谓的“调查”详情。经过调查，找到了几个“证“人”。他们看见这架飞机在几架苏联歼击机的逼迫下从土耳其卡尔斯市附近的苏土边界向东飞去。这些证人听见了爆炸声，看见一股浓烟从苏联境内的山后升起。然而，任何听过截收到的飞行员通话的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米格机是在这架电子侦察机侵入苏境很深之后才发现它的。

华盛顿流传着越来越多的猜测：11 名失踪的乘员在飞机坠毁前跳伞了，这些人要么被俘，要么仍在苏联南部某地游荡。

无论这些美国人的命运如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高级官员们确信苏联人知道的情况要比他们所说的多。因此，他们决定冒前所未有的风险：秘密地

向苏联官员透露截收到的米格机驾驶员的通话。

11 月 13 日，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召见了苏联大使缅希科夫和空军武官柯斯丘克少将。墨菲曾专门要求缅希科夫带柯斯丘克一起来。

在回顾了与 EC—130 有关的外交照会来往之后，墨菲告诉苏联大使，美国政府认为，由于苏联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无线电信发射的信号，美国飞行员可能在领航上发生了误差。飞机误入苏联领空后，苏联歼击机“ 不顾国际惯例 ”将其“ 作为敌机 ”击落。

不出所料，缅希科夫大使否认苏联飞机与此事件有牵连。墨菲提议为苏联大使播放截收到的击落 EC—130 飞机的苏联飞行员之间的通话录音。这无疑是国务院历史上最惹人注目、最富有戏剧性的建议之一。不知所措的缅希科夫拒绝听录音，他说，他不可能从技术上对录音进行鉴定。但是，墨菲对此已有所准备，他解释说，正因为如此，才请航空专家柯斯丘克将军参加会见。另外，他告诉缅希科夫，作为苏联驻美国大使，他有责任听这个录音。缅希科夫再次拒绝。于是，墨菲给了他一份录音的俄文稿。

在这两位苏联外交官离开之前，墨菲明确表示，美国决心弄清飞行员失踪的真相。他故弄玄虚地提到美国政府所掌握的“ 证据 ”，指出“ 还有更多的极其重要的情报 ”，并且表示政府打算进一步调查事实真相。

“ 证据 ”是什么？是苏联密码电报的译文或者截收到了的电话通话，还是特工提供的情报？从来没有透露过。然而，美国政府似乎确实有证据认为，这 11 名飞行员在飞机坠毁时没有丧生。

最后，墨菲强调指出，我们的“ 一些 ”人员已经遇难，这个文明的世界有一定的行为准则，因而美国希望并且要求提供失踪人员的消息。

在墨菲办公室里发生的戏剧性插曲没有产生预期的反应。而且不出所料，苏联人对侦听他们的空中通信一事保持缄默。他们很可能是因为感到窘迫而没有吱声。

翌年 1 月，尼克松副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分别会见了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职业外交家米高扬。他们均要求对失踪人员作出说明。尼克松暗示可能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米高扬的答复简明扼要：所有的情况以前都已经提供了。

不可思议的是，国务院显然相信苏联知道飞行员的下落或命运，因此仍不肯罢休。美国对苏联采取的主动行动和作出的主动表示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悄悄地在幕后进行的，并且都遭到了拒绝。现在，国务院决定改变策略，并于 2 月 6 日将事件彻底公布于众。杜勒斯显然不顾国家安全局的劝告，全文发表了截收到的米格机驾驶员攻击美国飞机之前、攻击过程中和攻击之后通话的译文。不过，杜勒斯虽想证明苏联在这次事件中应受谴责，但不准备承认美国飞机担负了间谍任务。因此，杜勒斯既不会透露美国是如何得到录音的，也不会透露政府为什么要等五个月才将此事公布于众。

苏联政府虽然感到意外和吃惊，但是根本不认帐。莫斯科把录音称作“ 虚构的 ”和“ 笨拙的伪造 ”，并且发表声明，指责发表的材料是“ 美国情报部门编造的 ”。

根据失踪人员亲属的要求，艾森豪威尔最后决定直接向赫鲁晓夫呼吁。5 月 4 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汤普森奉白宫的指示，在克里姆林宫私下会见了这位苏联领导人，再次要求提供有关情况。汤普森是否带来了国务院早些时候提到的“ 证据 ”，人们不得而知。人们只知道汤普森离开时两手空空。1962

年 11 月 20 日，官方宣布，失踪人员“可能已经遇难”。

在 9 月初的那个早晨乘飞机会为国家安全局截收信号的那些美国人的命运如何，可能永远是个谜。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局即使知道答案，也不会说。但是，在飞机起飞差不多两年半之后，突然传来了一则奇怪的消息，人们从中可能会得到答案。1961 年 1 月，苏联畅销的《星火》杂志，刊载了民主德国作家施赖埃尔撰写的有关美国谍报活动的连载文章的第二部分。这篇翻译文章原载东柏林《新柏林画报》杂志。施赖埃尔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那架美国飞机，并且指出，在苏联歼击机逼近美国飞机之前，17 名机组人员中的 11 名就跳伞落在苏联领土上了。接着，施赖埃尔补充说：“他们在埃里温郊区被俘。”

苏联政府起先忽略了这篇文章，后来则宣布文章弄错了。但是，事实是，最初刊载的消息具有权威性，因为《星火》杂志是在《真理报》印刷厂印刷的。《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因而发表那篇文章可能是经过批准的。自从发表了施赖埃尔的文章以后，再也没有发表任何有关失踪人员或其命运的消息。

尽管那架 EC—130 飞机被击落了，安全局还是继续派出电子侦察机。1967 年 7 月，一架装有电子监视专用设备的海军麦卡托 P4M 型飞机，在距朝鲜北部海面 38 英里的空中探测信号时，遭到了朝鲜米格机的攻击。

这架双发动机涡轮螺旋桨飞机装有两台辅助喷气发动机，可以突然加速。在那次事件中，这架飞机当时正在 7000 英尺高空执行例行电子情报巡逻任务。突然传来一声大叫：“发现两架掠翼喷气式飞机……正向我们开火！”几秒钟之后，年仅 20 岁的机尾炮手尤金·科德海军军士倒了下去，身上被破片击伤 40 多处。

P4M 是海军的一种反潜飞机。它本来还有其他的自卫武器，装在前炮塔中的一对 20 毫米航炮和装有机身顶部炮塔中的一对 50 毫米航炮，但是为了塞进专用侦察器材和额外的五名操作人员，拆除了这些航炮。

这架飞机的驾驶员迈那海军少校为了摆脱攻击者，从 7000 英尺高空下降到距日本海海面 50 英尺的低空。在飞机下降过程中，北朝鲜的歼击机从后面六次飞过，其中三次开炮射击。迈耶的副驾驶员可以看见歼击机机身上的红五角星。迈那终于驾机返回了日本，只有科德一人负伤。

50 年代初期以来共产党国家飞机和美国飞机之间发生的第三十三次空中冲突事件就这样结束了，美国海军驻日本最高指挥官威辛顿海军少将在飞机返航后说：“在历次要命的攻击中，机组人员安全返航，这还是第一次。”在此之前，美国飞机和共产党国家飞机在远东发生过 11 次类似的冲突。一些空军飞行贝驾机归来，可是遭到攻击的海军飞机则全部损失了。

这场血腥的空中电子战在整个 60 年代继续进行。1969 年春，发生了最严重的事件。那年 4 月 15 日，天刚破晓，30 名海军人员和 1 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日本横滨附近的原木空军基地登上一架装有四台发动机的 EC—121 无武装飞机。他们按照飞行计划，首先往西北方向飞行，飞抵朝鲜北部的舞水端外海某地后，即沿椭圆形航线飞几圈（每圈约 120 英里），从东北（靠近中苏两国边界上）沿海岸朝西南飞行。

在离国家安全局驻日本总部富干延兵营几英里的上濑谷，有一个海军安全大队的重要基地。当飞机上的海军信号情报专家们转动刻度盘搜索频率时，700 英里外的上濑谷基地一直对他们的飞行情况进行监视。

在沿朝鲜北部、中国或苏联远东边界进行侦察飞行之前，均向上濑谷和其他各国信号情报站发出绝密电报，告以飞行时间和航线。然后，各站技术人员在指定的飞行时间开始调机，打开录音机，以便监视目标国家的雷达和防空部队电台的频率。与此同时，参加“靶心行动”的其他人贝将灵敏的高频测向接收机对准发射机，以测定其准确位置。

载有 6 吨侦听器材的 EC—121，从原木飞 1 小时 17 分钟之后发出了一份例行话报。4 小时 43 分钟之后，这架飞机又用打字电报机发出了一份例行电报。下午 1 时 50 分，即起飞不到 7 小时后，飞机从雷达荧光屏上消失了。朝鲜的歼击机在清律的东南大约 90 英里处将其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事件发生后，在日本海进行的每月平均 60 多次的监视飞行当即停止。然而，三天后，尼克松总统下令继续执行侦察飞行任务，并且指示给予充分的保护。

空中信号情报平台除了充当空中侦听站外，往往还用来进行战术测向任务，并被称作空中无线电测向平台。它们在越南战争中曾大显身手，引导炮兵和空军袭击北越地面部队。代号为“美洲狮战斗”的空中无线电测向活动具有典型性。在这种活动中，空军的信号情报人员蜷伏在 EC—47“信天翁”式电子侦察机的腹部,使用价值 400 万美元的电子接收设备搜索 8000 英尺下的丛林，一旦查明某支敌军的位置，就将其坐标发给地面上国家安全局几个重要的直接支援分队中的一个，如波来古分队或芙拜分队。一旦收到坐标，地面人员就把数据连同其他空中、陆上或海上测向站提供的情报输入电子计算机，对目标作三角测量，然后呈送战地指挥官。

一名参加过“美洲狮战斗”的人员回忆说：“根据空中无线电测向数据实施的首次轰炸发生在 1968 年。我们对顺化西南大约 19 公里的地方进行了侦察飞行。我们搜集到的通信内容和进行的通信样式分析表明，在一个直径约 1 英里的狭小地域内集结了相当多的越共部队。艾布拉姆斯将军亲自下令 B—52 实施了在当时的越战中规模最大的袭击。每小时出动一架次，连续出动了 336 个小时，每架次投弹 30 吨。”地区遭到毁灭性破坏，从此被称为“艾布拉姆基地”。

第六节新科技间谍能手——信号情报卫星

广泛使用的电子侦察机有速度缓慢的 EC47、机身短粗的 EC—130 和驼背的 ECV—121。再往上数英里，在深黑色的天空中，空中间谍的超级明星——SR—71 尽情遨游。命运坎坷的 U—2 的后继者 SR—71 因机身乌黑而得名“ 黑鸟 ”，其蒙皮是用抗热钛制作的，当以三点三二马赫的速度掠过天空时，呈现出耀眼的红光。SR—71 的速度快过子弹，马力大于一长列火车头，能以每小时 2000 英里的速度跃过一望无际的大陆。它在 8·5 万多英尺的高空对 10 万平方英里的地球表面进行航空照相侦察，费时不到 1 小时。它可以用特别先进的机载信号情报传感器绘出电子战场要图，并用侧视雷达侦察边界另一侧的纵深地区。

1978 年 11 月，吉米·卡特总统命令这种喷气侦察机对古巴进行空中侦察，以帮助查明新近抵达古巴的苏制米格—23 歼击机是否具有投射核武器的能力（这些歼击机实际上没有这种能力）。一年以后，SR—71 再次奉命对哈瓦那进行高空侦察，严密注视驻该岛苏联部队的增长情况。

然而，“ 黑乌 ”尽管诡计多端，但通常也只是作为真正的高空哨兵（侦察卫星）的替身。在卫星射入轨道之前，“ 黑鸟 ”将对热点地区进行空中侦察，或者使用可以穿透云层的红外传感器进行监视。不过，安全局对日益增强的空间侦察的依赖甚于对其他任何一种侦察平台的依赖。

1960 年 8 月中旬的一天，蔚蓝色的天空明澈如洗。在夏威夷附近南太平洋 8000 英尺的高空，一架 C—119 运输机正在设法用 Y 形拖网截住“ 发现者 14 号 ”卫星几分钟前弹射出来的一个重 300 磅的密封舱。当降落伞带着密封舱向太平洋洋面飘落时，C—119 像表演空中飞人杂技似地截住了密封舱。这次回收密封舱象征着开拓了间谍活动的最新领域：空间。

在从空中回收密封舱的几天前，还成功地回收了一个平稳地溅落在海面的密封舱。在经过长达 18 个月的 12 次试验后所取得的上述成就表明，空间的确是一个适于进行间谍活动的场所，卫星拍摄的别国防范最严的禁区的照片，可以装在密封舱内从卫星上弹射出来，并且回收处理。

实际上，早在六年前，即 1954 年，就采取了最终导致苏美秘密空间竞赛的首批措施。那一年，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任命经济学家和杰出发明家比斯尔为他的计划与胁调特别助理，负责研制一种新型侦察平台：U—2 飞机。它可以安然无恙地飞越别国领土，既不需要沿边界飞行，也不需要一会儿越过边界，一会儿又赶紧退出来。1955 年 7 月，即与洛克希德公司签订合同 18 个月之后，“ 黑女士 ”开始服役了。一共部署了 22 架，其费用比原先估计的少 300 万美元。

随着 U—2 开始飞越苏联，比斯尔设立了一个非正式的特别要求委员会，以便协调侦察飞行的搜集要求。该委员会的成员起初限于中央情报局、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代表。后来，因为机上增加了信号情报设备，国家安全局也参加了委员会。

由于 1960 年“ 发现者 ”卫星弹射舱的回收成功，以及尔后为使美国拥有性能可靠的卫星情报系统所作的努力，美国情报委员会所属的一个正式委员会（空中侦察委员会）取代了比斯尔的特别要求委员会。空中侦察委员会负责协调搜集要求，以及发展和使用所有的空中侦察系统。

翌年，即 1961 年，中央情报局和空军联合组建了一个负责间谍卫星的统

一行政机构——全国侦察办公室。该办公室极其秘密。像 50 年代初的国家安全局一样，全国侦察办公室是一个“黑”机构，政府否认有这样的机构。

根据全国侦察办公室的安排，空军和中央情报局达成非正式协议：空军为卫星计划提供发射工具、跟踪基地和回收力量，而中央情报局则负责卫星的研究、发展、签订合同和保密。双方还同意，该秘密机构的主任由空军委派，并向国防部长报告工作，但要接受美国情报委员会及其空中侦察委员会的搜集要求。

在全国侦察办公室正式成立前不久，即 1961 年 1 月 31 日，空军使用一枚“阿特拉斯一阿吉纳”A 型火箭首次成功地发射了第二代间谍卫星“萨莫斯”。“萨莫斯”传送图象的方法是不弹射密封舱，而是在卫星上处理照片，然后将信号传回地面。采用这种方法发回的照片质量太差，因此该系统主要用于对大面积地区进行拍照（即区域监视），而弹射密封舱的卫星则用于在较低的轨道上，对根据区域监视选定的目标进行“近距离观察”。

然而，照相情报只不过是全国侦察办公室希望攫取的空间珍宝之一。同样重要的是，空间还可用于提供预警和搜集信号情报，国家安全局的科学家们对此并不陌主。在 60 年代初期和中期发射的预警卫星中，有“米达斯”系列卫星。这种卫星装有高级红外传感器，可以探恻到一枚弹道导弹升空时散发的热能。在发射“米达斯”卫星时，争议最大的是计划由卫星弹射出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在 2000 英里高空的轨道上施放出 3.5 亿万根像头发丝那样细的铜制偶极子天线，形成一个宽 5 英里、厚 24 四英里的天线带。在理论上，这个天线带可作为一种被动式反射体，以便中转国防通信。据报道，经过一次失败之后，1963 年 5 月由“米达斯 6 号”卫星取得了成功。

在此期间，还发射了另一个系列的预警卫星——“船帆座”卫星。这是一种 20 面体卫星，上面带有 18 个用于探测核爆炸的探测器。

但在所有送入空间的卫星中，最秘密的是信号情报平台——侦察卫星。它们往往附在照相卫星上送入空间，然后射入更高的轨道。

由于这些系统越来越先进，而且越来越昂贵，因而在整个情报界内，就发射哪些传感器、用它们监视哪些目标以及如何处理和分配情报等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空军和中央情报局在全国侦察办公室的控制问题上，发生了最激烈的争夺。虽然空军在名义上负责侦察办公室，但实际上只不过充当发射员的角色，发射系统的设计、制造和计划安排均由中央情报局负责。因此，从事这个项目的空军高级官员抗议说，转用到国家情报重点项目上去的力量太多了，有损于战术空军自身目的之实现。

1965 年，经过两年占用其大量时间的争吵之后，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与空军握手言和，同意作出一种平等的安排，即成立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央情报主任、负责情报的助理国防部长和总统的科学顾问组成。

根据这种体制，全国侦察办公室主任仍由空军选定，但他（或她）将直接向三人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情况。执行委员会则向国防部长报告工作，由他主要负责空中侦察系统的行政管理。这种安排还承认，中央情报主任作为情报界首脑，在与美国情报委员会磋商之后，有权确定情报搜集要求。万一中央情报主任与国防部长意见不一致，他有权向总统呼吁。

安排一个执行委员会，显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决策机构，但在情报分析领域内依然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自从 1958 年中央情报局建立照相情报中心以来,该局一直负责处理整个情报界的照片情报。由于 1961 年成立了全国侦察办公室，照相情报中心升级为全国照相判读中心。它设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一幢几乎没有窗户的黄色水泥大楼内，并由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提供分析人员，由于来自两个局的分析人员出于同样的目的研究同样的照片，从而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劳动。结果，中央情报主任赫尔姆斯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成立了一个特别联合审查组，对外在问题进行调查。

解决办法是让中央情报局佣有自己建制内的照相情报单位——中央情报局情报司图象分析处，而让全国照判读中心真正成为整个情报界共有的机构。美国情报委员会则以一个负责协调搜集和分析的新委员会——图象要求与利用委员会——取代了其负责卫星情报的委员会（即空中侦察委员会）。

正如中央情报局始终负责卫星侦察的图象判读一样，国家安全局始终负责信号情报活动（只有某些小例外）。然而，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又有所不同。中央情报局先是拥有照相情报中心，后来又拥有全国照相判读中心。可能是为了保密，国家安全局在执行间谍卫星计划的初期却没有一个整个情报界都有份的分析信号情报的中心。

1966 年 9 月，发生了某些变化，在国家安全局内成立了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新任命的中央情报主任赫尔姆斯站在做成电传打字带那样的长彩带前，乐得合不拢嘴。他拿起剪子，为情报界的这个最新机构——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的正式开张剪了彩。一道剪彩的还有笑容满面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卡特和国防情报局局长卡罗尔中将。在他们身后，美国情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鼓掌祝贺。为了纪念这次活动，美国情报委员会首次决定越过波托马克河在国家安全局总部举行一次正式会议。

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十分秘密，因此从未透露过这个机构的存在。即使在情报界内，它也神秘得很。它显然是电子间谍世界的预警神经中枢。前国家安全局负责通信保密的副局长塔特说：“ 如果从国家安全局的角度看，我们有这样一个系统：位于国家安全局内的国防空间与导弹中心（即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是国防情报局（包括各军种情报部门）和国家安全局联合组成的。这是一个预警机构，拥有所有来源提供的全部情报。与美国任何一个机构相比，他们大概都随时可以更好、重及时地发现世界范围内导弹、飞机或公开的军事行动对本国构成的威胁。 ”

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就像一个听诊心脏的内科医生一样，通过信号情报听诊器监视着地球，希望发现不规则跳动的第一个迹象。一旦发现这种迹象，便立即通过该中心的重要情报直通线路通知白宫情报室、五角大楼全国军事指挥中心以及预备作战室，最重要的是通知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空间跟踪与预警分析人员。这种预警有时只有几分钟，有时达一天，并且可能包括诸如将要发射的导弹（或宇宙飞船）的类型或其可能的弹道（或轨道）之类的宝贵情报。

一旦发射，位于同步轨道上的预警卫星将在一分钟内发现火箭发动机火舌，并通知地面已经发射。从这时起，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值班军官就密切跟踪该飞行器，以弄清它是否位于“ 具有威胁的方位 ”上。

与此同时，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通知该飞行途中的所有侦听站和信号情报传感器打开遥测装置进行截收。

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对全国侦察办公室的侦察卫星和监视卫星的依

赖，超过对任何其他情报来源的依赖。为此，国家安全局和全国侦察办公室一直进行着非常密切的合作。例如，曾经全国侦察办公室主任的赫尔曼博士就曾在国家安全局度过他的大部分生涯。

赫尔曼毕业于衣阿华州立大学，1955 年以电气工程师的身份参加空军，被分配到安全局工作。两年之后，他返回衣阿华州立大学任电气工程系教师，但是依然与国家安全局保持着联系，担任一名“顾问”。1959 年 9 月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被列入国家安全局的奖学金计划，1963 年在衣阿华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回到国家安全局，赫尔曼开始飞黄腾达。他先在技术计划机构担任工程师，后在五角大楼国防研究与工程办公室短期工作。1965 年，任国家安全局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 年 2 月，任负责科学技术的助理局长帮办和系统管理办公室代理主任。将近两年之后，又改任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 W 组负责人。1973 年 7 月，年方 40、满头黑发、带着眼镜的赫尔曼被任命为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局长，开始负责该局三大机构之一。

赫尔曼担任研究与工程负责人仅一年，国家安全局局长艾伦就任命他为局长特别助理，以便研究用信号情报支援军事行动事宜。这项任命导致其后上任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黑格于 1974 年把他选为战略警报与战斗情报系统机构的首脑，其主要职责是向黑格提供一个直接预警与战术信号情报支援系统。这个系统显然将使黑格能够收到时效性很强的信号情报和其他情报，而不是将这些情报先送回华盛顿处理。这样，黑格和华盛顿将同时收到警报以及与战术和战斗有关的情报。

与黑格共事两年后，赫尔曼回到华盛顿，担任了负责通信、指挥、控制和情报的助理国防部长首席帮办——五角大楼情报主宰的副手。又过了一年左右，赫尔曼实现了“其毕生的抱负”（前通信保密首脑雷·塔特语），被卡特总统选为负责研究与发展的助理空军部长，更重要的是兼任了秘密的全国侦察办公室主任。

然而，里根政府上台后，要求赫尔曼让位。因为他还有一年左右即可退休，所以被暂时留下来，担任五角大楼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德劳尔的特别助理。里根总统任命奥尔德里奇接管间谍卫星机构，还任命他担任空军部副部长。

虽然全国侦察办公室的详细编制从未透露过，但是可根据从各种来源获得的消息拼凑出其概貌。显然，办公室主任通常挂名为负责研究与发展的助理空军部长（如赫尔曼博士），或者为空军部副部长（如奥尔德里奇）。

由于担任上述两个职务的人担负着大量的其他职责，全国侦察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可能落在空军部特别计划办公室主任的身上。该办公室主任（既不见于《政府机构手册》，也不见于空军五角大楼电话号码簿）兼任位于洛杉矶的空军空间与导弹系统机构卫星计划副指挥官。全国侦察办公室基本上就设在这里，既靠近几个主要的间谍卫星承包商（如位于加利福尼亚雷乐多比奇的 TRW 公司），也靠近主要发射场范登堡空军基地。空军部空间系统办公室大概负责联系和协调，但不负责下达指示。

艾伦中将是开辟空中间谍活动的先驱者之一。1965 年，他担任特别计划办公室高级计划处副处长，住在洛杉矶。三年后，他被任命为空间系统办公室副主任，1969 年担任主任。1970 年 9 月，任特别计划办公室主任助理，七个月后接任主任，并兼任洛杉矶空军空间与导弹机构卫星计划副指挥官。1973

年 3 月 1 日，新任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施莱辛格挑选艾伦作为他负责情报界的副手。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短暂的任职；几个月后，他就接管了安全局。

大约在赫尔姆斯为国家安全局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正式开张剪彩的同时，全国侦察办公室正在为一项雄心勃勃的新卫星计划招标。根据计划，这种平台不是像从前那样只安装一种传感器系统，而是装备多种监听装置。在国防支援计划名义的掩护下（代号可能为“矿工”），这种新一代的卫星将成为美国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不妨碍履行预警职能的情况下，将携带更多的传感器（可能包括一个信号情报装置）。

1966 年 12 月中旬，与 TRW 公司签订了制造这种卫星的合同，传感器成套设备的制造权则交给了航空喷气电气系统公司。20 个月后，即 1968 年 8 月 6 日，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东部试验场秘密发射了该系列中的第一颗卫星（代号为国防支援计划 949 卫星）。这颗卫星酷似一个直径 10 英尺的大油桶，从上面伸出一个 12 英尺长的施密特红外望远镜，活一个鼻子。它被送入极高的 2.23 万英里地球同步轨道。因这个高度上，卫星的速度与地球的速度几乎完全相同，从而使卫星实际上可以固定在靠近赤道的某个地区上空。这只栖息在新加坡上空的长鼻鸟可以“看见”差不多半个地球，包括中国大部和苏联西部，但是看不见西伯利亚最北部地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卫星选择的轨道稍微偏离了中心。把卫星的轨道倾斜九点九度，卫星便偏离赤道上下十度。这样，卫星可以划出一个“8”字，从而把苏联纬度较高的地区纳入视界。每 12 个小时，卫星在这个“8”字上向东最远偏至南中国海，向西最远偏至印度次大陆。在赤道以北卫星几乎从河内正上方经过，在赤道以南，则经过雅加达。因为轨道略呈椭圆形，所以卫星能够在重要的北部地区保持比南部地区长一些的“停留时间”。

虽然卫星在这个轨道上能够看见苏联最北部的地区，但是在转到赤道以南时就无法看见苏联的大片地区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1969 年 4 月 12 日又发射了一颗 949 卫星，送入同一轨道。这两颗卫星保持同步，在一颗卫星转到赤道以南时，另一颗卫星在赤道以北巡逻。

这种卫星除了施密特红外望远镜（这种望远镜的目的可能是通过火箭发动机火舌散出的红外能及其重返大气层装置产生的高温，发现发射弹道导弹的活动）之外，还携有用于监视地面核爆炸的“船帆座”式探测器。

这两颗 949 卫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被作为国防支援计划名义下发射的另一个系列的更为先进的卫星——647 卫星——的原型。经过一次失败之后，1971 年 5 月 5 日，从卡纳维位尔角（其位置比范登堡更适于将卫星送入近赤道轨道）发射了第一颗 647 卫星，停留在马尔代夫群岛至塞舌尔群岛之间的印度洋上空。1972 年 3 月 1 日又发射了一颗，滞留在巴拿马运河上空，从这里可以发现潜艇在大西洋或东太平洋发射的弹道导弹。

据报道，国防支援计划 647 卫星几乎和 949 卫星一样，是美国导弹预警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颗这样的卫星就可以完全覆盖所有潜在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地域。据另一则报道称，带有红外眼睛的间谍卫星已经观察到一千多次由苏联、中国、法国和美国进行的弹道导弹发射。

虽然 949—647 系列卫星的头号重点是预警，但是后来发射的卫星相当可能带有大量的信号情报设备。佩因在《谍报技术》一书中称，一颗综合卫星就是一个“微型轨道试验室”。

> 它可以拾取、记录和发送地面所有通信系统的信号，包括无线电和微波电话信号。它还携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电子监视设备，这些设备很敏感，足以担负美国情报界在土耳其、伊朗、西德等地设立的数以百计的秘密侦听站所干的那种工作。凡是这些侦听站能干的事，它都能干。

佩因先生描述的是一种代号为“ 流纹岩 ”的国防支援计划新卫星的试验原型。这个原型是 1972 年 12 月 20 日发射的，可能携有最先进的窃听实验装置。

指号情报卫星不同于照相卫星和红外卫星，它始终严加保密。照相以及其他样式的图象传感器在情报界之外也有用，如气象探测和地质调查，而专用于对全世界进行监听的卫星则没有这样的用途。

信号情报卫星称为电子侦察卫星，是五十年代末开始研制的，主要用于补充在苏联和中国边界偷偷摸摸实施侦察（有时一去不复返）的笨重的四发动机侦察机。虽然有人驾驶的空中侦听站（载有成吨的先进设备）显然比油桶状窃听卫星更为可取，但是带翅膀的侦收站有许多不利条件。第一个不利条件就是受地理限制。虽然信号情报飞机巡逻航线沿线的边界雷达比较容易捕捉，但是与陆地大国的实际边界相比，飞机能够接近的边界地区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既然测定和分析雷达设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使美国能够制订对策，以便其轰炸机和导弹在战突击，那么，监听纵深内的各种防御设施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不会遭到攻击的卫星就成了理想的平台。

虽然某些早期的“ 发现者 ”卫星可能带有信号情报实验设备，但是发射真正的电子侦察卫星似乎始于 1962 年。那年 5 月 15 日，美国秘密地将一颗卫星送入了距地面 180 至 401 英里的轨道。一个月后，又将一颗卫星送入了距地面 234 至 244 英里的轨道。正像有人推测的那样，这可能是一种合作监听方式，即像照相卫星那样，一颗卫星被指定担负辽阔地区的搜索任务，负责测定各雷达的大致位置及其频率，另一颗更大、更复杂的卫星用来更全面地测定这些信号。

据报道，300 英里的高度最适于截收高频通信。在这个高度上，卫星将处在远达 1200 英里的雷达站和无线电发射机的作用距离之内。由于卫星自南向北转，地球自西向东转，因而电子侦察卫星在一天之内就可收到全世界几乎所有雷达和高频发射机的信号。

卫星显然能够在经过预定的目标时录下各种信号，然后在经过友好国家（如澳大利亚）时用超缩猝发发报方式把情报发回地面站。

60 年代中期，由于新发现的雷达站越来越少，因而可将电子侦察卫星做得很小，附在较大的照相卫星上发射出去。照相卫星到达正常工作高度（通常在 100 英里以下）后，侦察卫星即脱离，靠自身火箭进入 300 英里高的近乎圆形的轨道。在这个轨道上，这种较小（直径约 3 英尺、重约 125 磅）的卫星只是数一数而不是仔细研究沿途的雷达。情报一旦传至地面，即输入电子计算机，从而发现任何不规则变化或新的雷达站。在 60 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以及在 70 年代中,每年都有三至五颗信号情报卫星骑在照相卫星的背上射入空间。

虽然对于侦听某些信号（诸如雷达和高频通信）说来，这些圆形卫星显然身手不凡，但是它们听不到其他的重要信号，其中主要是带有电话通话、

遥测信息等重要情报的微波频率的信号。六十年代中期，国家安全局的科学家们认为微波的方向性太强，在较近的非常狭窄的区域之外无法进行监听。

尽管存在这种悲观看法，还是决定开始制造后来变成了最棒的窃听手段的“流纹岩”卫星。根据全国侦察办公室的计划，中央情报局把制造这种卫星的合同交给了 TRW 公司。该公司在雷东多比奇没有窗户的 M—4 号建筑物内对卫星进行了组装。制造国防支援计划 949—647 系列预警卫星的也是这家公司，但是“流纹岩”卫星不同于原先的卫星，它是纯粹的信号情报卫星。据一则报道称：

> 每颗卫星都携有一组天线，能够在空间拾取外国的微波信号，就像真空吸尘器从地毯上吸取灰尘一样。美国的情报机构能够监听共产党国家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微波无线电和长途电话通信，偷听在莫斯科的某位部长与其在雅尔塔的朋友的通话，或者某位将军与其在大陆另一头的助手的通话。

1973 年 3 月 6 日，首次发射了供实际使用的“流纹岩”卫星。这颗卫星，被射入非洲之角上空的地球同步轨道。在这个位置上，“流纹岩”卫星可以窃听苏联西部的微波信号，以及截收丘拉坦导弹试验场发射的液体燃料洲际弹导弹和在普列谢茨克发射的 SS—16、SS—20 这类的固体燃料导弹发出的遥测信号。

1977 年 12 月 11 日和 1978 年 4 月 7 日又发射了两颗“流纹岩”卫星，它们被送入靠近前两颗卫星的轨道，以便在前两颗卫星发生故障时予以代替。

就其作为遥测传感器而言，“流纹岩”卫星是美国核实苏联是否尊守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主要“国家技术手段”之一。作为该协定（1972 年 5 月在莫斯科签字）的一部分，美国和苏联均同意“不干扰”，也不“故意采取隐蔽措施去妨碍用国家技术手段核查恪守本协定条款的情况”。

美国试图通过使用“流纹岩”卫星截收遥测信号来保证苏联恪守双方同意的条款，如反弹道发射架、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和类型。此外，遥测信号还提供了与苏联弹道导弹的研制及目标工作有关的重要情报。

苏联显然认为，他们用来传送遥测数据的甚高频和微波波段方向性极强，位于极高的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无法截收方向性这样强的信号，因此，他们从来不屑于给遥测信息加密。据报道，1977 年中（即苏联从一个在 TRW 公司工作的间谍那里了解到“流纹岩”卫星的情况大约六个月之后），情况变了。从此以后，苏联开始给数据加上一次一换的密码，甚至进一步试图提供一种“磁带桶系统”，即在导弹上用磁带录下数据，然后用降落伞送回地面，从而使密码破译人员一无所获；这个不让美国获得遥测数据的问题成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重大症结之一。

“流纹岩”卫星尽管先进，但仍然只是美国“核查”努力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部分是从五六个“窗口”窥视苏联的地面和海上平台，其中最宝贵的是伊朗境内的侦听站。这个代号为“巡道工 2 号”的侦听站位于边远的山村卡布坎（迈谢德以东 40 英里），是美国用于监听苏联导弹与宇航发射活动的最重要的侦听站，它周围住着游牧民，但一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介绍说，它拥有“21 世纪的先进设备”。侦听员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监听丘拉坦（距

离仅 700 英里）发射的导弹在起飞和初期飞行阶段的每一个细节。由于它靠近试验场，因此可以起到“报警”的作用：它可以用信号通知卫星打开照相机和记录仪器，通知位于阿拉斯加的空军人员升空，监视试飞弹道的末段。

“流纹岩”卫星因为体积有限，而且位于试验场上方 2.23 万英里的高空，所以竞争能力很小。尽管“流纹岩”卫星装备的天线与卡布截侦听站的天线一样庞大，但是物理学原理决定了它收到的苏联导弹遥测信号强度，不超过设在伊朗的侦听站所收到的信号强度的千分之一。另外，许多人认为，在导弹最初飞行阶段搜集的情报最为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导弹助推器材和投射重量的详细情况。甚至连低空信号情报卫星也只是部分有效，因为它们每天经过其上空的次数有限，而且时间很短，苏联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调整发射时间，以免被发现。

由于上述限制,情报界于 70 年代中期开始制订研制新一代信号情报卫星的计划，以取代“流纹岩”卫星。这个代号为“百眼巨人”的新系统将提供一种“后备”情报能力，如果在伊朗、土耳其或其他地区的信号情报设施丧失，即可投入使用，然而，由于造价昂贵，这种新系统在情报界、政府和国会中引起了一场既激烈又非常秘密的辩论。冲突显然首先是在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专家和中央情报局图像专家之间发生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在谈到他对第二天的安排曾说：“负责科学技术的副局长达克特说，在全国侦察办公室执行委员会明天的会议（将由我主持）上，将会激烈地争论是否推迟研制一种电子传感器系统，以便找到资金使我们的照相系统发挥最大作用，不会因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费用增加而受到影响。”

全国侦察办公室最终同意了研究“百眼巨人”系统，递交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审批。施莱辛格是科尔比的前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现在对所有的空中侦察活动享有最后的发言权。他因在中央情报局抡起斧子猛砍预算而闻名，这次又抡起斧子砍掉了“百眼巨人”计划，而不顾他手下的国防情报局曾予以积极推荐。据说，他认为不需要这处新系统，因为美国在伊朗拥有侦听站并且拥有其他陆基传感器。

然而，科尔比也不示弱，坚持支持这项卫星计划。他行使了全国侦察办公室工作程序赋予他的特权，把这个问题直接提交给总统，建议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裁决。福特总统表示同意。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结果全力支持“百眼巨人”计划。这样，这个问题就转给了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该委员会鉴于此项计划的费用大大以及政府内部在其价值问题上有争论，否决了这项提案。

“百眼巨人”计划尽管被否决，但是 1977 年和 1978 年显然曾两次重新提出这个计划。不过，这个 2 亿美元的提案哪一次也未跨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的案头一步。大约在特纳扣住“百眼巨人”计划的同时，中央情报局提出一份报告，表示相信伊朗国王会在许多年内保持其统治。不到一年的功夫，巴列维王朝被暴力推翻。中央情报局不由得对提出上述乐观报告和否决“百眼巨人”计划感到后悔不已。

美国政府在伊朗发生政变后几周内就放风说，它已经停止了卡布坎侦听站及其里海沿岸贝赫沙赫尔姐妹站的活动。贝赫沙赫尔的侦听员是 1979 年 12 月撤走的。但是，卡布坎侦听站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无可替代。为此，美国决定采取这样的危险步骤：在甚至对驻在国政府也完全保密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这个基地。美国希望，革命引起的骚乱一旦平息，就可能达成新的协议，

从而可以继续不受妨碍地进行监听。

但是，伊朗帝国的动荡有增无减；伊朗新任参谋长奎拉尼少将以为美国原来的侦听站已经全部放弃，因此，他在 2 月底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胆地断言（这是说给国内群众听的），伊朗政府不能容忍美国在伊朗领土上没有侦听站。

听到广播之后，在卡布坎与美国人一起工作的伊朗空军人员突然造起反来，接管了基地，并把外国人扣作人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官员（8 个月后，他们自己也成了伊朝的人质）制订了解决办法：美国同意付给这些空军人员 20 万美元的解职费和欠薪，条件是释放美国人。交易做成了，信号情报专家们启程回国。

然而，用来衡量卡布坎侦听站被占领的真正损失的不是美元，而是时机。“卡布坎是无可替代的。”一位官员说。“近期内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这段时间可能长达三四年。这将影响到我们进行核查的能力。我认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基地对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以及全面监视苏联的导弹计划有多么重要。它提供了苏联试验和研制导弹的基本资料。损失真大，问题很严重。”

“流纹岩”卫星只能部分地弥补在伊朗关闭的情报窗口。有些人认为，假如当初批准了更先进的“百眼巨人”计划，那么局面本来可能会光明一些。失去伊朗的侦听站意味着整个情报界（特别是国家安全局）被迫凑合着使用较少的手段。它们在寻找其他有利地点时，不得不加强现有的系统。提出的建议包括使用载有特殊设备的 U—2 飞机，从巴基斯坦的基地起飞，沿苏联西南边界记录遥测信号，以及赋予位于土耳其的侦听站以更大的作用。然而，前国防情报局局长格雷厄姆认为这两条建议不妥当。这位陆军退役中将说，在土耳其设置侦听站实际上毫无用处，因为高加索山脉构成了地形干扰。至于 U—2 飞机，格雷厄姆说：“派遣飞机将是欺人之举，因为它们不是一天 24 小时都在空中，而且不能携带我们放在伊朗的成吨的设备。”

除了上述在照相卫星上射入轨道的信号情报卫星外，辅助“流纹岩”卫星的还有两种既照相又搜集情报的低空卫星系统，经过改装后，它们可以在监听遥测信号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一种是 467 卫星，俗称“大鸟”。这种卫星由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制造，于 1971 年 6 月 15 日首次发射。这个间谍卫星重 12 吨，长 55 英尺，其核心部分是一部令人咋舌的超高分辨率照相机，能够在 90 英里的高度分辨出 8 英寸长的物体。据报道，“大鸟”卫星有一次拍摄下了部署在普列谢茨克附近的一批飞机的样式、型号、翼徽以及地面支援设施。卫星上的红外照相机能够发现隐蔽的地下导弹发射井，因为发射井的温度高于周围的土壤温度。其他的传感器包括协助识破伪装的多光谱照相仪器和一系列的信号情报监听装置。

“大鸟”卫星的发射率大约为每年两颗。它是第一种既能实施搜索监视又能进行近距离侦察的卫星。467 卫星的主要弊端是使用周期短，起初大约为 52 天，1978 年延长到了 179 天。

第二种低空监视平台是代号为‘锁眼’的 1010 卫星（亦即 KH—11 卫星）。“锁眼”卫星比“大鸟”卫星更先进，它具有许多先进能力，不仅可以发回信号情报信息，而且可以向地面发回高质量的传真照相电视信号。在曾进行的一次试验中，“锁眼”卫星的信号情报能力得到了证实。人们从这次试验中获悉，64 页厚的 KH—11 系统技术手册的第二部分，注有高度保密的信号

情报最高级暗号——TOIPSECRETUMBRA（“绝密、暗影”），旁边还注着“为便于进行数据处理，卷轴标签用不同的颜色作了记号”和“容器”等字样。这可能意味着，“锁眼”卫星和“大鸟”卫星一样，也可以把用过的胶卷和磁带储存在容器内，定期弹入大气层，用降落伞飘至夏威夷以北的太平洋区域，从空中回收。这些容器也可以飘在水上或者悬浮在洋面下，发出无线电和声纳信号，最后由“蛙人”回收。接着，就把信号情报卷轴（与胶卷卷轴不同）送去进行数据处理。

“锁眼”卫星于 1976 年 12 月 19 日首次发射，尔后又于 1978 年 6 月 14 日和 1980 年 2 月 7 日进行了发射。它可以达到 300 英里高的轨道，几乎是“大鸟”卫星所达到的最高轨道的两倍，因此使用周期大约为两年，比上一代卫星前进了一大步。

尽管“大鸟”和“锁眼”卫星创造了技术上的奇迹，但在监听遥测信号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它们是低轨道卫星，因此苏联试验工程师很容易对付它们，只需把比较重要的导弹试验活动（如导弹点火发射）安排在这些卫星超出视野的时刻就行了。美国需要一种先进的同步轨道卫星——“流纹岩”卫星的后继系统。

“百眼巨人”卫星正是这样一种卫星。但是，连续三年被否决之后，这项研制计划看来已经放弃，而代之以一个更大、更先进的新系统。这个代号为“水上技艺表演”的超级卫星之所以有可能制成，是因为出现了将信号情报卫星送入轨道的新手段——航天飞机。航天飞机不同于以往的发射火箭（“大力神”III型火箭），它有可能运载重量和体积都大得多的卫星。

随着秘密的“巡道工”侦听站的丧失（“流纹岩”卫星只能部分地弥补这一损失），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失去了监视苏联导弹空间活动的主要情报来源。同样严重的是，有助于弥补上述损失的“水上技艺表演”卫星进入轨道的时间，因航天飞机遇到重重困难而一推再推。航天飞机很快就成了美国国家航空与宇航局跟 C—5A 飞机遭遇差不多的项目——费用大量超支，时间一拖数年。

然而，对日益关注情报空白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来，大肆吹嘘的航天飞机看起来简直成了“爱得赛”牌小汽车。例如，该委员会在 1980 年被告，航天飞机将于 1981 年 12 月首次试飞。但是仅过了 6 个月，这次飞行就推迟到 1982 年 9 月。更糟糕的是，航天飞机可能运载不了某些专门为它设计的间谍卫星。空军部长马克在国会秘密作证时承认：“航天飞机也许达下到所设计的最高载荷能力……换句话说，即使有航天飞机，我们也不可能用它发射所有的卫星。”

由于面临上述种种问题，加上担心这些问题对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美国核查能力的影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取消了航天飞机发射“水上技艺表演”卫星的计划，下令用只能使用一次的火箭发射这颗信号情报卫星。

这样一来，问题更多了。由于卫星最初是为用航天飞机发射而设计的，回此可能对其整个使命产生不利影响。问题并不到此为止。因为五角大楼和全国侦察办公室都曾经对航天飞机抱有巨大的信心，所以较大的发射工具（如庞大的“大力神”III型火箭）的生产线均濒于关闭。这意味着，虽然空军为 1980 年至 1985 年期间万一航天飞机出现问题而安排了足够的发射工具，以便进行 12 次“重要的国家安全发射”（这是他们对全国侦察办公室间谍卫星发射活动的委婉说法），但是每枚火箭的费用将高达 1 亿美元。当过全国侦

察办公室主任的空军部长马克承认，这种价格“将使它们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火箭。”

发射“水上技艺表演”卫星和某些其他的特大超级卫星，无疑将超出上述价格，因为需要恢复生产另一种因寄希望于航天飞机而逐步停止生产的助推器——“宇宙神一半人马座”火箭的高效能未级火箭。把一级火箭加在“大力神”III型火箭上，将会提供所需的额外推力，把卫星送到预定由航天飞机送到的那个高度。

不过，尽管火箭如此昂贵，占用全国侦察办公室大部分预算的还是卫星。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卡特就曾强调过这一点。他在谈到全国侦察办公室的发射过程时说：“这项技术是现成的，他们随时都会在范登堡又发射一枚火箭。大部分费用都用于研制卫星本身，即卫星内部各种各样的搜集情报的仪器。”

据某些官员称，由于一颗卫星的费用有时就超过 1 亿美元，加上 1 亿美元左右的火箭费用，再加上两者的改装费用，因此一颗“水上技艺表演”信号情报卫星的费用很容易达到 2.5 亿美元。然而，尽管这种卫星主要是为国家安全局制造的，但是卫星的费用显然不会出现在该局的预算内。这些费用隐藏在给全国侦察办公室打掩护的空军保密预算内。卡特将军证实了这一点。他是全国侦察办公室成立初期的元老，当时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后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在被问到全国侦察办公室的预算是否编入中央情报局的预算时，卡特回答说：“不编入。我在那里任职时，他们都知道这一点。当然了，这是因为我们参加了大部分项目。但是据我回忆，全国侦察办公室的预算编入空军顶算。我在那里时，中央情报局的许多经费编入全国侦察办公室的预算。”假如统计安全局用于空间计划的全部费用的话，那么其预算很可能增加一倍乃至两倍。然而，由于这笔预算隐蔽在笼罩着该局（其本身的存在就属于国家机密）的迷雾之中，仅有的一点点查清帐目的可能性简直也不复存在了。关于间谍卫星计划，据报道，已故的前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埃伦德曾经评论说：“假如你知道我们在这个领域里浪费了多少钱的话，你会惊得从椅子上摔下来。这是犯罪。”

卫星一旦进入轨道，即由国家安全局负责地面搜集站的工作及其费用。但是，全国侦察办公室仍通过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森尼维尔（靠近旧金山）的活动中心保持对卫星的实际控制。

在国家安全局组建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并为国防支援计划 949 预警卫星招标的 1966 年，便开始为这些地面终端站制订计划了。目前至少有三个（可能是四个）极其秘密的信号情报卫星地面终端站。

第七节我们受骗上当了

一位头发虽黑但已谢顶，并且戴着一副大黑框眼镜的美国人，从葡萄园和橄榄园郁郁葱葱的南澳大利亚现代化首府阿德莱德 ”飞往位于这个岛国荒凉的中心地带的艾利斯普林斯。尘暴卷着氧化铁沙漫天飞舞，使无边无垠的原野像火星上的沙漠一样发红。当他俯视着这番景象时，心中想必闪过这样一番比较：“ 与法兰克福相去甚远。 ”这段旅程并不只是经历了时空上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感官上的变化。

1967 年 1 月，正值澳大利亚中部处于干热的盛夏之际，40 多岁的国家安全局官员理斯 · 托林斯进行了这次旅行。不久前，他曾在法兰克福该局欧洲总部任职，现在正前去监督建造地面终端站，这个终端站将充当计划中的信号情报与预警卫星和国家安全局的中转站。

斯托林斯是 1966 年 10 月（即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举行剪彩仪式几个星期以后）到达澳大利亚的，他先在首都堪培拉逗留了几个月，与政府官员敲定最后的细节。谈判的结果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哈斯罗克和美国使馆官员克朗克于 12 月 9 日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这项协定的有效期为十年，期满以后，只要有任何一方提出，即停止生效。但是，1977 年 10 月 19 日，这项协定又正式延长了 9 年，期满以后，任何一国政府均可提前一年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执行这项协定。

艾利斯斯普林斯位于澳大利亚的正中心，当地白人和土著农牧民称之为“ 艾利斯 ”，它是这片辽阔荒地——有些人称为“ 内地 ”，有些人又称为“ 中部 ”——上的唯一城镇。澳大利亚这片内地的面积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倍半，大部分是移动的沙漠和干枯的河床。麦克唐奈山脉就像湖面荡起的无穷无尽的涟漪，穿过内地 250 英里的心脏地带，仅偶尔出现一小片树林和泥土地。山脉拐弯处的一个水洼，1872 年曾被定为建立电报站的一个备选地点。为了纪念电报主管人的妻子（她当时在南面将近 1000 英里处的阿德莱德），该地被命名为艾利斯斯普林斯。

在斯托林斯 1967 年 1 月下飞机时，艾利斯的人口已经增长到 6000 人。城镇周围是许多大规模的养牛“ 站 ”（即养牛场），有的面积有美国的罗得岛州那么大。虽然雨量从不充沛，但是只要下雨，生长的牧草就足够牛群吃到下一次降雨。可是，在这以前的八年中发生了当地居民记忆中最严重的干旱。1965 年头 10 个月，雨量只有 1 英寸多一点，1964 年也不到 5 英寸。结果，这里成了尘土飞扬的地区，牛群濒于饿毙。

然而，给当地居民带来如此灾难的环境却被国家安全局视为正合需要的理想环境。雨量少，意味着信号受降雨影响而变弱的机会少，遭到风暴干扰的可能性也小；与世隔绝，则带来了免受假信号干扰和减少被发现的可能性等好处。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式签订国家安全局基地协定之前 6 个月，建筑工人就开始在艾利斯镇西南铺设公路，通往但普尔巴小溪和梅雷尼水井。用水几乎完全依赖深井的当地居民早就提出修一条公路，但政府死不答应。因此，当他们在 1966 年 6 月的布告上看到修建这条公路时，既惊讶又高兴。然而，他们不明白，这条公路为什么要越过水井数英里通往无人之处呢？

公路的尽头是艾利斯斯普林斯西南 11.5 英里处的劳拉小溪，麦克唐奈山脉岩石累累的山麓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山谷。这个以松峡闻名的地方很快就从

石器时代的荒原变成具有 21 世纪水平的间谍基地。

今天，松峡看起来就像月亮上静海中的一座先进的人工城。山谷内隐藏着 454 名秘密工作人员，18 栋单层水泥建筑物（其中一些有超级市场那样大），而最令人吃惊的是一溜排开的六个银白色圆形天线罩，里面安装着盘状天线，直径最小的不到 20 英尺，最大的约有 105 英尺，其余天线的直径是：一个约 70 英尺，一个为 55 英尺，两个为 40 英尺。

为了减少外人闯入该地和发生电干扰的可能性，计划人员在松峡四周用双层栅栏圈起了 7 平方英里的“缓冲区”，并且一天 24 小时不停地进行巡逻，连飞机也不得飞至距松峡 2.5 英里的地方。正如第一道检查哨旁边的牌子上所写的那样，它的掩护名称是美国国防部和澳大利亚国防部主办的“联合国防空间研究设施”。

实际上，这个基地既是许多间谍卫星的一个地面终端站，又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侦听站。松峡基地（代号为“美利奴”）的建成刚刚赶上发射第一颗国防支援计划 647 预警卫星。头两颗卫星射入了新加坡上空的地球同步轨道，可以监视中国以及苏联的北部和西部。

松峡站从卫星上接收红外报警装置发回的信号，这种装置可在弹道导弹处于飞行中的动力段时发现其排气流。为了防止发出任何假警报，可见光传感器还向“美利奴”发回像电视一样的信号，供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进行分析。很可能还有其他的传感器作为补充，其中大概包括有限的搜集信号情报的能力。松峡站一旦收到数据，就会立即把重大的情况或威胁报知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

70 年代初又增加了装在天线罩内的天线，以接收“流纹岩”卫星发回的信号。这种卫星在飞越苏联中国时显然录下了信号情报数据，然后高速发回松峡站。小信号情报卫星大概也采用了同样的体制；不过，它们可能首先把情报发给功率较大的“大鸟”照相卫星，由它转给“美利奴”。

据一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澳大利亚还被用作采用非卫星手段直接侦收苏联通信的理想平台：

在国家安全局内部通信中，松峡被说成是一个“窗口”。埃克斯默思（海军安全大队在澳大利亚西北角开设的侦听站）和松峡都负有电子侦收和履行其他职能的任务。松峡和它的天线十分重要。从全球“监视”的角度来看，它们所处的位置非常适于监视苏联从里海附近的试验场和丘拉坦试验场发出的高频遥测信号。澳大利亚是一个和平、宁静的国度，因此是设置国家安全局某些设施的理想地点。

1969 年 11 月，开始建造另一个高度机密的美国卫星终端站，它的代号是“卡西奴”。这个终端站比松峡站小，地处同样与世隔绝的武麦拉禁区——艾利斯斯普林斯东南 60 英里处的一个起伏不平且没有人烟的狭长地带，面积 7.3 万平方英里。这个禁区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试验武器的地方，因此戒备森严。任何获准进入禁区的人首先领到一份“进入禁区须知”，注意事项包括：“除非得到有关军官的书面批准，否则不得以书面、口头或任何其他形式泄露与禁区有关的情况。”

“卡西奴”坐落在禁区内一个叫作纳朗格（东经 136°4′6″，南纬 31°1′9″）的小山谷里。据说，它主要处理“大鸟”和 KH—11“锁眼”之类的照相卫星发回的图像，因而对它感兴趣的主要是中央情报局，而不是国家安全局。据一则报道称，纳朗格接收侦察卫星飞越中国后不久发回的照片，

需要用它补充其他的地面站，因为低空卫星位于信号发送距离内的时间只有10 分钟。增加这个站，可以给目标拍摄更多的照片。

在筑路工人超过梅雷尼水井把公路铺向松峡的同时，国家安全局正计划在地球的另一面再开设一个秘密设施。英格兰的哈罗盖特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而且在其他方面都和澳大利亚的松峡正好相对。松峡那里是沙漠，点缀着干涸的湖床和光秃秃的崎岖山脉，而哈罗盖特这里有漂亮的山丘，绿油油的丘陵草原和连绵数英里的无人居住的沼泽。约克郡的这个静谧的小镇，位于伦敦北面将近 200 英里处。像其在遥远的澳大利亚的姐妹镇一样，它将成为具有 21 世纪水平的间谍战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1966 年的整个夏季，国家安全局的几十名文职雇员开始悄悄地在哈罗盖特大旅社露面。到 6 月份，在该旅社登记住宿的特工人员达到 70 人。到 7 月初，他们便包下了整座旅社，为期 6 个月。他们来这里之前，都曾受过保密教育，绝对不准承认与国家安全局有关系。但是，新面孔的出现在镇里引起了谣言：西面 8 英里处的陆军秘密基地要由文职人员接管了。

“ 嗯，我们并不高兴出让。但是，如果他们想要，我想他们是可以得到的。 ”，当年哈罗盖特西面凯特尔辛格区内斯菲尔德农场的主人 S · 鲁宾逊听到了出乎意料的消息：英国国防部想征用他的占地 246 亩的农场。政府一共征用 562 亩沼泽地，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一年后，来了 4 名美国陆军军官 3 名士兵，开始建造一个奇怪的“ 通信站 ” 。

历时 5 年并且使用了价值 680 万美元的水泥和天线之后，美国陆军安全局第 13 野外工作站最后于 1960 年 9 月 15 日正式开张。这个 400 人的基地名叫门威思希尔站，它几乎完全避开了城市的电磁干扰，非常适于进行监听。

1966 年夏天美国文职人员不断涌进哈罗盖特时，英、美两国政府接连否认这些文职人员即将接管基地谣言。尽管如此，陆军安全局 8 月 1 日正式地（然而又是秘密地）把基地移交给了国家安全局。最后，受聘为基地商店经理的一名少尉成了基地上唯一的军人。

换班后不久，这个围着三层栅栏的侦听站在外貌上就变得与松峡站惊人地相似起来。巨大的盘状无线接二连三地出现，其中有一些安装在混凝上底座上蛋壳型天线罩内。到 1980 年，天线的数目增加到八副。栅栏后面立有告示牌，上面写着：此系国防部禁地，非法闯入者将依照官方的保密法加以制裁。

据一直到 1975 年尚担任 G 组组长的雷文说,国家安全局接替的主要原因是，陆军未将足够的人力物力用于侦收迫切需要的战略情报，诸如外交和经济情报。“ 陆军拼命顶着，就是不侦收这类情报 ”，雷文说。在国家安全局接管之前，陆军一直将该站用于战术目的。此外，由于没有投入任何人力物力截收像卫星微波通信那样比较式的通信，国家安全局非常不安。

据雷文说，门威思希尔站的主要目标是西欧、东欧和苏联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他补充说：“ 它对西伯利亚无能为力。 ” 侦收的大部分信号非常复杂，该站无法破译，因此通过卫星发回米德堡本部处理。

门威思希尔站的某些战略侦收能力，大概是从美国空军安全局设在柯克牛顿（位于爱丁堡附近）的侦听站那里继承过来的——这个站恰恰在国家安全局启用约克郡站的前一天停止了活动。一些报道表明，许多原先在柯克牛顿使用的设备都沿着公路运到了国家安全局的新基地。柯克牛顿侦听站的一名前雇员介绍日常工作说：

电报是从用户电报机侦收到的。我有一张百把字的词汇表，将含有这些词的电报挑选出来。欧洲使馆的所有外交通信都加了密，侦收到之后，须立即送给一名高级军官。大批电报（诸如生日贺词一类的电报）则塞进纸袋。我必须特别注意商业通信，商品详情，大公司出售的货物，如钢、铁和天然气。我们的任务经常变化，这个星期监听柏林和伦敦之间的所有通信，下个星期又监听罗马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通信。有时词汇表上列有几十个大公司的名字。有时，我又不得不注意商品的动向。所有的侦收材料都要送回华盛顿米德堡。

像松峡一样，门威思希尔既负有搜集战略情报的使命，也负有提供预警的任务。它也像澳大利亚的那个站一样，是在国防特种导弹与宇航中心正式成立前几个星期才改建成先进的卫星设施的。因此，至少该站的一部分职能是充当一颗国防支援计划预警卫星（这颗卫星可能在南大西洋上空）的地面站。其他的天线很可能用于接收信号情报卫星发回的情报。实际上，在第一颗“流纹岩”信号情报卫星投入使用的 1973 年，又增加了一个新天线阵。门威思希尔所处的位置，看来适于接收飞越苏联北部和沿海地区的卫星发回的情报。在这个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可以监视苏联普列谢茨克导弹试验场，以及高度机密的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海港区。

与门威思希尔明显有关的另一种卫星是“大鸟”卫星。证据是，该站有大批雇员来自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制造“大鸟”卫星的厂家。

在国家安全局内，去门威思希尔任职被视为一桩美差，人们一般被派去工作三年。有些人就住在站内，那里有一个娱乐中心、一个俱乐部、一家商店和联邦存款互助会分会——一种仅限于国家安全局雇员或与该员有关的人员参加的信用合作社。据一名前门威思希尔站官贝说，该站一天 24 小时工作，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轮班人员，或者用门威思希尔站的行话说，是“能干的废物”。非轮班人员大多数是坐办公室的，他们被封为“日勤女士”。

据报道，该站保密措施极其严格。一则报道称：“所有的雇员都必须在严格的安全控制下工作。他们的家属奉命永远不得提及‘国家安全局’，连 12 岁和 12 岁以上的孩子都必须汇报他们与‘外国人’的一切来往。即使十几岁的孩子稍有疏忽，有关的官员及其家属也要立即被打发回国。”

显而易见，在雇员及其家属离开美国之前以及到达该站之后，都要接受保密教育。

与国家安全局侦听员一起进行监听的，还有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信号情报专家（至少在某些领域内是如此）。据一位前门威恩希尔站官员说，这两拨人的协作非常密切。他说：“实际上，我们合作碍好极了，每逢英国人上午 10 点钟摘下耳机去吃茶点时，美国人就走过去代班。”他补充说，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人员特别擅长搞电子计算机软件，而且特别善于破译欧洲的密码制，因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布雷宁格在门威思希尔站担任了大约五年的站长，直到 1980 年秋季才离职。他 50 多岁，自称为“技术员”，西装的翻领土别着一枚有美、英两国国旗的纪念章。在被问到该基地的任务时，布雷宁格老生常谈地回答说：它不过是个中继站。任何与国家安全局的联系都毫无例外地加以否认。尽管如此，布雷宁格 1980 年离开哈罗盖特后，迁进了米德堡附近的新居，并且在安全局担任了高级职务——对于一个普通的中继站站长说来，这可是不同寻常的升迁。

最后，第三个高度机密的卫星接收站在巴克利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开张了。这是一个戒备森严的设施，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附近的奥罗拉。该站（称为“空军空间与导弹系统机构航空空间数据设施”）看来是由国家安全局和全国侦察办公室合办的,可能负责控制和接收 1972 年 3 月 1 日射入巴拿马上空的国防支援计划 647 预警卫星发回的情报，以及诸如“流纹岩”等信号情报卫星发回的情报。1974 年的一则报道表明，巴克利通过五副装在无线罩内的盘状卫星无线接收情报资料，然后用国际商业机构公司制造的两部大功率 360—75J 型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

1977 年 9 月发生的一个插曲，可以说明巴克利的保密程度。该设施的 48 名雇员因有时抽大麻而被解雇。空军调查人员告诉这些雇员，他们正在搜查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但却反复盘问他们吸食大麻或其他毒品的情况。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来自特别调查办公室的审讯员借口律师没有经过适当的安全审查而禁止他们出席。最后，这个案子引起了当地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主席乔伊的注意，他把这个事件称为“政治迫害”，并向空军施加压力，要求恢复被解雇者的工作。由于认识到已经超出了合法界限，空军让了步，允许其中 39 人复职。这些人大多是制造“大鸟”卫星的厂家休斯飞机公司和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合同雇员。

然而，国家安全局对四名在盘问时被抓住把柄的雇员就没有这么心慈手软了。该局命令他们辞职，否则就开除。一个在安全局工作了 16 年之久的人的妻子说：“我们受骗上当了。”

第四章白刃战

第一节“自由号”上响起了令人恐怖的喊叫

1960 年，弗兰克·雷文接管新成立的 G 组时，他经历了一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化冲击”。在领导苏联一般处时，他负责破译一个大国（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中级密码制和阅读它们的明码电信。然而，信号情报活动办公室改组后，两个苏联密码译处（苏联一般处和苏联高级处）合并成一个单位——A 组，组长是前苏联高级处处长利文森。同时，亚洲共产党国家处变成了 B 组，其他地区处改成了雷文领导的新的 G 组。

现在，雷文不是负责一个国家和几个国家，而是负责操 20 多种语言的 100 多个国家，包括盟国、中立国和整个第三世界。但是，G 组和苏联一般处之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差别：严重缺乏侦听力量，因此缺少原始电信材料。苏联周围几乎处处有侦听站并有电子侦察机昼夜 24 小时对其进行监听，而美国在整个非洲只有两个侦听站——一个在埃塞俄比亚狂风呼啸的厄立特里亚高原上的阿斯马拉附近，另一个在烈日炎炎的摩洛哥沙漠中。因此，撒哈拉以南几乎都在侦听范围之外。南美的情况更糟，那里没有侦听站，尽管在巴拿马和波多黎各还有几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安全局决定模仿苏联人，建立自己的侦听船队。

多年来，苏联人一直在把装有大量天线的拖网船派往美国高度机密的军事设施附近的海域，希望拾取一些能够披露真相的无线电信号。例如，1960 的 4 月，一艘名为“维加号”的既短又宽的 600 吨苏联拖网船（其驾驶室顶上的巨大电子舱里伸出了 11 架天线）沿美国东海岸南下，到达离弗吉尼亚州亨利角 12 英里以内的海域。据一位情报官员说，有效距离达“几百英里”的电子设备，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到诺福克大型海军基地和该地区十来个其他较小型军事设施的无线电信号。

在到达费吉尼亚州沿海之前，“维加号”曾驶过新泽西州吉尔滩以东 85 英里的海域，当时美国海军正在那里举行演习，参加演习的有第一艘装备了射程为 1200 英里的“北极星”导弹的“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这艘苏联间谍船有一次甚至开倒车，似乎想把一艘派去回收潜艇发射的训练导弹的美国海军拖船撞坏。

60 年代初期，苏联拖网船的另一个主要侦听目标，是美国在南太平洋的核武器试验。1962 年春，几艘苏联情报收集船冒险驶近约翰斯敦岛以北的核试验禁区，在界线以外 10 至 15 英里处游弋。这些船中最大的一艘是 3600 吨的水文气象研究船“肖卡尔斯基号”，船上有 16 个实验室、一部气象火箭（用于研究大气层上层核爆炸效应）发射架以及收集和研究核爆炸残留物的设备。这种残留物能够提供核弹的设计和当量等方面的情报。从船上接收到的电磁脉冲中也可以确定核爆炸的时间和概略位置，其他数据得之于对高空核爆炸的光学观察和测量爆炸声波的水下测声装置。

建立国家安全局船队的主张起初曾在五角大楼内部遭到强烈反对，但终于在 1960 年获得批准。国家安全局开始到处为间谍船队搜罗船只。雷文回忆说：“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一种低速民用船。这种船可以不慌不忙地沿海岸缓慢行驶，把时间消磨在海上。”

首先选中了“乔治·F·瓦尔德斯二等兵号”（T—AGI69）。这艘锈迹斑驳的辅助船是从美国海运管理署封存的旧船中拯救出来的。但是，对于雷文和 G 组工作人员来说，“瓦尔德斯号”是一艘理想的船。“瓦尔德斯号”1944

年建于明尼苏达州里弗塞德造船厂，最初叫“ 朗德 · 斯普莱斯号 ”，后又改名为“ 乔 · P · 马丁内斯二等兵号 ”。它在服役期间，多半都是被军事海运局用作沿海运输船，一会儿运送部队，一会儿又运送文件夹。

为“ 瓦尔德斯号 ” 挑选的姐妹船是“ 约翰 ·E · 马勒中士号 ”（T—AGI71）。它的外形同“ 瓦尔德斯号 ”几乎一模一样。它曾在远东运送过补给品，1956年，在寒冷的北极执行了几个月的补给任务之后，于当年退出现役。

它们虽然是两艘航速缓慢、其貌不扬的海上运输船，但也是理想的电子侦听船。由于它们属于军事海运局而不是属于海军，因此它们可以把远离美国海军基地的港口用作母港。还由于它们的水手都是平民，因此它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执行任务，而只用较少的时间靠岸休假。再者，航速缓慢很适于最大限度地收集无线电信号，而不会被人认为它是在故意磨蹭。

在重新服役并进行了海上试航之后，“ 瓦尔德斯号 ” 被派往非洲并把开普敦用作母港。从这个南非港口出发，“ 瓦尔德斯号 ” 可以很方便地沿非洲东西海岸来回航行。尽管它是间谍船一事几乎已成公开的秘密，但是大部分非洲国家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借口：它的任务是监视苏联的导弹试验。事实上，它确实用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在纳米比亚海岸外的大西洋中监视过从卡普斯金亚尔发射的苏联导弹的溅落情况。但是，它的主要任务却是对摆脱殖民统治的非洲新兴国家，以及残存的殖民地内部的斗争情况，实施严密的侦听。

就在“ 瓦尔德斯号 ” 沿非洲海岸缓缓航行（有时它的速度如此之慢，以致有人提出是否在它的船头上画上几朵浪花，好让人觉得它是在动）时，”马勒号 ” 正停泊在母港——佛罗里达州埃佛格雷兹港内，把天线指向卡斯特罗的古巴。

在国家安全局开始为它的侦听船队制定计划之后不久，海军也对这项活动发生了兴趣，于是很快就爆发了争夺控制权的激烈斗争。最后，经过妥协，结束了国家安全局独立经营的局面，并决定增添第二代间谍船。继“ 瓦尔德斯号 ” 和“ 马勒号 ” 之后加人间谍船队的船只不再使用平民水手，也不再归军事海运局指挥，而是由海军配备人员和指挥，船上的侦听活动由海军安全大队负责。这意味着，海军可对自己选定的目标进行侦听，但是不得干扰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国家安全局对国家目标和战略目标的情况（如外交和政治情报）感兴趣，而海军则对外国海军的电信感兴趣。

1961 年 7 月 8 日，第二代间谍船中的第一艘服役。这艘名为“ 奥克斯福德号 ” 的通用技术研究辅助船（AGTRZI）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造的一艘“ 自由级 ” 船只，长 441 英尺，比先前的那艘船只长出了 100 英尺，而且航速也较快，能够急速驶抵目的地，缺点是如果用比其最大航速慢得多的速度航行，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

在 1961 和 1962 年这两年中，“ 奥克斯福德号 ” 都是在南美洲东海岸巡逻，时而也同监视古巴的“ 马勒号 ” 换班。1962 年 10 月，其中一艘船只发现了苏联正在古巴设置进攻性导弹的最初迹象。中央情报局获得这一秘密情报后，派出了一架 U—2 型飞机飞临古巴上空，并且带回了证据。

1963 年，又有两艘第二代侦听船投入使用，这两艘船是“ 乔治城号 ” 和“ 詹姆斯城号 ”。

配有 18 名军官和 260 名士兵的“ 乔治城号 ” 接过了“ 奥克斯福德号 ” 对南美洲的侦听任务，“ 奥克斯福德号 ” 驶向越南沿海。1964 年，在替换“ 马勒号 ” 执行了六个星期的监视古巴的任务之后，“ 乔治城号 ” 驶往委内瑞拉、

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沿海，然后驶回诺福克母港。

1965 年 1 月 5 日，“ 乔治城号 ” 穿过巴拿马运河，沿南美洲的太平洋南下，在智利沿海进行了 3 个月的侦听活动。下半年，“ 乔治城号 ” 是在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度过的。

1966 年，这艘信号情报船主要在加勒比海西南部和拉丁美洲沿海进行侦听活动。在它替换“ 马勒号 ” 执行（现在每年都要这样做）期间，“ 乔治城号 ” 从哈瓦那以北 12 英里的海上捉到了 3 名乘轮渡逃亡的古巴人，这对“ 马勒号 ” 来说也是常有的事。

正当“ 乔治城号 ” 在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活动时，它的姐妹船“ 詹姆斯城号 ” 正协助“ 瓦尔德斯号 ” 的非洲巡逻。1964 年 4 月，它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行第一个作业巡航。它缓慢地驶进地中海时监听了北非的通信，然后又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和穿过红海驶往英国的保护地亚丁（今南也门）时，收集了中东的无线电信号。在亚丁港作短暂停留之后，它继续航行，绕过非洲之角，南下开普敦，然后沿非洲海岸北上，对非洲大陆进行环航。8 月 17 日，这次 31011 英里的航程结束，“ 乔治城号 ” 返抵诺福克港。

两个半月之后，即 11 月 2 日，“ 乔治城号 ” 再次驶越大西洋，沿非洲西海岸进行信号情报活动。在非洲沿海活动时，它时常在开普敦和塞内加尔（今塞内冈比亚）的达喀尔靠岸停留。1965 年春，“ 吉米 T 号 ”（这是该船船员对它的昵称）再次被派往南美的太平洋沿岸。10 月，它驶往远东，协助“ 奥克斯福德号 ” 监视东南亚正在迅速扩大的战争。

第二代海上平台中的最后两艘船是在 1964 年底投入使用的。然而，和前三艘不同的是，“ 贝尔蒙特号 ”（AGTR4）和“ 自由号 ”（AGTR5）是用“ 胜利 ” 级船体改装的，比“ 奥克斯福德号 ”、“ 乔治城号 ” 和“ 詹姆斯城号 ” 长出大约 14 米，马力也略大。

在加勒比海进行了几次试航之后，“ 贝尔蒙特号 ” 于 1965 年 4 月 26 日前往非洲接替“ 詹姆斯城号 ”。但是两天后，该船在大西洋上航行途中接到紧急命令，要它改变航向，前往沿海某地进行监听活动。4 月 28 日，可能是为了保护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之中的美国人，约翰逊总统派遣了 405 名海军陆战队员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 贝尔蒙特号 ” 两天后到达，第二天奉命驶向拉罗马纳接运撤离的 250 名美国人。但在一阵慌乱之后，“ 贝尔蒙特号 ” 没有装到撤离的人员，于是又返回了它的活动区域。到 5 月 5 日，美国已在该岛部署了有 22289 名人员的部队，目的是：“ 帮助防止在本半球出现另一个共产党国家。 ”

“ 贝尔蒙特号 ” 停留在圣多明各沿海，侦听多米尼加的国内和国际通信，直到 7 月 13 日才返回诺福克母港。它把 1965 年中剩下的时间和 1966 年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在智利和秘鲁沿海收集无线电信号,然后于 1966 年秋在委内瑞拉沿海进行了短暂的巡航。

1966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4 时 43 分，正当“ 贝尔蒙特号 ” 在秘鲁的卡亚俄北几英里的海面上航行时，突然发生了剧烈的晃动，持续时间约 20 秒种。该船立刻停车，船员们各就各位。但是，最后弄清这原来是大自然在作祟：“ 贝尔蒙特号 ” 成了有史以来刚好在地震震中上方 155 米的海面上航行的为数不多的几艘船舶之一（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一艘的话）。尽管“ 贝尔蒙符号 ” 没有损坏，但是卡亚俄城和周围地区却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7 年 2 月 1 日，“ 贝尔蒙特号 ” 驶出诺福克港，开始了一次远航。它

沿南美洲东海岸南下，通过麦哲伦海峡（过海峡时遇上了 15 至 20 英尺高的海浪），然后缓慢地驶过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沿途收集的电信材料长达数英里。6 月 9 日，经过 4 个多月的航行之后，这艘疲惫的船只终于靠上了诺福克港的四号码头。

在“贝尔蒙特号”返回母港的五个星期之前，它的姐妹船“自由号”从同一港口启航，沿西非海岸执行它的第四次任务。5 月 22 日，它驶进象牙海岸首都阿比让停留了四天。

在 1967 年的春夏之交，G 组的注意力开始迅速从非洲转向了世界上的另一个地区。“我不愿做大惊小怪的人”，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5 月 19 日在安理会上说，“但是我不能不警告安理会，在我看来，近东目前的形势比 1956 年秋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动荡，或者说蕴藏着更大的危险。”

一天前，埃及总统纳赛尔已命令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离开埃及和加沙地带。以色列拒绝让这支部队调到边界的以色列一侧。5 月 22 日，有报告说，以色列坦克出现在西奈边境上。第二天，埃及发出了动员 10 万名陆军预备役军人的命令。22 日，纳赛尔宣布封锁亚喀巴湾。以色列紧接着在第二天就宣布对亚喀巴湾的封锁“是侵略以色列的行动”。

G 组预料到了发生这种危机的可能性，早在几个月前就制定了应急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将把本该在几内亚湾内零度经纬线相交的海域监听当地目标的“自由号”，尽可能向北部署。这样，一旦需要，它就能火速赶往中东。

但是，G 组也得给“瓦尔德斯号”派点用场。在非洲东海岸外的热带海洋中巡逻了四年多之后，它的船底已附着了大量海洋生物，航速下降到只有三至五节，因此需要返回诺福克港，以便进船坞刮船底。G 组决定充分利用这次机会，让“瓦尔德斯号”返航时从苏伊士运河通过，在缓缓驶过中东和地中海时绘制当地无线电频谱图。雷文回忆说：“坦率他说，当时我们认为把一艘船部署在中东并不十分必要。这样做危险太大。但是，‘瓦尔德斯号’显然是因船底锈蚀才返航的，如果大肆宣扬它是一艘民用船，是因船底锈蚀而返航的，不是来捞什么油水的，那么，也许有可能掩入耳目。”

“瓦尔德斯号”用了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才缓慢而吃力地驶过苏伊士运河和北非海岸（途经以色列、埃及和利比亚）。5 月 23 日，正当它驶至希腊和意大利之间时，华盛顿发出了紧急警报。在埃及宣布实行封锁和边界两边开始增兵后，国家安全局认为把“自由号”派往地中海的时候到了。按照标准程序，申请报告呈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侦察中心，由该中心做出最后决定并签发命令。东部夏季时间下午 8 时 20 分，五角大楼给“自由号”发了紧急电报（最快的一种电报），命令它立即驶往西班牙的罗塔，在那里补给待命。

三个半小时以后，即 24 日凌晨 3 时 45 分，“自由号”收到了电报，到上午 7 时，它已开足马力（十七节）向东驶去，然后转向北方。

在国家安全局，G 组开始把所有会讲阿拉伯语的人员集中起来，然后把他们派往希腊、土耳其的备用侦听站和地中海周围的其他侦听站。“老天爷作证”，雷文说道，“如果你会讲阿拉伯语，又在国家安全局工作，那你准得上飞机。”

“自由号”急需阿拉伯语专家。由于它的侦听目标原是西非，所以船上只有 4 名法语专家。因此，6 名阿拉伯语专家——3 名现役海军陆战队士兵和

3 名国家安全局文职人员——飞往罗塔，与“ 自由号 ”汇合。“ 瓦尔德斯号 ”也按计划前往罗塔汇合。“ 瓦尔德斯号 ”上带有中东无线电通信的全部重要情报。据雷文称，这些情报包括“ 什么人在使用什么通信线路——电传打字电报、电话、微波等等 ”。

6 月 1 日晨，“ 自由号 ”驶进罗塔港，加了 38 万加仑燃料，补充了食物和其他物资。语言专家们和“ 瓦尔德斯号 ”（已返回诺福克港）上的大量信号情报资料已经在等着它了。

按照国家安全局最初的计划，“ 自由号 ”将在当天启程，驶向克里特岛的东端，并停留在那里。根据“ 瓦尔德斯号 ”进行的一次侦听条件研究，他们认为：由于空中好象有一根“ 导管 ”，克里特岛沿海的某一位置对于侦听整个中东的无线电通信是非常理想的。“ 你可以在克里特岛上收看开罗的电视节目 ”，雷文说道。“ 如果你在基本上风平浪静的海上，信号传播的情况好极了。 ”

“ 自由号 ”到达罗塔几小时后便把资料、补给品、语言专家和侦听资料全部装上了船，但是船上独特的“ 技术研究船专用通清系统 ”爱出毛病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系统中有一架装在活动平台上的直径 16 英尺的盘状天线，它能将 1 万瓦的微波信号发射到月球上的一个特定点，然后再反射给马里兰州切尔腾汉接收站，或者海军的其他信号情报船。技术研究船专用通信系统的优点是能够迅速地传送大量情报，既不把船舶的位置暴露给敌方测向设备，也不会受到外来信号的干扰。但是，它的主要缺点是很少能够正常工作。

问题出在使天线不顾船身晃动而始终对准月球的复杂的液压系统上。由精密传感器和高级计算机驱动的各种液压装置，从未使庞大的盘状天线正常转动。紫色的液体常常从下面的扩建圈里喷出来。这样一来，无线就不能使用了。除了液压系统之外，它的另一个缺点是，只有当“ 自由号 ”和接收站都能清楚地看到月亮时，才能进行通信。

液压系统这次出毛病的原因是，诺福克造船厂错误地在需要高压部件的部位安装了低压部件。附近一艘潜艇修理船的一组工人用了一整夜时间安装了一些新部件，并且设法使这个系统可以使用了，但是他们警告说，这只是临时凑合一下。

第二天早上，“ 自由号 ”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全速驶向作业区。三天后，即 6 月 5 日，当它驶过西西里岛南海岸时，以色列突然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空袭，将这些国家的空军歼灭在地面上。与此同时，它的坦克向西奈半岛腹地推进。

在晴朗明媚的 6 月 8 日上午，“ 自由号 ”于 8 时 49 分到达“ A 点 ”。根据到达罗培时收到的绝密行动命令，该船将不驶往克里特岛，而是驶往距埃及西奈半岛东海岸 13 海里处（即”A 点 ”），在那里转向西南，并开始以五节的航速沿以塞得港（“ C 点 ”）为终点的 90 英里长的曲尺形海岸巡逻。然后，除非收到新的命令，否则沿原航线返回。由于埃及领海为 12 英里，以色列为 6 英里，因此“ 自由号 ”奉命不得驶人距两国海岸 12.5 英里和 6.5 英里以内的海域。

在“ 自由号 ”到达西奈沿海的大约 10 小时以前，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分析员急匆匆地来到 G 组组长雷文的办公室，用怀疑的口气问道：“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告诉我，你知道‘ 自由号 ’在哪儿吗？ ”雷文认为它仍按原计划停留在克里特岛的东端。他刚要回答，这位分析员就迫不及待他说道：“ 他们

让它直朝海滩开去了！”

“这个时候”，雷文回忆说，“我命令上告，要求把‘自由号’赶快调离那个地方！对我们（国家安全局）说来，让它靠碍那么近，不会获得什么东西。它在那里所干的事情，在我们要它去的地方也能做到……它（在克里特岛海岸）可以完成国家需要它完成的所有任务。”

但是，海军显然对“自由号”另有打算。“有人想要侦听附近的某些战术计划或战术通信”，雷文说，“或者一些谁也不需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我们侦听的是上层的情报。”

海军勉强同意把船撤回来。东部夏季时间下午 6 时 30 分（“自由号”船上时间 6 月 8 日中午 12 小时 30 分），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侦察中心发了一封电报，命令“自由号”不得驶入距埃及 20 英里以内的海域和距以色列 15 英里以内的海域。1 小时 10 分钟后，联合侦察中心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美国驻欧洲海军总司令部指挥中心的值班军官，指示该船不得驶入距海岸 100 海里以内的海域。下达口头命令之后，华盛顿下午 9 时 10 分（“自由号”船上时间凌晨 3 点 10 分）又用电报发出了一份书面命令，此时距“自由号”到达“A 点”还有 5 个半小时多。

但是，这些警告都没有传到“自由号”上。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后来把这次事故称之为“国防部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通信失灵事故之一”。因此，到达“A 点”后，“自由号”开始沿西奈海岸缓缓地向塞得港和苏伊士运河口驶去。

这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号”头顶上总有以色列侦察机在低空嗡嗡地飞来飞去。这种盒状的法国北方公司 2501 型“诺拉特拉斯”式运输机，通常是用于运送货物和部队的，然而有几架已被改装成了信号情报侦察机，并且开了几个镜头孔，用于照像侦察。这种貌似美制 C—119“飞行车厢”的双尾翼飞机在该船上空盘旋几圈后，便向特拉维夫方向飞去了。还有几次，高空喷气式战斗机也来盘旋几圈，然后离去。

下午 1 时 10 分，“自由号”船长麦克戈纳格尔海军中校发出各就各位的命令。“现在进行训练！现在进行训练！……各就各位”，他对着船上的广播系统大声喊道。这是四天中的第三次训练，这次训练是由岸上正在使用毒气的新闻报道引起的。尽管后来查明这些报道是错误的，但是这次训练给麦克戈纳格尔海军中校提供了一次机会，促使船员们更加认真地看着这场已经进入第四夭的几乎看不见的战争。他指着阿里什西面 20 英里的海岸上熊熊燃烧的大火和滚滚上升的浓烟，要求船员们睁大双眼，保持警惕。

此时，战争已经变成了单方的大屠杀。一开始突袭，以色列空军就掌握了整个中东的制空权。在最初的几小时里，以色列的喷气式飞机轰炸了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到埃及尼罗河上游卢克苏尔（那里的一个机场上停满了轰炸机）的 25 个阿拉伯空军基地。在西奈，以色列坦克和装甲输送车沿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向苏伊士运河推进。接着，以色列军队使用机沧、迫击炮、坦克和飞机攻占了那路撒冷约旦管辖区和约旦西岸，以军鱼雷快艇夺取了红海上的重要港口沙姆沙伊赫。一位以色列将军估计，仅在西奈一地，埃及的死亡人数就达 700 至 1 万人，而他自己的军队仅阵亡 275 人。

到 6 月 7 日（星期三），几乎所有的抵抗都被粉碎了。然而，以色列战争计划中的重要部分是对下述细节绝对保密：以军深入阿拉伯领土有多远，以及它取得的军事胜利有多大。尽管可能长久地防止任何超级大国强迫停

火，这对于以色列的战略说来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推论，战争持续得越长，以色列夺占的领土就会越多——况且，以色列对叙利亚还另有尚待实现的打算。因此，美国海军历史学家理·史密斯在《美国海军协会文集》上著文说：“任何揭开精心蒙在通常的‘战争迷雾,外面的烟幕的企图,均须予以粉碎。”

1 时 50 分，麦克戈纳格尔海军中校使全船完成了战斗准备，并在雷达屏幕上查看了该船所处的位置：它仍位于距西奈海岸线 14 英里的国际水域内。2 时，了望哨报告，右舷 5 英里处发现一架喷气式飞机在大约 5000 英尺上空同该船航向平行飞行。

不一会儿，更多的喷气式飞机晴空霹雳般地从船尾方向猛飞过来，紧贴着桅杆飞过。“自由号”变成了一座海上地狱。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摇撼着船身，驾驶台被桔黄色的火球和黑烟吞没。几秒钟后，它们又飞了回来，原来是以色列的“幻影”式和“神秘”式战斗轰炸机。火箭、燃烧弹把船员们炸得血肉横飞，和钢铁一起火化为灰烬。随后，又是一阵猛烈的扫射。

飞机往返穿梭，几乎每隔 45 秒钟就飞过船顶一次。以色列制造的炸弹是专用于击穿最厚的坦克装甲的，它们像子弹打穿硬纸板那样打穿了“自由号”的钢板，炸成了大大小小的锋利破片，把船员们杀死在船体深部的生活舱里。接着，更多的装有凝固汽油的银白色燃烧弹把这艘船只变成了一座焚尸炉。

不一会儿，这次空袭就像开始时那样突然结束了。八个已经死去的和奄奄一息的人躺在甲板和舷梯上，其中有大副和业务长。一百多人受了伤，其中许多人伤势严重。麦克戈纳格尔的右腿也被弹片划开了一条很宽的血口子。雷达和大部分无线电设备随着天线（显然是主要目标之一）一起被炸飞了。电罗盘这个重要设备也遭到了破坏。舱壁和甲板被打得千疮百孔，活像灰色的瑞士奶酪，其中有 800 多处弹孔大得能伸进一只拳头。

空袭过后，船贝们把缺胳膊断腿同伙抬上用铁管和方格铁丝网临时制成的担架，负责防控工作的船员冒着呛人的浓烟和炙人的热气在过道中穿行，军士长的休息室里堆满了被血浸透了的床垫，上面安放着肢体破碎的尸体，一片可怕的景象。

2 时 24 分，空袭过后几分钟，恐怖再次出现，三艘以色列鱼雷快艇排成战斗队形急速冲向“自由号”。中间的快艇发出信号，但被浓烟遮住了。空袭摧毁了“自由号”的信号灯，回答对方发来的信号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了。

突然，鱼雷快艇上的 20 毫米和 40 毫米机关炮开火了，一枚穿甲弹穿过海图舱进入驾驶室，最后打在一名年轻舵手的脖子上，他当即身亡。还有 3 名船员也被这阵乱弹射死。

这会儿，以色列入准备大开杀戒了。“防备鱼雷袭击，右舷！”麦克戈纳格尔海军中校对着话筒大喊道。2 时 31 分，一颗鱼雷越过船尾，过了一会儿，第二颗鱼雷击中了“自由号”右舷前部，弹着点恰好在吃水线之下，那里正好是信号情报设备舱。

轰！船程序结构上立刻炸出了一个 40 英尺宽的大洞，又有 25 名美国人（其中大部分是隶属于海军安全队的熟练技术人员）不是被炸成了碎块，就是被涌进船舱的黑色海水淹死。

停在那里不能动弹的“自由号”开始向右倾斜，那几艘法国制造的 63 吨鱼雷快艇围着“自由号”转圈子，向船上救人的人射击。3 时 15 分，接到“准备弃船”的命令之后，一名船员找出了最后 3 只救生橡皮艇，用粗绳系牢之后扔出船外，以备接到最后命令时使用。这一行动被以色列人看到了，

他们无情地开火打漏了其中的两只，打断了第三只上的缆绳。当这只橡皮艇漂过鱼雷快艇时，他们将它拖上船，好象是收到一件报答他们残酷屠杀的古怪礼品。

几分钟后，亦即这次攻击开始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这几艘航速四十二节的鱼雷快艇掉转船头，向阿什杜德基地疾驶而去。差不多与此同时，就像是在等待演出这场血腥戏剧最后一幕的命令似的，两架喷气式战斗机再次从船尾方向出现了，另外还有两架载满以色列士兵的“大黄蜂”式大型突击直升机也在受伤的船只两侧盘旋。“准备反击登船者！”“自由号”的扩音器里传出了船长大声呼喊的命令。但是紧张了几分钟之后，这四架飞机就像出现时那样神秘地飞走了，撇下“自由号”任其缓慢地沉入水下坟墓。

但是，“自由号”不想就这么完蛋。在攻击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无线电报务员们临时拼凑起几部电台设备和被打坏的天线，向第6舰队发出了危急信号。尽管以色列人实施了强烈的干扰，电报还是发到了目的地。在克里特岛附近游弋的“美国号”航空母舰，将四架执行戒备任务的 F—4“鬼怪”式喷气战斗机弹射升空，向位于东方400英里处的“自由号”飞去。但是，因为是执行戒备任务，这四架飞机显然只携有核武器，过了不大一会儿，它们便按照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命令返航了。

“美国号”和在附近航行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的水兵动手将核武器卸下，然后再装上常规炸弹和火箭发射架，这是一件很费时间的工作。武器换装完毕后，四架携有“麻雀”式和“响尾蛇”式导弹的 F—4“鬼怪”式飞机以及四架机翼下悬挂着“小斗大”式导弹的A—4“天鹰”式飞机，从“美国号”航空母舰甲板上紧急起飞。与此同时，四架装有活塞式发动机的道格拉斯A—1从“萨拉托加号”上弹射起飞了。飞行员奉命“必要时使用武力，包括实施摧毁。”

美国第6舰队电信活动突然大量增加，这显然使以色列的电信分析人员轻而易举地发现该舰队已经转入了对付危机的状态。在这之后不久，以色列政府发起了外交攻势，力图使华盛顿相信这次袭击是误会。4时10分左右，以色列人通知驻特拉维夫美国大使馆，它的防御部队“错误地”向西奈沿海一艘美国船只开了火，并且表示了歉意。四分钟后，这个通知用电报发给了华盛顿和第6舰队，接着第6舰队立刻召回了它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4时32分，“自由号”上又响起了令人极为恐怖的喊声，“飞机和鱼雷快艇向右舷靠近。防备右舷的鱼雷攻击。”

主甲板下层临时建立起来的医务所里立即出现了恐慌。治疗伤员的人员对刚才的鱼雷袭击仍然心有余悸，于是都慌忙爬上梯子，他们治疗的那些人也都不想留下来等死，纷纷拔掉静脉输液管争先恐后地逃命，以致把扎好的伤口都挣破了。身上也带着伤的下级军官佩特看到这场混乱后挺身而出，设法使大家回到原处，使局面相对地平静下来。

但是，这些喷气式飞机从头上飞过时并没开火，而204吨的“塔马斯号”鱼雷快艇似乎是想打灯语进行联络，可是谁也弄不清它发的信号是什么意思。最后，以色列艇长用英语对着手提式扩音器喊道：“你们需要援助吗？”气得发抖的麦克戈纳格尔海军中校通过他的航信士官向“塔马斯号”作了回答，他所用的字眼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词汇手册中可能是查不到的。

6时41分，以色列人再次企图和“自由号”联络。一架西科尔基公司制造的的直升机在“自由号”上空出现，将一个信件包投到甲板上。包里装有

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海军武官特斯尔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们有伤亡吗？’只要向下看看甲板上流淌的血水和仍躺在 51 号机枪座架旁边的两具尸体，就知道答案了。“自由号”企图用奥尔迪斯信号灯进行回答，但是对方显然没弄懂灯语是什么意思。大约 10 分钟后，直升机便飞走了。

尽管在它 22 年前建造的船身上有一个 40 英尺宽的大洞，船体向右舷严重倾斜，大部分设备被打坏，32 名船员死亡，余下的人有三分之二受伤，大副被打死，船长腿部受伤，鲜血染红了鞋子，但是“自由号”又英雄般地死而复生，缓慢地驶向比较安全的海域。

在这个漫漫长夜里，麦克戈纳格尔海军中校躺在驾驶室靠左舷的一把椅子上，靠着北极星和船尾的航迹指示方向，继续指挥该船前进。黎明后不久，“自由号”同美国海军驱逐舰“戴维斯号”和“梅西号”汇合了。在驾驶室里连续度过了 18 个小时后,疲惫不堪的船长终于向他那被炸得不成样子的船舱走去。直升飞机很快到来了，将几十名伤员运送到“美国号”的甲板上。从那里，重伤员被用飞机送往雅典，然后再送往那不勒斯的海军医院。然而，在该船停靠在马耳他港之前，麦克戈纳格尔海军中校一直没有离船。用五个星期在于船坞里对“自由号”进行临时性修理之后，他把这艘船只开过大西洋，回到了诺福克附近的小克里克两栖基地十七号码头，其时是 7 月 29 日。6 月 9 日，亦即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以色列政府就此事向驻特拉维夫美国大使馆作了解释。它声称，排水量 1.68 万吨、船长 455 英尺的“自由号”被错当成了船龄为 38 年的埃及运兵船“库塞尔号”（该船排水理 2640 吨，船长 2752 英尺，是一艘运载 400 人和 40 匹马的近海轮船）。

但是，在袭击开始前，“自由号”已处于以色列严密监视之下长达 6 个多小时。有 4 次，载有信号情报和照相设备的经过特别改装的飞机曾在该船上方作低空盘旋，有时高度仅有 200 英尺，几乎擦着船上的桅杆。另外有两次，几架战斗机也从该船上空飞过，并且还盘旋了几圈。

鉴于这种监视的程度，如果说以色列入把“自由号”同“库塞尔号”弄混了，似乎绝对不能让人相信。这艘装有大量天线和一座微波月面反射盘状天线的美国信号情报船，同埃及海军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海军的舰船毫无共同之处。船头和船尾两则用白漆书写并饰有黑边的巨大识别符号“GTR5”，也是不会让人认错的。在袭击前 10 天，“自由号”船头上将近 10 英尺长的“5”字刚刚用白漆重新刷过。另外，“自由号”船尾上的船号是用英文，而不是像埃及海军舰船那样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同样，以色列人巧妙地加以干扰的不是阿拉伯语电信，而是英语电信。

旗子也不一样。那天上午，5 英尺宽、8 英尺长的 9 号标准船旗，悬挂在驾驶台上面几乎高达 100 英尺的三角形前桅杆,在 9 至 12 节的海风中猎猎飞舞，一眼就能看见。每次有飞机飞过时，船员们都要检查一下船旗。然而，以色列人却诡称发现这艘船只时根本没有看见什么旗子。在以色列空军把旗子击落后，才真的没有旗子了。可是后来，至少在鱼雷快艇向该船瞄准前五分钟，在船旗被打掉的地方又升起了一面 7 英尺宽、13 英尺长的巨幅节日船旗。

以色列以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的情报机关之一——”摩萨迪”而自诩，它不可能不知道“自由号”是一艘美国信号情报船。更不可能的是“摩萨迪”在战争前夕会不知道“库塞尔号”这艘老掉牙的船只事实上正靠在亚历山大港的一个码头上生锈，距“自由号”被袭击的的海域 250 英里。在整个冲突

中，它一直呆在那里没动。

曾在“自由号”上工作过的一名军官恩尼斯在《自由号遇难记》一书中指出：“以色列政府一定是急于找一头替罪羊才挑出了‘库塞尔号’。在整个埃及海军中有不少经过改装的苏联和英国制造的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还有几艘扫雷舰、几艘快艇、两艘游艇和唯一的一艘运输舰——“库塞尔号……谁也不能诡称错把‘自由号’当成了一艘驱逐舰、一艘潜艇或那艘从前的皇家游艇，只能把它错当成‘库塞尔号’，因为毕竟只有‘库塞尔号’能被当成替罪羊。”

史密斯博士也有同感。他在一篇分析“自由号”被袭击的文章中写道：“的确,以色列入挑中这艘埃及船,很可能只是因为它的样子最像‘自由号’，尽管要很费一番想象力才能看出二者有点相象。”

如果正好如大量证据表明的那样，以色列的解释是编造的，袭击是有预谋的蓄意进行的，那么，进行这次残忍暗算的原因是什么呢？一种可能性是：“自由号”被袭击正是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它是一艘海上的侦听工厂，正在透过以色列人施放的烟幕，用磁带录下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暴露真相的无线电通话。

“自由号”上奇形怪状的天线——套管单极无线、抛物面天线、八木无线和对数周期天线，以及戴着圆鼓鼓耳机的侦听员，比一船步兵和马匹对以色列的威胁更大。以色列高级官员是不是害怕截获的信号可能会证明，这场战争不像以色列最初所声称的那样是埃及动用地面和空中部队对以色列发动的，而是由好战的以色列自己发动的？

原定 6 月 8 日（星期四）发起的最后行动——入侵叙利亚，在“自由号”驶进东地中海的同时突然推迟了。常常出毛病的技术研究船通信系统刚刚开始向华盛顿发报，不一会儿该船就遭到了首次空袭。在四门摆样子的 50 毫米机关炮被摧毁后，第一批攻击目标就是天线，使技术研究船通信系统只发出一半电文就中断了通信联络。鱼雷正好击中第 53 和第 66 条肋骨之间装有信号情报设备的二号舱。在“自由号”挨过最后几枪之后不到 24 小时，被推迟的入侵叙利亚的行动终于开始了。以上种种可能都是巧合，但是也许并不都是巧合。

美国政府的反应几乎同这次袭击事件一样异乎寻常。一个外国屠杀美国军人，把其中 34 人送进坟墓，并把另外 100 多人送进医院，后来可能还送进了精神病房。一艘几乎没有武装的美国海军船只在国际水域遭到射击，遭到火箭的痛击，遭到鱼雷袭击，被凝固汽油弹炸中起火，然后当船只下沉时疯狂的机枪射手们又把救生艇打坏。事后，这个外国对此表示歉意，并提出一种使人感到受了侮辱的解释，而美国政府却接受了这种解释，把整个事件捂了起来，然后再把此事的几乎一切细节都列为绝密。

难以让人理解的是，这细节材料中，有几份是同以色列的声明直接矛盾的情报报告。根据中央情报局 1967 年 7 月 27 日的一份报告称，一位大概在以色列政府中工作的秘密提供消息的人士说，毫无疑问，以色列在发动袭击前知道这是一艘什么船。这就暗示了这次袭击并没有选错对象：

他说：“你必须记住，在这次作战行动中，既没有犯错误的时间，也没有犯错误的余地。”这句活是想要含糊地表明，以色列部队知道“自由号”挂的是什么旗子，并且也确切知道该船在沿海干什么。（这个人士）暗示说，至少在袭击开始前 6 小时，就查明了该船的身份，但是，以军总部不清楚有

多少人可能看到“ 自由号 ”正在侦听的情报。他暗示说，这种情报的去向不能确定，也不能加以控制。他再次说明以色列部队在这次作战行动中并没有犯错误。他向我强调说，他们知道美国的“ 自由号 ”是一艘什么船，也知道它正在沿海干什么。

几个月后，这份报告被另一些秘密提供消息的人士证实了。他们明确他说，这次袭击是故意发动的，命令是国防部长摩西 · 达扬亲自发出的。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显而易见，应由两国政府作出充分解释。

第二节富比尼梦想建立一支最宏大的船队

在“ 自由号 ” 被袭击的两年前，即在 1965 年春，美国就已经在制订第三代侦听船的计划了。尽管这时美国的侦听船已达 7 艘，但是这些船只都是针对内陆的政府、民用和军事通信这些战略目标的，并且几乎只向国家安全局一家负责。

多年来，这种状况一直是海军的一块心病。在所有涉及海洋的问题上，海军向来习惯于大权独揽。因此，当国家安全局开始为“ 瓦尔德斯号 ” 和“ 马勒号 ” 两艘民用船制订计划时，海军很快就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且坚决主张：今后，所有的信号情报船都必须是配备海军船员的传统海军舰船。

但是，这时海军已经成为受雇于国家安全局的海上“ 车夫 ”，只有在不干扰主要任务——侦听国家安全局的目标的情况下才能搞自己的目标。因此，在进行自己的信号情报活动（主要是针对外国海军的信号通信）时，海军不得不把它的分析人员塞进不舒服的、外面布满天线的篷车里，把它们装上驱逐舰和护卫舰，然后解除这些舰只的正常勤务，让它们沿遥远的海岸缓慢地巡逻。这种侦听活动的效率极低。这样做实际上是以极高的代价把驱逐舰用作运输工具，运送一种只具有极小情报收集能力的、空间狭窄的钢制盒子。

这些驱逐舰和护卫舰是非常容易惹事生非的。陈旧的、经过改装的补给船沿海岸线缓慢来回航行，不会引起别国的注意。但是，如果抉成一艘美国军舰，各国就很有理由提高警惕了。1964 年，“ 马多克斯号 ” 和“ 特纳 · 乔伊号 ’两艘驱逐舰在东京湾航行时就是执行这种任务 (代号是“ 德索托巡逻 ”) 的。据称，那一次，它们遭到了敌方鱼雷快艇的袭击。这一事件导致了美国首次轰炸北越。

对这种情况最感烦恼的，是卡特将军的对头富比尼博士。富比尼当时 51 岁，任国防部助理部长兼国防研究与工程署副署长。作为五角大楼的电子间谍头目,他特别关心的是苏联拥有的由大约 40 艘信号情报拖网船组成的庞大船队。这支船队不仅常常在诸如诺福克和肯尼迪角这类敏感地区的沿海游弋，而且还常常尾随在地中海和太平洋活动的美国海军舰船。

“ 这些拖网船在跟踪我们的舰队 ”，富比尼有一次回忆说，“ 妨碍我们，侦听我们，记录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他们知道我们的战术和我们的装备和技术参数。他们可能对我们的装备知道得比我们还多。因此我开始纳闷：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他们的样子？我们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如果我们和他们混在一起，我们就能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了。 ”

富比尼关于照苏联人的样子建立一支美国间谍船队的设想很快就被海军作战部长麦克唐纳海军上将所接受。麦克唐纳在担任第 6 舰队司令时，就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充分了解。1965 年 4 月 20 日，富比尼、麦克唐纳同海军情报局长泰勒海军中将及国防情报局负责收集活动的助理局长哈尔芬格海军少将会晤，一起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方法。

富比尼最初梦想建立一支最宏大的船队。他设想这个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在头两个阶段中改装 30 艘“ 金枪鱼捕捞船 ”，每艘花费约 100 万美元，在第三阶段再增加 40 艘新船。然而，在批准预算的过程中，令人头脑清楚的现实使这个梦想不得不有所收敛，头两个阶段中改装船只的数量减到了 3 艘，第三阶段新造船数也减到了 12 艘，最多不得超过 15 艘。同时，使用金

枪鱼捕捞船的设想被否定了（因为这种船只太差，不适合安装沉重的信号情报设备），而代之以轻型辅助货船（一种轻型货船，有的比许多拖船还小）。

这次会晤之后不几天，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在大约 6 个星期后提出了一项分两个阶段实施的建议。起初，海军派一艘这样的船只在西太平洋活动，大约 1 年后，再在同一地区增加两艘船只。如果这两步完成得很好，海军便可着手建造一批船只，组成一支小型船队，以便在世界各地的出事地点使用。这项计划很快便得到了富比尼的上司——国防研究与工程署署长布朗以及国防部副部长万斯的批准。

被选入海军间谍船队的第一艘船只是“旗帜号”，它原先主要是在马里亚纳群岛的环礁之间往来运货，现正返回美国，准备退役封存。这是一艘不起眼的小船，排水量 935 吨，船长 176 英尺，已有 21 年船龄，同“自由号”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

在 8、9 两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旗帜号”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的吉特海峡海军造船厂进行改装，变成了一艘“通用环境研究辅助船”（AGERl），这其实是对一艘第三代海上侦听船的委婉称呼。10 月 1 日，在进造船厂的短短 7 个星期之后，“旗帜号”离开了布雷默顿，直接驶往日本的横须贺，15 天后到达那里，开始执行首次巡逻任务。

根据发给“旗帜号”的绝密命令，该船这次任务的代号是“磕头虫行动”，它要在日本海作一次为期四至六个星期的巡逻，“对苏联海军部队和其他临时目标实施战术监视和情报收集活动”。这项命令还写道：

C·在启程驶往巡逻区时，“旗帜号”应办理脱离航行报告系统的手续，然后在驶往指定的巡逻区时严格保持电子静默，直到被苏联集团的部队发现并加以监视为止。那时，“旗帜号”应解除静默，并发回定期报告。当苏联集团停止对“旗帜号”进行监视时，“旗帜号”应恢复电子静默。

D·到达指定巡逻区时，“旗帜号”有权在指定的巡逻区自由航行，以便对苏联海军有价值的部署和演习实施侦听。

这项命令还规定了一些限制，其中包括警告该般“离开苏联集团宣布的领海至少 1 英里，距海岸线的总距离应为 13 英里”。

到达横须贺后，“旗帜号”几乎立即就出发进行首次巡逻。这是一次十分危险的任务，它将按计划航行到距西伯利亚波罗特内角海湾 4 英里以内的地方。多年来，从这个海湾的口上向外延伸 12 英里是苏联的领海。美国对这一领海要求提出了异议，认为苏联的要求与国际法中的“基线”概念不符。“旗帜号”的使命是去试探一下苏联人对其领海要求所持的态度有多认真。

就在“旗帜号”嚓嘎嚓嘎地驶往西伯利亚时，一场寒冷的风暴使该船的前方和上层建筑开始结冰。航行到离西伯利亚更近一些的地区时，苏联的驱逐舰和巡逻艇开始对这艘在大海的浪涛中颠簸的拖网船实施骚扰，它们飞快地冲来冲去，有时开到离“旗帜号”25 码以内才掉转船头。但是，由于新的风暴即将来临，“旗帜号”船长毕晓普海军上尉深恐船上结的冰大重，会使船只倾覆，因此他给横须贺的总部发报，然后转舵 180 度返回日本。几个小时后，收到了回电，命令他继续前进，并告试他不要害怕。毕晓普服从了命令，重新掉转船头向风暴驶去，但是，由于在此后 24 小时中只航行了总共不到两英里，终于打了退堂鼓。

在尔后的 3 年中，“旗帜号”，一共执行过 15 次类似的任务。头 7 次是在日本海，主要是监视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主要海军基地。在

其余的 8 次中，有 3 次是在中国东海沿岸，最后的 5 次又回到了日本海。在“旗帜号”的 15 次巡逻中，有 10 次都遇到了危险，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上海外海，当时有 11 艘中国铁壳拖网船向“旗帜号”逼近，毕晓普海军上尉采取规避运作摆脱了危险，没有出事。

海军最初只想让“旗帜号”在苏联沿海活动，理由是在那里遭到危险的可能性最小，因为“旗帜号”的行动只是对苏联类似的监视活动的回敬。然而，跟中国或北朝鲜却没有这种对等的关系，因此担心他们会对该船采取报复行动。尽管如此，在国家安全局施加极大压力之后，海军同意派出“旗帜号”去监视这两个国家。国家安全局之所以向海军施加压力，是因它发现“磕头虫计划”超出了期望，大有油水可捞，因而渴望获得更多的东西。

美国海军实施“磕头虫计划”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摆脱在国家安全局的 5 艘大型船只上所处的寄人篱下的地位。现在这种情况完全变过来了，海军自己选择目标，而国家安全局只能在不妨碍完成海军任务的条件下安排自己的任务。但是，国家安全局发现这个计划的油水太大，不能让海军独吞。因此，它迫使海军妥协，使其中的一些航次主要为国家安全局执行任务，而其余的航次则主要要由海军来掌握。

在“旗帜号”离开布雷默顿，驶往横须贺不久，海军开始执行信号情报计划中的第二步，找到了两艘沿海货船，并把它们改装成通用环境研究辅助船。这两艘船只的番号是 FS—344 号和 FS—389 号，一看就知道是陆军补给船。它们很快就改名为“普韦布洛号”（AGER2）和“棕柯海滩号”（AGER3）。1966 年 4 月，它们被拖到布霄默顿，由于改装工作遇到了许多困难以及预算彼削减，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改装完毕。1967 年 12 月 1 日，“普韦布洛号”终于驶向横须贺港，去同“旗帜号”汇合。

在 1967 年的整个秋季，正当“普韦布洛号”进行海上试航时，一份供“旗帜号”和“普韦布洛号”使用的为期 6 个月的计划制订出来了。这份计划要求这两艘船只出航九次，其中一次在北朝鲜沿海，两次在苏联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外，两次在东中国海，另外四次在日本海。在这九次出航中，国家安全局要求至少五次用于主要执行它的任务。

第一次任务由海军组织，交给“普韦布洛号”去执行。这次任务要求“普韦布洛号”“摸一摸朝鲜北部东海岸的电子环境”，并“对在对马海峡活动的苏联海军部队实施侦听和监视”。对危险性的估计为“最小”。一位官员说，“根据 150 年来从未出事来估计”，这次出事的可能性不会有多大。

根据标准程序，将“普韦布洛号”此次执行任务的申请报告逐级上报，最后被夹进了一个封皮上用粗大字体写着“1968 年 1 月侦察计划”的厚记事本。这个活页夹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侦察中心掌管的，里面夹有将在下个月进行的数百次监视行动的简单内容。这些监视行动可能包括从派 SR—71 型飞机对中国实施越顶飞行，到派潜艇去北海搞侦听，一应俱全。

一俟收文截止，这本“厚得像商品目录一样”（一位前官员语）的记事本就被送往各有关机构进行批准、否定或提意见。12 月 29 日（星期五），装有“普韦布洛号”计划的记事本被发了出去，并在同一天送回。计划及时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务院的批准。当天晚些时候，它还得到了国防部副部长尼采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的三〇三委员会的批准，没有人提出意见，也没有人表示不同意。

但是，有一个人疑心不散。这个人是一名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退伍海军

军士长，他对“普韦布洛号”只会遇到最小危险这一估计感到非常不安。他知道，作出这种估计是国防情报局的事，国家安全局没有责任。再说，该船这次是为海军执行任务，国家安全局就更没有责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越来越感到不安，因此便将他的忧虑报告了上级。最后，负责信号情报活动的助理局长帮办同意了他的意见。尽管他以前从未对国防情报局的估计表示过不同看法，但是这次他觉得有理由发出“警告”，他写信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采取行动”：

下述情况供你们评价太平洋总部对危险所作的估计时参考……自从1956年年初以来，朝鲜空军已经增加了支援海军的任务。朝鲜海军在朝鲜北部海岸线附近一发现南朝鲜的任何海军舰船或渔船，便作出反应……朝鲜一般不承认其东海岸地区国际公认的空中活动分界线……上述情况供考虑向舰船提供保护措施时参考，而并非有意反对太平洋舰队的部署计划。

这封信于当晚10时28分送达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通信室，然后转给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该中心值班军官决定把它呈交联合侦察中心主任斯特克利准将，并把信的副本呈交海军作战部长处。

1月2日，斯特克利将军回到他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看到了国家安全局的警告信，但他根本没有告诉联合侦察中心和国防情报局。相反，他把这封应予优先处理的信的性质从“采取行动”改成“反映情况”，然后把它送给夏威夷太平洋总部，连具体交给哪个办公室都不标明。因此，这封信送达太平洋总部后，只是交给了几名下级军官。他们看见了信封上所标的是“反映情况”的记号，因此没有采取行动，只是看了一下，将它归档，并且很快就忘掉了。

“自由号”当年所经历的情况再次发生了：国家安全局发出了警告，然后就被军事通信系统吞没了。1968年1月5日，没有保护的“普韦布洛号”驶向朝鲜。18天以后旧景重现，一名惊恐万状的无线电报员向太空发出了无济于事的信号：“我们需要支援。SOS、SOS、sOs。请援救。请援救。请援救。SOS、Sos、SOS。敌人正强行登船。”

到天黑时，一名船员死亡，其余船员被俘，在7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美国就损失了第二艘信号情报船。但是，美国实际上损失得更多。18个月后，笔墨官司开始了。又过了6个月，美国信号情报船队所剩的几只很诀就退出了现役。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船只就被当做废铁卖掉了。

第三节针对美国民众规模最大的侦听行动

国家安全局局长艾伦面对穷追到底的新闻界和日渐咄咄逼人的国会各委员会的揭发活动感到惶恐不安，他于 1975 年 5 月 12 日亲手写了一份供存档的备忘录，终于结束了代号为“苜蓿”的行动，参议院情况委贝会主席丘奇曾把这一行动称为“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侦听行动”。

“苜蓿”行动是在将近三十年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时开始的。当广岛和长崎上空还在飘落着放射性尘埃时，杜鲁门发布了第九〇三一号总统行政命令，指示 11 月 15 日前完全撤销检查部门，停止对电报的检查制度。

通信安全局局长科德曼准将很懂得看不到电报而想搞电信情报是什么滋味。为了获得全部重要的电报，他认为很有必要和三大电报公司私下达成一项绝密协议。因此，他派了两名心腹，于 1945 年 8 月 18 日到纽约市去争取各商业通讯公司的首脑同意他们截取一切进出美国或由美国中转的外国政府电文，并对截获的电文进行拍照处理。

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通讯分公司的首次会晤一无所获，然后两人去找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副董事长。这位副董事长要美国司法部长先认定这类截取活动不违法，才肯提供合作，次日，两人再度前往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公司负责人也表示，只要司法部长判定这个计划不违法，公司就愿意合作，他们又紧接着来到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部，会见该公司的董事长，要他参加这一“爱国”行动。公司董事长表示愿意合作，但和其他公司一样，要等司法部长点头后才肯作出最后决定。

几天后，三家公司的董事长会见了他们的律师。这些律师都异口同声地劝告他们不要参与截取活动。但这三家公司没出几个星期，还是不顾公司法律顾问的警告，参加了这项名为“苜蓿”的活动，到 1945 年 9 月 1 日，日本还没有在投降书上签字，第一批电文就秘密送到了通讯安全局。

虽然三家通讯公司都同意参加“苜蓿”活动，但是卷入的深浅程度和合作方式却大相径庭。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意安全局接触通讯分公司（现名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世界通讯分公司）所有进出和中转的电报，双方同意：“将全部电文印刷成缩微胶片，一切外国政府的电报除原始缩微胶片外，还要另制一份，这些胶片由安全局显影后，再如数送回公司。”

西方联合电报公司最先只肯提供一个国家的电报，而且还坚持“要由公司的人掌握缩微相机，处理全部电文”。协议规定，截取西方联合公司发出的电文所需的一切相机和胶片均由安全局提供。公司雇员在纽约选好目标电报后，在发报室制成缩微胶片，每凌晨四点，由穿便服的通讯安全局人员取走。

美国无线电公司通讯分公司（现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环球分公司）是合作得最好的一家。1945 年 10 月 9 日，分公司副董事长巴斯比通知科德曼将军说，公司同意合作，具体事宜由分公司副董事长兼电报部经理斯帕克斯负责安排。斯帕克斯是个很理想的人选。他主管公司的世界报务并负责同国外通讯公司保持联系。1945 年 7 月以前，他一直主管陆军部通信中心的工作，他对通信安全局的工作很熟悉。

陆军安全局官员向斯帕克斯具体安排时，建议由美国无线电公司自己抽出某些专用通讯线路上的收发电报纸带送交陆军安全局。斯帕克斯不同意，

他说这样做，得派人来回取送电报纸带，还要把这些纸带寄放在一定的地方，这会引起人们注意，很不安全。他建议由陆军安全局自己来干。这一建议非常符合陆军安全局官员们的心意，他们马上就同意了。

那时，电报局使用的是一种五孔编码收报纸，纸带放入机器后才能打出可以直接阅读的电报。陆军安全局人员建议将电文全部送到陆军安全局。斯帕克斯认为只要看一看纸带开头有地址的那一小段，就很容易确定电文是否有用。通讯安全局的官员同意了斯帕克斯的条件，就动身返回华盛顿。

斯帕克斯很清楚，上级要是发现这件事至少也得砸掉他的饭碗。但是他深感美国正处于一种冷战和神经战的边缘，这种冷战当时正在升级。他表示，只要他能帮助政府掌握他国政府机构的通讯，他个人有多大危险，“ 也在所不惜 ”。

就在当月，陆军安全局负责纽约地区活动的艾亨上尉与斯帕克斯会见，一起讨论了合作中事宜的最后细则。斯帕克斯告诉艾亨，他向在电报局轮流值班的六名监督人员和电报局长做了交代，要他们每天晚上有一名值班员在快下班时取出当天的电文纸带，放在一个稳妥的地方，留待陆军安全局人员在午夜时分提取，随后带到他们自己的工作地点去进行分类。他们挑出有用的电文后，就转给陆军安全局在纽约市中心的另一个办事处，然后，大概是再送往阿林顿庄园。根据协议，这些电报纸带用毕再送回电报局销毁。

不出几天“ 苜蓿 ”行动开始了。陆军安全局人员每天凌晨三点至五点之间身穿便服开始分检工作。其实，他们的军人身分已成了公开秘密，因为他们每天都开绿色军车来，彼此又总是以“ 中士 ”，或“ 下士 ”相称。

关于制复电文的限制不到一年就解除了。通信安全局开始收到全部完整的副本（不管是美国公民、美国公司或使馆收发的电报），还可以随意保留或销毁。此外，“ 苜蓿 ”行动也不只是局限于纽约地区。在华盛顿和旧主山，安全人员每天去三家通讯公司收取电报；在圣安东尼奥由一名陆军通信军官负责每天去取当地联合公司办事处的电报。

1946 年 3 月，“ 苜蓿 ”行动已全面展开，此时，西方联合电报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对参与这项活动又重新担心起来。司法部长显然没有批准这项活动，这种担心越来越深，陆军安全局长把这个问题向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作了汇报。

为了安抚这几位神经紧张的公司主席，艾森豪威尔略微做了点姿态，在当月给每人写了一封正式的感谢信。

1947 年这三家公司的负责人益感不安，他们不仅要求取得国防部和司法部的保证，还要求总统亲自表态，承认他们参与这项活动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不会遭到联邦法庭的起诉。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国防部长詹姆斯 · 福雷斯特尔在 1947 年 11 月 16 日约见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长兼索斯森尼斯。贝恩和美国无线电公司通讯分公司主席哈里 · C · 英格尔斯将军。西方联合

电报公司董事长约瑟夫 · L · 伊根也受到邀请，但未能出席。

福雷斯特尔在会上告诉他们，他代表杜鲁门总统感谢他们在“ 苜蓿 ”行动中进行合作，并要求他们继续给予协助，“ 因为情报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他接着说“ 只要现任司法部长汤姆 · C · 克拉克在职，司法部就会在其权限范围内尽力给予三家公司充分的保护。 ”

福雷斯特尔对三家公司负责人的保证看来暂时稳住了他们，但这能维持多久，谁也没有把握，因此，国防部长几乎出于孤注一掷的心情，决定将“ 苜

蓿”行动有选择地透露给少数几个国会议员，以期能制定一项法案，彻底解除三家通讯公司的疑虑。

1948 年 6 月初，福雷斯特尔班子的几位成员秘密会晤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威利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米切纳，悄悄通知他们政府和三家通讯公司之间达成的这项不成文的微妙协议，要求他们在各自的委员会上建议，放宽 1934 年通讯法六〇一款里关于禁止截取通讯的限制，提出一项修正案，授权总统指定某些机构去获取外国政府的无线电和有线电通讯，这样“苜蓿”活动就可以真正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6 月 16 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讨论了这项提案，委贝会投票决定，由主席去斟酌是否要将提案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委员会给予的信任使福雷斯特尔很高兴，但并没有为争取“苜蓿”行动的合法性再做进一步的努力。这一活动要继续下去，还得秘密非法地进行。

1949 年 3 月，在司法委贝会听证后不到一年福雷斯特尔得病住院。一年前得到他秘密保证的各公司负责人一听说福雷斯特尔辞职住院，就要求他的继任人约翰逊重新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控合。1949 年 5 月 18 日约翰逊会见了这些负责人，声明杜鲁门总统、司法部长克拉克和他本人赞同福雷斯特尔的声明，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进行这种合作而负刑事责任。

1949 年，陆军安全局改名“武装部队安全局”时，接过了“苜蓿”行动。1950 年当过军事长的沃兰斯基从艾亨上尉处接过纽约地区的活动。1956 年国家安全局的塞奇又接管该地区的工作。但从截收一开始，纽约地区特工人员的工作就是由菲尼先生负责。

“苜蓿”行动的第一项重大变革使美国的密探能力大大跃进了一步，这在国家安全局内部只有少数几个特工人员知道。翌年，美国无线电公司新的计算机已作好准备和它对接。现在人们不必再在安全局设在公司的那间屋子里每天用人工分检成批的电文复制件和纸带了。通信员每天早晨只须用飞机将十至十二个磁盘送到米德堡复制，如果顺利，当天就可以送回纽约。

磁盘复制后，送入“收获”型计算机经过程序处理，就可以将任何载有某些字句、姓名、地点、收发报人的电报“剔出”。这些剔出的材料可能是一份监视名单中的一个姓名，也可能是带有“示威”二字的任何电文，或者是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收发的一切电报。任何电报全文里面若有需要挑出的内容只需百分之几秒钟就可以复制出来。

翌年，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世界通讯公司也改用了磁带。到 1966 年，国家安全局的交通和后勤费用使负责人托德拉博士开始发愁。“苜蓿“行动十分机要，除托德拉和几位局长以外，只有一位级别较低的管理人员负责这项活动。如果与通讯公司在合作上发生问题，他得向托德拉报告。

使托德拉不放心的是，把磁盘从纽约送到国家安全局的往返途中随时都会有丢失的危险。不管是因飞机失事，或是粗心大意，造成的后果都会很严重。只要原始磁盘遗失或损毁了。这项活动也就等于彻底失败了。因此，1966 年 8 月 18 日,托德拉在华盛顿会见了中央情报局主管计划的代理副局长卡拉梅辛内斯，请求中央情报局协助在曼哈顿商业区搞一小间隐蔽的办事处。托德拉说国家安全局需要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供他的雇员复制从商业通讯公司收到的国际电报。

中央情报局接受了这个要求,于 11 月将国家安全局成员安置在曼哈顿南部一个伪装成电视录像磁带公司的商业办公楼里。

国家安全局在这里隐藏了长达 7 年之久，才被轰了出来。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不一样，法律上对它有明文限制，其中一条是，不得在美国国内搞活动。因此，当中央情报局的法律顾问豪斯顿发现这一非法的隐蔽所时，就叫这些处理磁带的人员卷了铺盖。

托德拉没有被法律约束吓倒，也没有被捆住手脚，很快就在曼哈顿找到其它合适场所，将“ 苜蓿 ”行动维持下来。

第四节国家安全局第一次将它巨大的耳朵转向国内

在华盛顿，“苜蓿”开始活动时的环境与前略有不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数月，日本和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开始和司法部长一起草拟了一项总统行政命令，允许联邦调查局从私人电报公司获取必要的来往电报。但命令还未拟就，珍珠港就受到了袭击。

国会一反常态，迅速制定了检查法。1941 年 12 月 22 日，司法部副部长通知联邦调查局说，拟议的总统行政命令没有必要再搞了，因为新设立的检查局对国际通讯拥有全面的检查权，联邦调查局可以从检查局得到一切所需的电文。

联邦调查局却在这个时候自己于开了，10 月 7 日以后不久，国务院要求胡佛请求各电报公司将要发往某些国家的电报扣压 24 小时，然后复制送审，三家公司一致同意，均无异议。

不久，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检查局开始向联邦调查局送交与国防有关的电报复制件。联邦调查局感到不满足，在以后五年中扩大了自己的“秘密复制”计划，到 1946 年秋，联邦调查局直接从各电报局秘密获取大约 13 个国家的来往电报。

战后，根据通讯安全局和三家电报公司达成的秘密协定，由联邦调查局作为中间人，将华盛顿各电报局收发的电报复制件挑出来，将其中大约一半送给国家安全局，自留另一半，当地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每天上午至十二点之间到美国无线电公司去取电报。这时，公司早已把需要的电报挑检出来。

60 年代初，除了技术上的变化外，还有一项事态发展对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前途有更为深刻的影响。1961 年罗伯特·F·肯尼迪进入司法部任部长时，随身带着他的参议院调查犯罪集团活动小组委员会工作时一些遗留问题的材料。那时对所掌握的前科犯人还没有一个集中档案材料的地方。全国大约有 29 个或 30 个调查机构同时在收集这方面的情报。肯尼迪想有所创新，把各方面的情报来源汇总起来，互相沟通已掌握的情况，在司法部集团犯罪调查处内设立一个小的“情报机构”将联邦政府所掌握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材料汇集在一起。

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列一份犯罪集团头目的监视名单，分发给各有关机构，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局。刑事司从 1962 年开始将几百名首要犯罪分子的名单送交国家安全局，要求该局提供诉根据。

肯尼迪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古巴。就在刑事司将集团犯罪首要分子的名单送交国家安全局的同时，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将同古巴有来往的美国公民和公司的名单送给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则向联邦调查局提供关于美国同古巴的商业和私人通讯的情报，这些情报是从“苜蓿”行动和国际电话侦听中搜集到的。

为了让联邦调查局更好地利用国家安全局截获的古巴情报，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处民族情报科科长沃纳尔和安全局的官员在 1962 年 5 月举行了一次会议。沃纳尔在会后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现有的原始电报中，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定期开列的同古巴政府及个人做买卖的美国公司名单……至于私人电报，我们感到在美国和古巴之间，常来常往的人的电报最为重要……我们将给国家安全局提供一份各单，列出我们认为有调查价值和有情报价值的人。”

从此，国家安全局第一次将它巨大的耳朵转向了国内，对着自己的公民。

由于没有立法和法律的阻挠，这只巨大的耳朵一直继续转动。肯尼迪等人对犯罪集团和古巴很注意；约翰逊和尼克松两任总统则注意抗议运动的领导者和毒品走私犯。列入国家安全局的监视名单的美国人和美国机构越来越多。从 1962 年开始到 1967 年有了很大的发展。1967 年 10 月 12 日，陆军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助理参谋长亚巴勒少将给国家安全局局长卡特送了一封仅限在通讯情报渠道内传递的绝密信，要求国家安全局将可能受外国影响而在国内进行社会骚乱的所有情报都提供给他们。

白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对国内日惭升级的社会骚乱越来越感到紧张，在这种压力下，陆军部建立了一支对付社会骚乱的部队，由亚巴勒指挥行动。亚巴勒最担心的是预定要在五角大楼前举行的一次反越战示威集会，亚巴勒在示威头一天给安全局局长卡特写了一封信说：“ 最大的问题是，是否有证据可以肯定这些反对越南战争和其他国内示威活动是受外国势力煽动和控制的。 ”

卡特收到信的第二天，就给亚巴勒、中央情报主任赫尔姆斯和美国情报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发出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们，国家安全局正在集中更多力量，继续不断地努力去获取“ 信号情报 ”，以满足陆军的要求。但美国情报委员会从未批准过安全局的监听活动。

当陆军开始送交一张又一张的抗议者名单时，其他机构也在送名单，有的逐个写出名字，有的在事先印好的表格上填写姓名，还有的干脆通过电话报名单。

特工处提出了一份个人和组织的监视名单，里面都是反战和民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该处认为截取这些人的电报和电话对保卫总统的安全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 不论是民间骚乱、激进学生和青年的活动、种族主义分子的活动、激进的反战活动、支持逃避兵役者和逃兵的活动，或是与激进派有牵连的新闻界的活动，凡此种种，只要参与者与国外有某些联系 ”，中央情报局一律都感兴趣，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亦步亦趋，也同样予以关注。

从激进的政治团体到知名人士，乃至向政府抗议的普通百姓都被列入各种监视名单，很多监视名单越来越长，把同名单上的人和组织有接触的人也全部列为监视对象，结果使名单成倍增加。由于国家安全局采用真空吸尘器的办法（即进行筛选）进行情报收集，其结果是使国家安全局分析人员要审查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收发的电报、电话、电传，而这些人和实际工作对象很少牵连，或甚至毫无关系。因此，如果一个组织成为目标，它所有成员的通讯都可能被截取；如果某人被列入监视名单，这个人的一切来往通讯，或者仅仅涉及该人的通讯都会被收集进来。

国家安全局负责监视名单的核心人物是朱妮塔 · 穆迪。她是情报用户联络官。她在 1943 年离开大学进入陆军通信安全局当办事员，几十年来在国家安全局生产组织的密码工作中步步高升，退体后曾获国家情报功勋章。她主管的部门是生产办公室第五处。这位情报用户联络官是国家安全局同情报界其他单位的主要联络人员。她收到监视名单后，就将其中的大部分交给生产办公室、G 组组长弗朗克 · 雷文。

雷文在 193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珍珠港事件之前就一直从事密码分析和破译工作。1940 年，这位刚任命的海军少尉被指定为海军同各通讯公司联络

的外勤人员。在通信情报局攻破紫色密码后，雷文又锦上添花，发现了这个系统“关键的关键”，使美国人译解这种密码的速度达到历史性的记录。到60年代初期，他当了G组组长。

60年代和70年代初，交办的监视名单如雪片般飞来，雷文的问题也越积越多。他很明白国家安全局的任务严格限于搞外国情报，但是交给他监视的组织和姓名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出格。

1968年5月，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孟菲斯遭暗杀一个月后，灰心丧气的联邦调查局一直找不到自己怀疑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这时雷文收到一道直接的命令，要他把雷的名字以及他的12个化名列入监视名单中。这是一项十分不寻常的要求，它既不是由联邦调查局，也不是由司法部，而是直接由国防部长克拉克·M·克里福德办公室发来的。雷文回忆说：“我本想根据宪法，对于这样做是否合法，提出反对意见。然而那时我得到通知说，这要求系来自最高领导，没有商量的余地。”

国家安全局卷入对詹姆斯·厄尔·雷的调查，是国家安全局保守得最严的一个秘密。这一行动不仅没有在有关雷的法庭诉讼中透露，也从未向众议院调查暗杀委员会透露过。

虽然监视名单上有些人的问题介于外国情报和本国情报两者之间，很难定性，但是雷文认为把有些人的名字列入名单完全是“瞎胡闹”。例如，“胡佛要求监视美国所有的公谊会教徒”，这只是胡佛一个偶然的念头引起的。胡佛认为这个教会组织在向东南亚运送粮食和供应品。

有问题监视名单潮水般涌进国家安全局，对这一问题如何处理，分歧越来越大。一派认为，只要情报用户向国家安全局提出要求，就应尽量按要求提供情况。另一派是G组的意见，即对方提出的要求如果很不合理，就干脆告诉他，不能照办。

因此，雷文把G组不打算进行监视的对象通通都写下来，交给穆迪。穆迪将它存入档案了事，而那些可以加进监视名单的名字，则由穆迪交给G组，便被列入各种“技术侦察手册”。雷文说，“技术侦察手册要求分析人员在阅读电文时，将提到的人员，譬如国务卿黑格的材料通通挑出来，予以报告”。

“技术侦察手册”分发到G纵中的各个小组如G1、G2、G3等等，每一小组负责一个地区，如中东、非洲、南美或其他地区。

从一开始，安全局内部就对国内监视名单一事严守机密。任何涉及监视名单的电文均盖有绝密，仅限在通讯情报渠道内传递的图章，上面还印有“Trine”（后来改为Umbra）的代号，表明这一材料在通讯情报中是最机密的一类。在这一代号的上面再加上第二个代号，这份电文就同最敏感的窃听苏联的材料属于同一密级了。在1969年7月1日，这项对付社会骚动的监视名单工作，有了自己的代号和章程，就更加保密了。

自1969年“尖塔”活动正式通过后，只要收发电报的一方是美国人，或只要电文中提到了一个美国人，就要将这份电报列入这个绝密级。

“尖塔”之所以敏感并非情报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它沾了非法活动的边，因此电文上一切来自安全局的痕迹都要抹掉。

随着章程的制定，提交监视对象姓名的手续也趋于正规化，增加名单一律都要通过严格的指挥系统，用书面通知，不能随便打一个电话交代。

1969年10月24日，尼克松总统指出美国外交政策要关心对国际麻醉品的控制，并成立了白宫查禁海洛因特别工作组，成员有白宫、国务院、财政

部、麻醉剂和危险药物管理局以及国防部的代表。中央情报主任赫尔姆斯也是成贝之一，他在中央情报局计划局设立了麻醉剂协调处，负责向特别工作组提供有关麻醉品的情报。

该处第二项任务是，就毒品问题和其它机构进行联络，中央情报局极为重视这项任务。不久，麻醉剂协调处就向麻醉及危险药物管理局提供在海外使用的“ 黑名册 ”及敏感的情报报告，报告由国内收集处编辑。采用的情报材料有同出过国的人员的谈话；有分析报告，如《在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贩毒走私网》报告；还有控制麻醉品活动部主任的报告等。所有报告都直接送交麻醉剂及危险药物管理局的战略情报主任。

中央情报局通过它的 D 处也开始对国外进行截取活动，专门收集国际上的麻醉品情报。麻醉剂及危险药物管理局很欢迎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但是，美国法律禁止中央情报局在国内从事窃听活动。而危险药物管理局要对付的大部分走私贩毒犯，很多时间是在国内活动的。某些南美毒品交易就是在纽约中央车站某个电话间里通过电话进行的。

于是，麻醉剂及危险药物管理局局长英格索尔便求助于自成立之日起就不受这种约束的国家安全局。

1970 年 4 月初，危险药物管理局一名官员来到米德堡，会晤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托德拉。托德拉向这位官员保证，国家安全局可以接受该局请求，编制监视名单，甚至可以满足在中央车站监听公用电话的要求。4 月 10 日英格索尔局长给盖勒局长送去一份备忘录，对托德拉的帮助表示感谢，并附上该局对监视名单的总要求。

负责电讯处理的 G 组组长弗朗克 · 雷文认为执行麻醉剂及危险药物管理局的监视名单并非易事。他回忆说：“ 这需要进行专门的裁取，需要不断监听从纽约通往委内瑞拉的电话线路。虽然处理这条线路上的数据通讯花线不多，但处理人声通话不行，我们没有这个力量。 ”

监听麻醉剂和危险药物管理局提供的名单和国内的特定对象，是国家安全局采取的最危险的一次步骤。它不仅在明确地支持国内的执法部门，而且还在监视国内的公民。以前“ 尖塔 ”计划收集国外情报时的侦听系统突然直接转向了国内。

到了 6 月，根据监视名单截获的第一批材料开始送往危险药物管理局，9 月又开始对国内特定工作对象进行工作。在开始阶段，侦听活动是在国家安全局的一个情报截收站内进行。这一设施很可能是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名叫‘ 西北 ”的小镇外，由海军安全局的一个侦听站操纵。

从 1970 年到 1973 年，国家安全局在埃塔姆和安多弗的两个监听站一共监听过 19 条从美国通往南美的线路。

在安全局的绝密文件中，有一种“ 通讯情报优先处理指南 ”的内部文件，制定于 1966 年，是国家安全局确定目标的准则。它由情报界各机构的代表组成的班子草拟，经中央情报局长以美国情报委员会主任的名义签发。这一文件使国家安全局在执行全面收集信号情报的职责时，对优先考虑的目标和指导原则有所依据。

“ 通讯情报优先处理指南 ”文件将世界分成若干“ 区 ”，例如西欧是二十七区，其它亚洲国家（如印度）是二十四区，拉丁美洲是二十六区，中东和北非是二十八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二十九区。

在每一区的下面是信号情报的方法分类，例如，国际商业通讯中的电话、

电报和电传都列为 B 组。外国的国内通讯很可能是列入另一个组——A 组。最后在这些组的下面列有国家安全局的特用数字表示的具体目标，称为“项目”。项目内容可能是要求对武器系统或军事设施提供全面的情况。除了规定具体目标，项目上还注明需要情报的时间（如“需要在领受任务后 48 小时内提供”）和对情报完整程度的要求（如列为一级，就表示要最完整的情报）。

在一般情况下，若某一机构向国家安全局提出新的要求不超出原有的项目，只要在监视名单中增加新姓名，不需要额外拨款，国家安全局一般均会同意，不另行审查。但是，国家安全局如果认为新的要求要为情报搜集和处理增加额外工作量，或者在工作规模、完整程度或时间要求上需要对现有项目作大的变动，它就会通知提要求的机构，必须先将要求交起草“通讯情报优先处理指南”的班子批准后，再送往信号情报委员会（美国情报委员会下属的三个委员会之一，总是由国家安全局局长任主席），若美国情报委员会不作进一步审批，信号情报委员会一般都会同意变动“通讯情报优先处理指南”文件的内容。

但是，这个文件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其中列举的许多要求过于空泛，使分析人员在筛选大量通讯材料时无所适从，例如，有一次陆军竟然提出要“关于民主德国性病发病率的全部材料”，因为这种材料可以反映出民主德国军队的战斗力。对“通讯情报优先处理指南”文件批评最厉害的是雷文，他称这一文件为“一纸空文”。他说：“最优先处理的情报应该是苏联要发动进攻。可有些被列为苏联要发动进攻迹象的情报，简直叫你啼笑皆非。”有一项要求是要报告一切共产党高级官员不露面的消息，但从不具体说明这种“不露面”是指的什么情况。“要求我们在 15 分钟左右就要向全世界报告这一消息。于是你在 15 分钟内报告勃列日涅夫不见了——但是他是从什么时候不见的呢？见鬼去吧！如果他去上厕所，那也叫不见了！”

尼克松在 1971 年宣布滥用毒品已成危机，“尽早制止麻醉品和危险药物非法涌入国内，已成当务之急”，同时他将控制毒品工作的优先程度升了格，成立内阁国际麻醉品管制委员会，任命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中央情报主任和驻联合国大使为委员。

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减少乃至最后肃清非法的麻醉剂和危险药物从外国流入美国制定和协调联邦政府的政策”。9 月 7 日克罗被任命为委员会的执行主任。

克罗的第一个行动是成立一个由中央情报局麻醉剂协调官任主席的情报小组委员会。这是有史以来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务院、财政部和白宫等单位第一次协同作战，一致对付贩毒、吸毒活动。

这年夏初，中央情报局决定将它的毒品监视名单提交美国情报委员会通过，使之“合法化”。

这项新的要求经美国情报委员会批准后，就作为三十二区 B 组第八“项目”加进了国家安全局的“通讯情报优先处理指南”文件之中。它的内容是要求安全局提供“国际麻醉品活动，提供国际走私贩毒情况”。

这条“项目”只适用于三十二区，指的是北美洲和中美洲。这个“项目”注明需要提供情报的时间是“在接受任务后 72 小时之内”，情报完整程度估计是“二级”。

尼克松政府的毒品之战在 1972 年整整进行了一年。到此时列入国家安全局各种监视名单的美国公民已从数百人上升到数千人。长年任国家安全局副

局长的托德拉一面负责这项工作，一面又要保护这一机密，这一情况使他越来越发愁。

盖勒于 1969 年 8 月接任局长时,托德拉拖了一年左右才把国家安全局的监视名单项目告诉他。在这件事上被蒙在鼓里的并不止国家安全局局长一人。国家安全局早就为侦听美国公民的活动增加了人力财力，这件事从未经过批准，甚至从没有正式交到美国情报委员会上。情报用户同国家安全局往往直接挂钩，结果是国家安全局可以撇开美国情报委员会，自行开始新的情报收集任务。

托德拉和盖勒担心的事在 1972 年 8 月成了现实。一名 25 岁的前空军安全局中士决定把深藏在心底的绝密情况披露给《壁垒》杂志。费尔沃克中士过去是驻土耳其、联邦德国、越南监听哨的通讯分析员，他用佩克的化名，以同《壁垒》进行回答的方式宣称，国家安全局能够破译苏联所有密码系统。这些话可能是夸张，但这篇 16 页的文章大部分是相当准确的。

托德拉认为，这个军士透露的情况对国家安全局是一个致命打击。如果费尔沃克知道毒品监视名单计划，其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托德拉为了不让东海岸监听站截取情报的工作人员知道最敏感的姓名和电话，10 月份他向兄弟单位求援，要求中央情报局承担有关的长途线路的截取。中央情报局没有提出异议，将任务交给了 D 处。

这一计划被中央情报局的法律总顾问豪斯顿发现后，他在 1973 年 1 月 29 日给 D 处代理处长写了一份备忘录说，这项活动违反了 1934 年通讯法的案的第六○五条。该条款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披露私人的通讯。他的结论是这项工作不属于中央情报局的权限范围。由于豪斯顿的这份备忘录，中央情报局中断了全部情报收集活动。

安全局遭到中央情报局拒绝后，便要回名单和电话号码，自己接着干下去。但是六个月后，连国家安全局也感到暴露的风险太大，毒品调查计划便彻底结束了。

雷文回忆说：“在我们撤下来前五、六年，曾狠狠地打击过几次走私贩毒活动，说明我们可以及时掌握毒品交易和毒品贩子的情况，可以协力铲除这种毒品买卖。但是美国法律和官样文章把事情弄得很难办，不值得让人去费那个劲儿。”

第五节胡佛与国家安全局之间的一场较量

破译密码的技术，从使用铅笔发展到使用计算机之间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有一条原则始终不变，即偷窃密码比破译密码容易得多，也便宜得多。

联邦调查局里“黑包”专家在解开密码之谜方面，可以大显身手。他们半夜进入叙利亚驻纽约市的使团或伊拉克驻华盛顿的大使馆，给生产办公室破译专家提供的帮助具有极大的价值。一部翻拍的密码本，一张新型密码机结构图，或者在一个保密电话机上安装的窃听装置，都可以节省几百万美元和几年的工作量。

但是以前专门对付犯罪集团的胡佛局长却大笔一挥，于 1966 年 7 月 19 日将这项工程全部砍掉，负责国内情报的局长助理沙利文送来一份关于窃取工作的不存档的备忘录，胡佛在下面草草写道“这类手段不得再行使用”。他怕这句话被人忽视，六个月后，又做了更明确的规定，在 1967 年 1 月 6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胡佛宣布：

我注意到，局里的官员还在要求使用“黑包”手段，过去我曾明确过，不再批准这类请求，因此，不要再来报批这类事情。包括秘密潜入各类房屋之类的做法，我都不会再予以批准。

胡佛改变态度，对托德拉影响最大，他相信这位局长年事已高，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越来越小心翼翼。托德拉和卡特将军希望胡佛能改变他的主意，于 1967 年同联邦调查局的这位局长安排了一次简短的会晤。开始他们与胡佛一起重温了他过去在工作中创立的功绩，最后才言归正传，摆出了他们认为应该继续进行“黑包”活动的意见，看来胡佛可能是动了心，他表示愿意考虑重新恢复过去的作法。

托德拉和卡特兴高采烈地回到了米德堡。但是几天后，联邦调查局派驻国家安全局的联络员捎来话，说胡佛变卦了，仍要维持原定的限制。

胡佛在写给托德拉和卡特的便函中指出，只有总统和司法部长下了命令，他才能同意国家安全局进行“黑包”活动。然而托德拉既不愿去找总统，也不愿找司法部长。这件事只得暂时搁置下来。

1969 年 1 月 12 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第三十七届总统。3、4 月份，旧金山、坎布里奇和伊萨卡等地爆发学潮，在芝加哥黑人区，警察和黑人在大街上发生武力冲突。5 月，司法部长助理克兰丁斯特将这场席卷全国的学潮称为“一场全国性的颠复活动”。11 月 15 日又有 25 万多人聚结在华盛顿，抗议越南战争。

四月暴乱的硝烟刚消散，尼克松就命令国内问题首席助理埃利希曼要求情报界帮助编写一份外国共产党支持学潮的综合情况报告。由于缺乏扎实情报，这两个人都感到这份报告无说服力。两个月后，埃利希曼指定 29 岁的印第安纳人汤姆·休斯顿就这一题目再写一篇更有说服力的报告。

休斯顿是帕特·布坎南领导的研究和撰写班子的成员，是白宫顾问，也是一个刚退役的陆军情报官。由于他对新左翼政治似乎比白宫班子里任何人都了解得更多，所以这项任务落在他的身上。

1969 年 6 月 20 日，休斯顿向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发出一份备忘录说，“目前在这一领域内，收集情报的力量可能不足”，并代表总统要求他们提供材料，说明“目前在侦听外国共产党支持

美国革命青年活动方面都投入了多大力量”。休斯顿还要求各局说明，对激进分子的情报工作有什么不足之处，并提出解决办法。十天后，各局的报告都收到了，埃利希曼和白宫其他人员对调查结果和情报质量又一次感到失望。

失望情绪从 1969 年后一直延续到 1970 年，再加上暴乱和爆炸事件与日俱增，特别是 3 月份在“格林威治村”城的一座房屋里发生的气象员协会“炸弹工厂”爆炸事件，导致白宫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加强白宫和情报界之间的协调。在 1970 年 4 月举行的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由于暴力行动不断升级，在政府内部是否也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问题。

会上作出决定，要求总统会见四个情报局的局长，要他们就如何控制有增无减的暴力行动提出报告。这次会见几经推延。最后 6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举行。刚被提升为白宫办公室的高级人员、负责国内安全局事务的休斯顿，也参加了会见。

与会者除休斯顿、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外，还有国家安全局长诺埃尔·盖勒，国防情报局长贝内特，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联邦调查局长胡佛。另外还来了一个搭不上边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罗伯特·芬奇。

据贝内特说，由于在国内暴力活动方面缺乏有价值的情报，“总统把我们克了一顿”。尼克松对与会者说：“根据我在白宫收到的材料分析，我相信情报界在收集有关这些革命团体活动的情报方面，目前投入的人力物力很不够。”总统为了获得“过硬的情报”，要这些局长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各情报局在收集国内安全情报上作了多少努力，然后就如何加强收集激进分子的情报提出建议。

会议结束时，尼克松要求各情报局长和休斯顿共同为委员会写一份报告，并指定胡佛当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后被称为“局际情报委员会”。胡佛负责国内情报的副手沙利文被任命为工作班子的负责人，负责起草这件专题报告。

托德拉和盖勒在米德堡欣喜而乐观地注视着这一局际情报委员会。国家安全局许多成问题的情报收集活动可能因此获得总统的支持，委员会也有可能迫使胡佛恢复“黑包”活动。这个委员会还给国家安全局提供了扩大国内侦察活动的大好机会。盖勒挑选本森·巴夫汉为局内支持委员会工作的负责人。巴夫汉是生产办公室的局长副助理，也是生产办公室内地位最高的文职人员。

胡佛刻不容缓地开始了工作。1970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上午 11 时，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办公室内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赫尔姆斯和贝内特独自到会，而盖勒则带着巴夫汉同去。胡佛首先提醒这些密探头目说，总统对国内收集激进分子情报的现状很不满，然后明确指出，他领会总统的意图是要对过去发生的国内动乱情况拿出一份总结报告来。

休斯顿对胡佛关于总统交付的任务所作的解释感到诧异，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这份报告不应该是一份关于过去情况的总结报告，它应该对目前和将来的威胁作出估计，对情报的漏洞进行检查，并就如何改进情报工作这一问题归纳出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盖勒、贝内特和赫尔姆斯都同意休斯顿对委员会任务的看法，胡佛只好勉强同意了休斯顿的意见。

第二天委员会的工作班子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第一次聚会讨论起草报告的问题。讨论会举行了四次。休斯顿在宣读盖有绝密二字的提纲时，将委员会的宗旨又重申了一遍，然后补充说：“工作的细则由主席（沙利文）负责；检查工作的范围由白宫成员（休斯顿）决定。”

休斯顿补充说，委员会的“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运用一切特殊调查手段”，并“明确规定国家安全局在截取美国革命领导人和组织的通讯方面的权限”。

休斯顿发言后，沙利文要大家就委员会起草的报告和文件的密级发表意见。巴夫汉建议采用一个代号，经讨论，都同意所有的文件都盖上绝密二字，后面再盖上国家安全局的诫语：仅限在通讯情报渠道内传递。此外，赫尔姆斯还建议草拟一份“涉密人员名单”，开列“各成员局或部门将在委员会中工作，或知悉内情的人员名单。”两项建议一致通过。

然后委员会开始讨论核心问题——情报收集的方法。在座的代表们讨论了在收集总统所需的情报中遇到的种种限制。这时巴夫汉提议，立即由委员会各成员组织的反情报专家协同行动，对当前国内安全受到的威胁作出说明和估价，休斯顿又进一步提议由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从国内和国外角度做出估价，分别准备出书面材料，供下次会上散发。这些建议取得与会者一致同意。下次会议定于 6 月 12 日在中央情报总部召开。

第三次会议只是为第四次会议打基础的预备会，6 月 10 日举行。第三次讨论初稿的会议一开始，巴夫汉就把恢复联邦调查局的“黑包”工作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说恢复这种活动可以节约好几百万美元。在整个下午的会上，这个问题始终居于突出的地位。

这份报告终于在傍晚时分酝酿成熟。总统可根据这份报告对每一类情报收集的方法，做如下选择：（1）继续维持目前的限制；（2）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3）在列举的各种放宽限制的措施中，采纳其中之一种。

委员会就第一类情报收集的方法，提出了“对通讯情报的限制应如何解释”的问题，巴夫汉借此发动大家对绝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六号情报命令”究竟赋于国家安全局哪些权力直到将自己的任务理解成为只能收集外国情报，因此国家安全侦察目标等作法都是犯禁的。

因此巴夫汉、托德拉和盖勒认为起草这份专题报告是一个好机会，他们可以被批准名正言顺地继续这项实际上已经干了近十年的活动。一旦总统批准他们将在各种监视名单上增加美国公民的名字。

关于第二类情报收集方式的标题是“电子侦察和渗透”。巴夫汉又一次提出“这方面的限制给国家安全局的打击特别沉重”。他希望迫使联邦调查局协助国家安全局恢复电话窃听。他在报告中说，在各种收集情报的手段中，使用电子侦察技术手段，可以节省很多钱。

第三类方法是“秘密潜入”，国家安全局最希望取消在这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这可是托德拉要求恢复对外交人员进行“黑包”活动的宝贵机会。

报告一起草完毕，巴夫汉和其他各局的代表就向各自的上司呈上这份文件。盖勒和托德拉看到文件后很高兴，赫尔姆斯和贝内特也同样高兴。胡佛却勃然大怒，他怒气冲冲地说：“我曾经成年累月地批准拆阅信件和进行其他类似的活动。但是现在不行，情况已越来越危险了，我们会被人抓住的”。

胡佛要求将整个报告重新改写，去掉比较过分的那几条选择方案，但是沙利文劝他把反对意见写成签注就算了。例如，在电子侦察这一节下面，胡

佛加上联邦调查局不希望改变它的现有程序，但是“并不反对其他局去争取司法部长批准他们搞监听，然后由他们自己去搞”。换句话说，如果国家安全局需要在一些外交人员的住宅安装窃听器，他们就得自己去干。

局际情报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在 6 月 23 日举行，原想把报告最后润色一下后，就在两天后的 6 月 25 日签字。但是工作班子成员看到胡佛的签注后，他们知道要出问题了。

盖勒听到巴大汉的汇报后怒不可遏，立即打电话给休斯顿，要求再开一次局长会议，会上他将力主抹掉这些签注。休斯顿并不把胡佛签注看得太重，他满有把握：白宫要的东西，白宫总会得到的。

6 月 25 日下午 3 时，盖勒在胡佛办公室内和贝内特、赫尔姆斯及休斯顿在一起参加会议签字仪式。四位局长在特别报告上签完了字，胡佛就提醒他们把涉及报告的工作文本全部销毁，委员会的使命就算完成了。

次日，休斯顿在白宫收到报告后，就开始了他的行动计划，即促使总统批准特别报告中最有力的一些选择方案。第一步是起草一份备忘录给霍尔德曼，扼要地提出总统对这份备忘录应采取什么措施。标题是：“国内情报收集计划：分析和战略”。这份备忘录后来以“休斯顿计划”著称。

这份备忘录是休斯顿对胡佛最终的报复。他把这位联邦调查局长称为局际情报委员会“唯一的绊脚石”，建议尼克松对胡佛“进行一番安抚”并赠送一张亲笔签名的像片来安定他的情绪。

休斯顿将胡佛谴责了一通之后，在一份标题为“对情报收集活动的限制”上面盖有“绝密和仅限在通讯情报渠道年传递”印章的附件中，对总统应该解除哪些限制，提出了他的建议。在头四条建议中，有三条主要涉及到国家安全局。

7 月 14 日，备忘录和建议书经霍尔德曼转呈总统，大约一个星期后，尼克松就全部批准了这些文件。7 月 23 日，休斯顿最后润色了这份计划，由信使分送各情报局。当盖勒、托德拉和巴夫汉收到这份计划时，免不了大事庆祝一番。用托德拉自己的话来说，他从一开始就把休斯顿和局际情报委员会的会议看作是对“国家安全局天赐良机”，现在，他的手头上白纸黑字，掌握了总统的批件，他们过去一直在干着的事得到批准。托德拉又可以要求联邦调查局去搞大使馆的窃听和密取了。

胡佛得知总统批准休斯顿计划后，立即带着他的助手德劳奇气急败坏地冲进司法部长米切尔的办公室。胡佛谈的情况使米切尔大吃一惊，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有个局际情报委员会，更不用说专题报告或休斯顿计划了。他同意胡佛的观点，认为备忘录阐述的非法观点不应成为总统的政策。

7 月 27 日，米切尔来拜见总统。他对总统说，休斯顿计划中的建议完全“违背国家的最高利益，决不是美国总统所应同意的”。米切尔还说，“不要批准而擅自潜入外国使馆进行诸如安装麦克风发射机之类的非法活动，若被人揭发，就会得不偿失了。”

尼克松被说服了，决定撤回批示。这个计划刚发出去不过四天，胡佛、赫尔姆斯和贝内特又各收到一份撤回文件的书面决定，第二天，各情报局部按指示纷纷交回文件。休斯顿计划被牢牢地锁进了白宫。

托德拉、盖勒和巴夫汉对突然收回休斯顿计划也同样感到不安。霎时间他们又恢复到了原来的处境，可是，在休斯顿计划出笼以前，多年来他们虽然没有得到过批准，却一直都在收集国内对象的情报，他们认为不能因为总

统正式撤回他的批准就该停止这项工作。事实上，监视美国人的名单流入安全局的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加快了。

国家安全局三巨头对休斯顿计划的失败，真正烦恼的不是“苜蓿”、“尖塔”等大规模行动必须继续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行，而是从此不能再使用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侦听人员和密取人员了。

休斯顿后来又写了多次备忘录，但是他明白，这场较量的大局已定，获胜者不是他，在国内情报工作上，还没有人能同胡佛相较量的。

尼克松收回休斯顿计划后不到两周，休斯顿就被降了职，他感到心灰意懒，不到一年，辞去白宫的职务，回到印第安纳当律师去了。

虽然休斯顿在白宫丢了官，但他的计划却依然具有很大的活力。8 月底，霍尔德曼来找迪安，指示他考虑考虑，有无办法把原来的计划付诸实施。9 月 17 日，迪安拜访了他原来的老上司米切尔，向他解释了霍尔德曼的要求，而这位司法部长只是重新表示了他对休斯顿计划的反对态度，但对休斯顿计划中提出的建议成立一个永久的局际情报评价委员会的要求，表示赞同，米切尔感到有这样一个机构倒也可能有些用处。

迪安回到霍尔德曼那里，建议可以考虑第一步先把情报评价委员会建立起来，然后再着手解决收集情报的限制。

霍尔德曼表示同意，经过一个秋天，局际情报评价委员会成立了，它以司法部门为掩护，由负责国内安全的助理迪安主持工作。12 月 3 日在迪安的办公室举行第一次会议，就像过去休斯顿的局际情报委员会的重新聚首一样，出席者中有代表国家安全局的巴夫汉和办公室的吉姆·金格勒；代表中央情报局的安格尔顿；代表联邦调查局的穆尔；代表国防部的唐尼上校。会上大家决定，这个委员会的重点将是“美国政府掌握的有关国内革命恐怖分子活动的情况，并对这类情报作出评价，以判断：“（1）问题的严重程度；（2）联邦政府对出现的严重问题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在委员会“情报评价”幌子的下面，实际却藏着一个希望恢复休斯顿计划的强烈愿望。委员会在 1971 年 1 月 19 日发给米切尔、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一份未经签署的备忘录，它在一开始就提出：“同这一计划有关的原所有人员都确信，要卓有成效地进行国内情报活动，就应该首先从实行局际情报委员会的专题报告着手。”

这份备忘录发出几天后，国家安全局就着手草拟自己的备忘录，说明“它准备向情报评价委员会做出哪些贡献”。备忘录的标题是，“国家安全局对国内情报的贡献”。在“情报范围”方面，备忘录列举出以下几条：“（1）包括贩毒在内的刑事犯罪活动；(2) 受外国支持或以外国为基础的颠覆活动；（3）对总统的保卫及有关措施，情报来源应为“至少有一外国终端的信号”。

休斯顿发起组织局际情报委贝会是企图通过正门开展一场事实上毫无限制的国内间谍活动，胡佛看出迪安发起情报评价委员会也属同一目的，便采取了不合作态度。

盖勒、托德拉和巴夫汉看到胡佛对待解除阻碍国内情报收集活动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抱着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他们对通过情报委员会去促使联邦调查局恢复进入外交机构进行密取和窃听活动，已不抱多少希望了。剩下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直接向司法部长提出呼吁。

在赫尔姆斯的支持下，盖勒于 1971 年 3 月 29 日同他一起去会见了米切尔，说明国家安全局对恢复“黑包”活动“希望至为殷切”。胡佛也在座，

他告诉这两位情报首脑说：“ 有鉴于联邦调查局要承担的风险，本人对于开展这些活动毫无积极性，”

胡佛在米切尔办公室的会议上发言后，这位司法部长要求赫尔姆斯和盖勒准备一份“ 深入的研究报告 ”，确切说明他们的需要。他说，待看过报告后，他再召集这些人开一次会。然后“ 决定哪些能办，哪些不能办 ”。

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后来向胡佛建议过要对某使馆——很可能是南越使馆——进行极为保密的窃听活动，一周后，胡佛再次拒绝了这项建议，数小时后，赫尔姆斯给米切尔送去一封信要求否决胡佛的决定。次日，他得到可以进行窃听的答复。窃听设备在两天之内就从中央情报局送到联邦调查局总部，从 4 月 27 日开始，联邦调查局的“ 黑包 ”专家就在三周之内将这套窃听设备安装停当。5 月 18 日，中央情报局得到通知说，窃听设备“ 经测试，全部运转正常 ”。这一次胡佛终于吃了财仗。

可是，赫尔姆斯并没有料到这位联邦调查局老调查员还有最后一手。1972 年 1 月初，中央情报局得到消息说，胡佛要向国会作证，打算告诉国会议员这一窃听活动是由中央情报局要求干的，中央情报局于是赶快中断了这项活动。

10 个月后，在对河内和海防进行大轰炸的前夕，中央情报局要求联邦调查局恢复对该使馆的侦听活动。但是，到了 12 月 20 日，即开始投炸弹之后的两天，也就是中央情报局要求恢复侦听活动之后 12 天，联邦调查局仍按兵不动。结果国务院亲自出面要求联邦调查局对这一目标“ 尽一切可能进行侦听 ”。两天之后，窃听活动总算重新开展了一部分。到 12 月 26 日圣诞节后的一天，窃听活动全面恢复。

第六节使国家安全局不寒而栗的大泄密

安全局警卫森严，围着钢制栅栏、高压电网和有刺铁丝网，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保护它的是第四道障碍———道比华盛顿所有的赛克隆栅栏和武装警卫加在一起还要森严的“墙”。这是一道用避人耳目、严格保密和保持沉默等手法筑起来的“墙”，而且很少被打开过缺口。

自从在陆军部军事情报处第八科和“黑屋子”前面筑起这道“墙”以来，不仅使国家安全局及其前身的几乎一切活动与详情都瞒过了公众的耳目，而且在头 40 年中（直至 1958 年）也从未正式向公众证实过这一机构的存在。50 年代后期，国家安全局的名字终于出现在政府的一份不保密的正式文件中。即使在那时，列举的职能也纯系空洞无物的饰词。那时以前，它的名字、它的局长是谁、乃至它的存在，都是比“绝密”还要高一等的核心机密，只让政府里的极少数人知道。

就是在此以后的时间里，有关苏联克格勃（在世界间谍机构中，唯有它的规模堪与国家安全局媲美）的公开资料，也比有关国家安全局的公开资料多。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当了近 40 年的编辑、外事记者和国内记者，可是连他也坦率地承认，在其漫长的记者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未听到过该局的名字。他说：“我应该知道，每个美国人都应该知道。国家安全局是美国安全机构中的巨人……它在许多方面都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相形见拙。”

这位荣获普利策奖的记者，只是在发现国家安全局几十年来一直在偷阅他的电报和窃听他的电话以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局的。他说，感到吃惊的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因为“那个缩略语并非家喻户晓。如果我问邻居，哪一个是我国最大的安全机构，他会说是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他错了！国家安全局才是最大的，但在美国人中，只知其名者也不足万分之一”。

在已经把调查报道发展成一种艺术，而且猎取消息的记者大军每天都要把政府剖析一番的美国，在以拥有世界上消息最灵通的公众而自诩的美国，每一万个人中才有一个人听到过本国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间谍机构的名字，这实属极不寻常，这就是国家安全局那堵无形的场所起的作用。

正如大多数不朽的建筑一样，安全局周围的这道“墙”是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才建成的。“地基”是花岗岩一样坚硬的法令，例如通信情报法（许多人把它看成是和英国保守官方机密法一样严厉的法令）和第八六一三六号公法（这项法令使国家安全局有了个甚少为人所知的、令人惊异的空子可钻，它实际上使国家安全局不受新闻自由法的约束，乃至几乎可以否认自己的存在）。华盛顿的一些爱插科打浑的人说，NSA 这个缩略语不是指国家安全局，而是指 NoSuchAgency（“并无此局”）。局内人士则赋予 NSA 以另一种解释：NeverSayAnything（“守口如瓶”）。

“地基”之上是国家安全局所谓的“避人耳目的政策”。这是一种不搞对外宣传的政策，根据这项政策，雇员只能讲在国防部工作，不准讲工作情况。它可能是政府里唯一未设新闻发布官的机构。对于为数不多的询问，它干脆回答“无可奉告”。这一政策的影响如此之广，以致政府其他部门中的官员一般都以神秘的口气提到它，而且只是在必要时才提到它。

但是，形成这道“墙”的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浓厚的神秘色彩和迷信。在美国过去的军事与外交活动中，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能像密码破译工作那

样浪漫和引起人们极大的好奇。“ 齐默尔曼电报 ”、“ 黑屋子 ”、日本“ 紫色 ”密码的破译、中途岛之战、“ 魔术 ”、“ 超级 ”，所有这些密码破译工作加上了一层近乎神奇的色彩。这种神奇色彩与今天的计算机化毫不沾边，但是国家安全局仍要人们迷信这种神奇的色彩。

几十年来，国家安全局不断加强对密本密表的保密措施，并且一再警告说，稍有泄露即可严重危害美国的密码工作。因此，它躲过了国会调查乃至记者的窥视。不过，它真正担心的倒不是泄露“ 美国密码 ”（从某种意义上说，密码在一秒钟内可以换几千次），而是怕暴露“ 白花酢浆草 ”和“ 尖塔 ”之类的大规模非法活动。例如在马丁和米切尔叛逃之后，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曾明确表示，尽管他的委员会打算调查这一事件上前前后后的情况，但将自觉地不去过问国家安全局的一切活动。他说：

国家安全局的特殊职能及其在美国安全事务中的作用非常机密，因而不仅对公众，而且对政府其他部门都严格保密。

在进行调查与举行听证会期间，国家安全局工作的这种机密性得到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承认和尊重。委员会不打算了解该局的组织机构或其研究成果的详情，因为委员会感到没有必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多年来，只有一知名人士——戴维 · 卡巧妙地越过这道“ 墙 ”“ 往里面瞥过一眼 ”。他针对国家安全局不断试图利用国会的担心和无知这一情况作过一段评论。他在《破译者》一书中写道：“ 该局常常把它的秘密隐藏在一种吓人的仰郁气氛之中，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奥秘去吓唬国会议员，这种奥秘实际上不过是用四个字母组字而已。 ”

50 多年来，国家安全局这道无形的墙只出现过一点小小的裂纹，即亚德利的著书事件和 60 年代初期的叛逃事年，但是祸根都在内部。进入 70 年代以后，一些空前的冲击却大有动摇“ 墙 ”根之势，而且简直要把“ 墙 ”推倒，砸伤“ 墙 ”内诸公。第一道裂缝出现于 1971 年 6 月 30 日。那天，《纽约时报》开始公布美国越战决策秘史《五角大楼文件》的摘录。

在白宫，被前几次泄密事件搞得几乎精疲力竭的尼克松总统，对这次失密事故十分担心恼怒是来自联邦调查局下述消息：该局一名最重要的密探——在联合国工作的克格勃变节分子报告说，苏联使馆已经获得全套《五角大楼文件》。虽然这名特务（代号 ”软帽 ”，据说就是苏联外交官）十几年来一直向联邦调查局报告情况，但是情报界，特别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人，对他的忠诚表示怀疑。例如，中央情报局反间谍专家安格尔顿就认为，这个苏联人与其说是可靠的密探，不如说是内奸。当时，联邦调查局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过，几年之后，它却不得不表示同意。

对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泄漏，尼克松总统十分恼怒，安全局的官员则大为恐慌。如果苏联人确实已经获得这套文件，他们就有可能发现国家安全局最有价值、也是最秘密和情报来源之一——代号为 GammaGupy 的活动。这项活动涉及到窃听苏联政府领导人乘坐小轿车在莫斯科市内行驶时，用保密无线电话进行的谈话。窃听工作显然是由 USM—陆军安全局的一个单位在美国使馆内进行的。通话内容一被截获，就立即加上 TopSecretViparGammaGupy 的密级发往安全局破密。

据接触过这种材料的一名前情报官员说，这是美国在苏联国内最有价值的情报渠道之一。在国家安全局看到的通话材料中，有苏共首脑勃列日涅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 · 波德戈尔内和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 · 柯西

金的谈话。尽管这些苏联官员不会用这种保密性极差的电话谈论高度机密的战略问题，但是 GammaGupy 可以“获得有关苏联领导人个性和健康状况的极其宝贵的情报”。这位前情报官员指出，“不过，我们没有发现比如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类的情报。截获的材料都是些闲谈——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或者波德戈尔内的私生活。”

使国家安全局不寒而栗的是在一卷《五角大楼文件》（据报道该卷文件已被苏联使馆获得，但一直未在《纽约时报》刊出）中曾未注明来源地提到勃列日涅夫的一些谈话。

上述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因为在听说《五角大楼文件》落到苏联人手中之后不久，截获的通话材料就比较无聊了。情报专家们推测，苏联已经发现了美国的这种窃听能力，并向其高级领导人发出了警报。

虽然 GammaGupy 的泄露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但它绝不是唯一令人担心的事。国家安全局官员认为，在这份长达 47 卷的研究报告中，还有许多内容会提醒外国政府，特别是北越政府注意：它们的通信正在受到窃听，它们的密码正被破译。

即使在《五角大楼文件》发表以前，向报界泄密的问题就已经在尼克松的白宫内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现在，由于最近这次惊人的揭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总统决定，政府立即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反击：一条是通过法院；另一条则不太引人注目，亦即由一支小分队进行堵塞泄密漏洞的工作，后来这些人被人们称为“管子工”。

第一批《五角大楼文件》摘录刊出后不久，政府在法律战线打响了第一枪。司法部要求发布暂时约束令，禁止进一步刊登文件摘录，直至联邦法官经开庭调查确定是否应当永久禁止刊出为止。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

五角大楼总法律顾问布兹哈特派出了三名最精明能干的人员出庭作证，以便证明这些文件被定为“绝密”是完全有根据的。唯一的难题是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从未看过这些文件，第三个人又根本不是很合适的证人。对于准备为政府辩护的助理司法部长赫斯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头痛的局面。

布兹哈特对赫斯的反应感到吃惊，很不情愿地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证人，此人可以很有权威地谈论《五角大楼文件》的机密程度，但有一个难题，因为不仅证人的身份，甚至他所代表的机构都属于绝密范围，听取证同的唯一办法是在密室中进行，除法官外，不得有其他人在场。

赫斯认为，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违反司法程序。布兹哈特建议由他的秘密证人提交密封的宣誓书，只供法官过目。赫斯不得不再次提醒五角大楼的这位律师，《纽约时报》不仅有权盘问证人，而且同样有权了解法庭收到的任何证词。

“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布兹哈特怒气冲冲地回敬了一句。“这事非常机密，只能文给法官一个人”。

正如赫斯所猜测的那样（几年之后布兹哈特也证实了这一点），唯一能够掌握这种秘密活动机密的那位官员，就是安全局的首脑诺埃尔·盖勒海军中将。

《五角大楼文件》除泄露了国家安全局的破译成果以外，还有一些令人担心的问题。文件中多处逐字逐句地抄录了原先加过密的机密文电，而且日期、时间俱全，亦即注有表示确切发报日期与时间数码。人们担心，如果泄露了文电原文，敌人便能够将其与截获的密码文本进行比较（这是一种最古

老的破译密码的方法）从而破译。

《纽约时报》早就料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它聘请戴维·卡恩担任顾问。卡恩叫他们放心。他说，对美国密码制造成的任何伤害都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政府决定就密码问题起诉，《纽约时报》可以提出的另一个论据，是国会就倒霉的“普韦布洛号”间谍船被朝鲜俘获一事所举行的听证会。在公开发表的证词中，收录了差不多 12 份曾有密级的文电，这些文电像《五角大楼文件》中的文电一样，根本没有改写，也不是摘取大意，而且还附有原先表示日期与时间的数码组。

开庭以后，默里·格法因法官（他本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情报局的老兵）声称他对未采用摘取大意的方法引用电文一事表示担心，从而重新提出了泄露密码问题。代表《纽约时报》出庭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比克尔企图消除法官担心。他争辩说，政府从未断言“《纽约时报》刊登的文章中有哪一篇破译了密码、泄露了密码或者涉及了现用密码”。但格法因未被说服。他看着比克尔，解释道：“你、我、《纽约时报》都没有资格谈论什么会导致密码被破译这个问题。”

尔后，比克尔又提出：“在很短的时间内极其迅速地更换密码，已经保证了密码的安全。”但是，格法因没有理会这一论点。他说，“不逐字逐句地刊登密码文电”，同样可以论述越南战争的历史。

当再次提出密码这一敏感问题时，辩论从公开转入了秘密。格法因仍对未以摘录大意的形式公布电文表示不安。经过一段辩论后，当政府的三名主要证人之一、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布劳因海军中将站起来发言时，这场争论方告平息。这位在战争中荣获过勋章的老兵说：“格法因法官，在这间屋子里恐怕只有你和我年岁最大，足以记得什么时候因为逐字逐句地引用电文而泄露了密码。”比克尔高兴得咧开嘴笑了。“国家安全不光靠筑垒防御，还要靠我们和自由制度本身的价值。为了维护更有价值的言论自由和人民了解真相的权利，对于到处活动的爱争吵的记者，当权派只好忍着点了。”1971 年 6 月 19 日，格法因法官用上述雄辨的言词对这一历史性案件作了有利于《纽约时报》的判决，但仍维持原先暂停刊登的约束令，以便使政府有时间上诉。

上述判决在安全局内引起了恐惧和沮丧。这是盖勒局长所担心的结果。不过，他已经预料到作出这种判决的可能性，并且制订了紧急计划。

星期六上午宣布判决，但判决书的墨迹未干，布兹哈特便通知受理此案的纽约市检察官西摩说，国家安全局一位名叫扎斯劳的高级官员想秘密会见《纽约时报》的一位负责人，以便讨论某些保密问题。扎斯劳原系国家安全局 B 组负责人，现已接替巴夫汉担任负责生产系统的助理局长帮办，他是生产系统的最高文职人员，地位仅次子托德拉副局长的第二号密码学专家。一名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扎斯劳是局里最有权势的文职官员，他是盖勒局长的左右手。没有他，盖勒屁也不会放。”

西摩将这一要求转告了《纽约时报》律师比克尔。比克尔很怕进行这种会晤，他担心国家安全局设圈套：首先告诉《纽约时报》一些情况，尔后不让它作出反应，甚至不准透露会谈内容。尽管如此，《纽约时报》还是同意举行会晤，井决定由副董事长班克罗夫特作为代表，因为他在国务院工作时曾获得过接触机密的资格，而国家安全局要求报社派出的正是具备这种资格的人。

为了尽可能不耽误时间，会晤日期初订在第二天（星期日），后来又改在星期一下午 3 点。当发现联邦大厦内的西摩办公室不足以保证扎斯劳的安全时，检察官建议把会晤地点改在纽经律师协会大楼一个角落里的密室内。这幢大楼还有一个好处：扎斯劳和班克罗夫特可以分别从两侧进入大楼。

扎斯劳身材相当矮小，圆脸，有一头浓密的波浪式黑发。据说，他到达时胸前斜挎着一支手枪，并由安全处一名佩着两支左轮手枪的警卫陪同。给《纽约时报》一名职员的印象是，这个人仿佛是被派来重拍《刑警队》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经过介绍之后，西摩把班克罗夫特和扎斯劳单独留在房间内，自己退了出来，同安全处的警卫和《纽约时报》的一名律师一起在门外等候。

西摩一走，扎斯劳立刻谈了他来这里的原因：他要求《纽约时报》从《五角大楼文件》中删去有可能导致外国政府发觉其通信系统已被窃听的任何内容。这就是说，有关侦听成果、侦听手段或提到侦听时间的任何内容都要删掉。扎斯劳说，进行必要的删节并不难，只要《纽约时报》同意不发表某些细节就行，因为这些细节将会泄露情报来源、透露北越部队具体的调动和补给情况或者涉及到某次侦听活动。

使扎斯劳放心的是，班克罗夫特认为遵守上述方针不成问题。但他指出，编辑有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难以决定取舍。扎斯劳认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给班克罗夫特留下了国家安全局和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以便在需要时打电话求助。但他提醒说，此事尚需上级批准。他还指出，除他之外只有两、三个人知道这次会晤。

会谈以后，扎斯劳及其警卫返回米德堡，班克罗夫特回到《纽约时报》，报告了会谈情况。他被告知，在编辑文件时已经考虑到国家安全局的意见。

如果苏联人未能从删节过的《五角大楼文件》中发现代号为 GmmaGupy 的活动，那么，三个月后，看了 1971 年 9 月 16 日的《华盛顿邮报》，他们肯定会知道这一秘密。在该报第六版第七页的右上角，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在“华盛顿巡视”栏内证实了克里姆林宫可能已有所怀疑的事情。安德森报道了美国政府拥有窃听克里姆林宫核心人物谈话的能力，但未具体透露这些谈话是如何被窃听的。在谈到窃听到的内容时，他提到勃列日涅夫“有时伏特加喝得太多，因而感到不舒服”；柯西金“健康不佳，他对自己病痛的诉说比较可信”；他俩经常到一家私人诊所去消除病痛。

对通信情报工作的这种披露在情报界上层人士以及白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不知道安德森还掌握着多少该死的情报，同时也由于希望筑起一道防火墙，以防造成进一步的危害，中央情报主任赫尔姆斯悄悄地宴请了这位专栏作家，求他不要泄露窃听手段，也不要再提这项窃听计划。

安德森辩解说，他的消息来源告诉他，苏联人已经知道他们的电话遭到窃听（可能是通过获得的那套《五角大楼文件》知道的），但他答应不再透露这项工作的详细情况。他还答应不在《安德森文集》一书中提及这一行动。

尽管尼克松总统在《五角大楼文件》的诉讼中（首先刊在地方法院，尔后在上诉法院，最后在最高法院）接连败诉，但他仍坚持战斗。就在《纽约时报》刊出头一批《五角大楼文件》不久，尼克松把埃利蒂曼叫到办公室，吩咐他成立一个白宫特别调查组，该组的唯一目的是堵塞住泄密的漏洞。埃利希曼挑选他的助手巴德·克罗和基辛格原来的助手戴维·汤负责这项工作。为了组成四人调查组，克罗和扬又找来了利迪和亨特。利迪是财政部长特别

助理，负责对付集团犯罪活动，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政府内宣传有枪的好处。亨特当过中央情报局的暗探，成绩平平，现在是华盛顿某公共关系公司的职员，这些“管子工”们在白宫第一层第十六号房间内以一种右翼的狂热，从事着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为了取得支持，利迪突然出席了司法部情报评价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并且告诉包括国家安全局代表在内的与会者们：由于总统对多次泄密事件深表关注，并且“要求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因此成立了他这个调查组。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他在小组内的作用犹如开路先锋，负责“用润滑油或炸药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尽管利迪自吹自擂，会议秘书还是记录道：“戴维·扬可以代表埃利希曼说话，其地位比利迪高，因此应尊重扬提出的要求，而不必与利迪核实。”

利迪在 1971 年 8 月 4 日的会议上还说，他“打算通过情报评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迅速与各局直接联系，以便克服和尽可能减少官僚主义造成的问题”。他说，虽然各局由各自的首脑负责，但“埃利希曼不准备等各局把报告润色后再通过各自的渠道送来，而是要求一获得情报就送给他。”因此，利迪（据他在会上发言的摘要记录记载）希望“能通过情报评价委贝会工作班子的成员”向国家安全局及其它情报机构“要求提供情报，并且赋予他们以获取这些情报并将其送往白宫的权力”。为了保证每个成贝都能认真地履行自己的新职责，利迪通知他们，他将在情报评价委员会工作班子内坐镇，并列席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这样，利迪便从安全局以及其他情报机构的后门，通过秘密的情报评价委员会工作班子，直接向“管子工”小组铺设了一条“地下管道”。国家安全局通过这条管道输送了些什么情报（如果有的话）不得而知。但是，在水门事件之后所作的调查中，白宫为了限制对“管子工”小组调查而提出的论据之一就是，继续进行这种调查可能危及与破泽密码和通信情报有关的活动。时至今日，在“管子工”们的任务中，至少还有一项任务从未解密或透露过。”

正当《五角大楼文件》造成的裂缝震惊白宫之际，又开始出现了另一些细小的裂纹。在 1970 年 12 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底特律的联邦大陪审团对激进的“气象员”组织（左翼“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中的一个好斗的组织）的 15 名成员提出了秘密起诉。这批人中包括多恩、拉德和艾尔斯这样一些超级革命明垦，他们被指控于一年前（即 1969 年）在密执安州弗林特举行的一次“气象员”组织“作战会议”上，密谋进行爆炸与恐怖活动。联邦调查局依据起诉书展开了大搜捕，它把多恩列为 10 名要犯之一，并迫使大部分被起诉的成员转入地下活动。1971 年中，当白宫开始向联邦执法机构和情报部门进一步施加压力，让它们尽快镇压激进组织时，联邦调查局和特工处把“气象员”组织列入了交给国家安全局的监视名单之中。不久，它们便开始收到安全局截获的该组织成员发出和收到的电报的副本，以及那些提到他们情况的电报的副本。

到 1973 年夏，已有 44 名好战的“气象员”分子被捕并开始受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年夏天，在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的主持下，政府也在受审。

在安全局内，当了 15 年副局长和无形墙主要建筑师的托德拉非常担心。

他知道，该局染指了许多有问题的活动，而且水门事件委员会已经发现了线索。当委员会主席欧文在第一天的公开听证会上猛烈敲打他的小木槌对，托德拉已可以看出另一条新裂缝的痕迹。

1973 年 6 月 7 日，这条裂缝绽开了。这天上午，《纽约时报》首次透露了休斯顿计划，并且公布了计划的全文。人们从中发现，国家安全局“ 目前 ”正在窃听国际通信并且要求取消针对外国大使馆搞“ 黑袋子 ”活动（进行偷窃文件的活动）的限制，“ 以便搞到急需的外国密码资料 ”。尽管如此，由于该计划内容非常广

泛，披露出整个情报界的非法活动又如此之多，因此安全局没有专门引起人们的太大注意。

但是，作为水门事件听证会的副产品，另一股公众看不到的压力正在威胁着国家安全局的“ 墙 ”，使之东摇西晃。就在休斯顿计划公诸于世之前不久，“ 气象员 ”（当时正在底特律法庭受审）

的辩护律师们在暗中作了番尝试。由于了解到“ 管子工 ”之类的组织爱搞窃听和偷窃活动，以及由于希望发现政府对当事人采取不正当行为的一些线索，律师们提出动议，要求公布针对被告的一切非法监视活动，包括白宫“ 管子工 ”、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员、司法部、财政部和国防部针对他们的当事人进行的任何偷窃、破坏和电子监视活动，以及使用坐探或其他“ 间谍手段 ”的情况。

6 月 5 日，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基思批准了这一要求并命令各部局遵照执行。两天以后，副检察长伊伯索夫来到法院，要求重新考虑这一要求，他神秘他说，这牵涉到“ 别的问题 ”，但又不肯细说。他的请求被驳回。6 月下旬，伊伯索夫递交了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宣誓书，保证在调查“ 气象员 ”的过程中未采取任何非法的或“ 未授权 ”的行动。至于其他总局，伊伯索夫说：“ 政府认为这里不是审查政府不当行为的适当场所。 ”

基思法官不为所动。他把这种拒绝称之为“ 没有抓往问题核心 ”的敷衍行为，因而命令检察当局于 9 月 3 日以前“ 让各有关组织或部局内充分了解情况的人递交宣誓声明 ”，然后再就政府是否对任何证人“ 施加了影响 ”一事安排一次庭审。

上述命令使国家安全局感到震惊，它如公开发表誓言承认窃听活动，那将暴露“ 尖塔 ”和“ 白花酢浆草 ”行动以及监视名单问题，“ 屈从于上述命令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8 月 28 日，国家安全局的官员最后通知助理司法部长彼得森说，“ 气象员 ”组织被告们的通信曾受到窃听，但坚决反对“ 透露这一手段和有关计划 ”。

到 8 月 25 日艾伦接管国家安全局工作时，该局看来正在受到围攻。自从中央情报局退出以后，国家安全局曾单独为麻醉剂和危险药品管理局执行监视贩毒活动的非法计划，但因害怕暴露而于 6 月份勉为其难地放弃了这一计划，由于法庭调查进一步威胁到曾一度是坚不可摧的保密之墙，因此该局决定销毁物证。虽然该局原来规定保留资料至少 5 年，但 8 月底和 9 月初决定销毁与监视贩毒活动有关的一切资料——不仅包括窃听成果，而且包括所有内部备忘录和公文。到 9 月中旬，安全局与这项活动有关的片纸只字均荡然无存。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基思法官。助理司法部长彼得森 8 月 28 日与国家安全局官员举行了会谈之后于 9 月 4 日向司法部长理查森汇报了上

述活动，并说“我们对此事先毫无所知”。在此期间，检察官们要求延长执行法官命令的期限，理由是法庭要求不属于司法部管辖的范围，重要联邦机构交出宣誓书系异常之举，故需放宽期限。

延长时限的要求获准之后，彼得森向联邦调查局局长凯利发了一份备忘录，要求他在 9 月 10 日以前报告“联邦调查局为了获取情报、起诉或其他目的，而要求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哪些对有关的国内组织或个人的窃听资料”。此外，彼碍森还要求凯利就一年多以前一的一起类似诉讼案的判决（美国政府对美国地方法院诉讼案对国家安全局的侦听计划有何影响提出看法。在基思案件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虽然认为根据宪法总统有责任“保护政府不受阴谋以非法手段颠覆或推翻政府的伤害”，但它认为，这种职责所赋予的权力不应扩大为有权未经法院同意，就采取为保护国家不受国内组织颠覆所必须的电子监听行动。然而，在与外国或外国代理人的活动有牵连时，总统根据宪法是否有权未经法院同意就批准进行电子监视活动，仍有争议。

由于“尖塔”计划中确实包含了对包括“气象员”在内的某些国内组织进行过未经批准的电子监视活动，因此，基思案件的判例使这一行动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除非能够证明这些组织是配合某个外国进行活动的。

9 月 10 日，凯利作出答复，他通知彼得森，联邦调查局曾要求国家安全局提供“据悉曾参与旨在破坏和推翻美国政府的非法与暴力活动的有关组织与个人”的情报。至于对基思案件判例的看法，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回答说：“我们相信国家安全局实际上并没有为政府其他部门对被告进行过任何电子监视活动，因为根据该局的工作程序，他们并不知道可能包括在国家安全情报资料搜集计划中的任何组织或个人的身份。”

凯利似乎故意遗忘了一个事实：联邦调查局和其他部门事实上曾将这些人的名字和身份列在监视名单中交给了国家安全局。

接着，彼得森又告诉理查森，在联邦调查局交给国家安全局的监视名单上，个人与组织的数目目前“已超过六百个”。他还警告说，这牵涉到许多法律问题。他建议：

立即劝告联邦调查局和特工处停止要求国家安全局向他们抄送通过电子监视手段获得的有关这些个人与组织的情报，并应通知国家安全局不要向特工处或联邦调查局主动泄露这类情报，除非国家安全局在执行对外情报任务中主动搞到了这种情报。

9 月 17 日，国家安全局局长艾伦曾自行决定警告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提供监视名单的单位：“国会、法院和新闻界要求透露情报来源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他还说：“我自然对保护高度机密的信号情报来源极为关注。”艾伦要求每个提供监视名单的单位“重新审订你们交给我们的现有名单，以便使你们对名单内容的合适性感到满意”。

看了彼得森备忘录之后,司法部长理查森于 10 月 1 日指示联邦调查局局长凯利和特工处停止要求国家安全局提供电子监视手段获得的情报，并且要求这两个单位在重新向国家安全局申请获得外国情报或间谍情报以前必须得到他的批准。

尔后，他致函艾伦。他写道：“最近，我才第一次注意到贵局一直在向联邦调查局和持工处抄送通过电子监视手段获得的情报。”他援引了基思案

件判决书，并且指出，他发现按监视名单所进行的活动的合法性很成问题，因此要求国家安全局“ 立即停止 ”向上述两个单位抄送有关情报，但是“ 你们仍可继续把在搜集外国情报的日常活动中获得的有关情报提供给政府中的合适部门 ”。

三天之后，艾伦答复说，他已“ 指示在就法律问题听取意见之前，不再向联邦调查局和特工处分发情报 ”。不出所料，他根本没有告诉司法部长，就在四个月以前，该局曾经放弃了一项更成问题的窃听行动——为麻醉剂与危险药品管理局监视贩毒活动。他也未提及该局正在继续进行一项几乎肯定是非法的行动——“ 白花酢浆草 ”计划。

在艾伦、理查森和彼得森焦虑不安地进行书信往来的过程中，底特律的诉讼陷入了一片混乱。9 月 12 日，检察官盖伊通知基思法官，政府希望秘密审查由一个未具名的联邦机构提交的宣誓书证词。在指出宣誓书中提到的侦听活动涉及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问题并对案件的起诉没有影响之后，盖伊宣称，如果法院仍然判定必须向被告展示宣誓书，政府将要求收回这一文件并“ 保留撤销诉讼的权利 ”。这使“ 气象员 ”的辩护律师们大感意外。但是，经过考虑之后，检察当局认为，连这种办法也过于冒险，于是在 10 月 15 日，当基思法官仍在考虑是否进行秘密审查之时，政府方面突然认输，并在未申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提出撤销此案，以免暴露国家安全局与此案有牵连。

国家安全局再次把自己隐蔽了起来，但是保住这堵无形墙的代价越来越高。不仅司法部被迫放弃了差不多准备了三年的诉讼案，而且连司法部长也首次卷入了该局的一项活动之中，但他显然很不热情。安全局不得不再次放弃它的一项行动——在与理查森发生冲突后不久，便停止了执行“ 尖塔 ”计划。

第五章恶梦降临

第一节国家安全局元老雷文说：他们正在扼杀安全局

对于为了避人耳目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没有人比托德拉知道得更清楚。他曾一直担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任期之长，在情报界是闻所未闻的。这位身材瘦长、说话温和的数学家一直领导着一场战斗，以便使《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和克朗凯特的口头上不再出现 N—3—A 这三个字母。他的瓦刀抹平了安全局“墙”上最细微的裂纹，他的利剑赶跑了调查官。魔术师能把一只兔子变没了，而托德拉则可以使一个联邦机构整个消失不见。

但是，时代正在慢慢地改变。法院和司法部长对他的打击已经使他的利剑失去光彩，乃至有点变钝。更糟糕的是，过去一提“国家安全”就能把别人的嘴封住，而现在，这道符咒的法力已被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破了不少。连法力无边的护身符“密本与密表”也被《五角大楼文件》一案搞得不那么灵了，托德拉越来越束手无策。

12 月 30 日退休，但同意在选定继任者之前留任。1974 年 3 月 21 日，本森·K·巴夫汉被任命为副局长，一个前，即 3 月 22 日，在五角大楼悄悄地举行的仪式上，托德拉被授予国家安全勋章，从而成了第十七名荣获这种勋章的人。自从 1953 年根据总统命令设置这种勋章以来，国家安全局只有四名官员接受过情报工作的这种最高奖赏，他们是：信号情报处的奠基人弗里德曼和罗利特，国家安全局的第一任副局长温格，以及前局长英曼（1981 年 2 月 23 日授予）。

托德拉虽已退休，但同该局许多高级官员一样，转而又成了国家安全局的顾问。以这种方式变换身份的人如此之多，以致该局一名老资格人士曾感慨他说：“国家安全局的老家伙们是决不会完的，他们只要变成顾问就行了。”

与这同一行中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本森·巴夫汉（在国家安全局生产系统内，老朋友们都叫他“巴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进入陆军安全局。尔后，他在生产系统内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情报生涯，并且逐步晋升，在 60 年代中期担任了生产系统的二把手。在尼克松执政的最初几年内，他代表该局参加了局际情报委员会和情报评价委员会之类的暧昧不清的委员会。1971 年，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局负责计划与预算的副局长，而由经常挎着手枪的米尔顿·扎斯劳接替了他的生产系统二把手遗缺。

巴夫汉不仅接管了托德拉的办公室，而且继承了托德拉的瓦刀和利剑。不过，这两样东西都已经不需要了。70 年代初期如此频繁的冲击看来已经平息。但是，这种平静是虚假的。1974 年 12 月 22 日，安全局的保护“墙”上又出现了细小的裂纹。

这一天，西摩·赫什在《纽约时报》上报道了“混沌行动”——中央情报局针对美国人搞的一项高度机密的和完全非法的间谍活动的细节，从而揭开了情报界滥用职权的盖子。随之而爆发的抗议怒潮一方面使得国会大吵大嚷地要进行调查，另一方面急得秘密系统拼命加以掩饰。

为了挫一挫国会的锐气，同时也是为了对滥用职权表示象征性的关注，福特总统于 1975 年 1 月 4 日成立了一个由副总统纳尔逊·A·洛克菲勒领导的比较缩手缩脚的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国内活动调查委员会（人们称之为洛克菲勒委员会）。该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委员会的态度有多认真、工作有多卖力，从它的一名成员——前州长罗纳德·里根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委员会首次会议尚未结束，他就离开了。

在尔后的四次周会中，他有三次没有到会。由于忙于巡回演说，在委员会成立后的一个月当中，他连委员会总部都无暇光顾。

调查集中在中央情报局是否触犯某些具体法律这一范围狭窄的问题上，因此几乎未触及安全局。委员会的最后报告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中与国家安全局有牵连的几处地方干脆搪塞过去。在有关监视名单的一段简短文字内，国家安全局的活动被转弯抹角他说成是“ 政府另一个部门的国际通信活动 ”。在另一处地方，当谈到中央情报局支持国家安全局对贩毒者的监视活动时，委员会错误地宣称：“ 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其他官员指示有关人员只搜集外国情报，而未打算在美国国内或国外搜集据说正进行麻醉品走私的美国公民的情报。 ”正如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后来所发现的那样，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曾为国家安全局直接调查过贩毒监视名单中的美国公民的情况。

众议院设立了一个由纽约州民主党议员奥蒂斯 · 派克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整个情报界的情况，该委贝会对安全局可不那么客气。

作为对国家安会局进行简短审查的起点,派克委员会要求查阅该局的‘ 宪章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六号情报指令，这立即遭到拒绝。1975 年 8 月 7 日，五角大楼的情报 “ 沙皇 ”、助理国防部长霍尔到委员会作证时没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指令，派克大为光火。他说：“ 一方面要求我们为这个雇有大批人员的机构拨大笔款项，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提供授权成立该局的文件副本，坦率他说，这真叫我难以置信。 ”尔后，委员会进行表决，以十比零的票数同意发出传票调阅这一文件。

次日，出席作证并且受到围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E · 科尔比倒比较愿意帮忙。在威斯康星州民主党议贝阿斯平的追问下，科尔比几乎是漫不经心地使公众第一次了解到国家安全局对国际通信的窃听活动。科尔比在回答阿斯平的提问时承认，国家安全局窃听 “ 美国与国外的通信 ”。

阿斯平追问：“ 这是否会牵涉到作为通信一方的美国公民？ ”

科尔比承认 :“ 有时不可能把美国公民从被监听的通信活动中分离出去。这在技术上办不到的。 ”

科尔比也许感到说得大多了，于是不再理会进一步的提问，并说：“ 我确实认为，我们最好在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 ”

但是，科尔比和霍尔唱的只是开场戏，压轴戏订在 8 月 8 日（星期五）上演。那天上午 10 点过 6 分，一位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戴着眼镜的空军中将站在证人席上举起了右手宣誓。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名国家安全局局长就要在国会的公开听证会上当众作证了。艾伦即将让全世界破天荒地第一次窥视一下安全局的内幕，真是撩人心弦。

艾伦首先向委员会指出：“ 过去，国家安全局局长从未被要求出席国会委员会的公开会议 ”。接着，他宣读了一份 17 页的声明。这份声明主要简述了该局的历史，并且列举了该局参与撰写的国会与政府研究报告。他宣称，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和通信保密活动 “ 极易遭到破坏 ”。他回顾说，几年前乔治 · 邦迪在参议院作证时就曾把信号情报列为 “ 含有货真价实机密的六种活动之一 ”。最后，艾伦要求将一切有关国家安全局活动的问题留到秘密会议上去提。

政府最怕问答式听证会。仅仅两天前，科尔比就曾在回答问题时泄露了国家安全局的国际窃听活动。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泄密事件，白宫密使马什在听证会开始前几分钟会见了委员会主席派克，并且告诉他，委员会即将调

查的的领域“涉及到极其机密的内容”，因而应把艾伦的证词视为“国家最高机密”。

委员会不顾白宫的恳求，照旧进行了一轮简短的提问。议员们询问陪同艾伦的国家安全局总法律顾问班纳，他是否认为，尽管法律禁止窃听电话，但窃听美国公民打往国外的电话不在被禁止之列，班纳回答说：“完全正确。”

在四个小时的秘密会议上，议员们专门问到了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活动，艾伦始终坚持下述立场：该局“目前”没有窃听美国公民的国内或国外的电话。但是，上述证词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派克主席说：“我根本不相信。”他还提出科尔比星期三的证词作为证据。

实际上，国家安全局是在诡辩。国家安全局一直坚持认为，只在把某位列为“目标”的人的通话，即使这种通话最终可能被录音、抄录和分发给其他部门，那也不叫搞窃听。

虽然艾伦已在派克委员会上首次露面，但他知道真正的考验将在国家安全局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及其主席丘奇进行较量时出现。夏季和初秋，丘奇委虽会在秘密听证会上听取了该局现任和前任官员的证词，而且气氛越来越不友好。在证人中，最重要的恐怕要算负责该局大部分国内窃听活动的 G 组组长了。不过现任组长刚刚上任六个月。由于担心他缺乏对付委员会严厉提问的经验，国家安全局已经让他去欧洲作“莫名其妙”的旅行去了。

在将近 15 年前建立 G 组时就担任组长的弗兰克·雷文，已在六个月前退休。现在，文伦局长需要他回来。艾伦在电话上告诉雷文，“我们在向丘奇委员会提供证词的问题上碰到了麻烦”，因此要求他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以便回答有关 G 组活动的问题，雷文勉强同意了。

雷文在国家安全局及其以前的信号情报机构中工作了 35 年，他在这漫长的生涯中得了一种目前在安全局仍很流行的综台症，即由于担心漫不经心地泄露出信号情报活动搜集到的情报，而不愿对世界局势发表评论。当社交场合中的交谈转到中东问题或南美最近发生的政变时，他会突然默不作声，这不可避免地会惹起他妻子的轻声责怪：“菲利，讲呀！”（菲利是雷文在家中的爱称。）

现在，当他步出汽车，准备在丘奇委员会的秘密听证会上开始其第一大的作证时，妻子又作出了新的劝告：“菲利，把你那张该死的嘴闭紧点！”

整整一天，雷文坐在听证会大厅的后排等候传唤，这使他有机会听到国家安全局其他官员的证词，并且越听越感到不安。他回忆说，“他们正在扼杀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麻烦之中。它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他们处处防御，不是试图与委员会合作，找出毛病的所在和谁该负责，而是非常好斗，对委员会寸步不让。”

当每个官员被传上去作证时，证人席上都坐着班纳和穆迪，后者负责国家安全局与情报界其他机构的关系和分发所有的信号情报。雷文回忆说，“那天下午，我坐在那里旁听。作证的人知道委员会所提问题的答案。罗伊·班纳和胡安丽塔·穆迪却不知道。他们如果让证人说出答案——事实真相，本来不会产生什么麻烦……，但是他俩却从法律上进行了种种愚蠢的反驳和反问。他们在委员会所提的问题上吹毛求疵，在答案上找碴子，根本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

由于对国家安全局企图封住证人嘴的作法感到沮丧，计划在第二天作证的雷文来到艾伦将军的办公室，并且提出了“最后通谍”：如果国家安全局

让他作证，文伦将军首先必须亲自发布一道命令，禁止该局其他任何人插嘴，除非雷文要求他或她提供建议。他将回答委员会的所有直接提问，如果需要帮助或法律咨询，他会提出请求。雷文说：“我不想让参谋一类的人物在他们不知道我要说些什么的情况下插上一嘴，并就国家安全局宪章和中央情报局宪章的一些法律技术问题争来争去。”

雷文得到了这命令。第二天，班纳和穆迪都没有出席听证会，而是派去了他们的助手。助手们在这位前 G 组组长作证期间一直保持沉默。显而易见，结果是证词出人意料地坦率。参议员蒙代尔问雷文，他了解“白花酢浆草”行动已有多长时间了。雷文回答说：“噢，您可能把我当成一名新手了。我在 1940 年就接触到了这一问题，此后断断续续地接触过它。”后来，雷文回忆说：“我想蒙代尔一定惊讶得快要说不出话来了！……他说在他所遇到的人中，我是第一个承认了解这类问题已有五年以上时间的人。”

雷文在回顾这次经历时认为，国家安全局在听证会上被整得够呛，这主要是由于“它过分采取守势并试图与委员会较量，而不是把事实真相摆到桌面上来”。

10 月初，参议员丘奇宣布他的委员会打算对国家安全局的不正当活动和滥用职权问题举行两天的公开听证会，在将要传唤的证人中有艾伦将军。因此，斗争更趋激烈。

10 月 7 日（星朗二），亦即举行公开听证会的前一天，政府高度恐慌，展开了紧张的、最后的活动，企图促使委员会停止召开公开听证会。那天上午，福特总统亲自打电话给参议员丘奇，向他解释公开泄露国家安全局的活动将带来什么危险。挂上电话以后，他又派司法部长利瓦伊前往参加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以便作出更加详细的申诉。委员会副主席、参议员戈德华特建议完全取消公开听证会。但是，他的建议仅以一票之差遭到否决。最后，委员们违背委员会主席的意愿，以六票对四票的多数干脆决定：在和政府官员进一步会晤之前，“推迟”举行听证会。

推迟的时间很短。10 月 23 日，委员会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投票赞成六天后举行公开听证会。10 月 29 日，艾伦将军在总法律顾问班纳和副局长巴夫汉的陪同下进入拉塞尔参议院办公大楼第三一八号房间，第一次向参议员们、肃静的听众们以及全世界公开介绍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活动。这一场面是如此地令人难以置信，以致艾伦曾一度感到，公开作证违反了通信情报法，因而他正在犯罪。

艾伦把国家安全局的过失仅仅限制在按监视名单进行监视活动和实施“尖塔”计划上。他承认，由于在情报资料的处理上实行了极其严格的控制，这些计划最后只具有“大大缩小”了的情报价值。尽管如此，正是由于实行了上述计划，“才在美国防止了一次大规模恐怖活动”（据猜测可能是指针对美国犹太人的一次阴谋活动），“才使数批大宗毒品未能偷运进美国”。这位国家安全局局长告诉委员会，麻醉剂与危险药品管理局的监视名单上一共约有 450 名美国人和 3000 多名外国人 ;特工处的监视名单上约有 180 个美国人和团体以及大约 525 个外国人和团体；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名单上约有 1000 名美国人和大约 1700 名外国人；中央情报局的监视名单上约有 30 名美国人和 700 个外国人与外国团体；国防情报局的监视名单上约有 20 名美国人。

艾伦估计，在 1967 年至 1973 年的 6 年中间，国家安全局共分发了大约

3900 份报告，涉及到监视名单中的大约 1680 名美国公民，在被侦听的通话中，约有 10%的通话双方都是美国人，但是每次通话至少有一方是在外国领土上。

在尔后的提问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国家安全局官员就法律适用于该局的程度所作的回答。

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施瓦茨首先发难，追问艾伦与窃听有关的法律对国家安全局是否有效。这位律师对文伦说：“ 你是否认为你们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现在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你们窃听国内通信？ ”

艾伦回答说：“ 我认为是这样。 ”

后来，参议员蒙代尔追问巴夫汉副局长在休斯顿计划中所起的作用。该计划的部分内容是授权国家安全局大幅度地扩大监听美国公民的活动，他问巴夫汉对于这部分内容的合法性是否感到过担心。

巴夫汉茫然不解地问道：“ 合法性？从来没有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 ”

蒙代尔又问国家安全局的首席律师，他是否认为监视名单是合法的。这位总法律顾问回答说：“ 我认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它是合法的。 ”

委员会主席丘奇打断了提问，建议所有有关合法性的问题留到询问司法部长利瓦伊时再提出来。对此，蒙代尔说：“ 我想这对于委员会确定这些法律是如何被解释的非常重要。我相信，他们仍然认为它是合法的，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

班纳插话说：“ 主席先生，我可以谈一点看法吗？对于这个问题，法庭曾作过判决，认为它是合法的。 ”

蒙代尔追问：“ 那么你认为它是合法的？这是判决书所持的观点吗？ ”

班纳回答说：“ 我认为当时它是合法的。 ”

蒙代尔立刻回击说：“ 这正是我要说的，他们仍然认为它是合法的。 ”

最后，丘奇中止了讨论。

国家安全局的三名头头全都认为，该局生活在法律管不着的世外桃源之中，不受那些对全国其他地方都适用的同一法律和法令的约束。联系到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施韦克在此之前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一事实更加重要。施韦克曾问，利用国家安全局的监视名单和庞大的技术能力是否可能“ 窃听美国国内的谈话，如果有人心怀叵测地打算这样做的话 ”。艾伦回答说：“ 我想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

提问一结束，艾伦等三人退席。委员会转而调查国家安全局的另一项活动，即福特政府强烈反对公开提及的 ” 白花酢浆草 ” 行动。虽然白宫勉强同意让艾伦作为证人出席有关监视名单和“ 尖塔 ” 计划的听证会，但是“ 白花酢浆草 ” 行动则另作别论。尽管如此，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发表有关这一行动的报告（国家安全局认为该报告的密级属于“ 机密，只能通过通信情报渠道处理 ” ），并于 1975 年 11 月 6 日由参议员丘奇宣读，将其载入记录。

第二节暴霹时期的开始

对安全局来说，不幸的是对“ 白花酢浆草 ”行动感兴趣的并非只有丘奇委员会一家。1975 年 7 月 22 日.纽约《每日新闻》刊载了一篇文章，指责联邦调查局及国家安全局至少五年来一直窃听发自和发往美国的商业电报。由于受到这篇文章的启发，众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政府情况与个人权利小组委员会开始进行调查。该小组委员会享有这种调查权的根据是它有责任监督‘ 与保护美国公民隐私权有关的问题和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活动 ”。

福特政府和国家安全局可能曾带着相当忧虑的心情看待派克委员会和丘奇委员会，现在他们则以极其恐惧的心情来看待政府情况小组委员会及其女主席阿布朱格。对前两个情报委员会的调查，政府多少还可以作些控制，而阿布朱格的小组委员会则像一架失去控制的满载着炸药的运输机。它机敏地决定不直接让安全局提供情况，而是传唤国际通信公司内了解或参与窃听活动的人作证。国家安全局能够以涉及机密和总统行政特权作为挡箭牌，但是私人公司却得不到这种庇护。

起初，小组委员会得到了各公司和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克雷格（据查他是国家安全局与电报公司的中间人之一）的积极配合。但是，到 10 月 21 日，即第一次公开听证会的前两天，这种支持开始消失。显而易见，政府在这一天首次了解到阿布朱格的调查活动，并且发起了大规模反击。联邦调查局局长凯利致函小组委员会称，由于所提问题“ 正在调查之中 ”，因此他不准克雷格作证。与此同时，美国无线电公司环球通信分公司和国际电后电报公司世界通信分公司均突然通知小组委员会，他们拒绝派人出席作证，除非用传票命令他们这样作。

在听证会开始的前一天，白宫、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和司法部派出了大批官员劝说阿布朱格，希望她改变召开公开听证会的主张。代表团中包括国家安全局局长艾伦、五角大楼情报首脑霍尔、司法部副部长泰勒、总统特别顾问约翰 · 马什和白宫负责与国会联系的官员查尔斯莱珀特。他们提出的论据是，这种听证会将不利于司法部目前对犯罪活动的调查或国家安全。

阿布朱格不为所动，拒绝取消或推迟听证会。因此，为了进行最后的努力，就在这位女议员即将宣布听证会开始之际，司法部长利瓦伊来到听证大厅，试图亲自提出请求，但是，他的运气并不比别人好。1975 年 10 月 23 日 11 时，听证会如期举行，但是主要证人没有到会。由于克雷格和各电报公司等候传票，唯一的证词是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及其子公司切萨皮克与波托马克电话公司的两名代表作出的。

这位纽约州民主党女议员第一轮只好认输。她建议文伦与利瓦伊来委员会作证并申述他们的理由，以便记录在案。但他俩均予以拒绝。在此期间，丘奇委员会公布了对“ 白花酢浆草 ”行动的调查结果。不过，由于感到这一报告揭得还不够深，阿布朱格小组委员会决定继续进行自己的调查。

1976 年 2 月 4 日，小组委员会向联邦调查局的三名特工人员、一名原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一名国家安全局雇员以及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环球分公司和西部联合国际通信公司的经理们发出了传票。

两个星期以后，即 2 月 17 日，福特总统非同寻常地和史无前例地扩大了自己的行政特权，他指示国防部长唐纳德 · 拉姆斯菲尔德和司法部长利瓦伊：

鉴于传票还要求提供“包含极其机密的国家安全情报”的档案资料，应通知被传人“不予执行”。

次日，拉姆斯菲尔德和利瓦伊分别指示那位国家安全局雇员和联邦调查局那几位现在与过去的特工人员：由于福特总统行使行政特权，传票上的要求将不予执行。尔后，司法部长利瓦伊在给西部联合公司律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谨代表总统在此要求西部联合国际通信公司尊重这次对行政特权的运用。”这就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把行使行政特权的范围扩大到了一家私营公司。

2 月 25 日，女议员再次宣布开会。首先传唤克雷格。他先是提出不得广播、拍电视或照像，接着又告诉小组委员会，由于司法部长指示他不得根据传票的要求作证，因此“我只能从命，这次不能前往贵小组委员会作证”。

另外三名证人（全部为联邦调查局的现职雇员）也作了同样的答复。最后，小组委员会把注意力转向汤姆巴。他 30 多岁，满头黑发，在国家安全局工作了 16 年，目前是该局的中层官员。这位工程师 1960 年在西弗吉尼亚大学上最后一学年时受雇于该局，60 年代中期被分配到生产系统 C1 组工作，经过在该局“一般机构管理监督训练班”（代号为 MG—110）的学习，最后被提拔到中层领导岗位上。同前面的几个证入一样，汤姆巴企图得到行政特权的庇护，但他首先发表了一通使小组委员会大为恼火的简短的开场白。他告诉感到吃惊的阿布朱格：“艾伦将军让我转告您，在对机密情报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的情况下，他愿意满足贵小组委员会的要求。为此，他的参谋人员随时准备同您的成员一起更加准确地弄清你们的要求。”

这位女主席在表明小组委员会己几次邀请艾伦将军出席作证之后，不无讥讽地回答说：“在电话显然无不被窃听的情况下，您亲自给我们捎来口信，我特别表示感谢。”

几分钟后，小组委员会以六票对一票的多数，建议政府活动委员会以蔑视国会为由传讯所有五名证人。

由于政府拒不合作，小组委员会转而传唤各电报公司的负责人。3 月 3 日，西部联合国际通信公司常务副经理格里尼什到小组委员会作证，并呈交了一份国家安全局八年来的监听对象名单，而福特总统之所以要求该公司尊重他的行政特权，正是为了极力防止发生上述情况。

继格里尼什之后出席作证的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环球通信分公司董事长霍金斯及其几名下属职员。他们的作证是政府的又一次失败。司法部长利瓦伊早先曾“代表总统”要求该公司代表既不要出席作证，也不要交出文件，“直至能够就程序问题达成协议，以保证总统的行政特权不受严重侵犯”。但是，格里尼什和他的同事们不理睬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要求，径自出席作证，而且还交出了一批档案。

在约一个星期之后，国际电视电报公司世界通信分公司经理约普和另外几名职员就“白花酢浆草”计划出席作证，看来政府已经认输，所以对他们未加阻止。

听证会以后，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开始起草关于国家安全局对美国与国外的通信进行窃听的调查报告，供政府活动委员会发表。但是不久，对于是否应该发表这一报告，产生了不同意见。1977 年秋，报告起草完毕，委员会决定悄悄地将它存起来。

报告稿的题目是《国家安全局对国际电信的侦听活动》。这份报告指出国家安全局具有“非同寻常的侦听能力”，并且认为“联邦政府中没有任何其他部门能如此大规模地进行这种活动”。它把笼罩该局的保密气氛斥之为“鬼迷心窍的毫无根据”，并且进一步指责说，国家安全局一个劲地呼吁国会与公众“相信我们”，但从该局长期窥探别人隐私的经历来看，这种呼吁是毫无道理的。

对于国家安全局总是企图通过玩弄词义来隐蔽自己，报告批评得特别尖锐。它提到了艾伦将军的继任局长英曼海军中将的一份声明，英曼在声明中宣称，“请大家务必相信……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任何美国公民目前都未被列为国家安全局的侦听对象，但是，由于进行国际活动，他们的通信就可以破国家安全局根据‘国外情报”这条标准挑选出来。国家女全局从未否认它确实在‘挑选，美国的这类通信，”

安全局尽管最后逃过了阿布朱格小组委员会有关“白花酢浆草”计划的公开报告可能造成的羞辱，但是仍未逃脱攻击。由于受到洛克菲勒委员会调查结论（它断言情报界活动可疑）的启示，司法部长利瓦伊建立了一个绝密的工作小组，调查洛克菲勒委员会的结论，查明情报界是否可能还进行了其它有问题的电子监视活动。在受审查的项目中有国家安全局的几项活动，其中包括“白花酢浆草”和“尖塔”计划。

由执法部门负责调查情报活动是否合法，这还是第一次。不出所料，情报界采取了敌对态度。工作组的报告起草人麦克米伦注意到了情报界所持的“谨小慎微、处处警惕的态度”，他写道：“典型的作法是必须以恰当的问题引出所需的答案或文件。”“可是，我们有时因掌握情况不足而提出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有了恰当的问题，还要弄清向哪个具体人或具体单位提出，因为情报搜集工作各管一摊，互不交叉，这一特点往往形成一个人不了解其他人在干些什么。”

尽管如此，在 12 个月的调查过程中，这个经过精心挑选和特别审查的司法部律师小组，还是慢慢地、一层一层地揭掉了笼罩在国家安全局身上一些最先进的窃听和处理技术上的迷雾。工作组的最后报告被定为“绝密、UMBRA、只准通过通信情报渠道处理”，并且不准备解密。由于考虑到它非常机密，这份报告只印制了两份。1976 年 6 月 30 日，这份 175 页的文件写成后，工作组的把它呈给了特别诉讼处处长卡尔霍恩，长尔霍恩又为主管刑事司工作的助理司法部长及其助手柯什起草了一份同样机密的 50 页的“起诉报告摘要”。

在 23 种“有问题的活动”中，由于时效已过而无法起诉的有五种，“显然缺乏起诉依据”的有七种。至于其他几种，“可能会出现许多下级向上级、这个局向那个局、局向委员会、委员会向总统以及生者向死者推卸责任的现象。”

此外，工作组认为，报告所谈的问题是“涉及到美国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重大国际案件”，但它类似于因地址不详而无法投递的信件。因此，如果起诉，辩护律师就可能要求传唤“每一个稍有牵连的政府官员和原政府官员”，以便确定各项活动是由上面哪一级授权的。报告指出，“虽然可能成为被告证人的高级官员不应列入起诉书，但不能忽视可能由此而引起的混乱和困惑，也不能忽视他们可能作出出人意料的证词。”

工作组没有把矛头对准任何个人或者任何一个局，而是对准整个国家安

全体制，这种体制使各局获得了“过多的自决权，而又极少规定它们应负的责任……。因此，这是 35 年来总统与国会的过错，而不是各局的过错。”

“起诉报告摘要”一方面指控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电信公司参与“白花酢浆草”行动的雇员显然违反了 1934 年通信法中的某些条款，另一方面又指出，国家安全局高度机密的行政“法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号指令（后改为第六号令）实际上给了该局无视对政府其他部门都适用的法律约束的权力。这份仍属绝密的指令写道：“行政部门任何权威机构的与搜集情报有关的命令、指令、政策或建议，除非特别声明适用于通信情报活动，否则均不适用于通信情报活动。”摘要最后指出：“国家安全局的这份‘出生证’（这个文件属于绝密）表明，它不必遵守在国家安全电子监视方面的对其它部门所作的限制，除非明确指示它予以遵守。”

建议不对“白花酢浆草”计划起诉的另一个原因则简单得多：“‘要求’一家公司提供电报副本并不犯法。如果该公司同意提供，它可能犯法，而接受电报副本的一方则不犯法。”

这样，入侵者又一次被赶跑了。从丹尼尔·埃尔斯帕格以《五角大楼文件》开了头一炮起，到 1977 年 3 月 4 日司法部建议免予起诉止，在这六年当中，安全局受到了新闻界、法院、众议院、参议院、白宫、司法部长和司法部特别工作小组的进攻。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局被迫放弃了若干项活动，首次公开发表言论，并且最终承认它的职能不只是“保护美国的通信安全”。但是，对于安全局的人来说，最糟糕的是突然发现他们的无形墙已不再是坚不可破的了。

美国国家安全局一位工作多年的高级官员在“绝密、只准通过通信情报渠道处理”的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说：“我们也许逐步习惯，习惯于在我们熟悉的和习以为常的隐身帷幕似乎被揭开的时刻所产生的被暴露和无保护的感觉。”他希望这种“不适当的暴露时期”终于已经结束，但却发现那些揭露者可能认为这仅仅是暴露时期的开始。她最后写道：“一群群各种饥饿不堪的野兽闻到了香味，它们都跑了出来，刨着仓库的地基，这里嗅一嗅，那里闻一闻，企图找到更多的食物。”

第三节一项机密的“联合王国一美国协定”

1940 年，英美等国之间达成一项十分机密的“联合王国一美国协定”。这项协定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信号情报组织集于一把掩护伞下。这五个国家根据这一协定将全球分为若干密码势力范围，各自按着自己最大的侦听覆盖能力，负责几个特定的目标。例如，英国负责香港小西湾监听站，侦听中国的一些频率。美国负责设在台湾、日本和朝鲜的监听站，侦听其他频率。

为了提高效率和保守机密，各国还使用统一的术语、代号和统一的截收处理程序和共同遵守的纪律。因此各成员国的绝密文件和截收成果上面都有 VIPAR 等代号。这些规定和程序都写进了“国际信号情报规则”之中。

“联合王国一美国协定”是在 1940 年那个风雷激荡的夏天产生的。丘吉尔知道，英格兰若要生存下去，只付出血和汗是不够的。这是一场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战争；是一场既有火药也有科学的战争。为此，丘吉尔指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勋爵在 7 月 8 日会见罗斯福总统，提出英国愿将雷达和其它科学发展方面最新的高度机密技术情报透露给美国，而这正是美国落后的方面。两天后，洛西恩正式向美国总统提出派遣一个小型秘密使团访美的建议。

在外交史上，慷慨无私的赠与一向是极为罕见的，这封建议信最后婉转地提出了一些交换条件：“美国政府在得到英国装备或设施的详尽情况后，如作为互惠，愿就我国技术专家迫切需要的某些秘密技术情报进行讨论的话，皇家政府将感谢不尽。”

8 月底，英国飞机生产部顾问亨利·蒂泽德爵士在公文包中装着与雷达、反雷达装置、声纳、无线电引信和无线电截取等先进科技有关的最机密的详细材料来到美国。

但是蒂泽德的棕色皮包中显然少了一个代号为 ULTRA 的超级机密项目。

当这场战争趋于炽热化时，英国搞到了一台德国最高水平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工作模型。这台机器由丹尼斯顿海军中校掌握。他是艾尔弗雷德·尤因斯爵士最初的四人密码小组的成员，当时在英国负责相当于美国通信情报处的政府密码学院。

8 月间，丹尼斯顿和他那伙知识分子从伦敦威斯敏斯特区的布罗德韦迁至伦敦以北 50 英里的小城市布莱柴利，住在一所华丽的大楼里。他们带着一个名为“恩尼格玛”的盒式金属装置。任务是要在亿万种排列组合中，测定出所截获的电报可能使用的密码体系。结果创造出了“青铜女神”。

这是一个古铜色的柱形装置，外面套着一个更大一些的古铜色外罩，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1940 年 4 月初，在亨利·蒂泽德爵士到达华盛顿前 4 个月，“青铜女神”试验成功，译出几段有关德国空军某些人事变动的简短电文，这在当时具有难以想象的重大意义。

蒂泽德这次到美国来，没有向他的美国同行提起 ULTRA，这并非是因为疏忽。ULTRA 是英国最大的机密。丘吉尔认为这次没有必要将密码术情报拿出去，因为美国拿不出多少可交换的东西。

到 10 月份，丘吉尔第一次听说美国破译日本高级外交密码成功，他改变了态度。他的布莱柴利小组是先有了“恩尼格玛”工作模型才得以进行工作

的，而威廉·弗里德曼和他的小组却只凭想象就搞出了成果。丘吉尔对此大为感慨。

到了 11 月，中立的美国和为生存而战的英国签订了一项极其机密的协议。这项协议规定，双方全面交换密码体制、密码分析技术、测向、无线电截收以及其他有关德、日、意三国的外交、军事、海军和空军的通讯技术情报。

美国方面挑选了密码巨子弗里德曼率代表团前往布莱柴利。他们不仅要将美国七台“紫密”密码机中的两台带给英国，而且还要将两台“红密”密码机和包括美国海军的无线电情报手册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密码，也一并带去。

1941 年 1 月 5 日，弗里德曼患神经衰弱症住院，这项任务改由他助手、时任陆军少校阿贝·辛考夫率陆军通讯兵部队的奥·罗森上尉和海军作战部二十处 G 科的威克斯上尉及柯里尔中尉陪同，带着两台“紫密”密码机，于 1 月底 2 月初乘船去英国。

他们带回各种先进密码装备，其中包括经过改革的马克尼一艾达得克高频测向机，但就是没有“恩尼格玛”，英国人连他们对德密码已搞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告诉辛考夫代表团。问题是出在英国外交部。哈利法克斯勋爵下过指示，不准把“恩尼格玛”拿出去。由于外交部对情报和密码机构具有监督权，所以他们的反对意见就被遵照办理了。

尽管这项交易很不公平，两国之间的合作还是在继续加强。到 1943 年 4 月，两国间合作达到了高潮。这时军事情报处特别科的麦科马克上校，在军事情报处的泰勒上校和此时已完全康复的弗里德曼的陪同下，去英国执行又一次绝密的使命。这一次是去对英国通讯情报活动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考察。

此时，英国首次决定，要完全揭开长期隐瞒美国最深的机密。由此，美国军事情报处才算最后完全了解了英国人在攻破德国军事通讯时取碍 ULTRA 机密的惊人成就。在此以前，从这个来源获得的情报虽也由英国情报联络人员向英美两国野战指挥官提供，但是，英国人一直没有把 ULTRA 装置给过华盛顿。

英国皇家海军中校爱德华·w·特拉维斯在布莱柴利迎接了这个美国三人小组。特拉维斯提前从丹尼斯顿海军中校手上接过了这个新由政府密码学院改组而成的政府通讯总部。

麦科马克上校领导的小组在布莱柴利停留的两个月里，听取了有关“恩尼格玛”和 ULTRA 的全面情况介绍，并同英国对口人员商量如何将“恩尼格玛”和“紫密”密码机的产品最有效地用于他们的共同事业。

1943 年 5 月 17 日两家通讯机构正式签定了合作协定，即“英美协定”，这是在最高级的通讯情报方面第一次建立的密切合作。这项协定对人员交流，对井同处理和分发超级敏感材料等方面做出了规定。此外，协定第八段规定，不论是英方还是美方，凡是接受高度机密通讯情报的人员，都必须切实遵守文件上的安全规定。“英美协定”中有关合作程序如安全的各项规定，是通讯情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即使今天，美国国家安全局和政府通讯总部的一切信号情报活动都以此为基础。

英美协定签定后，紧接着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英美两国，还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破译密码机构。1944 年 3 月 13 日，在阿林顿庄园举行了第二次盟国联席会议，参加者有来自美国通讯安全局和英国政

府通讯总部的代表，也有加拿大检查组织和澳大利亚中央局的代表，这是第二次大战期间最机密的会议之一。

经过两年的协调和磋商后，1947 年，“ 英美协定 ” 扩充为五个国家的“ 联合王国一美国协定 ”。据一份报告说，在这个协定中美国为第一方，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第二方。后来签字参加的北约国家和日本、南朝鲜等其他国家为第三方。在第一方和第二方之间情报资料的交换不受限制，但同第三方，在分享情报方面就不那么慷慨了。

在整个 50 年代里，美国方面负责这项国际合作的人是弗里德曼。“ 英美协定 ” 的蓝图是他协助拟就的，战后的 “ 联合王国一美国协定 ” 的蓝图也是他帮助草拟的。弗里德曼同他的英国同行保持着友好的合作，称英国人为“ 堂兄弟 ”。

1952 年 3 月，英国通讯总部主任特拉维斯爵士退休了。他曾胜利地领导了英国最秘密、最重要的一场战斗。由于这场战斗，英国国王封他为爵士，美国总统则怀着感激心情授予他最高文职人员奖——功绩奖章。

接替特拉维斯领导政府通讯总部的是琼斯。琼斯任命皇家海军中校克莱夫 · 洛尼斯当他的副手。弗里德曼同琼斯和洛尼斯是多年老相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琼斯在为弗里德曼的贺信所写的答谢函中写了下面这段重要的话：“ ‘ 英美协定 ’ 对我极其重要，一想起我同协定的问世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促使 ‘ 英美协定 ’ 在我们的友好关系之中顺利发展将是我今后努力的目标。 ” 弗里德曼和国家安全局看到琼斯这番表态后，知道继续合作下去是下会有问题了。

在 “ 英美协定 ” 和 “ 联合王国一美国协定 ” 中，都有一条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国之间互派通讯情报人员的规定。美国国家安全局一成立，就开始秘密派人去伦敦与政府通讯总部的密码破译人员一道工作。派出的小组以 “ 美国高级联络官办公处 ” 为掩护名称，进驻位于格罗夫纳广场北边北奥德利街七号一座漂亮大楼内的五〇七号套间里。

大约就在美国武装部队安全局改成国家安全局的同时，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也从伦敦郊区伊斯科特镇迁到了伦敦以西 85 英里的格洛斯特郡的切尔特南镇的新总部，这是因为担心通讯情报和通讯安全机构都集中在伦敦市，若再遭受战争袭击，英国的密码力量就会全军覆没。政府通讯总部和电讯情报局迁往山区后，伦敦市内就只剩下了离白金汉宫不远、帕尔默大街八号的通讯安全局，这也是外交部的一个部门。

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久即在切尔特南的政府通讯总部设立了一个业务分处，同时还在伦敦保留着办事处。在 50 代中期，美国的高级联络官是海军上校柯里尔。1956 年夏，他被任命为美国通讯情报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十五年以前柯里尔（那时是一个少尉）作为辛考夫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曾给英国送去两台 “ 紫密 ” 密码机。美国领导驻切尔特南小组的副高级联络官拉金，一直在这里工作到 1957 年。

英国在华盛顿也同样设立了 “ 联合王国高级联络官办公室 ”，在 50 年代中期，它以 “ 英国三军使团 ” 这一掩护名称设址于美国海军楼主楼。当时的联合王国高级联络官是雅各布上校。

这项绝密协定的另一部分是关于连接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的专用无线电线路的控制权问题。协定规定英美各自控制自己的一端。但到 1954 年，美国想把这条线路的两头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力争修改英美协

议上的规定。但英国人则另有打算，结果决定 6 月份在英国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是否能修改协定。这个会议与另一个早已确定要讨论成立“通讯情报统一通讯中心”的会议安排在同时举行。

“通讯情报统一通讯中心”是一种特殊的中转中心，专门传送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讯。这种电讯被认为是极其机密的，就是在定为绝密的正常军事线路上也不能发送。统一通讯中心设有国家安全局专门提供的联机密码设备，只有经过通讯情报专门审查过的人方能进入。为了加强保密性，统一通讯中心设在单独的楼里，同其他军事中转站完全分开。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必须设在同一座大楼里，也要将通讯中心完全隔离开来。

两国合作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彼此有权在对方领土上建立侦听站。这似乎是一项一边倒的协议，因为到 1951 年 3 月，美国在联合王国及其控制的领土上共设立了七个监听站，而在美国却不见英国设有对等的监听站。甚至在朝鲜战争期间，就连英国为了应急而制定的一项在危急时把设在香港的一个通讯情报站撤到美方控制的冲绳岛的撤退计划也遭到美国的抵制。

50 年代中期，安全局在全世界监听的重点地区之一是盛产石油的中东。1954 年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埃及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1956 年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此举震动了整个伦敦和巴黎。两国立即不约而同，都想到要诉诸武力，英国首相艾登完全寄希望于美国有利的合作。但杜勒斯不愿贸然同英国联合动用武力。因此，英、法、以三国官员十月间在法国秘密集会商讨应对办法。10 月 29 日以色列向埃及发起了猛烈进攻。两天后，英、法两国参与了以色列发动的入侵。

艾森豪威尔对艾登政府施加压力，要他停止这场战争。一周之内艾登做了退让，于 11 月 6 日下令停火。危机过去了，但英美关系出现了裂痕。危机出现了以后，人们不禁要问：华盛顿对英、法、以三国的突然进攻，是否真的是事先毫无警觉。艾伦·杜勒斯在他的《情报术》一书中写道：“这里的情报界对以色列，以及其后对英法两国的动向是有警惕的。事实上，美国情报部门不断向政府报告情况，只不过是按照一向的做法，没有张扬自己的成绩而已。”

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译读这三个交战国家的秘密通讯，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负责解译英、法和中东国家密码电报的单位是生产办室的“其他各国处”。

这次入侵开始后不久，英国人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破译了他们的密码似乎有所察觉。工党议员、前陆军上校乔冶·威格在英国撤退后几个星期公开说，美国最近已“砸开”了英、法、以三国的外交和军事密码，从而预先得知计划中的进攻。

这次入侵对政府通讯总部和国家安全局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微妙的影响，颇使琼斯感到不安。

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两国关系冷下来并可能会在信号情报合作上引起的副作用，也同样感到忧虑。他们很可能还担心，英国和其它北大西洋公约国家都普遍意识到美国人已破译了他们的密码，从而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改变其密码体制。更麻烦的是，欧洲正在生产更新更复杂的密码装置。要攻破这些装置，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破码工作人员得花费很多年的时间。

接替卡奈因将军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职位的空军中将桑福德怀着这些忧虑去找弗里德曼，要他去英国和欧洲大陆完成一系列极为敏感的使命。这些

使命估计可能是重新强调政府通讯总部和国家安全局之间紧密合作的必要性，并同欧洲最大一家生产密码装置的企业——密码有限公司订立某种协议。

弗里德曼搭飞机去英国，伪称他主要是为了一本即将出版的有关莎士比亚的书籍，一时兴起决定这次旅行的，连与他同行的妻子也不知道他此行是为国家安全局出差。

弗里德曼来到切尔特南政府通讯总部大楼，同琼斯爵士相会。只有弗里德曼才能激发起英国同行的友情，也只有弗里德曼才能从政府通讯总部得到最大程度的合作。

弗里德曼会谈了整整一天，在切尔特南过了夜，第二天又接着会谈，并于当晚回到伦敦。9 月 1 日，他动身去欧洲大陆完成他的下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1977 年设在斯德哥尔摩的密码有限公司，可能是世界上向外国政府提供密码设备的最大的一家公司。由于第三世界很多国家在开始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为了保护自己的秘密通讯，他们纷纷求助于密码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的领导人叫海格林。他是在苏联出生的瑞典籍人，自 20 年代以来就生产密码设备并向各国政府出售。1940 年 4 月，德国侵入挪威后，海格林辗转迁到美国，建立了海格林密码公司，向美国陆军出售密码机。1944 年海格林搬回瑞典，重建工厂，1959 年，又将公司迁到瑞士。

弗里德曼离开伦敦先去瑞典然后到瑞士，去会见海格林。这次会见的目的，很可能是由弗德曼代表国家安全局要求海格林将他出售给别国政府、特别是向北大西洋公约成贝国政府的密码机进行改进，改进的详情提供给美国国家安全局，以便使国家安全局能够早日破译这些国家的密码。

第四节两只耳朵胜过一只耳朵

40 年代签订的“ 英美协定 ”和“ 联合王国—美国协定 ”奠定了友好和合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又被 50 岁的伦纳德 · 詹姆斯 · 胡珀接任。胡珀 1936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毕业时获近代史的特优荣誉，后在伦敦学院进修两年，再进入英国空军部，于 1942 年调往政府密码学院，以便继续留在政府通讯总部工作。1967 年接受“ 圣迈克尔和圣乔治高级爵士 ”勋位。6 年后，胡珀离开通讯总部去担任英国内阁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情报、安全协调官。

从 1973 年到 1978 年,巩固政府通讯总部的领导人是阿瑟 ·威尔弗雷德 ·邦斯尔。他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毕业时获现代语言二等荣誉成绩。他同胡珀一样，在 1940 年进入空军部，两年后进入布莱柴利大院工作，1977 年成为爵士，时年 60 岁。

自 1978 年起，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主任是托维。他是一位内阁大臣的儿子，1926 年 4 月 15 日出生，曾在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学院学习，以后转到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

国家安全局和通讯总部之间的和谐合作关系，最终虽要由两家领导人负责维护，但英美两个伙伴之间的日常联系事务则由高级联络官（即信号情报界的大使）来掌握。因此，美国联络官这个职位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内极受重视，人选都是经过慎重安排的。

美国国家安全局对这个职位究竟有多重视,连副局长托德拉也是 60 年代未才知道的。那时高级联络官赫斯博士任满回美，驻英联络宫的职位缺空。托德拉未向国家安全局长卡特请示,就挑选在国家安全局干了 25 年的老手科里去接任。

国家安全局长卡特却另有打算。那时，国家安全局各方面秘密工作的帷幔正逐步被人揭开，卡特要把他认为确实能向英国人及其绝密的政府通讯总部恰如其分地表达他的想法的人放在伦敦。

卡特重新选择了负责人事管理的局长助理康内利。卡特说，“ 他不是密码专家，但是，我需要的能在英国王宫代表我的正是他这样的人，我得另有选择。 ”

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对非英语协作国的政府代表和对英语国家的伙伴并不一视同仁。有一条规定是，只有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才能进入主楼。卡特对这一作法也很不同意。一次他要同南朝鲜官员会晤必须另择地点。卡特不听这一套，他把南朝鲜人请进大楼他的办公室，并同他们在马里兰俱乐部共进午餐。

20 多年来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联络官在伦敦的住宅一直在布赖恩斯顿广场三十五号里的五号公寓。从这里步行 10 分钟就是格罗夫纲广场和美国大使馆，在使馆大楼四五二号门内就隐蔽着美国高级联络官所属的办公室，楼下则是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室。

70 年代初期，住在 5 号公寓的是普赖斯，他曾是负责人事管理的局长副助理，再以前曾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代表常驻夏威夷的太平洋总司令部。他的继任人是生产办公室前副主任扎斯罗。扎斯罗回国担任负责电讯与计算机勤务的副局长时，本森 ·巴夫汉搬进了五号公寓。巴夫汉 1980 年 4 月退休，接替他的是负责行政管理的副局长唐 · C · 杰克逊博士。

同美国人一样，英国人对联合王国的高级联络官人选也十会重视。在 60

年代，英国政府通讯总部驻国家安全局的代表是帕克，他刚到任时，国家安全局局长是戈登·布莱克将军，后改为卡特，双方关系一直很好。

同美国国家安全局一样，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也打着外交官的牌子来掩护它的联络官。巴夫汉驻伦敦的外交官衔是“政治专员”。英国政府通讯总部 1982 年派出的联合王国高级联络官加普在外交官名录上只是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一个“行政官员”。

在两只耳朵胜过了一只耳朵的理论指导下，国家安全局和政府通讯总部同意通过“联合王国—美国协定”分享各自截取的电报成果。这就意味着，国家安全局除了通过“苜蓿”行动收集美国三家电报公司经营的全部电报系统传递的不计其数的来往电报，还在国内的“尖塔”行动中肆无忌惮地使用英国截取的情报来侦察国内的抗议活动分子。英国政府在这项极其非法行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国家安全局的合谋者。

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引起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的不安，因为它也利用国家安全局提供的电报和电传截取材料来对付它自己国内监视名单上的人。

“联合王国一美国协定”规定双方交换截获的电报和电传，同样也会规定交换截获的话声通讯（即电话）。据 1980 年 7 月《新政治家》周刊一篇文章分析，国家安全局设在约克郡哈罗盖特市的门威思山站的主要目标就是截收英国国际和国内的电报通讯。

国家安全局利用门威思山微波塔，旨在通过信号情报卫星对欧洲和苏联进行窃听。它感兴趣的还有进出英国的国际卫星通讯。这些信号由两个地面站收发，一个设在伦敦西北约 130 英里的赫福德郡的麦德利，一个在法尔默斯附近、康沃尔郡的贡希利草原上。这两个地面站仅次于美国设在西弗吉尼亚州埃姆和缅因州安多弗的两个地面站，它们是地球上最繁忙的商业卫星地面站，分别居第三和第四位。

贡希利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面站之一,它在 1962 年通讯卫星的早期实验中起过主要作用。那年，美国的《通讯卫星法案》经肯尼迪总统签署，正式成为法律。接着，于 1963 年 2 月成立了通讯卫星公司。一年半以后，有 11 个国家达成协议统一组成“国际通讯卫星组织”。这个组织于 1965 年 4 月 6 日将它的第一颗卫星——国际通讯卫星 1 号，即“报晨鸟”送入轨道。它运转了两个月之后，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建立起第一条卫星通路，为跨越大西洋的电话和电视服务。

在此期间，政府通讯总部在贡希利以北不到 60 英里的布德，秘密建造了它自己的两座 100 英尺的卫星碟形天线，布德也在康沃尔郡境内。政府通讯总部有了这些天线，就可以窃听来往于国际卫星和贡希利草原之间的一切通讯。

同所有一切的伙伴关系一样，各机构之间偶尔也会出现分歧和冲突。在整个 60 年代，有一个争吵不休的问题，造成政府通讯总部和伦敦通讯安全局之间的长期不和。在美国，通讯安全工作置于国家安全局领导之下，而英国的通讯安全组织长期以来是设在外交部内的另一个部门，政府通讯总部是通信部门，而伦敦通讯安全局是通讯电子安全部门，并有自己的主任和一套工作班子。主张通讯工作置于政府通讯总部之下和主张维持通讯安全局独立这两种意见长期争持不下，使美国国家安全局左右为难。国家安全局力回避身于争论之外，不介人矛盾。

到 1969 年通讯安全局终于并入政府通讯总部。

合并派的领导中有已勒。他于 1946 年加入政府通讯总部。1965 年被任命为总部驻华盛顿的联合王国高级联络官。1967 年回英国，被委派为内阁办公厅次官。巴勒在回英国时，讲到合并的事时说：“ 无论出现哪种可能，我都会再次为胡珀工作，这对我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巴勒于 1976 年从政府通讯总部退休，当上拉科尔通讯系统有限公司的董事，这家公司是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提供信号情报设备最大的制造商之一。

卡特和胡珀交情极为密切。到 1969 年卡特退休时，这位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忧心仲忡地对卡特说：“ 我担心是否能像过去一样，同你的继任建立起同样的相互了解的关系。我们所有人对他都一无所知，请在他面前为我说几句好话。 ”

国家安全局同政府通讯总部之间的友谊，双方在大西洋两岸一直都避而不谈，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从胡咱致卡特的送别信中看得一清二楚。

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密码学这种深奥艺术感兴趣的局外人只是一小撮对用简单密码互相测验对方技能有业余僻好的人，和一些试图以出售商用电码为业的人。据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个早期创业者说，那些交给政府进行评价或向政府兜售的密码，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归到所谓的“ 疯子档案 ”中去了。

在早期用铅笔和纸张研究密码的日子里，对于局外人的这种轻慢和蔑视，随时可见。那时，在密码学的研究中没有应用高级技术，科学界对此也不感兴趣，政府的密码专家也过着几乎是寺院式的苦日子。30 年代后期，编密和破译工作日益机械化，这些专家的苦日子才算结束了。10 年后，计算机代替了打孔机，密码学发展成了一门成熟的科学。过去，外界在这方面的兴趣曾一度遭到拒绝（如果不是嘲弄的话）。但是现在，为了不断推进对数学、工程学和电信学的研究，却需要与美国的学术界和工业界建立一种密切而秘密的联盟。

为了建立这种联盟，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成立后不久就建立了国家安全局科学咨询委员会，它由科学智囊组成，其 10 名成员是从布满常春藤的院校、具有法人地位的研究所和由学者组成的智囊机构中精选出来的。他们每年在米德堡开两次会，与国家安全局的高级科学家们合编成几个小组，讨论如何将最新的科技理论应用于侦听、破译和编密。

凯恩斯曾是国家安全局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早期成员之一。凯恩斯曾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担任过厄巴纳市伊利诺斯大学数学系主任(在威廉 ·马丁叛逃前不久，国家安全局曾准备给他奖学金，让他去这所学校学习两年）。50 年代中期，国家安全局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是罗伯逊博士。此人原是加州理工学院理论数学教授，后来担任了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

1960 年秋，弗罗斯特海军中将来到安全局时发现科学咨询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局的关系紧张。国家安全局的官员指责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没有在某些研究项目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而科学咨询委员会则反过来指责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人未给予指导，提供的支持也越来越少。

为了消除积怨、调整关系，弗罗斯特出入意料地任命莱因哈特为国家安全局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53 岁的凯斯理工学院数学教授莱因哈特，是几个月之前才被任命力科学咨询委员会新成员的。但是，正如他入选之后在给该委员会其他成员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他“ 以前没有在国家安全局干过，没有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 ”，才选中了他。接着，他又有点挖苦地说，

“‘无知有益’这个原则可能已被实行到了极端荒唐的地步。”

尽管有几个成员在委员会只呆了一两年，但其他人都呆了十年以上。

成立科学咨询委员会，是国家安全局雇用政府之外科学界和学术界专门人材的最早尝试之一，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尝试。

国家安全局曾在阿林顿大院装有护墙板的 B 楼召开过一次会议，这是该局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1957 年 7 月 18 日，美国一小批优秀科学家聚集在国家安全局没有窗户的情报室里，共同规划该局今后在技术上求生存的蓝图。

这个委员会在贝尔研究所杰出的研究工作负责人、42 岁的贝克博士主持下，已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分析美国密码的活动是美国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冷战武器之一。在这方面落后，将会招致第二次珍珠港事件。因此，他们建议发起一个像曼哈顿计划一原美国核武器计划一那样的行动，使美国在将通信技术、计算机科学、数学和信息理论用于密码工作方面远远领先于苏联和其它所有国家。贝克委员会指出，这个目标只有通过不断利用米德堡以外的科学天才的智力才能实现。

国家安全局此时已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年前，卡奈因将军已经开始为“闪电计划”打基础。这是一项为期五年、耗资 2500 万美元的计划，其目的是将计算机的速度提高一千倍。研究合同已交给了工业部门和科学研究单位。但是，这项研究是公开的。成果将公开发表，谁都可以得到。“闪电计划”产生出了 160 多篇技术文章、320 项专利申请和 71 篇学术论文。

现在必须做出决定：是否应继续像“闪电计划”那样向一般化的公开研究提供资金？这种选择实际上是：为了沟通国家安全局同科学界的联系，是架设一座公开的桥梁呢，还是修建一条秘密隧道？在贝克作出报告之后，决定使用“隧道”，“交通工具”则是“焦点计划”。

1960 年 10 月 22 日上午，普林斯顿大学广阔校园里的一座新楼举行落成典礼，一小批应邀而来的宾客静静地坐在折叠椅上，聆听着校长戈欣的讲话。“约翰·冯·纽曼楼”是一座用红砖砌成的现代样式的两层建筑物，带有一个漂亮的、浓荫遮地的院落，院子四周八英尺高的砖墙。它看上去像是一座新科研楼，也像是一座教学楼。

实际上它哪样也不是。

这座以计算机逻辑学先驱、杰出的数学家约翰·冯·纽曼的名字命名的楼房，实际上是学术界通往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隧道”的入口。

贝克委员会的成果——“焦点计划”涉及建立一个秘密的独立智囊机构，专门帮助国家安全局寻找与先进密码逻辑学有关的问题的解法。几年前，即 1956 年，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曾求助于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院长兼总统国外情报活动咨询委员会主席基利安，要求他帮助组织一个由文职人员组成的永久性班子，协助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武器系统鉴定组，对五角大楼内部在诸如向导弹系统提供资金这样的问题上发生的无数争执进行仲裁。结果建立了防务分析研究所。该所是学术界的智囊机构，最初由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凯斯理工学院、斯但福大学和图莱恩大学合办，后来又有七所大学加入。

贝克委员会作出报告之后，已当上防务分析研究所董事长的基利安被要求为国家安全局建立一个类似的机构，他表示同意。1958 年，在收到 190 万美元之后，防务分析研究所成立了通信研究处，并且开始计划在普林斯顿大

学校园内修建办公室和实验室。

尽管防务分析研究所的一位官员曾经声称，该所一向“ 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 ”，以保证该所“ 能够进行不只是支持政府的某些先进入的研究 ”，但是通信研究处一直同国家安全局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50 多岁的罗塞博士被选中为通信研究处第一任处长。他是康奈尔大学的数学教授和数字分析专家。为他选择的副手是莱布勒博士，此人 44 岁，在“ 安全局 ”已经工作了 5 年，并是“ 焦点计划 ”的主要设计者。莱布勒曾是桑迪亚公司的数学家，并曾分别在伊利诺斯大学（在该校，他和另一位数学家托德拉博士交上了朋友）、珀杜大学和着林斯顿大学教过书。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概率论和统计学。他显然很喜欢他所谓的“ 我们在普林斯顿所处的孤独境地 ”。关于国家安全局，他在一封给弗里德曼的信中说，由于你想必也知道的原因，我每次到那里去之后都想赶快回来，因此我总是争取在一天内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

1961 年 9 月 20 日，芝加哥大学数学系主任、55 岁的艾伯特接替罗塞担任通信研究处处长。艾伯特是密码学最早的空想家之一。早在 1941 年，他就看到了编密学同高等代数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同他的前任一样，艾伯特在通信研究处的任期也是短暂的。1963 年，副处长莱布勒从他的头衔中去掉了“ 副 ”字，当上了处长，这样一来，国家安全局和通信研究处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莱布勒一直当了 14 年处长，到 1977 年才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回到国家安全局任研究与工程办公室研究处处长。

接替莱布勒的是 43 岁的纽沃思博士。在这之前，他当了 12 年副处长。他是 1961 年，亦即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胞两年后，作为一名数学家到通信研究处工作的。

防务分析研究所曾被迪克森在《智囊》一书中称做“ 最秘密的重要智囊机构 ”，本部设在一座钢筋水泥和玻璃结构的十层楼房里，与五角大楼只隔着一个一英亩大的停车场。该所什么牌子也没有挂，不向外人宣扬它的存在。1967 年秋，部分地由于这种保守秘密的嗜好和该所积极卷入了越南战争，“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 ”普林斯顿大学分会的成员们在“ 冯 · 纽曼楼 ”前举行了一次示威，要求校方同防务分析研究所断绝关系，学生们若参加防务分析研究所的活动不仅必然会使他们间接地卷入战争，而且还会由于让学者们参加成果不能广泛共享的秘密科研项目而破坏学术自由。

对防务分析研究所的抗议扩及到了其他学校，并在 1968 年春成了占领哥伦比亚大学达八天之久的学生们在集会上呼喊的口号之一。

在校方同意取消同这个研究所的正式联系，但继续允许每个学院派一名代表以私人身份担任该所的理事之后，问题才最终解决。

在抗议活动之后，通信研究处悄悄地搬到校外一幢盒子形状的三层楼房中去了。这幢隐藏在树林深处的楼房除了三楼之外没有一扇窗户，外面也根本没有什么标志说明楼里是什么单位。

第五节“魔鬼”随之出现了

到 1970 年 2 月，防务分析研究所已发展为 5 个处、3 个组，共有 185 名专业人员和 274 名支援人员，每年收入 1300 万美元出头。通信研究处是其中最小的处之一，由 27 名专业人贝（比第一年只多了 3 名）和 33 名支援人员组成。专业人员大部分是数学家，通常是根据为期一年的合同从各个大学借调来的，在课题研究中，他们通常比国家安全局研究与工程办公室的专业人员有更大的自由。

但是，与通信研究处有关的统计数字是有点骗人的。该处成立后不久，便搞了几个计划，以便把美国国内几十位最杰出的数学家和语言学家组成一个秘密小团体。根据这些计划，组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排外性的夏令营——高级数学计划夏令营（简称 sCANP）和高级语言学计划夏令营（简称 ALP，本该简称 SCALP，但是通信研究处明智地去掉了头两个字母）.这些计划旨在把各大学中多种学科的高级学者组织到一起，向他们介绍密码学的难题，然后用他们的集体智慧来解决国家安全局的某些最难解的谜。

高级数学计划夏令营和高级语言学计划夏令营的参加者，一般都是美国最好的在职教授，他们经过审查和保密教育，可以接触绝密信号情报和通信保密材料。他们将于初复时节携眷到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度夏，并在那里的一幢专门修建的、警卫森严楼房里参加专题讨论会和讲座。为了避免嫌疑，国家安全局先把付给参加者的报酬交给防务分析研究所通信研究处，该处把钱转给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再由该校付给参加者。

1962 年，“闪电计划”结束之后，国家安全局向公开研究提供的支援也结束了。“闪电计划”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而私人企业间的竞争将确保在计算机及其有关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技术进步。通过通信研究处、高级数学计划、高级语言学计划和一些精选出来的重要顾问及研究项目承包人，安全局现在可以把全部精力和全部资金集中到一门没有竞争、由国家安全局独家垄断的科学——密码学——上去了。

但是“魔鬼”也随之出现了。

国家安全局恰如其分地声称，“本局毫无疑问加快了计算机时代的到来”。计算机时代的早期成果之一是在银行业使用计算机承办各种业务——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大笔款项过户，到对遥远的自动出纳机在深夜办理的存储业务进行简单的簿记。但是，它也带来了另一种后果：利用计算机进行犯罪活动。对计算机有足够的了解并能接近一台终端设备的人，可以使用诡计欺骗计算机，把一笔款子转入一个假户头，或逗引一台付款机把存在里面的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吐出来。

为了对付这种可能性，以及由于认识到数据通信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60 年代末，国际商业机械公司董事长威尔逊在该公司设在纽约州约克敦海茨的研究所里，建立了一个密码研究小组，在菲斯特尔的领导下，这个研究小组在 1971 年完成研究工作，研制出了一台代号为“魔鬼”的密码机。这台机器很快就出售给了伦敦的劳埃德公司，同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出品的付款机配套使用。

塔奇曼的助手是 42 岁的电气工程师卡尔·迈耶，他出生于德国，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塔奇曼很快就发现，“魔鬼”密码机需要大加改进，才能在商业上大量使用。研究小组花了两年的时间反复地把这种密码

机拆了又装上，每次都试图给它增加更复杂的功能。在改造过程中进行了大量“论证”性试验，由专家们用各种先进的手段试图破译。1974 年，这种密码机终于可以上市了。

差不多就在国际商业机械公司把注意力转向密码学的同时，另一个机构也开始以很大的兴趣研究这个项目。1968 年，自 1965 年以来一直为联邦政府订计算机采购和使用的标准局，发起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以确定政府对计算机保密性能的要求。研究的结果之一是国家标准局决定寻找一种编码方法或算法，作为在政府范围内储存和传送未加密资料的标准系统来使用。于是，国家标准局在 1973 年 5 月和 1974 年 8 月两次征求编码算法。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国际商业公司呈送了它的“魔鬼”密码机以供考虑。“魔鬼”密码机被戴维·卡恩称为“迄今制成的最小的‘密码机’”。它实际是一块指甲盖大的硅片，上面有极其复杂的集成电路，其密钥由一长串 0 和 1 组成，对于不同的用户，这些比特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正如家家户户大门钥匙上的槽口有五花八门的样式一样。

公式，把特定的密钥插进之后，可读资料输出后就变成了无法破译的比特，然后在接收站再复原。

正如钥匙上的槽口越多，锁就越难捅开一样，密钥上的比特越多，就越难破译。因此，国际商业机械公司“魔鬼”密码机密钥上的比特多达 128 个，但是，在把这台密码机交给国家标准局之前，密钥上的比特竟然神秘地少了一半以上。

从一开始，国家安全局对“魔鬼工程”就怀有极大的兴趣。它甚至在国际商业机械公司研制“s 盒”的结构时间接地予以协助。国际商业机械公司约克敦海茨研究所的高级雇贝康海姆承认：“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同国家安全局的往来不断发展。他们（国家安全局雇员）每次隔几个月就来看看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在于什么。”

国家安全局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本国面临着竞争。竞争对手不再仅仅是业余爱好者，而是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员，他们有数量无限的资金做为后盾，他们对完善质量比对提高速度更感兴趣。

在国家安全局看来，危险确实存在。多年来，安全局对于肉眼看不见的大量国际数据通信的依赖性越来越大。通信的内容主要与中东的石油、欧洲的金融交易和日本的贸易战略有关。国家安全局只要撒出电子网，就可以捞到很有价值的经济情报。

从发展中国家截获来的外交和军事情报也同样重要或更加重要。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国家的电信大部分是用陈旧、廉价或简单的密码机加密的，破译这些电报对国家安全局说来易如反掌。用秘密手段进行侦听有时可以获得宝贵的情报，例如某国家的部长向外交部提交的关于他同苏联或中国的对等官员进行密谈的报告。“电报通信是每时刻都在进行的，”G 组组长雷文说。“从非共产党国家截获到的有关共产党国家的情报，其数量是很惊人的。”

但是，经济实惠、高度保密的数据编码设备有可能使国家安全局水量丰富的河流干涸。

然而，对外来的竞争感到紧张的并不只是生产系统的破译人员。通信保密系统的编码人员也同样感到忧虑，但原因恰好相反。对于他们说来，最主要的担心是，外界的研究人员可能会偶然发现国家安全局使用的编密方法，从而泄露该局密码。

在同国家安全局的官员进行了密谈之后，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同意将密钥上的比特从 128 个减至 56 个。该公司同意将密码机上 8 个“ S 盒 ”选用方法的某些细节定为秘密材料。

国际商业机械公司提交了密钥被截短了的密码机之后，国家标准局便把它交给国家安全局进行所谓的“ 深入分析 ”。接着，国家安全局认定它的编码系统“ 没有任何统计学和数学方面的缺陷 ”，并推荐它作为美国最佳“ 资料加密标准 ”。

这个决定立刻在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某些批评者因密钥被截短而指责国家安全局说，他们这样于是为了保证密钥既长得足以防止一般的团体进行窃密活动，又短得便于国家安全局破译员进行破译。其他批评者则指责国家安全局随便调整“ S 盒 ”，并担心该局可能在这种密码机上安装了数学“ 活板门 ”，使其能够不太费力地破译所用的密码。因此，人们坚决要求采取保密措施。

批评者们说，国家安全局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标准资料加密设备最终将投入商品化生产，并安装在各种出口设备上，因此国家安全局不想因允许外国使用无法破译的密码机而作茧自缚。给这种密码机留下一些缺陷，就可以使国家安全局把手伸进外国和本国使用这种资料加密标准的每条通信线路和每一个资料库。

密码专家卡恩推论说，国家安全局在这种资料加密标准上曾进行过一次秘密辩论。“ 负责破译的一方想使外国政府和公司使用的这种密码机容易被国家安全局破译， ”他推理道，“ 而负责保密的一方则希望任何经过批准供美国人使用的密码机都是真正顶用的。结果作了妥协：密码机上进行代换演算的‘ S 盒 ’得到了加强，而不同用户使用的不同密钥则被削弱。 ”

带头反对这种资料加密标准的是斯坦福大学的赫尔曼教授和研究员迪菲。这两位计算机专家争辩说，用一百万个特殊的检索硅片可以制成一台能破译密码的计算机，每个硅片每秒钟可以试验一百万种可能的解法。

这种被“ 安全局 ”里的人们称为“ 使用蛮力 ”的破译方法是：从特定的侦听目标获取一些脱密电文，然后用高速计算机把它们同截获来的同一内容的加密电报进行对比。如果用每一种可能的编密方案来对加密电报进行分析，加密电报总有一次会与同一内容的明文电报对上号。这样一来，密码就被破译了，其他所有使用这种加密方法的电报也就很容易搞清楚了。

破译密码所需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密钥的长短。一个有 56 个比特的密钥，其可能的组合方式就有 7 万万亿个。但是，使用一台用 100 万个特殊用途硅片制成的计算机（每分钟可试验 1 万亿个可能的密钥）的话，就可以在 77 万秒钟（不到 20 小时）里试完全部可能的密钥。然而，赫尔曼指出，平均只要试验一半的密钥就能找到所用的密钥，这就使平均检索时间缩短到了半天以内。

此外还有费用方面的问题。据斯坦福大学的这两位科学家说，硅片本身的造价约为每片 10 美元，全部硅片的造价共约为 1000 万美元。他们认为，如设计、硬件控制、电源等等费用为硅片造价的一倍的话，这种计算机的全部造价约为 3000 万美元。赫尔曼和迪菲强调说，若折旧期为五年，日常运转费用将下降到大约每天 1 万美元，也就是说每译一种密码大约花费 5000 美元。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他们指出，计算操作和硬件的费用从 40 年代以来

每隔 5 年就下降十分之九。因此，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10 年后计算机的造价将只需 20 万美元，每破译一种密码只需花费 50 美元就行了。

但是，假如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对国家安全局的要求置之不理，硬是提交它最初研制成的 128 个比特密钥，结果又将如何呢？赫尔曼和迪菲说，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每破译一种密码的费用将令人难以想象地高达 200 亿美元，而不是为数不多的 5000 美元了。

为此，国家标准局成立了两个研究小组对这种资料加密标准进行研究。起初（1976 年 8 月），国家标准局的官员们为他们选择这种资料加密标准进行了辩解。他们说，就目前所拥有的机器来说，用“ 使用蛮力 ”的方法破译它，要用 1.7 万年的时间。然而，国家标准局资料加密标准研究小组的人事安排，给该研究小组所作判断的公正性罩上了一片阴影。国家标准局计算机保密研究小组的组长是前国家安全局雇员布兰斯塔德。研究小组的顾问利文森过去（至少在 60 年代末期）曾是国家安全局最高级的破译专家之一，当过生产系统一个组的组长，后来又显然是为了到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工作才离开国家安全局的。

对于这种计算机的造价、研制期和报废期，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意见不一。大部分人认为，制造期应为二至十年，报废期为六个月至十年，造价为 1000 万至 1200 万美元。

这套加密设备的发明者塔奇曼和卡尔 · 迈耶也出来为国际商业机械公司选定的算法辩护。他们说，制造一种专门破译这种标准加密法的机器要花将近 2 亿美元，而按这种资料加密标准制造的设备可以设计成用两种不同的密钥将文件内容加密两次，这就使密钥的长度增加了一倍，比特数增加到了 112 个。但是，贝尔研究所的三位专家指出，“ 大部分资料终端都不会安装这种设备 ”。

最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对这次争论进行研究后做结论说，尽管“ 国家安全局说服国际商业机械公司，使之确信经过缩短的密钥完全够用，（并且）在研究‘ s 盒 ’结构时也曾间接地给予帮助 ”，但是找不出他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关于资料加密标准的争论暂时平息了。1977 年 7 月 15 日，它正式成为政府文职部门使用的密码，56 个公司也开始为私人企业制造这种加密设备。某些机构（例如美国银行协会）采用了它，另外一些机构（例如贝尔电话公司）则予以抵制。

但是，有一点是辩论的各方都表示同意的，即：这个问题很快将被重新提出来。随着计算机的计算速度不断加快，性能不断改善，以及新技术（例如“ 约瑟夫森结、低温学和磁泡存储器 ”）的应用，这种资料加密标准的保险系数将会逐渐消失。一些人认为这种加密设备保险期为五年，另一些人认为是十年，但是几乎没有人认为时间会更长。在这段时间里，必须决定新的加密方法。

像当时一些公司开始销售标准资料加密设备一样，在 20 年代，纽约也有一家名叫“ 密码编制公司 ”的企业曾向实业界敞开过大门。这家公司位于范德比尔特大街 52 号一座灰色高层办公楼里。它编制各种密码并向贸易机构和其他企业出售，公司办公楼的那间屋子里设有密码编制公司的母体——亚德利创办的美国秘密破译机构“ 黑屋子 ”的总部。

在研制出第二代标准资料加密设备以前的岁月中，美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是；是否也像当年的密码编制公司那样，在公众对密码学的研究和政府对密码学的研究之间开一扇秘密的门？

国家安全局在标准资料加密设备上取得胜利后，便将注意力转到了一个更大的潜在威胁上，即学术界对密码学的研究工作。过去，密码学是一个冷僻的字眼，埋没在词典里不为人们所注意。现在，全国许多院校的数学家和电子计算机科学家却突然开始把巨大精力投入到这个课题的研究工作中去。这种研究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应用性的；一些科学家研制出了硬件，而另外一些科学家则对数学难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对密码学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致好儿所院校甚至开设了这个课程，并有一份专门研究密码学的学术刊物于 1977 年问世。

1976 年，两位反对前述资料加密标准的斯坦福大学科学家赫尔曼和迪菲提出了一种新概念，它彼戴维 · 卡恩称为“ 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在这个领域中最具革命性的新概念 ”。这对于国家安全局说来必然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后来，经过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三位科学家里夫斯特、沙米尔和艾德勒曼的改进，这种密码制就被称之为“ 公共密钥式密码 ”。这种公共密钥制不像标准资料加密设备那样使用同一种密钥加密和解密，而是使用两种不同的密钥———种专用于加密，而另一种则专用于解密。这就是说，人们可以任意取得（例如刊登在全国性姓名地址录中）他的计算机加密密钥，使得任何人都可以把保密资料发给他。但是，只有他才能将这些资料解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解密密钥。这种密码制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可以使发出资料的人用无法去掉的密码署名，这就确保了转移了署名者的真实性，他人无法伪造。

国家安全局试图中止外界进行的密码学研究工作，恢复它在这方面的一统天下。但它遇到了一个难题：工业界十分依赖国防订货合同，并听命于各公司保守的董事会，但是大学里的研究人员却不同，他们是独立行事的。国家安全局同自由行事的学术界不可能建立像同国际商业机械公司之间的那种密切关系。然而，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他们必须仰仗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经费。

国家科学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其宗旨是促进基础科学知识的研究。它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向各大学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提供津贴，并同它们签订合同。政府以外的大部分密码学家就是通过这种津贴和合同而获得经费的。因此，国家安全局认为，该局若能夺得对所有密码学研究经费的控制权，就会有效地控制外界对这一课题进行的几乎一切研究工作。如果国家科学基金会把各项密码学研究计划都交给国家安全局负责，国家安全局就可获得控制权。如果不可能都交给它负责，那么，授权它给任何它认为属于机密的计划确定密级，则也可使之获得控制权。

1977 年 4 月 22 日，国家安全局开始了它的夺权行动的第一步。那天，负责通信保密的副局长帮办科里（他已在该局供职 35 年）和他的一名助手博克，前往华盛顿 G 街国家科学基金会总部，同该基金会的官员会晤。这位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官员是计算机研究处特别工程计划主任瓦因加登博士。这次会晤的目的是讨论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密码学研究的问题。

通信保密办公室的创始人之一科里，现在是该办公室的第二号人物。会晤一开始，他就开门见山地向瓦因加登提出，总统曾指示把所有的编密工作都交给国家安全局“ 控制 ”，瓦因加登和他的基金会违背了这项指示。

瓦因加登听到这样的指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差不多两年前，亦即 1975 年 6 月，一位受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人（此人也为国家安全局工作）曾对他说，“唯有‘国家安全局’拥有资助密码学研究工作的法定权力这实际就是禁止其他机构支持这类工作。”瓦因加登唯恐赞助密码学研究工作不合法，立即停止再给这项研究提供新的资金，并向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总法律顾问送了一份备忘录，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因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法令，副总法律顾问拉斯肯便打电话给国家安全局法律办公室，但那里的人也找不出作为依据的那项法令。恐慌结束了，瓦因加登又继续向密码学研究工作提供资金。

现在，他又听到了这种具有威胁性的话。但是这次，他对国家安全局的两位来访者说，他的总法律顾问在差不多两年前就已经研究过此事，没有找到总统的有关这项研究工作的指示。讹诈失败了，科里含含糊糊他说，他们要设法使这个法令得到通过。科里一计不成，便又生一计，提议双方“共同”审查研究申请，企图为国家安全局取得所有的密码学研究计划确定密级的权力。

由于国家安全局确实独家拥有这一领域内的专家队伍，瓦因加登同意把收到的研究申请交给该局，但条件是国家安全局要对这些研究工作的技术质量提出内行的意见。此外，他还对科里说，他的处将继续审查密码学方面的研究申请，尽可能公开处理这些事务，只根据有凭有据的科学理由驳回研究申请，而且不允许任何人进行“秘密审查，即那种‘我不支持这项研究，但我不能告诉你原因’式的审查”。

瓦因加登明白，基金会的公开研究政策和国家安全局的要求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即将到来。在这次会晤的几天之后，他把对这场斗争的看法写进了一份供存档的内部备忘录：

首先，国家安全局的官方意识很浓。过去只有军事和外交通信需要严格保密，现在，由于在资金过户、邮件处理和其他广为分散的业务活动等方面的将电信与计算机的应用结合起来了，因而民间也需要高度保密的数字处理设备。国家安全局当然担心公共领域里的保密研究工作会使它的某些工作遭到损害。然而，他们并不只是表示忧虑，而是好像要保持他们的控制，并且垄断官方在这个领域里的专门知识。他们指出，政府正在要求该局协助解决计算机的保密问题。然而，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我，他们求助于国家安全局拥有这个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不是体现了一种政策，即国家安全局应拥有任何集中统一的权力。

显而易见，把如此重大的国内责任（它可能涉及到银行、财政和电缆电视之类的活动）交给国家安全局一事，只应在政府上层进行非常认真的辩论之后再作出决定，而不是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人所能置喙的。

再者，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国家安全局在政府中的地位，国家科学基金会同该局的关系必须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关系。一切与支持某些领域里的研究工作或具体项目有关的非正式协议，均须加以避免。

科里显然没有明白瓦因加登的意思，他给瓦因加登的上司、国家科学基金会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处处长帕斯塔写信说，“在考虑这一领域中的资助申请给保密工作造成的影响方面，你们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对此，我们十分感激。”

帕斯塔将此信按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组织系统层层上送，指出他的处并没有同意这样做。后来，他复信科里，对所做的安排加以澄清，并说，国家安

全局对研究申请所作的任务审查均将列入公开记录。

与此同时，1977 年 7 月 5 日，正当双方继续拉开架势要较量一番时，海军中将英曼进了安全局，取代了新近升迁的艾伦将军的职务。英曼很快就卷入了战斗。在他上任的第二天，他手下的一位文职雇员迈耶认定，关于公开进行密码学研究的问题，在英曼当局长的时期也必然会像艾伦当局长时那样被人忽视，因此他便擅自采取了行动。他未经任何人授权就写信威胁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该学会是美国最大的专业工程师团体，迈耶本人就是它的会员）说：打算参加该学会即将召开的密码学座谈会的人可能会触犯法律。

在那些将在 10 月份举行的集会上发言和提交论文的人中,有公共密钥的发明者赫尔曼和里夫斯特。使迈耶感到十分不安的是，这次会议不但将公开举行，而且还有一些外国来宾出席。更糟的是，根据几年前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同苏联达成的一项全面协议，这次会议的发言稿将在发表之前送往苏联。

迈那在他那封一页半的、单行间隔的信中,提到了《国际武器交易条例》。国务院根据这个条例控制列在“ 美国军火一览表 ”上的那些武器、弹药和“ 战争工具 ”（中型喷气式战斗机和军舰）的出口。在表内 “ 辅助性军事装备 ”一栏中，还列有编密装置、倒频保密电话、保密设备和与它们配套的特殊装备。

迈那强调指出，《国际武器交易条例》不仅适用于各种装备的出口，而且适用于与这些受限制的装备有关的非保密性技术资料的出口。他声称，举行这次座谈会并发表密码学论文无异于出口情报。因此，他的结论是，“ 除非某些报告和论文 ” 通过了保密检查，或者获得了出口许可证，否则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就会违反《国际武器交易条例》。

他说得极有道理。《国际武器交易条例》的确适用于任何 “ 可直接或间接供设计、生产、制造、修理、大修、加工、管理、发展、操作、保养或仿造 ” 表中所列装备时使用的 “ 非保密性资料 ”，以及任何可在对美国具有重要军事用途的领域内提高目前工艺水平或者创立一种新技艺的技术。所谓‘ 出口 ”，确也包括以书面方式或视听手段（其中包括举办有外国人参加的情况介绍会和座谈会）转让资料。

但是，如果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含义不明、涉及面过宽的规定，那么任何打算就涉及 “ 军火一览表 ” 的技术问题公开发表文章或讲话的人，似乎就须首先得到国务院的许可——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要求显然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违背，并且也未经最高法院批准。

尽管如此，这封信对于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还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学会的工作人员敦促参加即将召开的座谈会的人让国务院军火控制办公室——因此实际上是让国家安全局——审查通过任何有疑问的材料。

尽管迈那是以普通公民及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员的身份写这封信的，但是没过几天，人们就发现他是在为国家安全局工作，这一事实当然会使许多人认为，这封信只不过是国家安全局扼杀密码学会公开研究工作的一种隐蔽手段。

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令人难堪的轩然大彼之后，国家安全局否认它同这封信有任何牵连。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否认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因此，英曼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寻求帮助。在他任海军情报局局长和国防情报局副局长时，就已经同该委员会槁得很熟了。英曼要求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公正地审查迈耶事件和其他一些问题。该委员会同意了英曼的请求，并在1978 年 4 月发表了两份报告，一份是秘密的，另一份是公开的。这两份报告都认为国家安全局没有卷入迈耶事件。

第六节一种最古老的武器

可能是由于受到国会信任而获得鼓舞，国家安全局在当月就采取了另一个消除竞争的强有力的措施。

1977 年 10 月，西雅图的 4 个发明家，利用空余时间，在车库后院里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倒频保密电话。领头的是 35 岁的尼古拉，此人技术兴趣广泛，经常变换职业。这个发明小组把它的新发明称做“ 菲索风 ”，并在 1977 年提出了专利申请。1978 年 4 月，尼古拉终于得到了专利局的答复。但他拆开信后大吃一惊。他从信封里取出的不是专利证书，而是一张奇怪的表格，表格上端印着一行粗大的黑体字：保密命令。

尼古拉突然遭到了国家安全武库中一种最古老的武器——发明保密法——的打击。这项法令是在 1917 作为一种战时措施而获得通过的，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公开那些可能“ 损害公共安全或防务，可能有助于敌人，或者可能给成功地进行战争造成危害 ”的发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项措施也失效了。1940 年，这项法令又重新生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来，在 1951 年的‘ 发明保密法 ’通过后，它像不死鸟一样又从灰烬中复活了。1951 年的发明保密法规定，除非予以延长，否则保密命令的有效期不得超过一年。但是该项法令还耍了一个花招，它规定：“ 在总统宣布的全国紧急状态期间生效 ”或发布的保密命令“ 在全国紧急状态期间及其以后的 6 个月中都有效。 ”由于从来没有人费心宣布结束杜鲁门总统在 1951 年宣布的全国紧急状态，因而这种紧急状态一直保持到了 1978 年 9 月。

尼古拉收到的保密命令只是通知他：如果他“ 在此命令有效期结束以前，以任何方式向任何与此项发明无关的人 ”透露其设备的任何情况，他就将入狱两年并罚款 1 万美元。命令中丝毫未提发布这项命令的原因，也没有说明是谁下的命令。

西雅图的这位发明者所不知道的是，他在车库后院发明的那部保密电话的专利申请书，曾被送往政府中最不为人们所知的一个官僚安全局——这里处处可以见到标有“ 绝密 ”和“ 机密 ”字样的文件。专利申请送往专利与商标局后，均转给特别法律行政管理组——通称“ 保密组 ”。在这里，几十名经过特别批准的审查员将专利申请分为化学、电气或机构等类，然后对照各个国防机构提供的参考清单，确定这些发明是否涉及到国家安全，可疑的专利申请则转给五角大楼的武装部队专利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类似一种批准下达保密命令的机构），然后该委员会再征求有关机构的意见，并在经过磋商之后决定是否需要保密。尼古拉的“ 菲索风 ”专利申请书转到武装部队专利咨询委员会后，发生了意见分歧。国家安全局负责作出有关决定的那位中级官员要求发出保密命令（尽管该局的其他官员不同意），空军和海军的代表也表示支持，但是，陆军认为没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因此就把此事推给国家安全局局长英曼作最后决定。他批准下达保密命令。

这样，尼古拉就成了武装部队专利咨询委员会的人所惯称的“ 冤大头 ”。在每年发布的大约 300 个保密命令中，除极少数外，都是针对政府自己的已规定了密极的发明，或是针对与政府多少有关的发明而下达的。“ 冤大头 ”指的是这个圈子以外的极少数人。这回，这个“ 冤大头 ”气得要发疯。

尼古拉申请专利和国家安全局的优虑都是为了一种保密电话系统，这种系统对信号传输保密学的依赖显然在于对密码学的依赖。密码学仅仅是把通

信内容转变成没有密钥就无法认读的东西，而信号传输保密学则不同，它所研究的是如何把通信活动本身隐蔽起来。“ 菲索风 ” 的发明，最初是受启发于凡斯梯埃尔 1960 年为《类比》杂志写的一篇关于通信保密的文章。凡斯梯埃尔提出用一种伪随机波形传输方式，来代替传统的传输方式——用单一频率在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传送信号。使用这种新方式，就可利用频谱的伪随机变换（发射机和接收机在变频时严格同步）编码。在特别易被窃听的一个通信领域（使用民用电台频段和海上电台频段进行的通信活动）内，这种方法大有用武之地。但是它也可改用电话。

国家安全局之所以十分不安，似乎是因为民间人士又闯进了一个曾经由该局独家垄断的领域。多年来，在同潜艇和驻敌对国家特务的秘密通信方面，国家安全局一直十分重视把密码学与信号传输保密学相结合。这种技术包括跳频（发报频率每秒钟变换千多次）、猝发通信（把电报内容压缩成一个短促的“ 射流 ”）和扩展频谱（把一个信号减弱到原先的 1%，然后同背景噪音相混合）。

更有甚者，尼古拉还计划以大约每部 100 美元的售价出售“ 菲索风 ”。这个价格是大部分顾客都付得起的。这样一来，人们对这种新技术的兴趣便越来越大了。

就在给尼古拉发出保密命令的当天，另一位发明家也收到了一份保密命令。这一事实表明，国家安全局突然想在专利领域里显示其力量了。戴维达博士是威斯康垦大学的一位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他在差不多与尼古拉提交“ 菲索风 ” 专利申请的同时，提交了运用高等数学制成的“ 溪流 ” 式密码机的专利申请。可是，像他在西雅图的那位仁兄一样，戴维达也变成了“ 冤大头 ”。

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场令人难堪的公开争斗，使国家安全局用一两次快速打击取得胜利的希望化成了泡影。戴维达收到保密命令后不久，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校长鲍姆写信给资助戴维达进行研究工作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对保密命令进行谴责，并要求得到“ 最低限度的适当保证 ”。接着，他又告诉《科学》杂志，保密命令干涉了教职员们的学术自由，并且带有麦卡锡时代对大学耍弄的那些手法的味道。

尼古拉首先争取到了参议员马格纳森的支持，接着又求助于《科学》杂志。后来，他指责这种保密命令“ 似乎是国家安全局限制美国人民个人隐私的总计划的一部分 ”。他还说，“ 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窃听人们的电话，现在有人搞出了一种给窃听活动增加了一点儿困难的装置，他们就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加以反对。 ”

这场争论很快就通过全国新闻媒介宣扬出来了，国家安全局被迫打起了退堂鼓。它于 6 月 15 日撤销了发给戴维达的保密命令并说这是国家安全局的一名“ 用意很好的中级官员干的 ”，他这样做须知是“ 想要在明显违反规定的问题上坚持原则 ”，云云。然而，尼古拉的保密命令却直到 10 月 11 日才撤销。英曼后来说道：“ 我当时遇到的情况是，国家安全局内部对于尼古拉的发明是否构成威胁看法不一。由于每天都要与发明保密法打交道，因而做决定要快、要干脆。 ”

国家安全局在资料加密标准、迈耶信件和保密命令的斗争中所受的挫折，大大地损害了该局及其局长的名声。英曼认为国家安全局的头上让人扣了一个“ 屎盆子 ”，他担心这场一边倒的争论会瓦解整个国家安全局的士气，

并会吓跑许多很有培养前途的应募者。他在弗里德曼大礼堂召开的该局工作人员秘密会议上说，更糟的是，一些新闻报道还扬言要“立即破坏”该局秘密的“来源和手段”。

这位局长的对策是从两条战线上发起反击——一条是公开的，另一条是幕后的。在公开战线上，英曼阅览室把对手最厉害的武器——新闻媒介——拿过来为自己所用。他感到，尼古拉和戴维达两人就是利用新闻界来摆布国家安全局的。现在，他要为了国家安全局的利益来操纵新闻界了。

在英曼撤回发给尼古拉的保密命令后不久，他的公共关系战的第一个回合便打响了。在国家安全局 26 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在职局长表示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英曼对《科学》杂志的沙普利说，由于人们对密码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因此他感到有必要“找到某种方式来认真地讨论一下如何解决‘属于保密的’和‘属于学术自由的’这两种极为对立的看法……就国家安全局来说，长期以来保密工作对国家的利益起过非常好的作用。因此，历任局长都认为‘无可奉告’是最适当的回答。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公众对公开密码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大量的情报被公开了，这是很不利的。但是与此同时，没有人站出来制止这种现象，……指出这的确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尽管大肆宣扬，英曼“访问记”只不过是一出独脚戏而已。他愿意加以讨论的领域只限于国家安全局对戴维达和尼古拉事件所抱的态度。关于戴维达，英曼说，发出保密命令是“一项官僚主义错误，因为在发出命令时，材料已经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了，因此不可能保密”，至于尼古拉事件，他承认，审查员们曾有过不同意见，他是“由于过分考虑国家安全而失误”。英曼说，由于这两个事件惊动了公众。但是他指出：“当我们感到任何一项专利申请对于确保国家安全有用或有害时，我们就会……把它列为保密对象。”

但是，最能说明英曼意图的是他对沙普利说的下述这番话：他希望看到国家安全局在密码学立面能有能源部对原子能研究工作所享有的那种授权。这种授权将使国家安全局对于一切同密码学多少有点关系的研究工作都拥有绝对的控制，从一开始便加以保密。

“就我所知，一位在职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就与本局任务有关的问题公开发表讲话，如果不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话，至少也是没有先例的。”

英曼将军以上面那番话作为他第二次公开讲话的开场白。他接着说道，“国家安全局历来奉行一种在公开场合对有关我局任务的各种情况保持绝对缄默的政策”，但是现在，“我局的任务再也不能完全保密了”。

1979 年 1 月，武装部队通信电子协会在国务院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英曼在会上发表讲话，大谈“无限制地公开讨论密码问题”所包含的危险。关于这一点，他以前只是暗示过，而现在则大声疾呼。英曼警告说：

美国学术界在编密和破译上运用其才能，并将研究成果广泛扩散，这显然含有下述风险，即学术界的某些成就将会与国家安全局的某些破译成就不谋而合，结果导致被称为侦听对象的外国机构改进其编密方法。另一个同样重大的危险是，政府以外的密码学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发表，将会使国家安全局研制的通信保密装置所使用的编密原理失去作用……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可能使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局的任务）陷入危险之

在发表了“大事不好了”的讲话之后，英曼又一次要求加强政府对外界密码究工作的控制。他说：“尽管国家安全局以外的某些人担心政府对于政

府以外的密码学研究工作享有太大的控制权，坦率他说，我却担心政府的权力太小了。”

根据英曼提出的国家安全局同学术界进行“对话”的要求，美国教育理事会成立了一个公共编密研究小组，负责调查双方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研究小组的两位主持人是鲍姆和海曼。前者是给戴维达解过围的前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现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标本学院院长；后者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其他 7 名成员大部分是来自各大学和计算机学教授。国家安全局的代表是总法律顾问施瓦茨。

英曼提请这个小组考虑，是否可以搞一项法令，授权国家安全局对政府以外的密码学技术情报的核心内容在公开发表前进行检查。研究小组做出的结论是，这种法令只能有两种执行方法，其一是把传播密码学情报视为犯罪行为，其二是规定密码学情报在发表前须经一个政府机构（例如国家安全局）进行审查。按照第一种做法，国家安全局将对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情报进行监视，一发现保密的密码学情报被发表了，就立即进行刑事诉讼。按照第二种做法，任何人未经国家安全局审查而擅自发表密码学情报均会被判入狱。

这些严厉的措施牵涉到一些宪法方面的问题，于是研究小组决定采取一种折衷办法：建立自愿接受检查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国家安全局有权通知密码学著作的作者、研究者和出版者：它希望在发表前审查一下，然后该局可要求有关的作者自觉

自愿地下发表含有它认为不宜发表的内容的著作。如有分歧，则由国家安全局局长和总统科学顾问任命的一个五人咨询委员会提出最后的建议。

这种自愿检查制度于 1981 年 2 月 7 日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通过,只有该研究小组仅有的两名资料保密专家之一戴维达投了反对票。戴维达认为，研究小组的这一决定既愚蠢又危险，它将给国家安全局在今后违反学术界的意愿进行干涉开创先例，他后来写道：

两年以后，如果国家安全局认为它的确希望进行限制的话，这个问题无疑会拿到国会听证会上去。不难想象，国家安全局会向国会提出我们这个研究小组的决定，以此证明学术界人士的确和国家安全局取得过一致的看法，即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我们太容易一点点地失去宪法规定的自由了……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国家安全局要拼命保持现状，并要美国的研究工作和它一起停滞不前，而整个世界都在快速向前发展……只有采用走在他人前面这种老办法，国家安全局才能出色地完成它的使命。

国家安全局在继续进行其公开攻势的同时，也在第二条战线——为控制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密码学研究经费而进行的悄悄的幕后活动——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控制了经费，国家安全局就能控制研究工作。

1978 年 9 月，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在介绍了该基金会活动情况之后，向英曼将军建议说，要解决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研究工作侵犯国家安全局的“敏感领域”这个问题，一种有益的方法是国家安全局在各个大学执行一项小规模的（200 万至 300 万美元）非保密性研究赞助计划。阿特金森指出，这样一来，在国家安全局接手之后，国家科学基金会就可能把精力转移到密码学以外的领域中去。

这正是英曼一直希望得到的机会。他很快就答复阿特金森说，他的建议“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在执行任何计划之前，“必须先做好某些准备工作”。

如果对英曼的最终目的还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在 1980 年 5 月 31 日

举行的现代密码学研究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这些怀疑便消除了。作为“经过批准的观察员”参加会议的人中有莱布勒，他在花名册上登记的身份只是“国防部研究办公室主任”。实际上，他曾担任过国家安全局智囊机构——防务分析研究所通信研究处——的头头 14 年之久，当时是该局研究办公室首脑。莱布勒在一次未被载入会议详细记录的讲话中指出：“假如这种移交没有法律上的障碍，而且研究小组能拿出如何移交的有价值的建议的话，国家安全局将从国家科学基金会手中接管对密码学研究的资助事宜。”

显而易见，研究小组从未考虑过这一建议。尽管如此，英曼还是作好了夺权的准备，只要发现一项合适的研究计划，就立即行动。两个半月之后，这种计划出现了。8 月 14 日（星期四），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理论专家、当代密钥编密术的发明者之一艾德尔曼接到国家科学基金会巴恩斯的一个电话。使他吃惊的是，巴恩斯告诉他，国家科学基金会已决定不向他的研究计划中的某部分工作提供经费。当问及为什么时，巴恩斯只说这涉及到“单位之间的问题”。

第二天，艾德尔曼又接到了另一个电话，这次是英曼本人打来的。英曼解释说，国家安全局想资助他的研究计划。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事，艾德尔曼不想同国家安全局打交道。他后来对《科学》杂志说：“在目前的气氛中，我不想接受国家安全局的经费。”他说，他很担心国家安全局可能提出的条件。他不知道，如果该局坚持将他的研究列为保密项目，而他又拒绝这样做，该局是否会中断提供经费。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会禁止他按应有的程序进行研究工作，他还说：“这是一次机构之间相互勾结的可怕事件。”

国家安全局的突然介人，显然使得国家科学基金会手足无措。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六个星期之前刚刚辞职，而代理主席兰根怕格则是在阿特金森离任的几星期之前才当上副主席的。

在这个事件之后，英曼和兰根伯格都会见了白宫科学顾问普雷斯。最后决定，一切密码学研究计划至少暂时首先交给国家科学基金会，然后转给国家安全局进行技术审查。如果国家安全局想为某项计划提供经费，则通知国家科学基金会，由基金会让研究者选择接受谁的资助。

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审查了国家安全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三年半的扯皮经过之后，得出了下述结论：过去的事表明，“这两个机构并没有发生不和，只是以任务为重的国家安全局用哑谜似的官样文章给国家科学基金会发了一个信息，而后者仍在一个劲地想解开这个谜。其实，根据记录，国家安全局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了。”

1981 年 9 月 15 日，接替英曼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福勒中将发出了另一个信息，这次是发给美国计算机工业界的，但和发给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那个信息不同，它不是哑谜，而是明确的信息。

两个月前，国家安全局宣布成立一个新机构：电子计算机保密技术鉴定中心。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分析私营企业生产的电子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并按易被窃密的程度评定这些产品的等级。尽管接受审查是完全自愿的，但是福勒在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一次上讲话时明确表示，谁要无视这个鉴定中心，谁就可能失去有利可图的政府合同。这位国家安全局首脑警告说：“坦率他说，我们的意图就是要大大地奖励那些生产我们所需的计算机保密产品的国防部物资供应商。”

国家安全局希望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迅速推进私营企业研制保密计算机系统的工作，同时通过鉴定中心鼓励企业界让国家安全局分享其革新成果。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英曼在鉴定中心开幕式上说，如果缺少这种合作，就“有可能造成一种很不可取的局面，即私营部门的用户（如银行、保险公司）拥有比政府完善的系统。”

尽管他们发出了这些警告，但是，如果企业界的反应会像专业团体对公共编密研究小组所作反应一样的话，英曼和福勒也免不了会失望的。到 1982 年春为止，公共编密研究小组的自愿接受审查制度已被它的成员组正式否定了。大部分组织像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那样完全让科学家个人决定是否交付审查，并且不提交或不交的建议。

对审查制度如此缺乏热情可能是导致英曼将军在 1982 年 1 月大发雷霆的原因。他暴跳如雷他说，如果科学家们不同意自愿接受情报机关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的审查，他们就会激起公愤，这股怒潮，将导致用法律来限制发表那些政府从国家安全出发认为“非常敏感”的科研成果。

由于出现了他所谓的“美国技术内出血”的现象，英曼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警告说：“要求用立法方式解决问题的形势正在发展，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快了。事实上，这种解决方式的限制作用可能比研究小组的自愿审查制度更大，而不是更小。”

然而，到当时为止，英曼所谓的公愤“怒潮”连他自己的鞋底还没有打湿呢。

第七节前途也许将不堪设想

“中东某组织派出一名恐怖分子到纽约安放炸弹。……海地革命得到美国某一组织的支持。……从通话中获悉，一名国会议员正向某国政府索取款项。”……对此，应当如何处理？15 年来，G 组组长雷文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柬手的问题。如何划分国内目标与国外目标？如区分合法监听与非法监听？是以获取外国情报为目的，还是以执行法律为宗旨？

“应否对国内目标进行工作，在国家安全局内部曾有过激烈争论。”雷文说：“但此事很难解决。根本没有所谓纯粹国内目标这种事。”

在一个范围很广的领域里，国内外情报相互交叉，彼此重叠。其中最难处理的是被“吸尘器”戴截获的“不相于的”美国人的通讯。所谓“不相干”是说他们既非侦听目标又非监视对象。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因目标名单太庞大，国家安全局专用的巨型计算机存储容量虽然很大，仍不得不尽量把名单压缩。据雷文讲，譬如 MalcolmX 这一人名，程序编制员须将它缩略为最后两个字母“lm、空一格后，再输入其姓调。这样，只要监听材料中有这样的组合字母，通过计算机的读头，字母就会被自动检出。

计算机里之所以被监视名单材料塞满，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许多项目都会有大量的细目。例如要查侮辱尼克松的材料时，技术员须将各种可能出现的词句，如“TrickyDicky”等编成程序，然后还要把这个词转变成“ky……ky”。

如果挑选出来的材料还嫌多，可以进行“二次筛选”，如加上“纽约”一词把数量缩小。然而，经过一再压缩之后，即使将并非目标的美国人的电讯减少到只剩下十分之一，其总量仍很惊人。仅就“苜蓿”行动而论，每月筛选出来做最后分析的电文高达 15 万件。

再有就是侦听电话。虽然计算机还没有先进到能直接从通话中筛选出有用的词句，但是很容易给计算机编制程序，使它们一“听出”是谁在给目标打电话时，就启动录音机，将对话录下，分析人员可按照侦察手册上所列的情报要求来取材。

过去，国家安全局有一项内部掌握的政策：从电子追踪网上偶然得到的不相干的美国公民或公司的名字一概不向其他机构透露，如果比利时大使在电报中向本国外交部报告他在华盛顿某鸡尾酒会上听到某个美国人传的政治流言，国家安全局搞到这个情况，很可能只把这些流言转告国务院，而不提消息来源。

国家安全局担心，如说出美国人的名字，对方势必要采取行

动，这一来，整个监听工作就会告吹。

但是最难办的还是那些参与非法活动而又非既定目标的美国人的问题。安全局发现某个美国人通过中央车站电话亭，同在南美洲的贩毒分子勾结，进行非法活动时，只能报告说，有个不明身份的毒品贩正在中央车站向委内瑞拉定货……，但不能明确指出那个美国公民可能是谁。

安全局的许多用户认为不透露人名的政策是荒谬的。有一次因国家安全局拒绝提供某案中一个美国公司的名称，联邦调查局一直闹到中央情报主任那里，但结果还是失败了。

另一方面，无意中被收进国家安全局磁带库里的不仅有贩毒分子的言行，而且还有行为不端的国会议员向外国政府索贿的情况。这已成为 G 组组

长每天工作中的插曲。如何处理这种资料颇使安全局左右为难。但他们还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方针，把资料视为国内情报，扔进文件堆里了事。

国家安全局的另外一名官员穆迪曾因处理过牵涉国会议员不轨行为的证据而陷入尴尬的处境。她当过情报作业办公室的情报用户联络官，负责向政府各部门分发信号情报。因她通过截获的电讯，了解到韩国使馆一些电报的内容，退休后曾于 1977 年被召到众院道德委员会秘密作证。电报中可能有涉及某些众议员在接受韩国政府金钱后对国会施加影响的证据。

国家安全局最早的、也是被最严格遵守的内部工作准则之一，是禁止监听纯属国内的通讯，即收发双方均在美国国内的通讯。这样一规定，就不能获得各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与其领事馆及在纽约的联合国代表团之间的通讯。

在 25 年中,国家安全局就国外情报和国内情报的搜集问题一直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斗争。安全局坚持说，它的窃听权力是源子某种天赋的“总统的固有权力”，这是宪法赋予最高执政者的。但继水门事件之后，丘奇和派克主持的两个委员会揭发出大量滥用情报手段的事情。参议员肯尼迪与司法部进行了数月的秘密谈判之后提出了一项《国外情报监视法》。肯尼迪试图用立法来控制未经批准的监听，这次没有成功。

但《国外情报监视法》最后还是被通过了，并在 1978 年 10 月 25 日经卡特签署成为法律。

几十年来，监听技术的发展已大大超过了立法的发展。现在有了《国外情报监视法》，侦查工作终于被置于法律控制之下。而在此之前，对驻美外国使馆、外交人员及外国政府代理人的电子监视工作，一直波当成十分敏感的禁区，政府其他部门绝对不能过问。

根据这项立法产生出一个绝密的国外情报审核法庭。法庭设在司法部大楼顶层，房门装有密码锁，没有窗户，完全与外界隔绝。

为了分清国内情报和国外情报的界限，法律规定了复杂的批准手续，并补充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禁止将监听活动中无意获取的美国公民的通讯加以使用和分发。

仅举中央情报局要求国家安全局监听设在纽约、华盛顿和旧金山的“希腊旅游新闻办事处”的例子：

中央情报局的申请须先经情报共同体全国情报任务分配中心审定，列入“通讯情报优先处理项目”，然后送交国家安全局情报用户联络官。联络官再把申请送给负责希腊的 G 组组长。G 组组长和负责监听的 w 组组长碰头之后，认为监听这些旅游办事处就截取纽约、华盛顿及旧金之间纯属国内线路通讯，因此属于《国外情报监视法》管辖范围之内，须提出申请。

申请逐级上报，到了国家安全局负责情报作业的副局长那里，然后转给总法律顾问，由他确认监听对象是否属于外国官方机构或外国代理人，被监听的地点或设施是否真是由外国对象使用。

因为希腊旅游新闻办事处是“外国政府指挥和控制”的一个官方实体，所以符合监视法所说的“外国官方机构”的要求，凡是办事处的雇员只要不是美国公民或定居外侨，均可成为国家安全局的合法目标。但即使是上述责任中人，如果他们为希腊政府秘密从事犯罪活动，安全局也可将其列入目标。

其次，总顾问应保证采取符合“最低限度”要求的程序，使截取、保留和扩散美国公民通话的情况尽量减少。例如某个美国人为了了解办理签证的手续与某国驻美办事处通了话并未涉及国家安全，“国外情报监视法”就可

以禁止安全局将此人的情况保留起来或散发出去。

然而，如果这个人的电话或电报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国防或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局即有权转发这些材料，但一般不透露此人身份。

最后还有一种例外规定：若通讯涉及犯罪活动则可将内容分发。因此，偶然获得的议员受贿的证据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申请经国家安全局总法律顾问审议后，送到国家安全局局长国防部长手里，然后送往司法部高度隐蔽的情报政策及审查办公室。办公室的律师对文件作最后的润色并送司法部长批准。若获准，这些律师便在国家安全局信号情报作业办公室的一个官员的陪同下进入严加防范的国外情报审核法庭，向一位精通《国外情报监视法》的法官就此案的依据进行解说。

主持联邦司法部门这个宫廷法庭的人曾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官哈特。他与来自其他地区的 6 名法官任期是错开的，第一轮任期从 1 到 7 年不等。他们轮流来到华盛顿，在司法部主楼的一间密室中主持该法庭工作。这个法庭与其他法院不同：它秘密开庭，不传对手对质，也极少发布公开的意见和报告；它既未列入《政府机构手册》，又未列入《美国法院指南》，甚至连地址也秘而不宣。法官在批准截收许可证时，不需要对申请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以确认监听是否必要和适当。只要对象是“外国的”，而且符合申请手续，法官就只能批准而别无抉择。

自国外情报审核法庭成立以来，联邦政府从未在申请许可证时遭过挫败。至 1980 年 12 月，法庭批准了全部 518 次申请，只在 1981 年 8 月底有过一次例外。那一次司法部向法官申请对“外国指挥和控制的非法住宅性的房屋”进行秘密的“黑包”工作。但里根政府上台后，司法部又说，批准“黑包”工作的权力不应属于法院，而是总统的固有权力。主席法官哈特在法庭仅有的一次发布的意见中赞同这个看法。他否决了政府以前要求潜入某处的申请，但这一否决正好附合了司法部的观点。这样，“破门而入”的行动不需通过法庭、只需总统批准就可以了。

尽管法庭特别强调保密和安全，但有几个领域的事就是它也无权进行审查。一是国家安全局对外国使馆及受外国控制的其他机构的来往电传及数据通讯的监听；二是对美国国内的外国机构之间租赁的专用通讯线路的监听。这样，对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和其在纽约的联合国代表团之间的无线电或租用的微波电路的监听，国家安全局就不必按《国外情报监视法》的要求申请批准。

由于众院情报委员会认为这两类监听属于“政府在国内进行的最敏感的监听”，国会将批准权交给了司法部长独自掌握，而把情报审核法庭排除在外。

审核法庭实际上已演变成行政部门的一枚橡皮图章，而《国外情报监视法》的措词则更使它失效。国家安全局可利用“有意”或“无意”这类词句随意监听美国国内的国际通讯网，并把偶然迈出国门一步的任何美国人都列为目标或列入监视名单。

在美国国内，只要通过微波监听，国家安全局仍可随意将往来或通过美国的每一次电话或电文通讯收录进它那粗大的“吸尘器”。安全局可为高速计算机每分钟打印 2.2 万行的印字机编制程序，从而把含有如“石油”或“民主党贝”等关键词句的每一份电报或电传挑选出来。与此同时，手持监听清单的语声分析员仔细监听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的通话，并把含有指定内容的通

话记录下来，以备分发。

情报监视法说，“电子监听”就是对既定目标“通过电子、机械或其他监听装置获取情况”。但它对关键的“获取”一词却未下任何定义，而把这事留给了国家安全局。安全局在一份绝密文件中给这个词下了定义：“获取就是由国家安全局通过电子手段对并非发给它的通讯进行监听并将其内容加以处理使之具有一般人能够读懂的形式。”

通过精心插入“由国家安全局”的字眼，它巧妙地把从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或其他非安全局来源的全部截获材料都置于《国外情报监视法》和审查法院管辖的范围之外。这样，政府通讯总部就可对国家安全局有兴趣的国内或国外线路进行监听，并根据“联合王国—美国协定”将材料转给国家安全局。

这种做法从安全局的“尖塔”活动就可看出。在司法部对国家安全局非法监听的一项调查中说，“‘尖塔’情报，除了涉及毒品的国际通话一类之外，其余都是国家安全局在监听国际通话或电传等通讯中偶然获得的，或是通过政府通讯总部监听电传和国际电报公司海底通讯中获得的。”

国家安全局还对“通过电子手段”一语解释为：如果接受通过人手送交的商业通讯公司磁带，像在“苜蓿”行动中所做的那样，就与《国外情报监视法》无关了。

最后一句定义规定：在通讯被处理成“具有一般人能够阅读的形式”以前，就不能认为国家安全局已“获取”到任何情报。这样，国家安全局就可毫无顾忌地监听国内国外所有通讯而不受法律管辖。只要不去进一步“处理”通讯的“内容”，《国外情报监视法》就对之莫可奈何。

1978 年 1 月 24 日，卡特总统颁布了一道行政命令，详细规定了对全国情报机构的限制，防止重新出现 60 年代和 70 年代大量滥用权力的现象。但 4 年后里根总统废弃了这道命令，并大大扩张了侦察机构在国内行动的权力。

新命令由中央情报局总顾问西尔央主持的工作小组起草，经过修改在 1981 年 4 月签署形成法律。

命令在“情报活动的实施”一节中，正式授权司法部长，只要他认为“有理由”相信目标是“某外国政府或其代理人”，就可以批准国内“黑包”工作。

里根的命令同时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国家安全局是否有权协助各级执法机构进行与信号情报无关的密码分析的问题。

联邦调查局有一个秘密的密码分析和翻译科，隶属于该局研究室技术估价处。多少年来，该处一直隐藏在华盛顿市东南郊宾夕法尼亚道二一五号一座没有标记的米黄色大楼里，专门破译犯罪集团之间的密码通讯。

联邦调查局密码破译员的主要时间都用来破译“布基”的密码系统。这是一种将跑道、马匹、赌注等各种赌博资料译成数字，再从数字译成暗码的密码系统。调查局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破译。然而也不时碰到一些特别复杂的系统，这时调查局就要向安全局求援。往往由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沙利文给 G 组组长雷文打个电话。雷文把这些难破的密码交给分析员，在空闲时间解决，有时他们在吃午餐时就给破了……然后再送回联邦调查局。

送到 G 组的案件有简单的赌博案，也有复杂的谋杀案。有一起款额巨大的“猜数彩”诈骗案牵涉到五角大楼的人员。交易细节以及组织者、参加赌博者的名字都使用暗语。国家安全局破了暗语之后，联邦调查局随即对有关

人犯进行搜捕。这时诈骗案的主要组织者们互相猜疑对方告密，造成了流血惨案。

并非所有案件都使用传统的笔墨书写暗语。有一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诈骗犯，数月之中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任何通讯联系。但发现他们都把一种价值 10 美元的高级衬衫寄给拉斯维加斯市的一家干洗店。联邦调查局认为衬衫是一种密码，悄悄拜访了国家安全局。G 组分析员将衬衫数量、颜色、尺寸、纽扣一一绘表，作出记载，甚至仔细记录下每一件衬衫的不同气味，最后确定，问题出在每次送来的衬衫数量上。联邦调查局把罪犯一网打尽。

国家安全局担心卷人这类合作被发现，到 70 年代初，停止了一切这类合作。

现在，根据里根的行政命令，安全局有权协助联邦政府任何部门进行密码分析了。

丘奇委员会十分担心这种权力，曾警告说：“国家安全局侵犯美国公民私生活的潜力是任何其他情报机构无法比拟的。”曾在中央情报局通过研究与发展部门工作过的沃特斯也对这种权力忧心忡仲，他说：“现在，数以吨计的电子监听设备与国际国内的公共关系统相联结。还有许多设备已签定合同等待安装。天晓得穿孔卡片将在何时悄悄落人机器，上面记载着你、我的电话号码。”

自从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局的出生证以来，几十年中美国同时经历了两场革命。一场是，微波和卫星大大改变了电讯技术，使电线几近淘汰。已有 9 颗国内卫星在运行，并有更多的卫星用于国际通讯。每颗卫星都拥有数以千计的通讯线路。通讯卫星公司的 4 颗通讯卫星，每颗都有 1.8 条长的通讯线路。通过这些无形道路的，不仅有数百万次电话通话，而且还有数百亿字词和数码，其中有最简的电报、电传信息，也有复杂的计算机数据。现在甚至已开始在用微波和卫星传递信件。

1980 年，美国邮政总局开创了国际电子邮政系统，通过卫星及海外合作的邮局，可以把各种书信和图像迅速送交收件人。1982 年 1 月，邮政总局在国内开放了一种电子计算机邮政，将计算机产生的电子信息通过卫星分检，发往全国各地邮局，各个邮局再将内容复印、自动折叠、封口、贴上邮票交邮递员送出。

据美国无线电公司估计，到 1990 年，全国邮局处理的全部 750 亿件书信，将会有三分之一通过这一无形的空中邮路传递。

与此同时，另一场革命改变了国家情报的收集方法。过去美国技术原始情报的主要来源是手持微型照相机的秘密特工人员。而今天，情报的来源则是那些世界范围的微波信号网和卫星通讯的长河。安全局将收到的信号加以处理，便可在经济、政治、外交及军事等方面获得丰硕的情报成果。

卡特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又做过国家安全局局长。他同人工情报和信号情报这两种情报收集方式都有过密切关系。他认为信号情报不受情报中央委员情报分析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比人工情报准确、真实、及时，要高明得多。

由于这两场革命（卫星和微波技术的巨大发展及信号情报的大量增加）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必需有第三场革命，即法律革命来解决。国家安全局已成立几十年，当今没有一个正式的宪章，而只有一项《国外情报监视法》。这只是一条保护情报机构免遭公民攻击而不是保护公民免受其侵犯的行政命

令。

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技术使截听公民的个人私事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因为随着通话被转换成数字信号，就可把电话谈话通过监视词句编制程序的计算机加以处理，把人声变成文字记录。

以往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要对这种技术专制有所防范的话，这种防范不会来自国会，而很可能来自学术界和工业界，要由它们为私人及商用通讯设备安装的保密装置。因为如果没有保护，前途也许是不堪设想的。